敬文东学术随笔系列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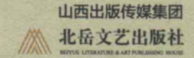


颓废主义者的春天

关于身体、记忆和时代的诗学建构、文体探险

敬文东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颓废主义者坚决拒绝他的时代，他只愿意成为这个时代的旁观者和观察者。

在现时代，从任何一个角度看，技术都绝佳地满足了人类好逸恶劳、好吃懒做和热爱堕落的天性。欲望成了人的唯一灵魂或灵魂的主要部件。

装在这本小书中的文字，基本上都在松松垮垮地谈论欲望和快感。明眼的读者能够一眼看出，在这些文章中，有的是正面在谈论欲望与快感，有的采取了迂回包抄的方式，还有的则使用了离题万里的放风筝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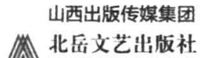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78-3963-1
9 787537 839631
定价：34.00元

敬文东学术随笔系列

颓废主义者的春天

敬文东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颓废主义者的春天 / 敬文东著. --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378-3963-1

Ⅰ. ①颓… Ⅱ. ①敬… Ⅲ.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1576号

书　　名：颓废主义者的春天
著　　者：敬文东
责任编辑：续小强
助理编辑：孙明亮
书籍设计：张永文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5628694（编辑部）
010-57427288 57427866（北京中心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　　真：0351-5628680 010-84364428
网　　址：http://www.bywy.com
E-mail：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9×1194 1/32
字　　数：243千字
印　　数：1-3000册
印　　张：10.875
版　　次：2013年10月山西第1版
印　　次：2013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78-3963-1
定　　价：34.00元

目录

第一辑 丰益桥笔记

第二辑　感谢的声音

第三辑　一些疑问，一些随想

第四辑　虚构的和真实的

第一辑　丰益桥笔记

丰益桥，北京西南三环上一座普通桥梁的名字。几年来我一直居住在它身边，我忙碌、卑微的形象被它所目睹，它沉默而近乎伟岸的身躯也为我所瞻仰。它在暗中教育了我；就在它身边，我写下了不少粗疏的文字。为了表达对它的敬意，我要把其中一些文字献给它，并以它的名字来命名。

一、三十四岁的三十四句话

1. 作为一个没有太大力量的人，我需要从我不屑的人与事身上寻找勇气。

2. 我厌倦了，但为了活下去，我必须从厌倦中获取养分。

3. 写作不是拯救，写作也许是拯救，写作肯定是拯救。——这需要再试一试才能下结论。

4. 所有形式的煽情都是极端的修辞行为，都是修辞世界得以形成的主要建筑材料。但修辞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

5. 寻求事物的真相是我今后的努力方向，而我在修辞世界中已经生活了将近三十四年。

6. 我每天做出的动作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垃圾动作，我需要把非垃圾动作提高一个百分点。

7. 作为一个怀疑主义者，我不配有任何信仰；对于一个怀疑主义者，任何信仰都配不上我。

8. 快乐就是绝望，或者说，快乐就是绝望的可能形式之一。对于一个怀疑主义者尤其如此。

9. 从此以后，我要把曾经敞开的后背和胸膛护住。

10. 不要轻易相信因果关系，但要同情动用因果关系的人：因果关系在绝大多数时候是绝望的人、无可奈何的人或者不可救药的人的救命稻草。

11. 保持记忆的真实性。记忆没有权力把它主人的小伤口上升为艾滋病，更没有权力把“一个女店员的焦虑上升为形而上学”。

12. 对转弯处保持好感——它是奇迹的集散地；对转弯处保持警惕——它是危险的密谋处。

13. 由于神经衰弱或者过于兴奋，你是一个天天做梦的人。记下它们。把它们记在笔记本上。

14. 不要为自己的见解总有人捷足先登而沮丧，那正好说明你是一个正常人，既不是天才，也不是白痴。

15. 争取发明一种可以承载梦想的非修辞性的学术方式，争取发明一种懂得羞涩和能够承纳羞涩的学术方式。

16. 我讨厌所有人尽可夫的貌似高贵的词汇，我较为相信方言。

17. 热爱父母是一切道德的最低限度。

18. 一定要把自己的房间处理为诚实的空间——既然你不能排除别人的房间中的虚伪。

19. 解释生活可以，但不能犯“用肥料去解释鲜花”的错误。

20. 要学会宽容自己与他人身上的自相矛盾，要学会感激自己身上的自相矛盾带给你的滋养。

21. 用右手作恶，但保持左手的清洁。

22. 慢慢吃饭，慢慢走路，慢慢写作，慢慢生气。

23. 努力抱怨是为了努力排除内心的黑暗。

24. 抛弃所有的美女，去爱那些丑姑娘，犹如爱风景中的黑暗部分。

25. 了解一个源头和两个结尾，就算完成了任务。实际上，一个源头和一个结尾也不了解，你也完成了任务。

26. 不要相信任何型号的英雄，但可以相信英雄尤其是充气英雄身上的喜剧性。

27. 一个长了一双全平足的人，却被强迫着走很远的路。这就是能力和目标之间的巨大差距。

28. 一条小河、河中的一条蛇、蛇口中的信子，是我对故乡和童年的永恒记忆。

29. 喜欢剑走偏锋的人，只是一个道德上和写作上的技术主义者。

30. 往前走，不如往暗地里走；往人多的地方走，不如回家睡觉。

31. 我不配充当任何人的敌人，任何人也不配充当我的仇家。

32. 梦是呈阴性的，房间是呈阳性的，这就是梦能够和必须在房间里进行的原因。

33. 他真像一个人！而我不过是一个犬儒。

34. 争取依靠写作把无聊的日子进行到底。

2002 年 6 月 19 日

二、非典*，五月，每天一条佐餐笔记

第1天：现在（之一）

现在是五月一日。我只剩下一个窗口、一次五十公尺之内的遛狗、一个夜晚、一个白天、二十支香烟、三瓶啤酒、几毫克的怒火与五盎司的等待。当然，还有一个居民住宅小区。都五月了，它还浑身无毛，却竟敢号称“××花园”。

第2天：口罩及其他

口罩，白色的口罩，黑色的口罩，内裤颜色的口罩，像保护理论大厦的逻辑，苍白地保护我们。还有出入证，还有贴在出入证上陡然苍老的面孔，还有得自童年时期的悲观和根深蒂固的绝望，还有被禁闭的狗、狗的愤怒和怯怯的呐喊，还有松松垮垮的阳光——它漫不经心地照进了我幽闭多日的书房。从今天起，我开始写那篇注定不会发表的文章。

第3天：偶然之间

也有偶尔到来的揪心想念，偶尔到来的脆弱兴奋，偶尔到来的雷声、雨水、冰雹、上天的震怒，还有偶尔到来的远方、运动、问候、呼喊、小

* 非典，学名Sars，一种超强传染病，2003年4月至6月席卷中国尤其是京津地区。

小的善意的疾病、幽暗的呓语以及呻吟。今天，我终于愿意说：让我们活在胜利中，让我们活在遥遥无期的庆祝中，哪怕是让我们活在无期徒刑中。

第 4 天：四种性质的梦

但更多的是梦境。它们不请自到，天天光临我神经衰弱的卧室：一个梦让我欣喜，另一个梦让我恐怖，还有一个梦在前两者之间起到了平衡作用。但它让我醒来后心如枯井、万念俱灰。所以我只能期待下一个梦，它号称第四种梦。

第 5 天：今天或现在（之二）

今天可以随便修改格言、篡改语录。今天允许每一个人随便修改格言、篡改语录。但今天不允许任何一个人随便制造谣言、传播蜚语。今天，又有了新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得随便信任谣言，否则重者收监，轻者罚款。

第 6 天：名句选辑

竖子成名，遂使世无英雄。（阮小二）

天地玄黄，脸蛋洪荒。（无名氏）

我不入洞房，谁入洞房。（释老大）

唯君子与男人为难养也。（孔老二）

吾善养吾渺然小气。（孟老三）

人定胜苍蝇！（荀老四）

师者，所以传谣、授受、解不惑也。（韩老五）

灭尽天理，复尽兽欲。（朱老六）

立志成痞则痞也，立志成猪则猪矣。（王老七）

为肠胃立心，为脸蛋请命，为情妇继绝学，为肾脏开太平。（张老八）

老子的队伍才开张。（臭老九）

通往茅房的道路是黄金的道路。（吴老十）

五月就要过去，非典就要结束，所以不认识非典的三月就会到来。（鄙人）

向口罩致敬，但主要要向肛门致敬。（还是鄙人）

第 7 天：谈谈自己

我终生的朋友：失败、无聊、自杀、出家的念头和破罐破摔。

我终生的爱好：写作、发脾气、喝啤酒以及抵抗终生的朋友。

我终生的渴望：平静、安静、清净和洁净。

我终生的敌人：狡诈、弱智、卑鄙、伪善、既不要脸又不要命，最后一定还要再加上一部分人的所谓好运。

第 8 天：新增的条文

必须要制定新的法律，以便保证任何文章都拖有一条光明的尾巴。

第 9 天：脏话或现在（之三）

现在，我最喜欢说狗日的、日你妈，日你妈、狗日的。今天，我听见自己在梦中都在说这样的脏话。今天，又是今天，我写完了那篇起始于第二天的文章。它确实又臭又长。

第 10 天：不期而至的白发

第一根白发让我心惊，第二根白发让我有点心惊，第三根白发让我感到骄傲，第四根白发让我感到沮丧，第五根白发却让我感到它来得太不舒畅，仿佛它竟然是从天而降。

第 11 天：关于照片

照片：傻瓜的纪念品。照片：青春的垃圾场。照片：情人的性欲替代品。照片：老年痴呆症的商标！

第 12 天：偷自一篇小说

我梦见我正坐在一间幽暗的教室里。我们的老师杨 ×× 正在教我们学习四则运算。他使用了大括弧、中括弧和小括弧，也给我们讲明了大括弧、中括弧、小括弧的用途和各自的权力。按照尊老爱幼的伦理学传统，杨老师说，计算的顺序应该是小括弧第一、中括弧第二、大括弧第三。为了提醒我们，也为了便于我们理解四则运算，杨老师强调说：还不是把你们这些祖国的花朵放在了第一位，你们这些兔崽子！但我们理解不了杨老师的幽默，因为我们遇到的实际情况刚好相反：我们天天在家挨打，我们每天都要受到父母——也就是人民群众——的欺负。于是我们七嘴八舌地反对杨老师的意见。但杨老师挥舞着教鞭，最后还是成功地镇压了我们试图对数学举行的起义，消灭了我们对数学的不满和不敬。然而，令我们更为惊讶的事情还是出现了：杨老师在黑板上演算了大半天，粉笔费了一打，那道带有大括弧、中括弧、小括弧的四则运算题的答案居然为零。坐在我身边的张大顺

同学终于忍不住了。这个一年后得了小儿麻痹症、二十年后在打工的养鸡场触电身亡的哥们儿站了起来：忙了半天，屁都没有，老师，你究竟想要我们干什么？

第 13 天：偷自一首诗

亲爱的美眉，亲爱的小秘

亲爱的小妹，啊消化我精力的肠胃

你是我的腰花、葱花、玫瑰花

你是我的补丁我的衬衣以及活见鬼……

第 14 天：偷自一篇散文

当上帝吐掉牙齿缝隙中的肉屑，魔鬼是否也需要拔出植物纤维？因为它一贯摆出来让我们看到的凶恶，竟然让我们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魔鬼其实是个素食主义者；魔鬼一直是个素食主义者。它表面上的凶神恶煞，只是为了掩盖这一事实，而我们居然被它欺骗了数千年。

第 15 天：偷自一封信

啊，王老五，我的心肝，我的哥们儿，我在自杀前又一次想起了你。我仿佛又一次看见你行尸走肉般的生活，我仿佛又一次看见你的不思进取。有那么多的山——比如乳头山——在翩然起伏，有那么多的洞——比如水帘洞——在流水叮咚，你为什么偏偏要埋首在坟墓一样的书房中？你为什么不埋着头直接就往那里边拱？

第 16 天：偷自一则日记

我要去自愿上当，我要去杀人，我要去当和尚，我要去割包皮，我要去流浪，但我现在的一门心思是抢银行……

第 17 天：啤酒的优点

对付时间、空虚、死亡、怒火、夜晚、诗歌、仇恨、官僚、秦始皇、非典、艾滋病、二万五千里和伪学术，啤酒都是最好的武器。啤酒是它们最好的朋友或最差的天敌。

第 18 天：香烟的用处

香烟最大的用处体现在历史学上。香烟在人世间所有的学问中，只看重历史学。依照它的本意，它愿意把我们的历史分为两半，然后供我们研究：有香烟陪伴的历史和没有香烟陪伴的历史。我们认为：前者是不幸的，后者是悲惨的。但香烟断然否决了我们的肤浅看法，它的结论刚好相反，但又最终和我们的意见完全相同。

第 19 天：词语

词语，我虚拟的食物。词语，我真实的情人。词语，让我暗中勃起的词语！你是我的坟场，我的葬身之地，我的来世和今生，我的死亡和一小把骨灰！

第 20 天：臆想中的官司或口福

我的小学老师贾 ××，在我当年冒死从河中捉了一条鲤鱼，碰巧

成功消灭了他老婆身上某种久治不愈的怪病后，马上赞扬我以后有可能当上国家主席。现在我准备和他打官司：我拼了多年命，才有机会坐在一所大学的班主任的宝座上——据说相当于行政二十二级。他调戏了我，他欺骗了祖国当年的花朵。现在我申明：如果仍然拿不出一个主席的职位，我就要让他请我当赔罪宴上的主席——当然以他还活着为前提。

第 21 天：童年片断

我穿过一片坟林时，听见坟墓中一连串的窃窃私语。说话人自称是我的祖先。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我。当然我也不曾见过他们。但我清楚地听见他们说，这孩子，哎，他妈的这孩子……我吓了一跳，不知道他们说的究竟是个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我如此失望——毕竟我是一个幼童，还没有机会辱没祖宗。我于是大喊了一声：喂，你们他妈的说清楚一点！当我屏气凝神等他们再次说话时，却什么声音也没有了。结果那天晚上我哭爹叫娘，高烧不止。奶奶认为我被祖先们吓着了，冒着黑暗去祖先们的坟头叩拜、唠叨，申说她的困难，叫喊她的苦命，顺带替我赔罪，并擅自给我带回了两块卵形的小石头，要我揣在贴心的口袋里。

第 22 天：祖父

我无数次梦见过他，我的祖父，我的爷爷，我终生最热爱的人。我在他的背囊里，坐碎了他亲爱的酒瓶子，因为他背了我六十里地！我也坚信他会梦见我，天天梦见我。但直到有一天，在中关村的人流

中，我看见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老人，我才确信他真的已经死去了。梦不再属于他，梦只属于我。实际上，我是看着他咽气的。我用左手替他合上了右眼，我用右手替他合上了左眼。那一年我十三岁。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怕任何死亡。从那以后，我见到了太多的死亡。而再一次看见和他长得相像的人时，我已经人到中年，浑身是病，已不再为这样的巧合感到惊讶。但我仍然想追上那个人。我想看个究竟，就仿佛一个大盗前往目的地踩点。当我在车水马龙的中关村追赶那个人时，摇摇摆摆的老者已经走到了街对面。与此同时，能够把我装载回家的公共汽车，停在了我眼前。偌大的北京啊，堵车是最常见的事情，而我的家居然错误地离中关村足足有十多公里。我最后一眼看见那个老头，当然是在拥挤的车上。我拼命往窗口挤：在我用拐了好几个弯的目光寻找到那个老头时，他正在街对面的人流中，趁着夜色偷窃钱包并被人当场抓获。我为此暗自热泪满面，为没有机会抢救他后悔不已。

第 23 天：回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

那天下午，天气很好

太阳是深秋的太阳

如奶奶锅里的红苕

我跳进河里

那天下午，河水很清

污染躲得远远的：

我又是一尾鲫鱼了

眼睛似樱桃。

那天下午，我学会了写诗

关于阳光，关于爱情

那天下午，我忘记了

晚上在一步步走近

那天下午，我和人打球

输了很多

那天下午，我想起了

更遥远的一个下午

爷爷牵着我

给自己找坟地

那天下午，我想起了你

我远在天涯的爱人

长着一对白白胖胖的乳房

……

第 24 天：奶奶

每当她老人家拿着黄荆条，迈着小脚瘪着嘴唇，趺趺撞撞、骂骂咧咧准备收拾我的时候，我总会拦腰抱起她，把她举得高高的。无意中还撞见了她羞涩的、苍老的乳房。每当她觉得被我举得高过了我的头顶时，她总会大笑不止，骂我长得快，比她想象的还要快。然后就在笑声中和喘息中，忘记了我的一切罪行。她真轻！也许不足六十斤，以至于我十岁的时候就敢将她拦腰举起。她死于我十四岁那年的十二月。是我把

她抱进了棺材。我感到她比她准备收拾我的时候还要轻、还要飘忽、还要……高兴，以致让抬棺材的人都感到吃惊。

第 25 天：一个推理示范

历史从来都不仅仅是事实，或者，历史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事实——事实是一个乌托邦。历史只是解释。历史从来只仰仗解释。

解释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眼前的生活。因此，一切解释都要遵循下述定律："凡存在的，就一定是合理的。"

合理的生活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需要历史和解释。但没办法的是：生活一直需要理由。更没办法的是：理由就是信仰。

信仰不过是解释的副产品。但信仰的最高形式是自成体系的信仰。

体系使信仰理性化、规范化、条理化、法则化和经典化，体系让信仰得到了完整的表述和说明。但体系最后无一例外地总会让信仰弄丢了自己，因为信仰只是对生活的一种特殊解释。

任何解释都要以解释者的自身生活需要为出发点，所以任何体系之间都是互相矛盾的。矛盾在它的终极处产生了战争。

战争就是一种解释和另一种解释之间的斗殴、谩骂、互相吐口水。按照和平主义者的期望，要想免除战争，要想节约口水，就必须开除解释。

但任何和平主义者都知道，开除了解释，也就没有了历史。

第 26 天：天涯

天涯的十分之一是良心，十分之二是推理，十分之三是好运，十分之四是你。

第 27 天：论解放

伟大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l Newman）赞扬拿破仑说：“因为他懂得火药的语法，所以他能解放全世界。”“因为”是纽曼给出的，“所以”是我——一个非典时期被迫幽闭的中国人——捏造的。

第 28 天：夹在上海时期的笔记本中已经六年的一个小片段

梦的含义是什么？哲学家胡梭发道斯基院士在他那本有名的小书《梦想研究》里说，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几乎都曾碰到过这个小小的难题。胡梭发道斯基院士的哀叹，其实可以概括如下：梦虽然是个小如跳蚤的问题，却又不免具有跳蚤的机灵度。它总能从那些号称特大号的哲学家的眼皮底下开溜，拒不对他们提出的所有论据、论点负责。不用说，这中间也包括我们大名鼎鼎的胡梭发道斯基院士。这让我想起了《伊索寓言》里打败狮王的那只小小的蚊子。当然，小东西洋洋得意之余最后又不免陷身于蛛网，毫无悲壮色彩地填饱了蜘蛛大人的肚皮。这是你我早就听说过的“寓言”故事了。小米也知道。小米是一个人的名字。这家伙长得和我一模一样，简直让我都无法分辨。比如说吧，我额头有一条伤疤。那是我在调试录梦机的时候不小心划伤的。当时我忙得手脚无措。因为事情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根本没有时间去管一个小小的伤口，更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伤口，会给我其后的“爱情”——假如它真的算爱情——带来那么大的麻烦。当时我想的是，和我一生的理想——录梦机——比起来，我宁愿舍掉一条腿，额头划伤又算个屎。按照规律，伤口后来结了痂。撕去那个叫做痂的东西后，我也算是为理想挂了彩。有趣的是，小米

额头上的同样位置也有一条伤疤，像一根拉长了的蚯蚓。照他的说法，他是在唐朝的宫廷里，为杨玉环写那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时，不小心被高力士的砚台砸伤了。按照小米的意思，高力士是因为嫉妒才假装失手伤害他的。小米还说，高力士后来专门向他道过歉，请他泡过妞，其中一个妞，“简直比他妈杨玉环还要风骚一百倍”。听他说完，我哈哈长笑了。我说小米你在做梦吧，唐朝早他妈下了地狱，唐朝早就成了一个素食主义者，像那个狗日的魔鬼一样，你还以它为骄傲呢。小米不屑地看了看我，带着梦幻般的眼神对我说：你知道个狗屁！小米接下来问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我说，你最好不要装疯卖傻，你最好弄清楚点，现在咱们不就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局子里吗？小米鄙夷地一笑：错了，哥们儿，我们现在在他妈大唐的监狱里！我们就快被处死了！见我无话，小米停了几分钟，又愤愤地说，怎么还不给老子们送啤酒来？

第 29 天：父亲

我父亲一直是个命运爱好者、神迹收藏家。但在我看来，他收集到的神迹都是二手货。他顶多只能算个业余收藏家。他从来都没有弄明白，神迹也是要钱买的。但他每年都要洋洋得意地给我画一道珍贵的符。按他的说法，这道符能保我一年平安无事。他命令我：必须要把那道符带在身上，哪怕去参加党代会。我前前后后带了差不多二十年，但我至今还没有成为我党的党员。在我看来，即使从最有孝心的角度说，父亲给我画的符也是二手的，因为他画的符来自他收藏的二手神迹。我暗中嘲笑过他无数次，当着他的面也嘲笑过很多次。但他每次都执迷不悟地痛

斥我的执迷不悟，甚至还威胁我说要和我断绝父子关系。我听了他煞有介事的威胁之后，总是笑着对他说，那就去他个娘的，你要真不承认我是你儿子，我也没办法。当然，每一次我都妥协了。为了表达孝心，我还帮他威胁过另一个“受害者”——我的小妹。我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就随老爸去吧。

第 30 天：想起十四年前的声音

置身人海
有一种声音不断传来
那是在一辆破旧的长途汽车上
有一个少年告诉我
他刚从新疆回来
那里雪真大
看不见房屋
狼的眼睛像两扇窗户
他告诉我
北方的狼冷得打抖
他在那里做小工
如今赚了一笔冷钱
正准备回家购买春节
他给我抽新疆的烟
我吸着像在吸新疆的雪
可我感到很温暖

毕业时我曾申请去新疆工作

听说那里大漠孤烟

风景不错，落日很圆

却没被父亲批准……

被他拽回了故乡

于是我终生难以用手指

触摸世界的边缘了

那个少年劝告我

还是家乡好

死在家乡

不会抛尸异地

他的笑很年轻

幸福肥肥胖胖

……

置身人海

那声音不断传来

我紧塞耳朵

我把它堵在门外

原打算去流浪

今夜有风七级

家乡的风七级

我得想想

好好想想……

第 31 天：总算熬过去了

今天是三十一号了，我还活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是一个可以写进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胜利。那么多人死去了，他们的姓名我一个都不知道。与死者不相干的其他人也不会知道。但我还是为剩下的晚上买好了香烟和啤酒。我早已将它们放在了窗口。在等待中，在几盎司的愤怒和更多的绝望中，我准备和谁喝一壶？和 X、Y、Z 还是 S？当然，不多不少，我买回的依然是香烟二十支，啤酒……三瓶。要是有人来，要是你来，那我再下楼去买。

2003 年 5 月 22 日

三、小评注

有如黄河鱼，出膏以自煮。

——苏东坡

1

一个单纯依靠内心生活的人，其生命最多只能持续十年或者十五年。

2

“不能永久生活，就迅速生活。”这是依靠内心生活的人一贯崇拜的座右铭。从能够看清事物眉目的角度进行观察，这种局面之得来，仰仗以下两种情况：依靠内心生活的人受到了时代的快速之箭的诱发却无力自拔；依靠内心生活的人想尽快耗完自己的一生，因为他不愿意长期忍受外部世界的无聊。因此，依靠内心生活的人最终和速度相关，而速度归根到底是一个时间概念。依靠内心生活的人最终依靠的依然还是时间。只不过相较于我们，时间给了这种人特殊的外形结构而已：时间包纳了这种人的心脏，时间始终在要求这种人的心脏能够适应快速的时间本身。依靠内心生活的人最后无一例外要死在时间之前：他撤退，他前进，他原地踏步，但他最终只得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只需要一个跳跃和倒栽葱，他就能得到他所需要的解脱。

3

解脱取决于中途退场的决心，但由于依靠内心生活的人天生胆小，他最终连一个微不足道的窗口也得不到。

4

依靠内心生活的人通常对外部事物不屑一顾，只偶尔对他感兴趣的人和风景投以一瞥。他就这样把用于解脱的窗口，处理成了可以盛纳视线的暗中通道。和我们不一样，依靠内心生活的人与外部世界的分裂是彻底的、决绝的。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外部的一切都只不过是用于内心反刍的材料，即使是通过窗口映入眼帘的一堆牛粪、一朵残花、一枝败柳，也能在他的反刍中成为内心的有机养料。他坚信自己的内心足够强大。但他没有注意到，危险正是在他的妄自尊大中一步步靠近他的。当他只顾消耗内心而不能有效补充内心所需要的能源时，内心正在以加速度的方式趋于老化。可以设想，一部高速运转了十年或十五年却又从未从外部获取有效营养的机器，要是不老化，就只能依靠奇迹。对这个人来说，唯一可能的结局就是突然衰老、内心坍塌。在这种时刻，他有一张足够年轻的面孔，却有一头白发和过早酸软的四肢。

5

内心是一架具有浓厚的形而上学性质的机器，但它又不是虚拟的机器：它是一架需要真实的力量去滋养和启动的机器。依靠内心生活的人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重要任务：不断开动这架机器，加大它的马力，让它高速运转起来。这种人就是从完成这个重要任务的过程当中，才获得了

生存下去的活力。

6

从字面听上去，依靠内心生活的人，其步伐和心跳都应该是从容的，但必须要完成开动机器的重任却使他格外性急。因为如果没有急躁，机器就会停顿下来，生存的活力也就会不复存在。凭良心说，形而上学性质的机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拯救了他；但天地良心，这架机器同时也对他构成了伤害。在所有可能的伤害当中，心脏受到的损害也许最大。这就是说，依靠内心生活的人最有可能得心脏病，哪怕他从前的心脏是如此健康，搏动得如此有力。但这确实怪不得他，因为没有任何心脏能够长期适应包纳心脏的快速的时间本身。

7

对于依靠内心生活的人，有两种情况值得充分考虑：依靠急躁使内心机器高速运转，其结果肯定是毁灭——因为它得不到有效的休息；依靠从容让内心机器慢慢趋于静止，其结果也是毁灭——因为静止意味着生存活力彻底消亡。这两种情况的根源在于：在解除了外部拯救的所有可能性时，内心机器的高速运转就是生存活力的唯一来源；而随着机器不断老化，要让它保持高速运转的态势，就必须给它施以更大的助力。一个重要的问题就这样在悖论中出现了：运转和使运转得以产生的力量实际上都来源于这架机器本身。这无疑再度加快了机器的老化。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一旦停机，这种人又该怎样生存下去呢？他还有力量从活力的彻底丧失中站起来吗？

8

依靠内心生活的人确实是傲慢的：他鄙视一切，除了内心的力量，他不屑于相信任何其他的东西。但在一度时间内，这种人怀着可笑的、战战兢兢的心情愿意相信爱的力量。但他终于没有看见什么是爱。他不过是看见了几根爱的鞭毛——这和我们大多数人把鞭毛当成天使遗落的羽毛迥然有别。依靠内心生活的人思虑再三，在终于否决了爱之后，接下来他就不再需要相信来世。因为像他这样的人肯定没有能力作恶——当然也不屑于作恶，因此，假如有来世，他必定还会是人。这恰好是他万难忍受的事情。这种人因此从心底里就不相信任何型号的拯救，他甚至把不信任的态度推广到每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身上。依靠内心生活的人根本看不起医生。他认为医生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最可耻的人，在干着一些伪善的事业，竟然在采取各种方式割断人的解脱之路。从各种可能的角度上说，依靠内心生活的人都是医生和医学的天敌。按照这种人的真实想法，他倾向于看不起任何人，其中也包括他自己。

9

但又确实不能将纯粹依靠内心生活的人视作狂徒。这种人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于人无害的悲观主义者罢了，也基本上不会对他人构成实质性的伤害。他唯一能够伤害的人只是他自己。依靠内心生活的人都是一些无聊的自虐狂。

10

这种人不相信外部的一切。他认为外部的事物不过是假象，是毫无

意义的尘土。但从任何一种意义上说，依靠内心生活的人又绝不是佛教徒。这种人甚至把生活本身都看作外在的、异己的事物。生活不过是给了他一个必不可少的存身的场域。当然，这种人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悲观主义了解得十分清楚。他深陷其中，无力自拔。他把这一局面的到来全归功于命运在从中作梗。而对于命运，这种人向来无话可说。他拒绝谈论命运。正是因为对外部的彻底否定和不信任，依靠内心生活的人才在无奈和绝望中转向了内心。这又是一个悖论。当从内心生活中得到少许安慰时，依靠内心生活的人会暗自兴高采烈，甚至还会愚蠢地认为这一回很可能是真的有救了，也因此忘记了厄运轻轻的脚步声。而当他听见厄运的脚步声时，才发现大势已去。他最后能听见的，只是他的胸膛深处发出的一声轰鸣。

11

依靠内心生活的人最大的愚蠢是：他居然无条件地相信内心的力量。

12

依靠内心生活的人一个比较大的愚蠢是：他在被逼无奈中，竟然动用了内心的悖论和内心的阐释学循环。为了应对包纳自己的时间的快速，这种人竟敢把自己的生存活力的来源，建立在一个由无数个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的点组成的圆圈上。但他忘了，这是一种致命的圆圈。在这个圆圈上，原因就是结果，结果就是原因。无论是从逻辑的角度看还是从经验的角度看，这个支撑生存活力的圆形构架都称不上稳当。它的坍塌是必然的。想要避免坍塌的命运，除非仰仗奇迹。

13

对于依靠内心生活的人来说，避免坍塌的奇迹需要以下三个条件的帮衬：一，奇迹确实是人间的“事物”；二，构成这种人的生活的时间可以是静止的；三，这种人的内心坍塌必须要先于圆形构架的坍塌。但这里面的难处在于，第一个条件万难成立，第二个条件根本不可能成立，第三个条件也许可以成立，但又需要另一个条件的帮衬：依靠内心生活的人一出生就死去。

14

依靠内心生活的人为了拯救自己，为了奇迹真的可以现身，也曾暗暗将目光转向了各种可能的学说。他把他能想到的各种宗教——从基督教到绝种教——挨个儿打量了一番，试图从中找到借力打力的武器。但依靠内心生活的人不仅是悲观主义者，而且在悲观主义的长期哺育下，还最终成了不可救药的怀疑主义者。因此他根本不可能相信任何一种天花乱坠、口吐白沫的宗教。这种人只愿意站在毁灭的边缘，站在内心的废墟的中央，为宗教居然不能拯救他暗自叹息。这是他对宗教的唯一敬意。

15

但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敬意。正是依靠这一点，这种人最终获得了一汤勺的虔敬感。

16

虔敬感最终也被证明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恐惧才是依靠内心生活的

人最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

17

实际上，恐惧才是这种人必须天天面对的“事物”。前者是后者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口的食物，但从各种意义上说，前者又都是后者的敌人和仇恨的渊源。时间长了，这种人简直就成了恐惧的化身。他走向人群。虽然他看起来和我们并无二致，他的同类却一眼就能将他从人流中认出，并把他从我们之中分离出来。因为我们和那种既悲观又妄自尊大的人有着根本的不同。但作为同类，所有依靠内心生活的人都绝不会互相喜欢，尽管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就是人和镜子的关系。走在大街上，他们中的一个人就是另一个人跳动的心脏，但他们中没有谁会把这种局面真当一回事儿。对此，他们早就见惯不惊，唯一的愿望就是掉头而去，把那些讨厌的同类尽可能抛到一边。

18

遗憾的是，依靠内心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能遇见他的同类，无论是在大街上、厕所边、书店还是食堂或睡梦中，因为我们的时代太容易生产这些物种。我们的时代就是生产这种人物的优质培养基。

2003 年 6 月 10 日—11 日

四、颓废主义者的春天

1

一个真正的颓废主义者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浅薄的人会以为颓废者就是蓬头垢面者、无精打采者、破罐破摔者。这其实是莫大的误解。对颓废主义者作如是想的人，很可能是被地摊上的“相术”手册给搞糊涂了。真正的颓废主义者，恰恰是那些多多少少有些飞扬跋扈的人。真正的颓废主义者绝不轻易暴露自己的真面目。他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因为我们的时代始终在提倡高歌猛进和人定胜天，轻易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从根本上说，就意味着颓废主义者的立即完蛋。颓废主义者坚决拒绝他的时代，他只愿意成为这个时代的旁观者和观察者。而要完成这一身份的构建，有两个必需的条件：足够长的观察时间以及被足够多的人愉快地接纳。因此，表面上的兴高采烈始终是颓废主义者的一贯标记。他的风趣和幽默使他得以吸引更多的人。良心不坏的颓废主义者在心里也有偶尔的歉意：他玩弄了那么多人，那些人却始终把他当作朋友和妙人，并给了他足够多的掌声和笑声。

2

与颓废主义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真正的无精打采者、破罐破

摔者和蓬头垢面者。和颓废主义者大不相同，他们是因为高歌猛进的势头被打断后，才做出这副悲惨兮兮的模样。这伙人从来都不是旁观者，也不屑于做一个旁观者。他们自始至终都想做一个勇于进取者。这类人一旦被他人或者命运掐断了支撑高歌猛进的生长点后，悲痛欲绝的神态就出现了。不管他们从前是多么的幽默和有趣，到此刻都会原形毕露得令人同情或遭人厌恶。颓废主义者早已洞穿了这种境遇，所以他从来不把人世间的事情真的放在心上。他来到人间，仅仅是为了尽量多地领教众生相，当然也包括无精打采者、破罐破摔者和蓬头垢面者的所有做派。

3

对我们来说，颓废主义者始终是一个谜。他是怎样成为一个颓废主义者的？他为什么要成为一个颓废主义者？成为一个颓废主义者又有什么好处，尤其是在一个以积极进取为时髦的时代？成为一个颓废主义者的目的是什么？这都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事情。曾经有不少故作深沉的学者和哲人给出了诸多解释，但他们的解释如果说不是可笑的，起码也是言不及义的。因为他们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如下问题：即使是领教众生相，又对颓废主义者有什么好处？因此，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永远没有谜底的谜语。不过，我认为，在一个什么事情都能在我们的智力中得到清晰呈现的时代，有几个小盲点简直是太好了。我乐于看到智力的失败，也乐于看到各种学说的最终破产。

4

真正的颓废主义者是真正的隐士。但这是一种特殊的隐士：他不是居住在终南之巅或渭水之滨，而是穿行在众人之中。哪里人多，哪里就有颓废主义者的身影。他衣冠楚楚，口若悬河，无非是想换取活命的口

粮——实际上，颓废主义者离开了人群，也就丧失了自己的身份：时代和他人的滑稽可笑，始终是颓废主义者的养料和补给品。没有值得可笑的人群和可叹的做派，就很难想象颓废主义者还有存在的可能。但颓废主义者并不是要以他人的可笑来证明自己的高明和不可笑。恰恰相反，颓废主义者正是从他人的可笑、可叹上，看到了自己有可能滑向可笑、可叹的危险，并借助这种"看到"把自己的隐士身份保持到底。所以，颓废主义者离不开人群。他感激人群。但他也在骨子深处看不起人群。

5

在所有的颓废主义者当中，释迦牟尼可能是最极端的人物。此人组建的佛教教团则很可能是最大的颓废主义者群体。和所有颓废主义者一样，乔达摩·悉达多在成为释迦牟尼之后，依然穿行在人群之中。他甚至拒绝接受所有形式的布施。释迦牟尼看到了勇于进取者的荒唐、可笑、可叹和可悲，更加坚定了进一步成为释迦牟尼的决心。很难设想，要是乔达摩·悉达多像后起的沙弥或僧众那样抛却众人、深山静修，是否还会成为释迦牟尼。这样说起来我们都错了，因为我们以为释迦牟尼真的是超越生死轮回的佛，而不是人。事实上，释迦牟尼始终是一个人，是人中的颓废者。而且正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颓废主义者，所以才能成为世世代代被人顶礼膜拜的佛。但彻底的颓废主义者不可复制。他的行为是一次性的。即使今天仍然有人愿意成为彻底的颓废主义者，也是不可能的。乔达摩·悉达多是第一个洞明了这个秘密的人，所以他抢了先，率先占领了这个后人永远不可企及的高度。除此之外，乔达摩·悉达多的聪明还在于：他确实不是一个自私自利者，相反，由于他的善良，所以他才预先创立了一个教团，以迎候那些向往彻底颓废的人。完成了这一工作后，释迦牟尼还给那些向往彻底颓废的人，安慰性地制定了颓废

所能达到的各种果位：沙弥、和尚、菩萨……或者罗汉。

6

任何一个颓废主义者都喜欢另一个时代。他只把自己的时代当作隐居静修之地，而把另一个莫须有的时代当作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说，释迦牟尼之后的和尚们彻头彻尾地错了：他们一步跨往深山，却悲剧性地忘却了自己更应该和可悲、可叹、可笑的人群集中在一起。许多和尚有偷情、喝酒、吃肉、还俗、娶妻、生子、贪财……的毛病。这不能被看作意志不坚，而要归因于他们忘记了人群对于颓废者的重要性。和尚们看似荒诞不经的行为，实则是人群对他们的愚蠢或性急的报复。没有观察对象的旁观者是不存在的，同样的道理，没有人群可供穿越的隐居者也是不存在的。逃往深山还号称修道，在真正的颓废主义者看来，只能是怯弱的表征。归根结底，颓废主义者的家园就是他寄居的时代——只不过通过他的观察和冷眼旁观，修改了他存身的时代的含义。释迦牟尼没有把这层至关重要的颓废理论告诉他的弟子，既有可能是他高估了弟子们的悟性，也有可能是要故意留一手，以便在他死去后，依然可以作为一个旁观者，观察他的弟子们在如何丢人现眼。此人就这样在阴曹地府也在继续他的颓废主义行径。他也因此成为唯一一个彻底的颓废主义者，至少是给他的唯一性增添了让人信服的筹码。

7

任何一个真正的颓废主义者，都能很快从人群中认出自己的同类，就像当年的乔达摩·悉达多一眼就认出了阿难。这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其具体的操作方法早已失传，但又被无数的颓废主义者暗中运用。有多少颓废主义者就有多少种运用方式。但也有偶尔的失误。我愿意讲一个

小故事来说明这种失误。有一天，我因为无意间冒犯了我的领导，正失魂落魄地走在魏公村的街上。这时迎面过来一个衣冠楚楚的家伙。此人一脸讪笑。他从很远的地方就开始看我，搞得我以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因此对他怒目而视，想把领导发在我身上的邪火发到他身上。没想到此人在经过我的一刹那却对我说：哥们儿，你可以加入我们的队伍，让我们一起放声大笑那些可笑的！我以为他是个疯子，于是不理不睬，径直扬长而去。过了许久，我才明白过来：这是一个颓废主义者，而且是一个还没有入门的颓废主义者。现在我还明白了另一个事实：在这个假货横行的年代里，颓废主义者当中也有赝品。只是我弄不明白，在一个高歌猛进的时代，颓废主义者还值得冒充吗？这又是一个谜。

8

我之所以说邀我入伙的那个家伙是个还没有入门的颓废主义者，除了他的冲动和故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外，还因为他喜欢拣各种边缘开走。要知道，魏公村那条街在我走的时候，仅仅是一条小偷出没，其他垃圾分子也十分猖獗的小巷子。的确，颓废主义者喜欢人多的地方，但同时也喜欢边缘。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把这两件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事情统一起来的。邀我入伙的那个家伙在喊我的时候，很有些装腔作势的做派，本身就是颓废主义者观察和调笑的对象。但更值得调笑的是，他不能同时既行走在边缘，又行走在人最多的地方。他还没有来得及掌握这一技术。他居然以为人少的地方就是边缘。此人的如许行为表明：如何成为一个颓废主义者的秘诀看起来已经泄露了。但这正好是真正的颓废主义者故意性的阴谋：他抛出了一点皮毛，让喜欢附庸颓废的人上当受骗，促使他们以颓废者的面目到处招摇撞骗。此等行径刚好给真正的颓废主义者提供了新的风景、新的观察对象。但真正的颓废

主义者这样做确实出于无奈：我们时代的人太乏味、太没有趣味了，颓废主义者如果不自己给自己创造可以继续观察的有趣对象，就难以把颓废的行为进行到底。

9

颓废主义者差不多都是些食量很小的人。由于颓废是这个世界上最花力气的事情之一，所以，绝大多数颓废主义者都是些干筋瘦骨的家伙，也许只有唯一彻底的颓废主义者释迦牟尼是个例外。如果你在人群中看见一个胖子，我建议你首先要把他从颓废者的行列中清除出去。胖家伙们最有可能是政府官员。因为在我们时代，成为政府官员的条件之一就是能尽量多地摄入山珍海味。颓废主义者对此不感兴趣。他们是食物的退让者，是各种动物的朋友。在通常情况下，同时行走在边缘和人最多的地方，使得颓废主义者疲惫不堪，毕竟他从餐桌上摄入的热量实在太少了。但颓废主义者之为颓废主义者的诀窍就在这里：他从人群的可笑、可叹中，得到了热量上的必要补充。这种补充让他们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完全能将过于耗费热量的幽默和嬉皮笑脸做得更为逼真。

10

颓废主义者离不开人群并不表明他不能独处。恰恰相反，夜晚才是颓废主义者最钟爱的时间段落。夜晚是颓废主义者的春天。他躲在屋子里，开始动用某种只有颓废主义者才能理解的语言，动用只有颓废主义者才具有的特殊口吻、语调，记下白天的一切。因此，夜晚给颓废主义者提供了播种和发芽甚至收获的美好想象。颓废主义者就这样在语言中和文字中，得以让自己很轻松地既行走在人最多的地方，同时又行走在边缘上。他从中又一次补偿性地获得了必要的能量，以便他在天亮之前

的睡梦中，有足够的力量拜会各种各样的神祇。他甚至梦见自己成了一个彻底的颓废主义者，占有了乔达摩·悉达多的高度。颓废主义者也只有在梦中才能窥见这一高度。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食量很小的人经过一个疲劳的白天，还要在晚上进行记录的原因。顺便说一句，每一个颓废主义者一生中都写下了无数本日记，但由于他们的语言和我们的语言绝不相同，所以他们记录的具体内容始终不为我们所知。他们的记录只在颓废者的阵营中暗中流传。这就是颓废主义者为什么最终不可能假冒伪劣的真正原因。那些附庸颓废的人就这样被真正的颓废主义者当作长枪使用了无数回。

11

但真正的颓废主义者都是骨子里的失败者。他也不相信这个世上有任何成功的可能。和其他样态的失败者不同，颓废主义者是笑着的失败者。他失败得越彻底，就越接近彻底的颓废主义者。正是这一点，把真正的颓废主义者和假冒伪劣的颓废主义者最终区分开来。后者不过是想通过冒充，去博取别人的同情，或者干脆把冒充当作韬光养晦的手段，以便在关键时刻施以绝杀，从而有效地猎获成功。真正的颓废主义者对此了然于胸，而且这也同样出于他的诡计：真正的颓废主义者就是想看见那些附庸颓废的人的如许行径，以便从中获得能量。实际上，这是颓废主义者获取能量最不费力的方式。颓废主义者就这样笑着，等待着，观察着，一步步走向他的终点，走向他终极的春天。

2003 年 6 月 12 日

五、我喜欢的……

我喜欢有水的山脉、有纹路的历史、有灰尘的旧书、带轮子的风景、充气的道路、革命前的夜晚、解放后的一小块春天以及一部分经常摸着脑袋的地主分子。

我喜欢不完美的、略嫌臃肿的女人，肮脏和清洁杂呈的孩子，滔滔不绝的饮者，沉默的疯子，夜晚中的一小片光明，和太阳有关的黑子以及沉默。

我喜欢各种各样的结尾，我喜欢琢磨可能存在着的各式各样的结尾。

我喜欢各种伟大学说的破产。

我喜欢各种冒牌的英雄必然要露出的各种型号的马脚。

我喜欢人民群众中的一小撮。

我喜欢二分之一的一分为二地看、三分之一的三陪女、四分之一的新四军、五分之一的红五月、六分之一的闰六月、七分之一的七月十四、八分之一的建军节、九分之一的重阳节、十分之一的双十节和整个的正月初一。

我喜欢我老家那个女疯子，她和另一个不是她丈夫的男疯子在奔向疯癫的道路上，一起炮制了一个聪明乖巧的儿子。我喜欢她专注地看着

儿子时的平静表情。

我喜欢曾经痛骂过我的小学女老师，只因为她的女儿长得甚合孤意。

我喜欢静止的时间，椭圆形的呐喊，充满压力的长方形，武松的哨棒，潘金莲向她的矮丈夫将投未投的砒霜。实际上，我喜欢的是那个妖冶的女人肿胀得快到爆炸的犹豫和犹豫带给她的充满恐怖的美。

我喜欢在旷野上旁若无人一路高歌的孩子、四五个比赛骂人的孩子、七八个歌颂祖国的孩子。

我喜欢没有父亲的“成功”。

我喜欢各式各样的杨柳腰和水蛇腰，更喜欢杨柳腰和水蛇腰按照某种比例混合而成的那种腰。

我喜欢夜半才点燃的灯盏。

我喜欢一鸡两吃，更喜欢允许我两吃的那只鸡。

我喜欢露珠、红色、碎片、隔夜的话题、夏雨雪、天苍苍和野茫茫。

我喜欢有历史感的鱼、穿裤子的云、带喷嚏的汤、早泄的乌托邦、落后的道路、先进的死亡、昨天阴沉的念头以及盖了公章的贞节带。

但我最喜欢沉默、青草、花生、过路人、错误的理想和偷偷摸摸爬上来的半个月亮。

2003年10月7日

六、起于偶然的回忆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古诗十九首》

开封：童年和比例之城

扬子江支流的支流从镇前蜿蜒绕过。镇名叫开封，支流为西河。太阳落山之前，男人们在河中洗澡、钓鱼，妇女们淘米、洗衣，偶尔还将干枯的经血残片倾倒在河中。一大群幼小的鱼苗密匝匝地追逐着那些残剩的、颇有些言不及义的红色。差不多平均两条幼鱼分食一个没有完成着床任务而又令人肃然起敬的红细胞。这一切，似乎是在公开证明被大自然隐藏起来的物质不灭定律的无懈可击。物质如此这般的奇妙循环，让开封镇从头到脚都充满了生机。总之，西河是开封的后院。开封人民把自己的秽物和欢娱的残渣，通过这条身份卑微的小河奉献给了东海。

站在玉兰山顶，小镇的全貌尽收眼底。如果视力不错，你甚至会看见镇中学漂亮的女老师——你的女老师——李小艾正在戴乳罩。你那时还小，视力还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但仍然看不见那些充满激情的动作细节。细节被距离吃掉了，细节填进了距离贪婪的血盆大口，剩下的只是距离吐出来的森森白骨，就像你成年后，在大庭广众当中见到的阴谋的大纲——它正在等待动作的填充。站在玉兰山时，你只有十二岁，仅仅知道李老师年轻、漂亮，理应充满激情，理应对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感

到满意。乳白色的胸脯，鸽子样的胸脯，也只能是李老师的私人财产，却依然是你梦中的花园。实际上，站在玉兰山顶的你只能依照感觉、依凭方位，才能准确地判断出：那个遥远的窗口确实属于李老师。但那个窗口同时也属于你，属于你充满好奇心和想入非非的童年。

镇上有刁民五百，你只是他们的候补选民。你那时还小，你想成为刁民的雄心壮志屡遭刁民们的嘲笑。镇上有良民五千，你只是其中的一个小角色。因为你还不够资格成为刁民，只好委身于良民的队列，混迹于良民们充满善意而又鲜活生动的污言秽语、家长里短之中。镇上有妓女二十，不过要等到最近。童年时代的你无缘瞻仰她们的风姿，因为妓女下凡落草到开封时，你早已离开那里了。从辗转而来的各种传说中，你只知道，那些妓女和镇上的所有刁民都熟悉，和所有的良民也熟悉，和所有的良家妇女却结成了仇人关系。她们是开封镇的帽子公司，其产品一概呈绿色。

依据各种渠道会聚而成的小道消息来计算，妓女和刁民的比例是一比二十五；和良民的比例不多不少，刚好是一比二百五十。现在你终于知道了，那确实是个合乎人性的比例，和人性中的良民成分与刁民成分的比例恰好相当。在你心中，开封和其他所有面貌不一、性质不一、身份不一、规格不一、型号和美丑不一的城镇相似，适合一个人的成长；开封能给每一个寄居在它腹腔内和胸膛中的童年，提供充足的、必需的养料和奶酪，提供高耸的胸脯、充盈的奶水以及众多的想入非非和颠三倒四。

你有感于刁民们的做派和威风，本想立志成为一个刁民，但你的父母不同意。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在和你的古怪想法、罪恶念头作坚

决的斗争。那么多的拳头、棍棒、充满善意的威胁以及珍贵的糖果，落在了你的头顶、背部、耳朵和嘴巴里。它们都在或残暴或温柔地强迫你敌视、远离刁民，放弃成为刁民的理想。但父母肯定没有想到，你按照他们的心愿终于成了一个表面上的正人君子，仍然天天幻想着成为一个刁民，天天在梦中操练刁民的基本功课，并把诸如此类的念头弄成了白日梦。那都是开封留给你的遗产。现在，你理所当然地长大成人了，胡须漫长得足够亲近地上的鸡粪。在某些时刻，你被有些人刻意视作痞子；在另一些搞笑的场合，你又被看成君子。但他们都错了。他们都没有见过开封，不知道那是最适合一个人发育和成长的城镇，更不清楚那个小镇身上有着互相矛盾的、永不改变其性质的时光。那是完全静止的时光。它始终在以逸待劳，它轻而易举就能将合乎人性的比例，安放在它每一个子孙后代的头上。和开封镇几乎所有人民群众一样，当你被视作痞子的时候，恰好最像一个君子；当你被看成君子的时候，正是你内心深处最痞子的时刻……

普安：矛盾之城

普安镇是我认识的第一座大城市。在见到它之前，我从未见过那么多的人，那么光鲜的灯火，那么漫长而曲折的街道。第一次走在它古怪、狭窄、迂回而又起承转合的街面上，迎头撞见那么多风尘仆仆的行人，我激动得差点晕了过去。现在，它的人口已经暴涨到五万。这应该归功于普安人民旺盛的生殖力。而旺盛的生殖力，则要部分地归功于普安人民娱乐生活的长期匮乏。娱乐生活的严重缺失，最终让普安人民有机会为人类奉献出那么多价廉物美的劳动力。如今，这些可以直立行走、巴

望着美好生活的劳动力，通过逐渐嚣张起来的交通，被输送到了世界各地。他们在以被迫的勤劳和卑微赚取活命口粮的同时，也在怒火冲天、骂骂咧咧地建设世界，改造山河。

我热爱普安镇的人民群众歪戴帽子斜穿衣的翩翩风度。他们习惯性地、遗传性地爱好标新立异。凭着这一爱好，数千年来，普安镇为人类贡献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民间学者、口若悬河的演讲家、技艺高超的业余谋士、无师自通的修辞大师、热爱闲情逸致的隐士、偷鸡摸狗的幽默天才、令人潸然泪下的罪犯。我经常看到普安人民打架、斗殴，为某一个只有三分姿色的女人争风吃醋、刺刀见红。有一天，我起得绝早，启明星还在天边对我挤眉弄眼，并大肆嘲笑我的无功劳碌。就在我准备向启明星投掷石块的当口，在顺城街僻静的拐角处，我看见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她迅速捂住了自己的私部，只把白晃晃的屁股对准了我随时准备晕厥的目光。我理解导致她赤身裸体的复杂原因，也理解她见到我时依据某种道德准则作出的身体反应。在普安，这都是无比正确的事情。还有一天，我看见一大群人围着一对正在交配的狗。他们为那两只热情洋溢的狗疯狂地鼓掌，幸福地呐喊。每个人都激动得满脸生辉。街道上顿时明亮多了。而站在冬天的河沿上，我看见了淘沙的老妪老翁。他们躬身立在刺骨的河水中。我看见疲惫不堪的老头子直起腰来，在仍然躬身的老太婆腰间按捏了几下。我猜想老太婆腰间的疼痛可能消失了一大半。当然，你不能奢望疼痛会这么简单地完全消失……

我少年时代的尾巴部分全部遗弃在了普安镇。在普安，我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莫名其妙的伤感：自己搂着自己的脖子顾影自怜，自己附在自己的耳边窃窃私语；而扬起头，又迅速做出了极度滑稽的傲慢样。迄今，

我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我的少年时代会和普安镇如此格格不入。普安镇历史悠久，饱经沧桑，成熟得一塌糊涂，完全是一只城墙上的麻雀。它早已学会了以超然的眼光看待事物，以谦卑的姿态面对时间，以逆来顺受的不变面孔，对付它早已见惯不惊的灾难、痛苦、蹂躏、难以预料的命运和不公。在它身上，没人能够找到一丝一毫的伤感、傲慢、顾影自怜和惊慌失措。它平静、木讷、谦卑得犹如夜晚，只偶尔发出一两声夜猫子般的惨叫。那是起义的声音，是压抑到了极点的呼喊。我闯荡江湖多年，终于理解了这种声音的性质和含义。而在晕晕乎乎的少年时代，我就这样以深入普安的方式，游离在普安之外；我扑进了普安镇温暖、硕大的子宫，却始终站在它的理智和风度的裙裾外边。我和普安构成了一对彻头彻尾的矛盾。

我无意中花费了整个少年时代的尾巴部分，细细打量过普安镇。在其他地方，我从未滥用过这么多的时光和热情。普安的全部形象，它每一个可以想见的细节，都因此坐落在我心上。它给我留下的深刻遗产，就是让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要和这个地方构成本质上的矛盾。普安镇不允许我和别处友好相处。它愿意和所有别的地方争风吃醋。它残酷地爱着我，威严地注视着我。它始终试图从所有别的地方争夺对我的所有权和统治权。遵照它的旨意，我像一支恒用恒新的矛或一张历久弥新的盾，无可奈何地寻找与我相匹配的那面盾或那根长矛。但另一方面的情况我也必须如实说出：收留我少年时代尾巴部分的普安镇至今还挺立在原处，但我已经令它遗憾地不再年轻，不再停留在当年的时间刻度上，以至于它连刻舟求剑的机会都没有；收留我的那间小屋仍然健在，但早已换了主人。而在普安镇不无褊狭的意识里，主人从来都是个时间概念。

只有那些在春秋两季发情的狗一仍原貌，还在向我发出殷切的邀请，直如同生活邀请激情，新年邀请鞭炮，寂寞的黑夜呼唤猫头鹰悠长的尖叫。

广元：残破和唯美之城

嘉陵江大力一扫，在绵延千里的崇山峻岭之间，为广元开拓出了一块平坦而硕大的地盘，用以安置广元不断成长的躯干。因此，广元是奇迹，是神话。它体现了上天的仁慈和好生之德，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能在这块奇迹般平坦的地盘上安家落户。

站在广元的市中心，向南望去，是则天皇帝的纪念馆。许多世纪以前，广元人民为自己酷爱标新立异的同乡修建了这座庙宇。从古至今，每天都有三五位生养了女儿的父母来这里朝拜。他们希望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看在同乡的份儿上，保佑故乡的女儿大富大贵、长命百岁。如果也能当上女皇，那就再好不过了。向北望去，则是佛教的后花园。千百年来，上千尊佛像不知疲倦地屹立在嘉陵江边的峭崖绝壁上，和则天纪念馆隔江相望。武皇纪念馆经过反复重建，显得雍容大度；而千佛崖上的佛像的脑袋，早已被破四旧者一一扭掉，再也无法复原。在许多时刻，物质不灭定律都会如此这般地迎头撞上它在解释学上的大限；物质的奇妙循环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因此，曾经完美的小城，如今变作了残缺的广元；曾经和谐的历史大厦，如今看上去竟是如此的漏洞百出。

站在广元的市中心，向东望去，是被阻隔的嘉陵江。大坝上面是丰满、风骚、丰腴和故作淑女状的江水。游艇在水面上缓缓移动，满载着游客的欲望和悠闲。游客们极尽夸张的行为与动作，也只是让游艇的吃水线下降了五厘米。而在大坝下边，则是几乎干涸的江水，像一行悠长的眼

泪。向西望去，是葱郁的凤凰山。传说中珍贵的鸟儿在这里鸣叫过三次，差不多历经了三十个朝代。人们为它修建了巍峨的高塔，等待着它第四次鸣叫，也准备将第四次鸣叫储存在高塔内。广元人民为高塔赋予了别致的造型、迷宫般的内部结构。这是为了让凤凰的鸣叫声一旦进入迷宫般的塔内，就再也无法逃逸出去。如果能将那只凤凰锁闭在高塔里，简直就是额外的收获了。不过，广元人民都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广元希望以几近唯美主义的方式，重新修复和谐的历史大厦，将历史大厦身上的漏洞一一排除。物质不灭定律就这样以某种奇妙的妥协方式，改头换面来到了新时代的广元：人们在极尽现代化之能事的高楼前，摆放了古老的石狮子；在宽阔豪迈的大街上，用永不褪色的油漆写满了繁体字。你穿行在广元的身体中，会油然滋生出某种离奇、怪诞的感觉；你在惊讶中，也许会确信历史真的在这里复原了，物质不灭定律又一次争得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但你却万难想到，制造石狮子的石料，无法为被扭去脑袋的佛像打造新的司令部。广元人民太聪明了，他们知道，古老的佛像一定会拒绝新生的、伪造的、仿制的脑袋。没有脑袋的佛身一如既往地具有强烈的排异能力。它排斥异己的、被人推荐而来的脑袋。何况没有脑袋，佛也能平静地活下去。它们会用仅存的躯干打量脚下的江水。实际上，它们全身上下都长满了眼睛，每一个部位都是司令部。它们根本不需要任何二手的脑袋。

我偶尔也会回到广元。那里有我的亲人、朋友和父母。我也曾多次上过凤凰山，妄图听到凤凰的鸣叫；我偶尔也会坐在游艇上观赏市容，倾听那些无伤大雅、最多只是言不及义的甜言蜜语。但我无力为广元打造任何像样的东西，作出任何像样的贡献，更没有能力修补它的任何一

个漏洞。面对广元，我只有唯一一个值得称道的能力：平静地走在它充满现代色彩的街道上，迎面遇到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灯火、那么多的车辆，却不必为此惊慌失措、面色如土。而有一天，我穿过宽阔的嘉陵路、建设路和则天大桥，来到犹如苍蝇的目光般迂回、蜿蜒曲折的海嚎街，拜访一位我认识了多年的朋友。他差不多已经六十岁了。房门打开后，我发现我的朋友已经变作了一位英俊少年。他很亲热地拉着我，用我熟悉的声音向我嘘寒问暖，以我熟视无睹的姿势端茶送水，并吩咐他头发花白的夫人翻箱倒柜，张罗着要为我的远道而来接风洗尘。

乔庄：几乎之城

乔庄，我阴错阳差中进入的城市。我青春时代几个美妙难忘的时刻在这里灵光乍现。那时我刚过二十，年轻得能拧出水来，足以让满脸沧桑、心如枯井的今天嫉妒不已。那时我正发疯地热爱世界、拥抱生活，真诚地仇恨岁月、厌恶人生，多次想到过上吊和抹喉。那很可能全是因为无望的爱。今天，我不再想到自我了断，却丝毫不说明我还热爱什么，还能热爱什么。而一下长途汽车，我马上就看见了乔庄安静的人群，悠闲的脚步，空气中慢吞吞游动的声音泛出的绿色。我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到的那一刻，乔庄刚好是暴雨初歇，没有流尽的雨水在街上悠闲地踱步。我甚至在街道侧边一个透明的小水洼里，看见了三条幼小的鱼苗。它们在安静地吞吐雨水。不可思议的小城啊，我几乎是一眼就爱上了你。

我很快就被几个完全不认识的人拉进了酒馆。我从未到过这个城市，我不知道有谁会认识我。但我一点诧异感都没有。我相信这不会是假象。我旋即就和他们喝了个昏天暗地，把心窝子掏了个底朝天。我还和一个

最多只有十八岁的女孩干了满满一缸子高度白酒，足足有三两之多。仗着酒兴，我口若悬河地说着，声泪俱下地说着，几乎没有一丝酒意。喝完酒，他们不知从哪里听说我是一位业余诗人，正在奋力涂鸦，杜撰一些莫须有的情节、催人泪下的故事，就簇拥着我去拜见他们的诗人。

那位慈眉善目的诗人看起来有五十多岁。他连我的名字和籍贯都没问，就直截了当地为我的到来表示了高兴，为我们刚才的疯狂面露宽厚的笑意。他甚至还拍了拍与我干杯的女孩的额头，说以后可以多喝点。他要送我一本诗集。他说那本诗集写有乔庄的一切，乔庄的每一滴眼泪、每一片乌云和许多丝缕的阳光都记录在案。他说，阳光是记不完的，眼泪和乌云总会有一个限度。我趁着还未发作完的酒兴问：有鱼吗？他怔了怔，快活地说，当然有，怎么会没鱼呢。他准备到院子对面的房间取书，却怎么也找不到钥匙。他幽默地一笑，然后摸出一把斧头，像随手掏出的一个诗眼，三下两下就把门弄开了。

接下来的几天，那位与我干了一缸白酒的女孩陪我走遍了乔庄。我阅尽了乔庄的春色。我翻看了它的肠肠肚肚。我走过了它的心脏、肺、胆囊和粗糙的脊背。我几乎爱上了那个长有雀斑而又善饮的姑娘，琢磨着怎样才能把她带往海角天涯，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生儿育女。她扑哧一笑，骂我是不是有神经病。随着她口开口闭，我闻见了槐花的香味；而顺着她的手指，我看见了掩藏在大山丛中的小村落。那是她的家乡。村前有一条小河，两岸长满了野菌子。暴雨初歇，正是野菌子撒野、做梦、抒发感情、怀孕的大好时节。我有些不饮自醉，很想把软软的身体软软地靠向她。

那位长有雀斑而又善饮的女孩很快就消失了。我丧魂落魄地走在街道上，勉强向迎面而来的人点头、致意，勉强保持了风度。我很快又遇

见了几个热情得近乎悲伤的人。他们邀请我去慰问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懵懵懂懂之中，我随他们到了医院。躺在床上的居然是陪我游玩的女孩，野菌子生养的女儿。她面色苍白，几乎没有血色；仅有的几根血丝整齐地排在她脸上，像我初到乔庄时看见的鱼苗，在安静地、孤零零地张望。但我不知道它们在张望什么。人们告诉我，她已经病了很久，在这里已经躺了很久。我闻见了病房里药水的清香，我隐隐嗅见了小小的疾病散发出的槐花味。我不是一个脆弱的人，但我有了哭泣的念头。我愿意仁慈的上天给她一个健康的身体，赐予她茁壮的命运，和我一样，她也应该茁壮成长，吞食宁静、绿色、火、大米与尘埃。我真愿意她马上爬起来与我喝一盅。就像她与我干杯是假象一样，她的疾病、离她只有三十公尺之遥的死亡也是杜撰的、捏造的。

我离开乔庄也是暴雨初歇的时刻。我期待着有人来为我送行。但我终于失望了。汽车缓缓驶过宽阔、洁净的街道，似乎是不愿打扰小城的宁静。从车窗望出去，我看见太阳已经当头，街面上的人也多了起来。他们无疑是在响应太阳的号召。就在汽车加速冲向城外的盘山公路时，我看见躺在病床上的姑娘在向我乘坐的车辆挥手。我不知道她缓缓挥动的手势，究竟是表示再见还是邀请我留下来，甚或是要我带她去海角天涯。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搞明白。

宝轮：等待之城

一个在半途上不期而遇、迎面撞来的小镇：嘈杂、脏乱、哈欠连天、眼球突出、花枝招展而又神情亢奋。这就是宝轮，平庸是它最好的判词。因为你能在我们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见到它的变体或亚种；它的特征

一下子就消失在与其他地方的雷同中。宝轮差不多以睡眠的姿势平躺在你面前。你很容易分辨出它的额头、脖子、胸膛、肚脐、自由的四肢和较为苗条的腰身。感谢慵懒、略带色情的睡眠姿势，最终让宝轮免去了平庸的命运。

眼球突出的小城有一个打眼的十字路口，它的位置相当于呈睡眠状的宝轮的肚脐。旅馆、小吃店、半遮半掩的发廊、录像厅、令人揪心的长途汽车站……团结在肚脐的周围，并理所当然地以它为核心。十字路口是由它们选举产生的总统。十字路口也很好地体现了它们的意愿。它们因此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格在附庸和长随的位置上，从未想到起义和篡党夺权。

我在二十岁的雨季，不可思议地走进了宝轮，来到了十字路口的下属之一长途汽车站。我发疯地想赶往乔庄。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里，只知道我必须在宝轮的十字路口换乘车辆。但传来的坏消息说，由于暴雨侵蚀，通往乔庄的山路已经多处塌方，何时疏通，敬请尊敬的旅客倾听高音喇叭的亲切通知。

我怀着朝圣的心情，每隔一个小时去觐见一次高音喇叭。觐见之前，我都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心跳熨烫整齐。我渴望它能传来好消息。受阻宝轮的那几天，是我平生最热爱高音喇叭的时段；此前此后，我都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对它的厌恶。我偶尔也会声嘶力竭，偶尔也像骂街的泼妇一样，对付生活中难以忍受的辰光，但在内心深处，总是渴望宁静。所以我对高音喇叭的语言纵欲、夸夸其谈深恶痛绝。但在雨季的宝轮，我每隔一小时朝圣般的觐见，都以失望而告终。我随时准备跳起脚来骂娘。我在宝轮的肚脐上坐立不安。我不知道肚脐内部的器官，是否感受到我

的脚步对它的敲打、踢踏。我不知道是否伤害了它正在孕育中的胎儿。直到天黑，我也没有得到丝毫希望，而该死的暴雨又兜头浇了下来。

我住进了十字路口的另一个下属——小旅社。它距离呈睡眠状的宝轮的三角区已经相当接近。它的位置仅仅是从肚脐向下滑行了一点点。躺在床上，我一边屏气凝神，用耳朵巡逻高音喇叭传出的消息，一边心不在焉地收看电视新闻：红色的大会、绿色的高产、脸色发白的经济、嬉皮笑脸的大好形势、有着爆炒腰花般面孔的人民群众、唱着军歌戴着绿帽子的解放军战士……我调了一下频道。艳俗、散发着肉香的歌星立即扑面而来，流里流气的声音立即扑面而来：我们的祖国是花园；爱我吧，爱我呀；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外婆的澎湖湾；我要死了、死了……

我起身走进了十字路口的又一个下属——录像厅。它刚好坐落在宝轮的三角区的中央。我相信这不是巧合，因为录像厅正在放映一部三级片，和录像厅所处的位置刚好般配：高耸的硅质胸脯、丰满的阴性大腿、隐秘的大腿拐弯处、猩红的嘴唇，可就是没有让人最终眼睛一亮的绝杀部位……我真倒霉，无意间迎头撞上了一个半遮半掩的时代。含蓄是它的基本美学。所有的观众都对这种欲盖弥彰的美学顿足捶胸，骂声连连。和他们一样，我也在录像厅坐到了天明。我正处在热爱三级片的年龄。我把高耸的胸脯、丰满的阴性大腿、隐秘的大腿拐弯处、猩红的嘴唇颠三倒四循环往复地看了又看，仍然没有见到让我眼睛一亮的部位。我也开始仇恨含蓄的美学。我自觉地加入到了痛骂的行列。我压抑不住地高喊了几嗓子，把正在咒骂的人民群众的咒骂声成功地镇压了下去。他们都扭过头来惊讶地看着我，他们搞不明白，这个皮肤黝黑、满脸粉刺、乳臭味还剩三十毫克的毛头小子，哪来这么大的火气。

从录像厅出来，迎面撞上的还是暴雨，还是高音喇叭里已经麻木、迟钝的坏消息。我气急败坏、暴跳如雷，打算放弃我的计划，回到出发的地方。静下心来后，我发现早把出发的地方搞忘记了。那个叫家的地方对我是不存在的，因为我正处在热爱三级片、热爱浪游的年龄。无奈之中，我只好决定尽量拖延我的热爱，拖延我的青春、我的焦虑、我痛心疾首的幻想……

接下来的三天，我怀着朝圣的心情，每隔一个小时就去觐见一次高音喇叭。觐见之前，我都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心跳熨烫整齐。我渴望它能传来好消息。我住进了十字路口的另一个下属——小旅社。躺在床上，我一边屏气凝神，用耳朵巡逻高音喇叭传出的消息，一边心不在焉地收看电视新闻：红色的大会、绿色的高产、脸色发白的经济、嬉皮笑脸的大好形势、有着爆炒腰花般面孔的人民群众、唱着军歌戴着绿帽子的解放军战士。我调了一下频道。艳俗、散发着肉香的歌星立即扑面而来，流里流气的歌声立即扑面而来。我起身走进了十字路口的又一个下属——录像厅。它刚好坐落在宝轮的三角区的中央。而录像厅正在放映一部半遮半掩的三级片……

我曾多次经过呈睡眠状的宝轮，从能够拧出水来的青年直到心如枯木的中年。但我再也没有下过车，直接从它的头部途经它的大腿绕了过去，以便尽快赶往我的故乡或者讨生活的远方。每一次我都远远看见过它的肚脐、当年焦虑不安的我筛糠的背影。我早已学会了等待，但我确实不喜欢每一个让我处于等待状态的地方。

2004年3月28日

七、伪箴言或真经验

如果能回去，我现在就走。

过去的日子以无聊居多。

爱好转折的人不相信直路；相信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人往往又鼻子扁平：因为他碰了太多的壁。

读书以致博学的目的是使人仁慈，而不是使人勇猛、聪明和急躁。

一件从前发生的事情，之所以能让后人以调笑或幽默的言辞加以诉说，仅仅是因为它太过荒唐。并且越是以悲壮、悲惨或神圣、庄严的面孔呈现出来的事情，越是如此。

邪恶的人不会感染瘟疫，善良的人不会上天堂。

酒使人乱性，但首先是使人乱肾，首先是唤醒了肾。

在一个自我推销的时代，保持羞涩感是可敬的；在一个夸夸其谈、初通文墨的时代，保持口若悬河的姿势远比保持沉默的姿势更为有效。

泛神论是一种我 / 你关系。相信泛神论的人因此拥有了众多的情人。但最终他会发现，这些情人中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他与他们不过是一夜情而已。

真理只存在于左手，而道德只存在于右手。

啊早晨，夜晚的肛门。

唯一的悲剧是人的必然宿命即死亡即优先性。除此之外，凡被称作悲剧的，最终只能是闹剧和搞笑。并且最大的悲剧导致最大的搞笑。

到处都是强迫症患者。到处都是孤儿。

京剧中的唱，不过是把语言弄成了弹性无限的橡皮筋。但真要到了弹性无限的程度，那根橡皮筋也就断裂了。

维柯（Vico）说，历史循环是由一阵晴天霹雳开始的：经历过洪水灾难的原始先民将这从天而降的巨响当作了上帝的声音，纷纷中断了与自己女人的交媾，满以为自己受到了非难。惊恐的先民们站了起来，把女人拖进洞穴之中，从此便出现了私有财产。我愿意为这个精辟的洞见增加一个例证：连我们家的狗都是这样。

把幽默当作天神之光的人是智者，把幽默当作省力方式的人是仁者，把幽默当作对自己的同情的人是自恋者，把幽默当作闹剧的人是虚无主义者，把幽默当作未知之物的人，则是天底下的最不可救药者。

真理就是此时，就是此时的沉默。这既可能是虔信者的信条，也可能是逢场作戏者的格言。何况在这个真伪莫辨的国度，何况这是个真伪莫辨的时代。

消息总是无性的。

精神早已习惯了纡尊降贵或遭人欺凌。

计算是中性的，算计却极具冷笑性质。

拥有逻辑混乱的一生的人往往最具有喜剧效应。

《创世记》说：“正如上帝曾经许诺，如果在所多玛发现十个正人君子，他就不会毁灭它。”一个患有道德亢奋症的黑马思想家（我们时

代以盛产这号半人半神的尤物而著称）则高声宣布："如果你不忏悔，我就要到报章杂志上去审判你；我就要写杂文。"

告别之前我们总是吃鳖。

仅仅了解邪恶谈不上智慧，只看见黑暗则是一种无以复加的肤浅，但如果像歌星和小品演员认为的那样一切都是透明的，我们就更无话可说了。

一切观点和立场依天气的变化而变化才最安全，才对健康最为有益。

有一个人自称是我的 X 光透视机，自称能看清我的肠肠肚肚兼阴险邪恶。我非常高兴，很想让他描绘一下我的肠子的形状，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的大肠、小肠、盲肠和十二指肠，何况我正在闹肚子。此人想了想，仔细地想了想，又把我反复瞧了瞧，最后居然说我没有肠子，花花肠子倒是不少。

一个被人认为早已自杀了的诗人据消息灵通人士说，已经成了我们这座城市的清洁工。他在天亮之前、万籁俱寂之后开始清扫我们制造的垃圾。也就是说，他始终与黑暗和臭气为伍。这个诗人是所有诗人中最彻底的诗人，他身体力行，言行一致。他像一个幽灵，但他更像一个幽默。

我见过这样一个人：他暗中信任的东西从来羞于出口，因为人们不相信他信任的那些东西；而对人们公开信任的东西，他又不得不做出一副假装相信的样子，并且四处申说。

——多谢！

——多射！

面相凶狠的毛哥与同样面相凶狠的刚哥下象棋。刚哥招架不住，乘毛哥专心思索之机，偷偷摸摸把一个被吃掉的炮重新安放在棋盘上，直

接对准了毛哥的老帅。现在轮到毛哥招架不住了。他万万没有料到，刚哥居然在他的卧榻之侧埋伏了一个大间谍。他左思右想，终于发现了这中间的玄妙，于是大怒："你他妈有三个炮？"刚哥也大怒："我他妈有一个加强排的炮！"这很可能是一个隐喻。

怀旧是弱者的惯常姿势，是虚无主义酒店的招牌菜。而虚无主义酒店时而人声鼎沸，时而门可罗雀——这要视天气和心情而定。

善于投降、习惯投降是一种优秀品德，它证明所谓坚持不过是个搞笑的时间性概念。但有四个"坚持"绝对不应该受到嘲笑，它们是：坚持吃饭，坚持睡觉，坚持撒尿，坚持走孤独主义的羊肠小道。

"故乡的泥土可以治疗疾病。"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也是一个绝对的错误。

……如果现在就走，我也许还能回去。

2004 年 4 月 30 日

八、强迫症患者和保守疗法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用美元估算人命。的确，在今天，除了长生不老丹、后悔药等少数几种不幸被证明为不存在的物件外，几乎没有花钱买不到的东西：花容月貌、肾脏、来自无能者隐蔽部位的快乐、爱情、机遇、官衔、荣誉直至性命，都明码实价，在货币定义过的市场上随处兜售。西班牙作家洛普·德·维加在提到黄金时代的马德里时就说过："在那里，一切都变作了店铺。"这种情形从前如此，于斯为盛；马德里如此，我们的北京似乎也不例外。

据一个流布久远的谣传说，痛苦哲学的收藏者、妇女的敌人叔本华，有一阵子在餐馆进午餐时，老是拿出一枚金币随手把玩。久而久之，叔本华的该举动终于惹恼了餐厅的侍者。此人愤怒地责问哲学家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想显示自己有钱还是咋的？面对侍者的愤怒，叔本华轻描淡写地说，如果这个餐厅里有人在进餐时不谈金钱，我就把这个金币送给他。叔本华要是活到今天，或许会更加绝望：金钱在现代社会更拥有君临一切的凛凛威风。电子货币的出现，非但没有让金钱的威风更加隐蔽和含蓄，相反，倒是让它更加昭彰和嚣张了。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如果

没钱，基本上就被解除了生活的权利，也基本上被认为是死定了。为谋生而追逐钱财，不为谋生只为追逐钱财而追逐钱财，不过是金钱爱好的程度不同罢了，都无一例外地展示了金钱的力道。这种情形，几乎成了眼下中国最为亮丽的风景线。看看大街上涌动的无数张贪婪的面孔，或随便在某一个厕所边偷听如厕人的交谈，就没什么不明白的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利润，意味着我们有必要把撒尿的工夫也控制在最低水准上。金钱重新归整、修理、打磨和定义了生理。很显然，这算不上奇迹，而是金钱的题中应有之义。

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如今这个社会上几乎人人都是金钱的强迫症患者；诸多治疗方法也因此应运而生，其中，心理学成了当今时代最具潜力的学问。不少有商业远见的家长，已经为自己的孩子瞄上了这一行当。尽管心理学已经成了一门产业，但遗憾的是，它对金钱强迫症的疗效不能算好。另一方面，出于久病成医的原因，几乎每一位患者摇身一变都无师自通地变作了优秀的心理专家。于是，我们才有机会欣赏这样的西洋景：有些人白天追逐金钱，到了晚上则趁机成了隐士。军火商傍上了诗歌，房地产老板变成了京剧票友，毒贩子加入了佛教爱好者组成的阵营，车行老总爱上了水仙花，亦官亦商的人在家中趁着夜色摆弄哲学，皮条客——这是赚大钱的人——则成了古典音乐的“发烧友”……他们把这叫做双重生活。作为一种保守疗法，据说双重生活在医治金钱强迫症方面效果显著，因为它给患者们提供了一个叫做精神家园的尤物，可以很好地安置患者们的灵魂。顺便说一句，不保守的疗法其实一直存在，那就是舍弃金钱，但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选用，何况今天。

我有一位正在努力患病，并把患这种病当作成功标志的朋友。我当然是一个真资格的无产阶级，即使是在一个假货横行的时代，我也敢向任何人担保这一点。但承那位朋友不弃，我曾经接受过他的教导：没钱的不是人。我顿时茅塞大开，也开始匆匆忙忙努力患病。不过，据我所知，我这位朋友目前还处在疑似病例的水准上，虽然比我高级一点，但还是没兴趣去过双重生活，更没有资格体验那些夜晚的隐士们的共同心声：钱太多了的也不是人。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更加高迈的境界，隐隐还有几丝傲慢，但同时也说出几分真理：钱太多了会把人变成“钱人”，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植物人。于是，我们现在看见了：白天的植物人到了晚上成了灵魂的人；灵魂的人到了白天又一次成了植物人。这种随昼夜不断轮回的把戏，确实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

爱默生说，新的经验始终在等待新的诗人。从逻辑上讲，这话其实更应该反过来说：新的治疗方法始终在迎候新的病种。因为几乎所有像模像样的病种，几乎所有具有几分姿色的病种，都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因此，我丝毫不反对双重生活，相反，我对这种极其有效的保守疗法持热烈欢迎的态度。因为无论从任何角度说，谋生都不能算错；金钱也不是操行不佳的阿堵物。准确地说，是我们这些叫做现代人的特殊动物，在一个叫做现代的社会里，陷入了一个十分隐蔽的怪圈：金钱为我们提供了好处，但我们又错误地理解了金钱的德行。双重生活既能暂时缓解我们对金钱的误解，又能像上帝一样，迎候那些目下的疑似病例如区区在下者。这样说，颇有点爱因斯坦式的调侃意味：当科学气喘吁吁爬上山顶时，才发现宗教早已在那里等候它了。因此，双重生活在今天大规模出现，既是时代的幸运，也是现代社会的显明标志。

最后我要说，双重生活作为一种保守疗法，并不是现代社会特有的发明。在一个历史如此悠久的国度，它也是古已有之的事情，只不过现代社会重新定义了双重生活。作为一个例证，明代的卫泳就提出了另一种保守疗法的方案。这个科举制和官本位的强迫症患者，也是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他的方案是隐于色：右手把盏，左怀美人，所谓“真英雄豪杰，能把臂入林，借一个红粉佳人作知己，将白日消磨”。隐于色看起来比隐于朝、隐于市、隐于野有趣多了。只是该人在大白天也在这么干，好像不受昼夜更替的轮回之苦，或者说，他强行将白天和夜晚的格局打破了。较之于今天的双重生活，这显然是一种更彻底的保守疗法，几近于极端。但问题是，今天的双重生活作为一种有效的保守疗法，还能从卫泳的方案中找到借鉴吗？毕竟今天的保守疗法的有效性，建立在对昼夜轮回的绝对尊重上。

2004 年 12 月 16 日

九、细小的纪念

人生半哀乐，天地有顺逆。

——杜甫

土门公社简史

土门公社原来叫土门乡，乡治在土门庙，一个必须经由崎岖山路才能到达的小场镇。乡改公社后，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被转移到了较为平坦的葫芦坝。那两个地方都留下了我小小的、打着火把的童年。红彤彤的土门公社下辖十个大队：新华大队、西河大队、庆祝大队、灯塔大队、红旗大队、前进大队、庆丰大队、革命大队、友爱大队、红光大队。此前它们分别叫做土门村、寨山村、仁家湾村、缑家村、李家村、仁马丫村、石板村、岩上村、彭家村、刘家村。土门公社改名为国光乡后，它们又各自恢复了本名。传统战胜了政治。

我的童年丢弃在了新华大队，丢弃在了有西河从门前经过的土门村。

方圆十里之内

方圆十里之内有两条河、三座山、十个生产队、三千农民、五千亩土地、一座水库，方圆十里之内曾经拥有过三次大洪水、四次干旱、两次蝗灾，方圆十里之内没有污染，方圆十里之内有一个爷爷、一个奶奶、三个妹妹、五个堂兄。这些都属于我。

车祸

现在可以说到那次几乎不存在的车祸：

拖拉机在前边开，趁司机不注意，我从后面爬了上去。站在车斗里我手舞足蹈，大喊大叫，知道今天上学的路可以免了。风景在纷纷向后退，时间则在加速向前——但那是我成年以后才知道的事情。快到学校时，那个年长我三十岁的司机故意加快了车速。但这没什么了不起。我奋力一跃，就下到了地面，只不过搅乱了几个小石子的小美梦。但后车轮却从我的小腿上碾了过去。我眼睁睁地看它碾了过去。有几分惊诧，有几分恐慌，也引起了过路人的几声尖叫。司机停了车，脸色雪白。都是本地人，他不过是想开个玩笑。他战战兢兢，满脸堆笑，试图将我拉起。但我推开了他，提着书包跑进了教室，正好赶上班长喊起立、向毛主席敬礼。

陈景润

这个人不谙世事，只知埋头演算。数学就是他的家。他拼却一生也要证明 1 + 1——那是哥德巴赫猜想的俗称，曾经被人民群众讥为吃饱了撑的。他的事迹因为一篇报告文学举国皆知。作为一个除数学外对其他一切都近乎盲童的人，他因为举国皆知幸运地讨到了老婆。据说求爱信有几箩筐。在 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之交，文学具有巨大的功效；因为那篇报告文学，处于懵懂阶段的我们算是成功地找到了偶像。我的同学中就有不少人冒充陈景润，煞费苦心地装做不谙世事——尽管他为了入团刚刚向班主任参了我一本；还有不少人假装连面条也不会下。我短暂地模仿过他，但很快就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也明白自己小小年纪就诡计多端，模仿纯洁之徒有碍健康，就放弃了模仿。让我欣慰的是，

我的同学中，确实有两个人成了数学家，也有七八个人修炼成了面条也不会下的尤物。

我从来就不曾了解过陈景润，只知道在需要偶像的时代，他碰巧成了我的偶像。他在成名二十年后死于车祸，却没有引起任何骚动。在上海的一个黄昏，我通过晚报得知了这一松松垮垮的消息。我为此满怀惆怅，却从未公开申说。

雷锋

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关于他的传说多如牛毛。每年总有一天，我们都要提着扫帚，去一个和我们没有关系的地方一阵猛扫，将街道弄得乌烟瘴气——那是我们学习好榜样的具体方式。我读到过这个人的日记。小学还未毕业的雷锋能写出如此精辟、如此含义丰富和深邃的文字，让我目瞪口呆，让我万念俱灰；他表现出来的水准让我对未来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他圣徒式的品德、天才般的智慧，让我绝望，让我自暴自弃。因此在学习他时，我很有些怒气，把街面弄得更加尘土飞扬，让人民群众对我的学习成绩很不满意。今天，我如此堕落，根本没有机会成为圣徒，也未曾搞出含义深邃的东西，雷锋叔叔要负一定的责任。我恨恨地想，偶像最好能和我差不多以便拯救我这样的人；但如果和我差不多，他肯定成不了偶像。这就是偶像的宿命，群众的无奈。偶像在群众中间只会更孤单。

鲁迅

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刻薄和讽刺的艺术，小小年纪，就习惯于像他那

样以嘲讽的眼光看待人世。听说他骨头最硬，眼光最毒，我也开始锻炼骨头，砥砺眼睛，并在父亲的拳头下、老师的呵斥声中慢慢长大。我终于成人了，如此苍老，如此冷漠，对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不闻不问，对几乎所有该做的事情仅仅聊尽义务。唉，我把最好的时光全花在了悲观和厌世上，天天思谋着如何尽快度完这转瞬即逝的一生。现在，我老了，骨质疏松，目光涣散。对不起，鲁迅先生，如今我再也经不起您的教诲。

毛泽东

他是我童年的神灵，想起他，就觉得很幸福。那是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一年中只能吃少数几次肉；但想起他所产生的幸福感，比马上就要吃肉产生的快乐还要强烈。精神战胜了物质，信仰打败了口腹之乐，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听说他住在比葫芦坝还要大十倍的北京城里，身体健康、神采奕奕，我就激动得想哭。我没有见过他，但我曾经多次梦见他；有好几次他还拍着我的肩膀要我好好干，醒来后百思不得其解。我真的想念他！我已经三十六岁了，很想和他讨论一些问题。我估计他现在不必日理万机：如今，美帝国主义开始向我们示好，苏修早已解体，群众的敌人由法律去收拾，他也许有时间和我讨论幸福问题。我想告诉他，在他过世二十年后，中国人民都能吃上肉了，但我们的幸福感却在不断减少。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毛主席，你对此有何高见？

仁家湾

这是一个村子的名字。我没有考证过它的来历，但肯定是张冠李戴

的产物，因为住在这个村子里的没有一家姓仁。他们全体都姓一个很怪的姓。我曾经有幸在这个村子里上过四年小学。如今，设在一个四合院里的教室已经破败不堪；住在教室西侧喜欢吃蛇的男人已经魂归西天；教室对面那个漂亮的女孩，忍不住夏天的燥热去池塘游泳，早在我童年时代就已死去（我目睹了她光滑的尸体）；住在教室东侧的男人因为和儿媳不和，在一个傍晚仓促跳水自杀，连晚饭也来不及吃……四合院内的姑娘们也早已出嫁。自离开那里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们，但她们的美丽毋庸置疑。最近一次去仁家湾是十年前，我要趁着春节的闲暇给久违的祖先烧纸。那是一个寒冷的黄昏，我远远看见了仁家湾的乡亲，他们已经认不出我了，我也乐得不打招呼。但我去参观了我的学校（也就是那间教室），它已经谢顶，只剩下四面矮墙，寒冷的余晖无遮拦地射进了我们当年摆放课桌的地方。我看见了多年前那个蓬头垢面的孩子，在我混浊而漠然的目光中，是他充满好奇心的小眼睛。

蛇

第一次见到它，我只有七岁。那是一个黄昏，我随爷爷步行去十几里外的外曾祖家拜寿。在一个大约七十度的斜坡上，我看见它一晃而过。因为它太过丑陋，我惊叫起来。晚上，在外曾祖家饱餐了一顿，却在梦中第一次见到了蛇。它向我做鬼脸。第二天早晨我呕吐得天旋地转，差点把肠子都吐了出来，更不用说还没有消化掉的肥肉。那年月，那香喷喷的肥肉啊。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闻到肉味就看见了那条蛇，就要呕吐。

第二次见到它，是同一年冬天。某一个早上我去仁家湾上学，路过一条小溪时，我看见一条银灰色的长虫，昏昏然躺在水草上。它是在冬

眠吗？有那样冬眠的吗？我以为那是黄鳝，准备伸手去抓。一位稍大我一些的同学说，那是蛇！我突然胸中翻滚，把刚刚吃下的酸菜稀饭吐了个底朝天。

很多年后，我读到了《圣经》，读到了它对蛇极度蔑视的言辞。我为此拍手叫好。更早一些时候，我从道听途说中得知，我们的图腾的原型之一就是蛇。这把我吓了一跳。

蓑草

仁家湾每一个山坡的每一块岩石上都长满了蓑草。那是编织蓑衣的好材料。我想让爷爷给我编一件，以便将头戴雨帽的同学比下去。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很容易把别人比下去，也很不容易把别人比下去。但爷爷要我自力更生，先到山坡上割蓑草，然后才能听从我的命令编蓑衣。我知道他的臭毛病。我跑到了山上。

我眼前的蓑草真是梦中的植物，像胡须一样光滑，依稀如幼嫩的梦境，还泛着青色。我有些不忍心下手。那是我今生唯一一次同情植物，有点矫情，有点夸张；从那以后，我不知在有意无意或直接间接中，摧残过多少蓑草的本家和近亲。但我还是割了起来，绿色的汁液慢慢染绿了我小小的手掌。因为雨季就要来了，我可不想再戴着雨帽去上学。而穿着蓑衣能给人一种长大了的感觉。那时，我渴望长大，不像今天，时时刻刻梦想着回归种子，回归那个温暖的来源，永远不再出来。

西河

我曾多次孱弱地写到它，但它无比坚实，但它更多地来到了我忘恩

负义的梦中。是啊，我曾在它的胸膛上学会了游泳，这一技术后来不止一次救过我的命；我还在它的腹腔中抓过鱼。那些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鱼每年都要集体洄游，在西河的腹腔中产卵，这过往的一幕如今在污染过重的西河终于渐成传说。而那时，随手一抓，就有一大把正在缅怀爱情、正在为种族繁衍专心工作的鱼来到了我们手上。它们安静、虔诚，不知厄运将至。我也曾试图寻找西河的腋窝，因为奶奶告诉过我，我们都是从母亲的腋窝里生下来的，而仁家湾所有的母亲都是从西河的腋窝中生出来的。我终于找到了，那是一处碧绿的、呈奶子状的深潭，水温沁凉，正适合母亲们居住。我流连忘返地在那里呆了整整一个夏天；从那里出来后，我长大了，对其他所有地方的腋窝不再感兴趣。

瞒天过海

从新华大队队部（即土门村村公所）到我们家的四合院有两华里，全是因陋就简的机耕道；机耕道上有一条两米来长的小桥，桥下是供春耕的流水过路的涵洞，不足半米高。但它有一个古怪的名字：瞒天过海。我从小就知道这个地名，但真正让我大吃一惊则是在我断文识字、初通文墨的成年以后：那个大字不识几箩筐的村子，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文绉绉的地名？

紧靠瞒天过海的是一片坟林，挤满了我的列祖列宗。恍惚间我记起了过世多年的爷爷给出的解释：乡亲们深知罪孽深重，来生为人为狗很难确定；但有了好地名，就能躲过阎王爷的判决，逃生到极乐世界，因为人世太苦了。爷爷说了，没有能力断文识字的乡亲们深信，一个好地名能改变他们来生的命运。我？我要深深地祝福他们！但洞察阴阳的爷

爷最终却葬在了一个小山头，坟墓的走向正好与瞒天过海平行。爷爷不用转头就能斜视到瞒天过海，那个只有两米来长的奈何桥。他不会从永世的轮回中逃逸出去。直到今天，我还在等待他的出现；直到今天，我仍然愿意对每一个比我年轻的人表示亲近和友好。

2004 年 12 月 31 日

十、人生公式

人很难将某种癖性或行为坚持到底，无论是好的癖性还是坏的行为。这大概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有人篡改了毛主席的语录说，一个人做一件坏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说起来这个命题好像也能成立。因此，如果把毛主席那句话抽象出来，我们可以获得公式一：一个人做 × 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 ×。这个 × 几乎可以被置换为人世间任何一件具体的事情，比如勇气——我愿意冒险把勇气也大而化之地称作事情。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此公有两本薄薄的哲学著作，分别写于早年和晚年，据业内人士说两本书都堪称经典。《逻辑哲学论》是早期著作，我们从这本书的序言中能够看到维特根斯坦的勇气和傲慢：这本书所阐述的真理，“在我看来是不可反驳的，并且是确定的”。维氏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欧洲哲学史上所有的疑难杂症，于是跑到一所山村小学当教师，不再过问哲学。《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晚年的著作，从该书的序言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略为有些自卑的维特根斯坦：“我怀着怀疑的心情发表这些思想。”“我本愿写出一本好书，这并没有实现，而能够改进它的时光已经流逝远去了。”从前那个

傲慢和自信的维特根斯坦到哪里去了？

名声显赫的荒诞剧《等待戈多》里有一位波卓老爷，此人也有一句名言，大意是，这个世界上的眼泪是一个常量，有人哭，就一定有人不哭。这真是至理名言。就我所见，或许只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差堪比肩。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也给抽象那么一下，完全可以获得公式二：这个世界上的 X 是一个常量，有人 Y，就一定有人不 Y。公式一和公式二既可看作互为补充的关系，也可以看作对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达。首先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终其一生的勇气和傲慢是一个常量，前半生勇气十足、傲慢十足，后半生就要为前半生的过度透支付账、还债；其次我们还可以说，一个人勇气十足、傲慢十足一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勇气十足、傲慢十足。所以，蒙田愿意自告奋勇地为我们举例说，一位征战失败的勇敢将军，看到敌方当着他的面杀他的儿子时连眼睛都不眨，但当敌方当着他的面接着杀了他的不少士兵时，这位将军哭得几乎晕了过去。蒙田评价说，那是因为他的勇气一点一点地消耗殆尽了。瞧瞧，这还只是个把钟头的事情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的主人公之口说过一句惊心动魄的话：人总得有一条活路啊。这句话不需要抽象就可以看作我们的公式三：无论前两个公式昭示的结局为何，公式三提供的结论必然为真。连无聊透顶的西西弗斯都没有选择自杀，也许正说明了公式三的真正内涵。加缪评价西西弗斯说，此神之所以没有自杀，是因为他在徒劳无功当中终于明白了，他的生存意义就是担负荒诞。有了这一条，他也就算是有了活路。因此，为了响应公式三的号召，深受公式一和公式二压迫的人们于是寻找着各种补偿形式。补偿形式是对上述三个公式的绝妙总结：维特根斯

坦从美国侦探小说中获得了勇气和自信，平凡如我者则从令我不屑的人与事中攫取了同样的东西。两者看似不同，实则是一回事。就这一点而论，我和维特根斯坦没有高下之分。因为据维氏的学生马尔康姆回忆，他的师尊明确向他提起过，如果美国不给我们侦探小说，那我们就不给它哲学，归根到底还是美国损失更大。我们从这话当中听到的除了幽默，还有饱经世事之后的沧桑。维特根斯坦是不是从侦探小说中找到了活路，我不敢妄加推测；维特根斯坦是否从这样的言谈中获得了傲慢或勇气，肯定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歌德是伟人，但他说出了我们这些正宗凡人需要遵守的补偿方式：如果我觉得自己傲慢了，我就去读大师们的作品；如果我自卑得没脸活下去了，我就去读那些垃圾文字。鄙人是歌德这句话的忠实实践者，因此居然跌跌撞撞地混到了今天。

2005 年 4 月 19 日

十一、真理，又是真理

“真理”一词虽然在南朝梁萧统的《令旨解二谛义》中就出现过，但据说主要是指佛法，意为纯真的道理；近世以来，“真理”才从日文中周游了一圈后返回母国，并转为现义，意为不能怀疑的规则、秩序，又岂是道理所能概括的。和真理比起来，道理不过是意见而已，哪怕是纯真的道理，也不过占据着最好的意见的要津。“真理”从日文回归母语，并带来了新的含义，并不意味着现代意义的“真理”在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实际上，所有形式的煽情的基本依据，就是煽情者自以为掌握了真理，所以才敢胆豪气壮、气冲斗牛。只不过在古典中国，煽情者不用“真理”一词而已，因为他们有许多“真理”的变体，比如解民倒悬、吊民伐罪，都是些光鲜的词汇，其中正包含了宇宙间无可置疑的真理。翻翻最为古老的《尚书》就不难知道，我们的尧、舜、禹是何等的口若悬河、振振有辞；如果他们不觉得自己真理在握，口若悬河的底气又来自何方？

尧、舜、禹当然是我们叹服和膜拜的对象，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学者唐甄才有如下之言：“有秦以来，凡为帝者皆贼。”唐甄显然给足了上古三代诸位帝王以足够的面子。如果考虑到人类历史上诸多灾难大大半

来源于某些大人物的煽情行为，就不难揣测唐甄的命意：先秦以前的真理是真正的真理，尽管人们在述说真理时也口若悬河；有秦以来的真理都是些伪真理，顶多只是些上不了台盘的意见，尽管人们在论及真理时有时采用喃喃自语的低沉方式。

如果说上古三代的真理是天、道，三代以后的真理就是王、霸（主要是霸或名王实霸），勉强还给口若悬河者的煽情一点面子，那么，现时代的煽情的面子几乎大大半来自孔方兄的权威：金钱才是教主，教主在颁布各种版本的真理。最有名的例子是各种电视节目，尤以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节目为甚。一个个设计精美的画面，主持人或高亢或低沉的声音，让观众或咒骂或肉麻或笑逐颜开。但无论是观众还是主持人都明白，这种形式的煽情的最终结果是：电视台赚足了钞票，主持人腰包亢奋，观众则用咒骂打发了时光。

更让人吃惊的是一些真理的后备军，他们由一些深受当今时代各种真理之熏陶的大学生组成。开诚布公地说，孔方兄只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罢了，远不是全部。我曾经鬼使神差，居然充任过京城数所高校联合举办的辩论比赛的评委。一入现场，我才发觉自己竟然无聊到来蹚这趟浑水。看得出来，那些孩子们临阵前都受过短暂的专门训练，他们个个文质彬彬又咄咄逼人，口若悬河之间还配以一个模子里边铸出的手势："请问"时双手前推，"我认为"时左手捂胸，"让我们倡导"时则右手与肩恰成四十五度锐角，意在配合最后几个有待升华的字眼。他们就如此这般手舞足蹈地为某个极端无聊的论题战斗。看到这样的场面，我不禁毛骨悚然，不知道是为自己羞愧还是为他们难堪。

不仅语言具有修辞成分，动作也有；修辞不是坏东西，但它容易被

弄成坏东西。因为用到极处的修辞就是为了煽情，就是为了从修辞的层面击倒对手，至于真理在何处，得全看修辞的脸色。希特勒当年就是凭着这一手得以祸及全球。他的成功，就是把真理在煽情中给修辞化了，在煽情中给夸张地动作化了。

依我看，煽情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之一。我从前不明白《圣经》为什么不把煽情列为七宗罪之一，现在我隐隐有些知道了：《圣经》整个儿就是煽情的集大成之作。《圣经》最明白，正是在真理的煽情作用的帮助下，依靠大人物们的口若悬河，依靠他们自以为真理在握的豪言壮语、花言巧语，群众发动起来了，能够让人血流成河的机器制造出来了。刘邦、项羽当然是这方面的天才，爱哭的刘备难道是这方面的庸才？按照野史的说法，此公的眼泪正是煽情的物化形式。希特勒的公鸭嗓子更是自不待言。

把稚嫩的大学生辩论比赛中动用的煽情，和刘邦、项羽、刘备甚至希特勒的煽情联系在一起，或许要遭人唾弃，但我不准备为此感到任何不安。鲁迅当年在面对北京尘土飞扬中那些面色蜡黄的孩子时说，我由此知道了中国的未来。我也想假冒神圣地说，我从大学生们的手势和慷慨激昂的言辞中，也看到了在各种真理掌握下的中国的未来：那不过是纯粹手势的胜利，语言的胜利，“真理”只剩下了摹本。

2005 年 4 月 19 日

第二辑　感谢的声音

需要感谢的东西很多，但一切都得慢慢来。首先要感谢的是某些我认识或者不认识的生者或死者，当然还要感谢诚实的记忆。正是他们（它们）帮助我渡过了难关，最终让我成了一个稍有良心的人。

贷款之后修什么房子?

在向生灵们发放记忆的能力这方面，老天爷真可谓一个平均主义者，因为它给许许多多动物都赋予了记忆才能，甚至看上去智商不高、身披盔甲、信奉缩头主义的乌龟，也能凭借记忆找到失散多年的恩主（这样的故事屡见于报端）；而在分配回忆的能力这方面，上天显然只垂青人类，它只给人类配发了语言装备，让人仰仗语言有能力清晰而有目的地回忆往事。如果说记忆只是往事的储藏器，是存放往事的私家银行，回忆无疑是这家银行忠实而不懈的借贷者。有意思的是，作为借贷者，回忆不但从来不向银行付息，干脆连本钱也不还；作为放贷者，记忆不仅幽默而且怀着不可告人的心理纵容了回忆的如许行径，还能使自己的存储量不但没有丝毫减少，反而还在不断增多——这仅仅是因为“人这畜生”（that animal called man）天天都在无事忙，随时随地都在生产转瞬即逝的往事。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两脚动物不仅在以自己的行动替回忆向往事银行还贷，而且还向记忆付出了超高额的利息。这实在是一个过于久远的故事，它的起源和发生远在我们的智力之外。

记忆，也就是那家往事银行的幽默和不可告人还远不止于此。它之所以原谅和纵容回忆借钱不还、骗本牟利的唐突本性，并不是因为记忆

特别具有宽容精神或者特别具有活雷锋精神，而是为了它自己：往事只有通过回忆才能长大成人；仅仅将往事存储在记忆中，如同将一个婴儿始终幽闭在子宫里，甚至是将可能存在的孩子始终封锁在卵巢隐蔽的沟壑中。而往事在回忆的搓揉和敲打下长大成人，才是记忆最乐于看到的场面，仿佛花旗银行乐于看见放出的贷款在奸商手中翻滚着、嚎叫着上升与飞翔。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最为搞笑的事情大面积地出现了：回忆在使用不费吹灰之力就到手的款项时，往往张冠李戴、上蹿下跳并四处行贿，鲜有老老实实做生意的时候。大量的怪胎就这样被回忆炮制出来了。依照钱锺书的记载，到人间吃醉了酒因而误入钱先生之书房的魔鬼，对上述情形有过上好的描述：“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这或许就是往事银行假装慷慨之后最想看到的闹剧。但那无疑是我们这些回忆者屡教不改的丢人现眼。

说这些看起来不着边际的闲话，为的是给谈论徐晓女士的散文集《半生为人》（同心出版社，2005年，以下引自本书只注页码）打个铺垫，因为这本书也是向往事银行进行大肆借贷并经回忆四处打点的产物。无论作为读者的我们多么简陋和粗心，我们都能看到，那些曾经鲜活的事情、那些一经发生随即就被存放在记忆当中的往事，也在徐晓女士的回忆中长大成人了。不过，无论我们多么挑剔、苛刻和眼睛带毒，都无法从中看到从各种型号的回忆录中经常看到的怪胎；《半生为人》也没有让诸如“自传就是别传”那样的搞笑场面出现。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和许多人一样，徐晓从往事银行贷款也是为了今天；和许多人稍微不同的是，

徐晓女士的回忆显示了某种显而易见的急迫感。这是个和生命、命运、时间有关的故事：

> 三年以前的这个季节，后来成为我丈夫的周郿英离我而去。我之所以写下以上的文字，大多是因为我们的儿子周易然，当年他还没有出生，如今也只有九岁，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只有靠母亲为他留下一点儿父辈的踪迹。我希望将来他能从这些文字中了解并感知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在我来说，这是写作的理由，也是活着的理由。（第170页）

徐晓说得很明白，回忆是活下去的理由，在最低的水平上也是写作的理由。更重要的是，她是为儿子而回忆，是为了儿子才走进了往事银行的大门。她不希望在走出银行大门时两手空空。这个过于繁重的任务或目的，要求回忆在动用到手的款项时必须小心翼翼、诚恳谦逊和谨慎有加；否则，稍不留神就有可能陷入魔鬼先生说过的那种陷阱。为着这个目的，回忆既是往事的主人，又是往事的仆从。它们必须相互妥协，必须采用一种平等互利的对话方式，以求得各自的道德完善。更为致命的是，往事既要在回忆的搀扶下长大成人，又不能全由着回忆的性子让自身处于委曲求全的境地；回忆既不能把往事弄成连往事自己都不认识的尤物，也不能故意丑化往事以抬高自己的品貌和身价。《半生为人》中有好几处提到过和监狱有关的事情，因为作者在不足二十岁时曾因莫须有的罪名在某座监狱呆过两年。这在被赞扬为“人妖颠倒”的“文革”中倒是常见的事情，虽让人震惊，实际上不足为奇。徐晓在《无题往事》中如是写道：

> 平反时我正在北师大中文系读一年级。平反决定在全年级宣读

时，我的平静使自己都觉得吃惊。被逮捕，被开除，这些惊心动魄的字眼，对我来讲已经算不上是刺激，平反与不平反，似乎对我都没多大意义了。就是不爱听别人说我是反“四人帮”的英雄。张志新的死是悲剧，可我的被捕是闹剧。我要真的是英雄，倒显得那些抓我的人不那么荒唐了。我还怕那些真心实意的赞扬。夸你坚强，说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儿坐了两年牢还能保持身心健康很不简单。其实只有我自己最清楚，事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当生活把你抛进火坑，你不得不在里面时，根本谈不上什么坚强和勇敢。你有的不过是活下去的本能，别人所能承受的你也同样能承受。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是关于是否出卖过朋友的委婉询问，我的回答一定让人很扫兴：我之所以没有出卖什么，是因为我实在是什么也不知道。我无法假设，如果我知道更多，会不会在几十个小时轮番审讯的疲劳战术中败下阵来。我不是一个遇罗克式的自觉革命者，我缺乏最起码的政治常识，我是一个完全名不副实的政治犯。（第 80 页）

面对让自己过于委屈的往事而有如此质朴和坦诚的态度，确实让人佩服，尤其是联想到动辄把手臂上的小伤口上升为民族的心脏中了一刀的人，徐晓的风范就更让人佩服了。不过，徐晓肯定明白，质朴和坦诚并不是从天而降的，毕竟动用往事银行的贷款花天酒地，将它充当四处喊冤的盘缠，才是人的常态；毕竟自哀、自怜、自恋才是我们首先想到的情感方式。这些并非不可原谅的缺陷需要我们克服，而克服显然需要极大的勇气、耐心和智慧。徐晓在另一篇文章中，用更为坦诚的语调说明了质朴和坦诚的由来：

“文革”后二十年，有许多人记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狱中经历，

> 这些记述因不同身份、不同体验，甚至因不同的写作时间和写作心境而不相同。回过头来想，如果是二十年前，我的记忆会筛选出完全不同的素材，我的心境会选择完全不同的词汇，我的笔而不是电脑的写作工具会使我结构出完全不同的句型。我可能写得很宏大、很悲壮，也可能写得很哀伤，但一定不会像现在写得这样从容和琐碎。最有可能的是，我会让读者和我一样声泪俱下，悲愤不已。那肯定是真实的，就像现在我所要写的仍然是真实的一样。（第 89 页）

或许正是因为征用了这种历经磨难才获得的低平语调，往事才从记忆中挣脱出来，并穿越时间的重重迷雾来到了回忆者眼前。它带来了它必然要带来的启示以及它睡梦般迷人的温度。但无论是启示还是诱人的温度，不管我们承不承认，都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轻易就能获得的。事实上，它们是徐晓为儿子准备的礼物，其间肯定经历过无数的自我斗争，也经历过无数次的与往事的斗争。但无论是自我斗争还是和往事较量，不过是从往事银行获得贷款的必要代价。“无端歌哭因长夜，婪尾阴阳剩此时。”（谭嗣同：《感怀》）徐晓经过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最终拼力付出了这一代价；《半生为人》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回忆原则，体现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回忆原则。

《半生为人》的封底引用了一位自称“（20 世纪）70 年代出生的识字者”的话：“上世纪 80 年代，当我还是无知少年，书中的人物是我仰望的群山，而当今我长到他们当时的年龄，才发现他们那一代的精神气质，业已成为绝响。”也许这位朋友指的是北岛、芒克、江河、阿城、史铁生而不是李南、郭海和刘羽。实际上，徐晓的回忆重心也许刚

好放在了后者的肩上。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半生为人》名为散文集，实为回忆录，只不过它回忆的不仅仅是徐晓本人，更是徐晓的同代人——在迷信、盲从、残酷而封闭如沙漠的岁月里寻找智慧、独立、尊严、自由和思想的那一代人。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的有些人如今早已大名鼎鼎，另一些人则寂寂无名；有的人早已撒手人寰，另一些人则在这个越来越冷酷的世界上残缺不全地活着。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激情，他们的追求，他们在普遍而持久的迷惘中坚定而犹豫的思索，在《半生为人》中都显得活灵活现而又不失分寸。当年他们贫穷、无名、落拓，但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思考的时代、求索的时代，远不像今天这样势利、俗气和浮躁。他们在那个充满了青春气息却又压抑青春的年月里，卑微而不失高贵地活着，对不入法眼的东西不屑一顾，对想念中的事物和人则掏足了心窝子，也挥霍了太多的语言炮弹和激情。的确，按照徐晓的回忆，那确实是炮弹，迷人的、火热的语言炮弹。

正因为如此，我愿意说，徐晓的回忆不仅仅是为了今天，更是为了将来。她是为了将来而回忆，而使用了那笔珍贵的款项。而将来是儿孙们生存的时间段落，因为无论是徐晓那一代还是我们这一代，都将老去和死去。她在《半生为人》中反复提到的儿子，既可以读成实际存在的儿子、她的儿子，也可以读做隐喻意义上的儿子、将来的儿子、人的儿子。为了将来的人，回忆者必须善待偶然漂到自己手中的银行贷款：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爱；不是要将往事弄成纪念碑，而是要将它在回忆中重新转化为记忆——那也是一个银行，但它不应该只是徐晓的私家银行，更应该是子孙们的公共银行，目的是要给他们一个见证：曾经有一群人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活过，曾经有一群和我们一样年轻过的人

在那个荒谬的年代里真正地年轻过、爱过……死过。

我故意放弃了《半生为人》中津津乐道的“故事”情节，因为愿意了解和共和国同龄的那一代人的读者，或许有机会、有兴趣读到这本书。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家私人往事银行，我们的回忆也始终有权利向这家银行无偿借贷，问题是我们贷款之后想做什么？想修什么样的房子供什么样的人居住？或者说，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什么样的权利动用这笔款项？在我看来，《半生为人》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苏珊·桑塔格（Suan Sontag）在一篇关于于韦伊（Simone Weil）的短文中深有感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有意识地追求健康，却又只相信疾病包含的真实性的时代。”（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56页）《半生为人》或多或少也透露了这层消息，但又将这层消息的原意进行了改编和重组：她那一代人是在一个病态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但她那一代人凭借自己卑微的反抗和昂贵的热情，使自己甚至时代获得了必要的健康和真实性，哪怕只有一小把。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回忆在此走上了它最正确的道路，那笔无须付息和还本的款项也找到了自己的最佳用途：不是给回忆者修建疗伤的私人别墅，而是给所有的后来人修筑一间会议室，让所有人的记忆在这间会议室中聚首、交流，让它们找到自己的回声，听见时隔多年后那熟悉的心跳。因为不管怎么说，所有人归根到底只是一个人，所有时代的人归根到底只是一代人。

这间会议室最终被徐晓处理成了故乡，这是回忆最应该奔赴的目的地。回忆就是要将往事打造成故乡。当然，这绝不仅仅是徐晓的目的，

更应该成为拥有回忆能力的人的本性，尽管在一个浮躁、势利的时代这一目标很难实现。徐晓不过是本着这一本性的指引并诚恳地接受了指引。而故乡意味着起源。由此，徐晓从私家往事银行征用了贷款后，终于将故乡和属于未来的异乡联结起来了。但把徐晓修筑的房屋称作会议室也好，唤作故乡、未来的异乡也罢，在徐晓那里，不过是同一幢建筑的不同名号。卡尔·克劳斯就曾斩钉截铁地说过，起源即目标。

我无意说《半生为人》是部伟大的著作。如前所述，它不过是一间会议室，一间贫民的草房子，是这个世上某些人安置自己心灵的故乡或目的地，也是一间无权者安放自身权力的秘密斗室。如今，这间秘密斗室公开展出了，但它或许只接待少数几个有兴趣的人来此聚谈——不过，这不能被理解为私家银行的吝啬，而要理解为时代的匆促和人心的浮躁。

由此上溯六年，我临近毕业，很偶然地读到了收入《半生为人》中的《荒芜青春路》，心潮澎湃；由此上溯八年，我还是个学生，更偶然地读到过同样收入《半生为人》中的《永远的五月》，禁不住潸然泪下。2005 年 4 月我见到了徐晓，那是在北大诗歌节一次小小的聚餐会上，她书中写到的几个人也齐集于酒桌。我和她说过的话多达十句，这让我感到受宠若惊。她胖瘦得体，一如她的文章；她笑得有分寸，也一如她的文章。我仔细观察过她，依稀还有二十年前的张扬和热情，但更多的是沧桑、皱纹、风度和碰杯。这一结局的由来，《半生为人》都有交代。

2005 年 5 月 21 日，北京丰益桥

感谢本雅明

1

一个出生于20纪60年代末、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人，难免不拖有一条宿命性的尾巴，那就是瓦尔特·本雅明曾经指斥过的“大话崇拜”（le la blague）。本人的肤浅经历或许可以视作这方面一个渺小的例证。

和许多同龄的朋友们一样，我从老师那里首先学会的三个完整的句子也分别是：“毛主席万岁！”“我爱北京天安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多少年以后，我才清楚地发现，上述三个句子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原始图腾：它的体温，它的印记，它愤怒的表情或者偶尔和蔼的面孔……无不对我们其后的人生运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在学会了这些最基本的大话元件及其基本组合方式之后，紧接着我们就开始被诱导着去写一些“革命歌谣”（当然，蓝本早已预先摆在那里了），算是对原始图腾的借重和运用。诸如朗朗上口而又咬牙切齿的“×××（人名），坏坏坏，/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我们最擅长的句式，也是我们最喜欢的节奏——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苍白的甚至是缺席的童谣作了必要的补充。它在我的记忆和意识中，甚至成了革命歌

谣的基本公式，因为“×××”可以依据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得到不断的变更：“×××”一忽儿是“刘少奇”，一忽儿是“邓小平”，一忽儿又成了“王张江姚”。时至今日，我仍然把它的善于变化和孙悟空的七十二变相提并论。有较长一段时间，提起孙悟空我就想起了“×××”。

经过诸如此类的“规训”程序后，我们接下来还要干一些比较复杂的活儿：每周上交一篇“日记”，以备老师检查。结果，我和不少同学写的都是自己帮助贫农张大爷的故事，只不过帮助的具体内容有些差异：有的为他挑水，有的为他推车，有的替他捶背，还有的甚至帮他倒夜壶。其实，我们的老师和我的同学们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日记的真实性。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且不乏保守和排外气质的村庄，我们村（那时叫生产队）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姓张的贫农大爷。张大爷在我们幼稚而又苍老可笑的文字中之所以必须要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原始图腾在我们身上的需要，也是为了给原始图腾的内在逻辑找到现实生活中的对应物，以便顺顺当当地引出如下结论：我们这些脸蛋都洗不干净的祖国的小花朵，早已作好了接革命的班的准备。

那是我们的狂欢节。我们在大话中吞吃着米花糖般的大话一天天长高，居然红光满面，肠胃畅通，对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它们不过是渺小的美帝国主义和苏修——都不惧怕。仰仗着大话的威风，我们从小就“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我们就这样快乐地度过了童年。事实上，我们幼小的灵魂一出生，就整天浸泡在大话或者巨词的福尔马林溶液中。我们的每一个脑细胞几乎都沾染了大话的余唾，并形成了有效的条件反射，面对不可一世的生活，我们随时可以引证大话哇哇大叫，以表达自己的感想。因此，我们的神经整天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小小年纪就成

天幻想着马上去解放全人类，渴望所有的受苦大众都能像贫农张大爷那样，得到我们无私的帮助。而在 1978 年的某一天，我帮祖父摘完棉花后，洋洋得意地写了一篇日记，其中有如下一句话，算得上对原始图腾不自觉的活学活用，也算得上给了给我教益的大话一个优异的回报："我又在大风大浪中成长了一天。"若干年后，当我看到马克思说，有些人喜欢"人为地制造革命，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时，我暗中大吃了一惊。当然，这怪不得我们这些祖国当年的小"花朵"。因为早在我们出生之前，早在我们由花粉变成花朵以远，大话早已为我们构筑了一个虚无缥缈而又唾手可得的巨大空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在那个巨大的空间中游动、穿梭、呼喊和嚎叫。"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我们严肃地、反复地说着这句加入少先队的誓词，然后光着脚丫子冲向了山间、田野。那是祖国大好河山的组成部分，奔向它，就是奔向伟大的、终极的目标。

让我始料未及的是，我从小学会的词语中，有绝大部分很快就被证明是不及物的。它们中的绝大部分在若干年后，甚至构成了对它们自身的强烈反讽。实际上，我从小就熟悉的词语在面对渺小的吃喝拉撒，在面对低俗、低矮的事物时，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它与我的日常生活没什么干系。但这绝不是说，我们的图腾真的毫无用处。作为我们的胎教，大话的最大遗产，就是给我们其后漫长的岁月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一种言说的姿态。尽管我对此很快就感到了厌倦和一定程度上的苦闷，也强烈地感到了有些不那么对头，但我没有能力尽快走出大话营造的氛围。毕竟早在我们清醒之前，大话的套路、大话的各种零部件，已经不由分说地构成了我们身体的有机组分。我的自我教

育从此开始。我清楚地记得，我生命史上这件重大的事情，发生于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某一天。因为就在那一天中午，面对祖父的去世我痛哭不止，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表达我的痛苦。在那一刻，眼泪比语言更有说服力。也是在那一刻，我清楚地感到，在此之前社会、父母、学校和祖国对我的诸多话语教育，顷刻间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但即便如此，我的自我教育的成效却是缓慢的、是暗中发生的。从那时开始，在一个偏僻的小镇，在川北一个边远的小县城，再后来是在成都平原一座美丽的都市，我发疯般读了古今中外不少大师、次大师、准大师和伪大师们的著述。我承认，我长时间地模仿过他们的做派，试图用他们的语调说话。但我惊讶地发现，诸如此类的做派和语调，和我周边的实际生活几乎没有一点关系。而所谓关系，就是想和凡庸的生活细节搭上关系却从未搭上关系的那种关系。俗不可耐的细节始终无法出现在我早已习惯了的语言模式中。很久以后，对这种境况我有过一点微不足道的检讨，而很长时间以来的更多的反思则深埋内心：

我要把昨天丢弃的人间细节
重新捡起：在整个挥汗如雨的季节里
我给它施的肥最少
这一点我从未忘记。

（敬文东：《如今》之二）

若干年后的今天，晚知晚觉如我者也终于看清楚了，当年的大话给予我的思维方式、观察角度、言说姿态，乃是一种宏大的、粗疏的、省略了若干细节的方式。它太高尚、太迂远了，我渺小的身份根本就配不上它；它太光滑、太剔透了，以致在它与我的日常生活之间根本就产生

不了有效的摩擦力，无法让我通过语言稳当地行走在真实的生活之中，也无法让我通过语言的窗口，看见属于我的凡庸的生活细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成了一个准盲人，面对周遭的事物发出的议论可笑之极。大话组成的空间就像一张网眼巨大的渔网，只能捕获鲸鱼那样的猎物。而鲸鱼，如你我所知，经过人们千百年来的穷追猛打，差不多快要灭绝了。即便如此，我肤浅的经历还是可以作证，即使鲸鱼没有灭绝，即使它碰巧撞在了我的网眼上，也不会被我真正地把捉，因为我从来就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把捉它——尽管在大话组成的令人眩晕的时空中，我似乎曾经有过那样的本事。

除此之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胎教始终让我明白：通过大话提供的观察角度，一切事物无不是明晰的，一切事物都不具备任何神秘性。它们的身体、内脏、血液和神经，就像三角形的内角之和等于一百八十度那样清楚和毋庸置疑。事物身上的神秘光辉被大话有效地清洗掉了，唯一存在的光辉只是大话所允许的光辉。那是一种炫目的、燃烧着的、令我们心醉和心碎的光辉。我们穿行在事物中，就是穿行在朗朗白昼之中。其结果只能是：各种事物在大话中变得形象单一、口感寡味。除了把它们当作纯粹物理意义上的物质供我们利用外，就什么也不剩了，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周边的各种事物完全丧失了热情。秉承着大话的教诲，我坚决相信：土地就是用来种庄稼的，房屋的天职就是为我们遮风挡雨，而树木之所以长出来，就是为了让我们砍伐，否则，它们就是毫无用处的东西。

我非常热爱我的母语。在某一个下午，我还曾故意矫情地对一位挖空心思想出国的小娘儿们说过：汉语就是我的一切。但我仍然要说，在

我粗浅的印象中，大话始终是汉语的一贯品德。诗人张枣把汉语界定为“在历史上从未摆脱过政治暴力的重压，备受意识形态的欺凌，怀旧、撒谎、孤立无援却又美丽无比的汉语”。张枣是对的。从《尚书》《周易》开始，几乎每一部正宗的典籍莫不是大话的演义。从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典籍中，我看到了天、天理、道、廖天一、爻、未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立志成圣则圣矣……却难以看到我们应该拥有的那块渺小却并不洁净的现实。倒是一些不入流的稗官、野史和笔记中，还残存着一些非“大话”的成分。但它们要么腐朽不堪、让人厌恶，要么根本就没有对付大话的任何力道。确实，在道听途说中，在较为广泛的阅读中，来自汉语深处的大话品质和我的胎教、原始图腾一道，上下其手，翻云覆雨，使我在大话的沼泽地越陷越深。我近乎行尸走肉般行走在街道、商场、立交桥和电视塔旁边，面带冷漠，思谋如何上吊或投河，以便告别太过清晰以至于无聊透顶的人生。

当我终于有一天发现自己深陷大话的泥潭而难以自拔时，我感到了彻骨的恐惧。但那时我还自以为年轻，以为凭着自己的努力就能从沼泽地中攀缘而出。事情过去很久之后，我才明白：在任何情况下，自我都是渺小的，都是不足为凭的。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需要脚手架。认识到这一点很痛苦，因为这证明了自我的微不足道；但现在我愿意相信，认识到这一点也足够美好和幸福，因为从此以后也许我真的有救了。感谢本雅明，他在我最需要帮助和拯救的时候，像个幽灵或半神一样，适时地来到了我身边——尽管这位软弱而又坚强的人生游击分子、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者，也仰仗了许多人的救助，才成了我眼中半神一样的本雅明。

2

曾和本雅明一起流亡巴黎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有一段关于本雅明的话，非常精彩也非常有名，即便在汉语读书界也差不多耳熟能详。阿伦特说：本雅明学识渊博，但不是学者；研究过文本及其注释，但不是语言学家；翻译过普鲁斯特和波德莱尔，但不是翻译家；对神学有浓厚的兴趣，却不是神学家；写过大量的文学评论文字，却不是批评家……汉娜·阿伦特目光锐利，见识非凡，品德近乎无懈可击，是我心目中在心、智两方面都堪称完美的人物。正因为如此，她的话或许可以证明：即使对于阿伦特这样优秀而不怀私心的朋友来说，本雅明也是难以理解的。

但我似乎更乐意赞同本雅明另一个朋友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的看法。此人认为本雅明是一个“纯粹的形而上学家”。肖勒姆的理由是：本雅明的“学术活动贯穿了各个阶段，覆盖了所有领域。从表面看，他的主要论题是文学和艺术，有时也涉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题目，并且很少涉及纯哲学的问题。然而，在他所有的研究领域里，他的兴趣和冲动都是从一个哲学家对世界及其现实体验中获得的”。但本雅明的全部著述却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绝不是黑格尔那样的形而上学家。在我看来，导致这种分野的原因之一，是本雅明奇迹般地从一开始就掌握了一种袖珍式的观察方法。这显然和黑格尔所代表的德国形而上学传统所要求和使用的观察方式大相径庭。黑格尔说的是另一种大话，是一种和理性有关以及关于理性及其运用的大话。

在我所能阅读到的本雅明的文字中，无论是学术著作（比如《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德国悲剧的起源》），还是泛文学创作（比

如《单向街》《驼背小人》），袖珍式观察方法始终是它们的稳固根基。本雅明通过这一手，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大面值的货币，明目张胆地转换成了小面值的货币，将英镑弄成了便士。尽管他的前辈胡塞尔在这方面也来了一手，但他们的方式完全不同。1925 年，痛苦、失意的本雅明有过一次意大利之旅，他在那里写了一篇绝妙的文章，题为“那不勒斯”，其中有如下一段：

> 建筑物就跟这石头一样可渗透。在院落里，门廊上，楼梯上，建筑物与人们的活动相互影响，互相渗透。任何情况下它们都给自己留有余地，有待一日可能变成一个汇聚了意想不到的新兴人物的剧场。这里没有什么是确切无疑的，没有什么是要永久存在的，没有什么可以说它“就只能是这样而不能是那样”。建筑物，公共生活节奏中最具稳定性的部分，就是这样形成的……在这样的地方，人们几乎没法分辨哪里是楼房正在兴建，而哪里的楼房已开始倒塌，因为一切都未做定论。多孔性的形成，不仅是南部工匠的懒惰造成的，更主要的是建筑师的即兴创作的热情所致，这种即兴创作要求不惜任何代价地保留一定的自由空间和机会。建筑物被用作大众舞台。所有的建筑物都被分成同时活动着的无数剧场。阳台、院子、窗户、走廊、楼梯、房顶同时又充当着这些剧场的舞台和包厢……多孔性是这个城市永不衰竭的生活法则……个人生活也是同样的分散、多孔和混杂。使那不勒斯区别于其他大城市的地方恰恰是它与南美那些黑人聚居的小村庄之间的共同点：社会生活渗透于每一个人的个人态度和个人行为中。这里，和在南美的小村子里一样，为了生存，对这里的北欧人来说，最自私的事情就是公共事务……这

样，家庭之间在一种相互模仿并接受对方的联系中达到相互影响。

这段随手分拣出来的文字，绝不仅仅是本雅明全部著述中的一个片段，实际上，它几乎可以算作本雅明全部著述在写作方法论上的一个缩写或者缩影，尽管它看上去似乎有些简单。本雅明的朋友阿多诺（Adorno）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过："要想正确地理解本雅明，必须感受到他每个句子背后的转折。"但在我不无褊狭的理解中，阿多诺的话，只不过正确地说出了袖珍式观察在本雅明的文字中的结果，而不是袖珍式观察的展现过程。实际上，只要稍微阅读一点本雅明，就不难发现，本雅明的所有词汇、句子，都被袖珍式观察方法深入浸泡过。袖珍式观察在本雅明那里意味着：决不放过一块石子（建筑物就更不用说了），但同时又始终要从一个看似渺小的事物，快速过渡到另一个看似乏味的事物。这是本雅明在词与物之间构筑的一种也许仅仅属于本雅明的特殊方法论。不了解这一点，或者忽略了这一点，本雅明的晦涩难懂就是必然的结局。

本雅明特别喜欢波德莱尔的诗歌。他引用过《恶之花》中的如下两句："绊在字眼上，像绊在石子路上 / 有时碰上了长久梦想的诗行。"这两句诗也许恰好可以用在本雅明身上：通过袖珍式观察，本雅明也完成了从石子路到字眼再到"诗行"的嬗变，如此快速、打眼，像疾风驶过茅草那样，他的文字快速地掠过众多的事物，但又从不因为匆忙而忘记了赋予众多事物以深深的擦痕。正是这一写作素质，构成了本雅明"每个句子背后的转折"。

本雅明的文字也因此具有一种强烈的恍惚性。恍惚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从看似的漫不经心中，透露出的恰恰是细致入微的体察；从看似的

慢中，透露出的恰恰是快。本雅明令人惊讶地将这两重类似于悖论的“事物”，包裹在了他的文字统一体中。而他的文字统一体，正好是他的词、句子、段落直到整个写作擦过事物时留下的深刻擦痕。本雅明也由此给了进入他眼睛和心灵的事物以浓重的恍惚性。事物在他的文字中左摇右晃。但左摇右晃的事物始终能把善于阅读的人，或者干脆说，能把与本雅明心气相通的人，导向一个令人眩晕的目的地。但本雅明通过这种恍惚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将目的地处理成了通向目的地的一个个中转站。

我把与本雅明的相遇看作我生命史上的奇迹。而奇迹总是起源于偶然。的确，我就是在偶然中遇见本雅明的。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在我遇见本雅明之前，是不是听人说起过他。十多年前，我在济南文化东路一家狭小的书店里，偶然看见了三联版的《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张旭东译）。因为价钱便宜，装帧不俗，书名也比较对我的胃口，就买了下来。但我当时并没有读它。我正在兴致勃勃地赶制一篇稿子。直到文章写成后，我才打开了那本书。我立即被吸引过去了。本雅明在这本异常复杂的小书中那种繁复、精彩、不拘一格的引用方法，让我惊讶不已；那种精微的细节描写和分析，几乎让我热泪盈眶，像失散多年的地下党员找到了组织。现在我愿意坦率地说，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有意识地感受到了细节的力量。读完这本书，我对自己刚刚写成的那篇文章深怀仇恨：它仍然是大话的产物，是大话的逻辑开出的惯常腔调，它仍然试图用大词去捕捉虚构的、虚拟的事物。在我的文章中，词与物之间的关系是虚拟的，几乎经不起任何推敲。我撕掉了那篇文章。我预感到我生命史上的一个时代终于结束了。

从那以后，凡是本雅明的书我都买、都读。但我要说的是，吸引我的，始终是本雅明的观察方式、观察方式产生的令人眩晕的文字，以及产生这种文字所需要的心灵转折。我对本雅明究竟说了什么始终兴趣不大。事实上，我从未打算成为研究任何一个人的专家，哪怕他是上帝。人缺少什么，自然就会追求什么。我需要的只是死死抓住本雅明，期望他能将我从大话的泥潭中一步步拖曳出来。我得承认，有一段时间，我在很大程度上剽窃了本雅明的观察方式。我也开始在自己的行文中有意加入一些有说服力的细节。我期望通过这一手，将我早已习惯的大面值钞票，转换成和自己的庸常生活相匹配的小面值的零花钱。为此，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本雅明在论述和细节之间的种种配方：它的比例、它的密度、它的节奏、它的温度。它们都曾被我利用，尽管我深知本雅明是不可学的。不久，我发现自己渐渐从大话的泥潭中走了出来。我成功地抛弃了我的原始图腾、我的胎教，但我又从另外一个较小的角度，重新建立起了与原始图腾的关系。

3

马克斯·韦伯精辟地指出，所谓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就是世界的祛魅的过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理性的霸权，事物仅仅是主体的对象，是供人解剖的标本。在这个高度张扬理性，并把理性“上升”为大话的过程中，事物身上的光辉消失了，事物的一切脉络似乎都变得清晰可见。理性制造出的大话空间是本雅明的存身空间，政治制造的大话空间是我生存的空间。让我惊讶的是，本雅明有能力强行让事物——哪怕只是一张报纸——重新充满神秘性。仿照韦伯的话我们可以说，本雅

明的观察和写作过程，恰恰是给世界重新“增魅”的过程。在本雅明的几乎所有文字中，我们都能看到，每一件事物，每一件事物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不清晰的，都充满了神秘性。究其原因，很可能是本雅明的犹太教背景。在 1931 年的一封书信中，本雅明解释过这一点：

> 我从来没有在脱离神学思想（如果你愿意称它为神学思想的话）的情况下去研究和思考。也就是说，我的研究和思索一直遵循着犹太教法典的教诲，遵循着《圣经》中每个段落都有四层含义的原则。我的体会是，即使是最陈腐的共产主义论调，它所包含的含义层次也比当代资产阶级深奥理论包含的含义层次多。那些所谓的深奥理论只有一层含义，即为自己辩解过失。

秉承着这种认识世界的态度，本雅明似乎从来都是根据他的好奇心、根据他的自我根源来展开他的写作。他对事物的内在品质有一种近乎迷狂般的爱好。仰仗着特殊的观察方式，本雅明似乎长了一双电子眼睛，能一下子看到事物的核心部分上去。事物的转义、喻义、歧义，都在他的电子眼中暴露无遗。而他接下来要做的，只不过是用相匹配的词语和句式将事物核心部分的转义、喻义、歧义盛纳下来。在理性和科学的转弯处，在理性和科学的机关枪扫射不到的地方，本雅明出现了。甚至是在理性和科学管辖的范围内，本雅明也让事物重新充满了神秘性。他来到理性和科学的枪口下，挡住了它们射出的子弹，将事物的神秘性近乎完好无缺地保护了下来。

本雅明通过他的电子眼，还看清楚了一个事物的核心部分与另一个事物的核心部分之间的差异。但这是一种神秘的差异，甚至就是关于神秘的差异。更让人惊讶的是，看起来有着近乎无限差异的两个事物，都

能被本雅明天衣无缝地连接起来，并统一在同一篇文章中，统一在同一种语调中。仰仗着袖珍式观察方法，本雅明掌握了一整套表面看起来是“乱点鸳鸯谱”似的联系法则，却又能在暗中准确地把两个看似完全不同的事物焊接在一起。他在诗人（比如波德莱尔）和“拾垃圾者”的形象之间找到的同一性，不过是“乱点鸳鸯谱”的辉煌战果。

在一个机器大生产的时代，在一个看起来越来越清晰的年头，本雅明通过他的观察方式，重新赋予了事物新的神秘性。但本雅明让人惊讶的地方远不止于此。他能让自己从最微小的事物身上，从点滴的时间当中，窥见神秘的上帝、拯救以及希望：

> 卜卦人从时间中找出他所蕴藏的东西。在他们的经验中，时间肯定不是均质的、空洞的东西。任何人如果记着这一点，或许就能领会人是如何在记忆中体验过去的——也就是说是以与卜卦人完全相同的方式体验的。我们知道，犹太人是被禁止探索未来的。然而，摩西五经和祷告却教他们记忆。这就剥去了未来的魔力——所有到卜卦人那里去寻求启示的人全都是屈从于这样的魔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犹太人来说，未来就成了均质的、空洞的时间。因为每一秒的时间都是一道弥赛亚可能从中进来的狭窄的门。

但本雅明窥见拯救的方法却不是论证式的，或者具体地说，从来都不是柏拉图和黑格尔式的。本雅明有一套单独属于自己的“逻辑方式”。这是一种能把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暗中连接起来的逻辑。这是一种充满诗意和神秘性的逻辑。通过他的观察，也通过他的写作，本雅明重新为点滴的时间赋予了记忆，为细小的事物添加了被别人、被逐渐流逝的时间抹去的细节。由此，本雅明发明了一种和时间有关的记忆术，以此来

对抗在理性的大话空间中越来越严重的遗忘品性。他最接近文学创作的《驼背小人》就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

早几年，有人认为本雅明对汉语学界意义不大。持论者的依据之一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本雅明的论调太不合时宜了。对此我有一点不同意见。但我首先要申明：如何接受本雅明，本雅明具体而微的思想如何在汉语学界产生何种影响，那是别人的事情，我管不着。我想说的仅仅是：本雅明在中国已经发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发生在诗歌界。在我熟悉的诗人朋友中，有不少人都坦率地承认过这一点。不过，在我看来，本雅明对我和我的朋友们的影响，与其说是在思想方面，还远不如说是在思维方式和观察方式方面。还是以鄙人为例。作为一个曾经把大话当胎教和原始图腾的人，我通过本雅明第一次懂得：事物的神秘性是如何在我们的意识中产生的，事物的神秘性在我们的语言中又是如何产生的。通过本雅明，我还明白了另外一个道理：事物的神秘性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东西，它让我们丰富，让我们沉入缅想，使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可爱的；细节和细节之上的神秘性，是我们的激情和拯救的来源之一。

在中国不断向所谓的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作为一个个凡夫俗子，我们确实需要事物和事物的细节的非透明性，也希望在我们的目力所及之处，事物不那么太过清晰。这当然不是在提倡神秘主义或者“封建迷信”，而是要力图使看似毫无光辉的事物，通过它的混沌和神秘为我们提供“诗意”，为我们带来激情，从而将我们从平庸的、一目了然式的现代生活中拯救出来，让我们重新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而好奇，刚好是勾引我们朝气蓬勃地生存下去的必要动力之一。

遗憾的是，本雅明并没有朝气蓬勃地把他的生活推进到底。忍受了命运无数次戏弄后，他终于在一家小旅馆里自杀了。从启示的角度，我愿意固执地说，本雅明自杀，并不是事物的神秘光辉在拯救方面的无能所致，事情的真相也许恰恰是：智慧如本雅明者，也没有能力完全洞悉事物的神秘，没有能力仰仗这一点以便成功地将自己引渡到光明之中。实际上，本雅明的观察方法早已向我们暗示了：在一个高度理性化的大话时代，事物的神秘性本身就是一种有待重新发明的特殊“事物”。而本雅明显然没有完全掌握拥有“重新发明”功能的必要技术。对此，我，一个东方的小知识分子，愿意在这里说：恰恰是本雅明的自杀，给了我继续学习他的理由，也正是因为本雅明的自杀，给了我更加感激他的依据。他以他的著述将我从大话的泥潭中拽了出来，又以他的死，教导我继续探讨事物的细节以及光辉，从而为自己的生存——哪怕仅仅是苟延残喘——找到一部分坚实的理由。

2003年6月16日—20日，北京丰益桥

姐姐们都老了

此刻，我同意把速度加大到无限。

——西渡

1

1974年，正是“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时节，应和着来自“革命牌”内心深处的庄严号召，刚过而立之年的广州籍画家陈衍宁完成了红遍当时的著名油画《渔港新医》。这幅深谙革命话语之精髓的作品很快就被制成宣传画和年历四处张贴；通过那个年头质地昂贵的纸张的公有制的帮助，《渔港新医》有幸为“红海洋”的最终成型，贡献了它应该贡献的力量：纸张确实在“广泛地倒向阶级”（柏桦语）。出于对那个红彤彤的年代的正面呼应，布质画面上昂然挺立的，是一位阳光灿烂的女赤脚医生。遵照中国人的想象力通常的运行规则，复兼革命的力比多的一般性涌动，那位女医生被刻意塑造成一位妙龄少女；通过革命年代暗中存在的意淫心理，赤脚少女医生含蓄的笑意征服了几乎所有的革命群众，甚至连革命群众严加看管的“黑五类”分子也无法幸免——他们似乎乐于被征服。

时光倏忽而逝，《渔港新医》和赤脚医生这个名号一道，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与视界。和它显赫的前生相比，它的后世显得过于落寞；直到半个甲子之后的2006年，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回忆者祝勇才在他的长篇回忆之书《反阅读》里征用自己的童年记忆，对《渔港新医》

作出了生动的追忆：那位女医生“倾斜着身体，提着一只洋皮铁桶，在为渔民送药。作为疾病的抵抗者，她有着与身份相符的健康体魄，透过她穿着的广东渔民的宽松服装，可以感受到她身体内部的力度和肌肤的弹性。作为她身份的象征，那只踩踏在船帮上的赤脚格外引人注目。那是经过海水浸泡并被南国充沛的紫外线照得通红的赤脚，上面记载着一个年轻的赤脚医生的全部履历”。北国沈阳当年的病童，多年后有幸成为回忆者的祝勇如实供认，“我熟悉这幅画是因为它曾经被印刷成年历，很长时间贴在我家墙上。那时我的腿部刚刚做了一个不小的手术，腿被石膏固定成一个姿势，并且要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维持这个姿势，即使睡觉也不例外。那段日子里，那个健壮的女孩是我唯一的朋友——我甚至企图与她对话。她的嘴唇微张，正是想要说话的样子。在阴郁的北国冬季，这幅具有强烈的户外光影效果的油画照亮了我的整个房间。我坐在床上不能动，常常望着她的那只脚发呆，想象着行走和奔跑的感觉。脚、船、大海，这些意象既对我形成蛊惑也对我构成伤害。成年以后，我长期在南方游走，或许就是为了完成当年那个病童心中曾经许下的诺言。赤脚的女孩给我某种安全感，因为她是医生，并且拥有健康的青春。她为我提供了完美的身体范例……”（祝勇：《反阅读·疾病》）

通过较为铭心刻骨的追忆，回忆者祝勇捕获的，是在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1966—1976）的尾部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或微不足道的花絮，它早已湮灭于被许多人大声称颂的“历史长河”，但它也理所当然地变作了回忆者个人成长史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一个小小的历史按钮、一个并非贸然存在的生命口令：半个甲子之前的某一天，一个六七岁的小

男孩，在病床上有幸目击了一位被革命话语蓄意制造出来的妙龄少女，一个光着脚丫子的女医生。她美丽、丰满、圆润、成熟，因革命话语的照耀和对革命话语的有意分享而阳光灿烂，因革命的力比多在她身上周流六虚而光彩夺目。在祝勇的记忆中，她是小男孩黑暗时期唯一可靠的伴侣。首先映入病童之眼的，是那位少女健康的体魄、宽松的服装、微张的嘴唇，是她的赤脚、“身体内部的力度和肌肤的弹性”“健康的青春”和“完美的身体范例”；环绕在赤脚女医生身上的革命话语的光芒突然间烟消云散，革命的力比多也踪迹全无——是女医生湿润、丰满、令人炫目的肢体，而不是革命话语的光辉或它的力比多，为小男孩多病的“身体指明了方向”，让他“对自己成长中的身体满怀憧憬”（祝勇：《反阅读·疾病》）。《渔港新医》之所以没有在后来成为回忆者祝勇的那个小男孩心中起到革命教育的作用，革命的力比多也不曾发挥出它超强的蛊惑功能，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个病童年幼无知，而是他的大腿确实出了问题——来自身体的疼痛不费吹灰之力，就战胜了革命话语多年来一贯的无往而不胜。但这实在算不上奇迹，毕竟身体拥有更大的力道：是身体为那个病童赋予了对抗异质物品的强大力量。

依照总是在事后才编纂出来的革命编年史，1974 年以后，火热的年代因其过于火红终于开始淬火，伴随着肉眼难以察觉的青烟，进而走入它较为漫长的疲软期。大人们在小男孩的病房外依然装模作样地继续操练：挥舞拳头，高呼口号，给最高指示以热烈的掌声，为阶级敌人、美帝国主义和苏修反动派献上无产阶级专政的特制铁拳——只是疲态渐露；小男孩则带着成长的重任，躲在病房中独自从一个少女那里寻找慰藉，无意中吹响了迈向成人世界的号角：他渴望她的身体的指引，渴望

她微张的嘴唇吐出状若莲花的温柔之辞。那个正在逐渐淬火的年代号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个时代不需要坚若磐石的房门，不像半个甲子之后以金钱为本位的今天，家家户户都以铁将军严守门户。因此，那扇并不需要多么坚固的房门隔断的不只是年龄，更多的是革命：房门外，赤脚女医生两眼迸出革命之精光，摄人心魄，鼓舞着群众的斗志，为人民带来了土生土长的健康；房门内，少女医生则是那个病童的姐姐，温柔健康、入口化渣。她是他的保护神、教育者、小小的图腾，是他“可呼其乳名的小妈妈”（张枣语）——只因为她“对于生命的诠释不仅来自她的职业”，祝勇在 2006 年说，“更来自她的躯体本身”。（祝勇：《反阅读·疾病》）一个潮湿、丰润的身体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变作了守护神和教育者，但这同样算不上奇迹。

“如果把想象心理看作人的一种天然能力，而不是后天教育才获得的某种能力，那么就必须认定这个复杂的心灵具有一定的作用，它不但可以唤醒一切、假设一切，而且能够随心所欲地把欲望与灵感、内在的冲动与自然力混为一体。”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口气显得意味深长，也充满了想象力，“我们必须顺其自然，把画面放在思想之前，把自然画面放在首位。这类画面直接来自自然，它们同时服从自然的力量和人的本性的力量，产生于物质和自然物质的运动，我们可以在自己身上、在我们的器官中感受到它的活力。”实在应该感谢那个不小的手术，是它的善意，是它提供的另一种性质的自然画面，培育了回忆者的孤独和脆弱，培育了回忆者对依赖之物的暗中依赖。很显然，那是被革命话语坚决排斥的依赖物，因为它只承认自己才是唯一可靠的屏障。这个见风即长的小秘密将会在其后的日子里，为回忆者提供纵横驰骋、破虏平蛮的锐利武器。

2

疾病、无知、年幼、孤独，还有太多太多被我们（或回忆者祝勇）有意放弃的无以名之的小小因素，让那个小男孩在革命年代有机会迎头认出了他的姐姐——但是很遗憾，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姐姐的光芒”（保罗·策兰语）来到我的同龄人（比如那个叫祝勇的病童）身上，更有着历史主义方面的硬性原因。那个伤腿之童在病房中肯定不会明白（当他成为回忆者后肯定会明白），在他幼小的身体和稚嫩的孤寂之外，是他从不认识但又必须天天碰面的某种力量让他在被培育、被规训的过程中，突然认出了他需要的姐姐——尽管半个甲子之后，回忆者祝勇的言辞十分从容，和“突然”这种咋咋呼呼、拐着急弯的词汇几乎难以搭讪。像那个传说中的土行孙一般，这种力量来无影、去无踪，它迅疾地风卷大地之后，我们只能从它制造出的残迹和废墟身上，大地或时光的创伤身上，辨别它的形状、性质、神态和身影。那个病童需要姐姐，是事后才能肯定的事情，病童本人对此并没有明确的意识。那个历经沧桑，终于成长为回忆者的人用事后的恍然大悟证明了这个看法：“直到现在，我才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在当时所有的美术作品中，赤脚医生几乎不约而同地以少女的形象出现。这标明了艺术与现实的距离——一个年老的中医出现在我们面前，会让我们备感信赖，但在绘画上却恰好相反。我猜想画家们在潜意识中赋予赤脚医生以欧洲古典绘画中女神的职能……”（祝勇：《反阅读·疾病》）

世界是由阴阳组成的，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但又绝不只是活在中国人心头的观念，因为从古至今，没有哪个部落、民族或国家竟敢不是由男人（阳）和女人（阴）构成的。这是视觉、听觉、味觉甚或

下三路共同认可的常识。人类在阴阳杂处、阴阳交融的状态中度过了数万年，从来不曾对阴阳分立感到任何惊奇（不分立才是令人惊奇的事情）；直到某种奇怪的历史主义阴错阳差地获得它的权威性之前，这种状态从未改变过它的性质。那个怪模怪样、携带着太多偶然性的历史主义稍一站稳脚跟，就公开宣称自己具有不可战胜的必然性，它因此有资格促使自己借助革命的名义对阴阳重新进行划分。不出它所料，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那个“令人痛苦的”（舍斯托夫语）必然性果然取得了彻底、干净、全面的胜利：不是阳战胜了阴，就是阴满怀革命豪情主动投靠了阳；不是全体中国人奇迹般变成了雄性，就是全体中国人集体转渡为中性人。在那个熊熊燃烧着的、亢奋的、喘着粗气的历史时期，阴或女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体失踪；“不爱红装爱武装”就是阴性或女人在那个年头赢得的新的历史内涵。

阴性大规模消失或者隐匿，导致阳气过剩；过多的阳气注定要导致整个时代肝火旺盛、脾气火爆甚或甲状腺肿大，男女老幼在幻觉中满脸都是青春痘。这是一件至为奇异的事情，是古今中外从未存在过的奇观。“谷风布气，万物出生；萌庶长养，华叶茂盛。”（《焦氏易林·坤》）一代人得以成长的土壤已经被预先造就；作为植根于这片土壤的幼苗或“萌庶”，未来的回忆者只能选择专心致志地成长——在偷偷摸摸地对依赖之物的依赖过程当中。

半个甲子之前，大腿做过一个不小手术的小男孩，我的同龄人，因为孤寂过于强大，因为阳性世界横行无忌，在那间由一扇并不坚固的大门隔开的病房里已经无处藏身、躲无可躲；出于对温柔与柔软的极度渴望，他像他的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急需一个姐姐，哪怕是一个错认的阴

性，只要她是丰满的，只要她真的具有母性、雌性和一点点呵气若兰的女性。是需要的暗中作用、暗中包庇，让那个小男孩全方位误读了《渔港新医》、抹去了女医生身上的革命话语和她随身携带的革命的力比多；特殊年头的特殊需要令小男孩意外地收获了一具温柔的胴体，既然他的母亲正在忙于革命，在响应革命话语和历史主义的号召不幸或万幸地接近于中性，既然“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张楚：《姐姐》）。

用于回忆的武器就这样在暗中成长，在偷偷摸摸地成型，发誓要让自己锋利，直到某一天回忆者本人对此都会十分惊讶。

3

作为被百密一疏的火红年代无意间遗漏的一分子，那个病童借助于在革命岁月捕获的阴性滋养和因错认而来的姐姐，辗转多年，终于长大成人；作为成长的必经步骤，他和他的同龄人一道，经过了相似的磨砺，走过了大体相同的、有些乏味的人生三部曲：“童年：没人管没人问，在野地里疯玩，时代的动荡偶尔经过他们并不十分在意的眼帘。少年：上中学，毕业后有的上大学，有的赋闲。经历平凡，校园平静。写诗，唱歌，读书，幻想。成年：上班，进入社会。社会开始变幻。从国家而言，这是从政治本位向经济本位的转化；就他们而言，生活开始从玩味滑向无玩味，从精神世界落向无精神的世界。”（李皖：《这么早就回忆了》，《读书》1997 年第 10 期）但我们的回忆者，就出现在这个“无精神的世界”的地平线上，以他不无犹豫的神情和支吾着的姿势：

山麓相会樱花开，

多望能有，

女郎观花来。

（《万叶集》第1752歌）

在姐姐的滋养下，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回忆者（比如祝勇）多年以后终于羞涩地亮出了他的身份特征：他是个浑身上下散发着阴性气质的回忆者，谈不上什么战斗能力，既不特别坚强也不特别脆弱，尽管他拥有胸毛、发达的肌肉甚至偶尔出现在笔底和舌尖上的狠话；他回忆的不是自己的辉煌，而是自己的平庸或失败，因为他从未经历过辉煌，“虽然从理论上知道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但他既无能力也不屑于投机取巧，即使在恋爱的时刻也没有掌握抄近路的技巧”（敬文东：《我们这一代的故事》，民刊《思想》2005年秋季号），他的回忆之书（比如《反阅读》）注定只能是失败之书；盛纳在这个容器里的，不是成功的经验，而是从不断的失败中捞取的一鳞半爪的教训。他是教训之麦的收刈者，因为“让你想起往事的女人既是你的敌人又是你的朋友”（伏尔泰：《关于记忆的传说》，《老实人（伏尔泰中短篇小说集）》，曹德明等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94页）。但教训无疑是宝贵的，正如同那些成功者辉煌的经验一样。

早在病床上凝视赤脚女医生“身体内部的力度和肌肤的弹性”开始，伤腿之童多年后的回忆者身份就已经命中注定。对不起，这样的语气和宿命论没什么干系；对不起，这样的语气和决定论也攀不上亲戚。因为拥有“没人管没人问，在野地里疯玩”之童年的回忆者，拥有第一手童年的那个人，早在他目击赤脚女医生的胴体时，无意间就已经开始了他的内在移民（inner emigration）：他以与时代分离的支吾着的姿势和时代保持亲密接触，他因此有机会把外部的大时代转化为内心中存储的小日子，把火热改装为内心深处的清冷，这种清冷随时可以越过胸腔遍

布肌肤的每一寸土地。通过内在“移民”，他过早地成为了那个火热时代的“遗民”，在一个时代破碎之前他提前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破碎。他无路可逃，他已经命中注定：发现或认出姐姐不过是内在移民的注定结果之一。

因此，回忆者不是逃逸者，更不是幸存者或好运的持有者：他从未经历过像样的磨难，甚至从未走进过一个像样的故事并成为其中的一个普通情节；只不过有被误读而来的姐姐存在，他碰巧有些额外的幸运罢了。这几乎是他一生中能够遇到的最大的幸运。实际上，他是革命的残余或剩余价值，是革命的遗腹子或羡余物，因为他仅仅是在革命的尾部而不是头部发生的小插曲和小花絮，尽管受革命之托，他一生下来就是后者钦点的接班人，但他确实还来不及得到后者全方位的浇灌，来不及饱餐后者体内奔涌不息的力比多。按理，红色应该是他的全部背景、唯一背景，但幸运的是，他还是一个阳性世界中阴性乳汁贪婪的吸吮者，尽管由于历史主义的权威性在四处晃荡，那乳汁并不丰盈，也不特别富有营养，但依靠内在移民的转化作用，乳汁的产量和质量不多不少、不偏不倚，正好能够造就他额外的幸运，精确得犹如行星的运转，需要上帝给出太多的机缘巧合。

拥有这种奇特出发地的回忆者长大成人、获取他的回忆者身份之后，他对革命话语的光彩夺目、历史主义和它所宣称的必然性有理由表示怀疑，并经由怀疑生发出轻微的唾弃心理：“那一刻，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没有什么急欲要牺牲所有人幸福以达成的国家目标，没有不可挑战质疑的社会准则，没有一定要肃然起敬的理论学说，只有爱情的可能性，生命的愉悦，私密的甜蜜，真心的笑容。”（胡晴舫：《我们

这一代人》，《读书》2004年第7期）因此，回忆者在收刈自己的失败教训时，时时都会听取来自阴性乳汁的教导，宁愿以身体的软，面对教义（即革命话语、历史主义及其必然性的和合）的硬，宁愿下意识地用潮湿、温软的身体，在回忆中重新感知阳性教义对自己的成长的特殊意义。这既不是感恩也称不上反抗，因为没有一种出自事后的抗议能够称作真资格的反抗，因为反抗的唯一特征就是它的当下性、即时性。反抗具有过期不候的显明特征，类似于半个甲子之后四处通行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连接回忆者和回忆者的历史经历的，注定是一个被回忆者有意放大的切点，即革命的力比多和回忆者身体内部的力比多之间的相交、相切。尽管这个关键性的切点在回忆之书（即失败之书，比如《反阅读》）中，并没有被明确提及，也没有被冠以这样的名号，但它的影子无处不在，它的温度和气味无处不在，它甚至就是失败之书或回忆之书之整体。毫无疑问，力比多是矢量，但它又是一种脾气十分古怪的矢量：它倾向于以任何一个方向作为可能的方向——杂乱无章是它的最大特性，必须将某个方向化为现实的方向则是它的第二大特性。受这种古里古怪的倾向性的暗中指引，革命的力比多成功地生产出了火红的历史，它没有脚本却宣称脚本早已命中注定，剩下的工作仅仅是按照脚本的规定集体性地扭动身体，向一个已知的目标一路狂奔；它宣称火红的历史仅仅出自它的必然性，但它从未想到火红的历史终有淬火的时刻，看不见的青烟早已开始扩散，更不愿意提及力比多拥有的第二大特性：它始终试图“给我们一部第一哲学”（prima philosophia）。仰仗着这种立场恍惚的倾向性，回忆者则让自己度过没有多少磨难的小日子后成功地长大，并

以此对那个小男孩在病房中担负的成长重任作出承诺。得力于内在移民的暗中帮助，几经周折，两种力比多产生的合力最终塑造了回忆者的阴性气质；但两种力比多在形成合力时绝不会遵循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只因为革命的力比多的力量，按其本义，要远远大于回忆者身体内部的力比多所拥有的细小力道，并且更加混乱、更加恍惚——前者因此有理由宣称它拥有必然性。实际上，合力的产生遵循一种变态的平行四边形法则。正是这个有点变态的法则让回忆者对姐姐的需求既是公开的，又是偷偷摸摸的；既是有意为之的，又好像是在无意间幸运地获得的，宛若天上掉下的一个林妹妹或者一块可口的馅饼。

被回忆者放大的切点：变态的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它不仅造就了回忆者的身份及其特征，更造就了回忆者的失败之书，但它首先造就了回忆者构架回忆之书的方法论。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回忆者在回忆往事时独有的形而下学：通过艺术（比如《渔港新医》）走向身体，通过身体（比如那个伤腿之童）走向对历史的理解，通过对历史（比如那段火红的岁月）的理解走向对艺术的回忆性打磨——没有被明确申说却又在暗中被放大的切点终于展开了翅膀，绽放出花朵。它的气味感染了书中的每一行文字，它的热量有能力让每一行文字处于恒温状态。面对往事，它开始以温柔、阴性的手脚摧城拔寨。那个沈阳的病童在成年之后对他构架失败之书的形而下学有过明确的告白："这是一种奇妙的递进关系。我通过身体来观察历史，又通过艺术品来观察身体——如果没有那些艺术品，我又要到哪里去寻找那些业已消逝的身体状态？"因此，在这个回忆者看来，对于失败之书或回忆之书，"艺术是起点，历史是终点，而身体则扮演着中介的角色。将'身体'夹放在'艺术'与'历

史’之间，并非一个随意的选择”。那个终于幸运地成为回忆者的曾经的病童说，这表明身体在失败之书中将要担当重要使命，因为和回忆的宗旨相适应，失败之书“在表面上是一本阅读史，但阅读的对象，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身体，身体背后，则是迷乱复杂的历史图像”；失败之书“将1960至1970年代作为一个切片，对‘革命中的身体’作一次深入的研究，来考察身体在历史中所处的生态环境，以及它与历史之间的对话关系”（祝勇：《反阅读·引言》）。

艺术：那个火红年代独有的火红的艺术，阳性是它的唯一特征；历史：那个火红的革命年代，它由毫无方向感的革命的力比多所造就；身体：被革命年代和寄生在它身上的艺术所规训的那团团血肉。切点被悄悄放大之后，艺术、身体、历史被完美地统一起来，作为对立面的硬性的教义、阳性的教义，在回忆者的成长史上立即显示出它特殊的意义；失败之书、昂贵的教训才能由此得以实现。形而下学因成就失败之书而成就了它自身，因为至少从表面上看，“死亡是爱情的真理，爱情又是死亡的真理。”（乔治·巴塔耶：《文学与恶》，董澄波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2页）这是一种质地特殊的、做了变性手术的辩证法。《反阅读》由此启发了我们：和巴黎的诗人等同于拾垃圾者的形象有些类似，在中国，在那个火红的时代过去了半个甲子的时间之后，回忆者等同于失败教训之收刈者。这是被误读而来的姐姐给予的神奇礼品，但谁又是沾染了过多革命话语及其力比多的赤脚医生被还原为妙龄少女的催化剂？

4

许多面孔迥异甚或相互间斗殴不断、水火难容的人生理论都齐声宣

称，它们可以完美地解释一个人何以成为这样一个人，可以解释一个人的“所是”的全部由来。回忆者对这些仰面朝天、自以为是的理论的最好态度应该是不予理睬，让它们在一边牛气冲天、胆豪气壮，因为回忆者拥有艺术—身体—历史的三位一体作为武器，有他自己的独门暗器——形而下学。那些故意排斥身体的人生理论不能进驻回忆者的眼帘。它们必须要被回忆者的眼睛挡在帘子的外边。

和回忆之书的写作宗旨相适应，形而下学的重心是追忆。追忆是这样一种器物：它是一个人穿过火红的阳性时代辗转成为回忆者之后，对往事进行的重新认证，是对阳性时代进行的阴性挖掘；它必须拥有一套看似柔软实则有力的考古发掘系统。在追忆的帮助下，将会出现一部个人的思想史；出于回忆者的私人气质，出于培育了这种气质的乳汁的特殊性，这部个人思想史将是一部呈阴性的思想史：姐姐始终是这部回忆录背后的隐蔽力量。

追忆总是后置性的器物，它的存在取决于一个显而易见的循环：一个病童在阳性时代的诸多艺术品的陪伴下，走过那段火红的岁月，一路来到半个甲子之后平庸而黯淡的辰光——他因此拥有两个质地不同，但都可以用不好来判断其成色的岁月；这时，他在暗中的阴性、被误读而来的姐姐的帮助下早已长大成人，他愿意回首来路，用已经成型的阴性气质重新窥探那个阳性时代对他的滋养。他站在今天咀嚼过去。他将再一次和姐姐相逢，他将再一次面对已经远去的内在的移民过程，他因此将至少两次经历历史：一次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一次是他在循环作用的帮助下在内心经历过的。前者的含义要靠后者来赋予，只因为前者经历历史时还来不及仔细打量历史。或者说，后者才是意义的出源地，但前

者无疑是策源地；策源地必须经由出源地的激发、催化才能让自身得以呈现。与通常的情况截然相反，后者才是前者的生身之母。因为，“人在经过现在时，眼睛被布蒙着。他只能感觉和猜测他实际经过的一切。只有到了后来，当蒙眼布解下时，他才能清楚地看见过去，搞清他经历了什么，并发现其中的意义。”（米兰·昆德拉：《欲望玫瑰》，高兴、刘恪译，书海出版社，2002年，第60页）

因此，是让追忆得以存在的那个循环使切点得以形成，是回忆者在追忆中重新再现、重新理解了革命的力比多和个人体内的力比多之间的相切，是追忆重新组建了那个变态的平行四边形法则：追忆是一个高明的建筑师。唯其是事后的观望才使平行四边形法则呈现出变态的特性，所以那种变态，那个古怪的平行四边形，才格外令人吃惊、恐怖和炫目，回忆者独有的形而下学悄然现身才显得富有必然性——另一种性质的必然性。

形而下学得之于那个循环，但也明火执仗地加固了那个循环：它让循环在回忆之书当中显得更加打眼，更加辉煌，像暗中涌动着、澎湃着的地火。那个火红的年代中的所有艺术品，无论是电影、小说、故事还是戏剧、音乐、绘画和雕塑，都显得亢奋、激情四射和朝气蓬勃，动不动就会吼叫起来，呈现出对全部意义的垄断姿势；寄存在那个火热年代的所有艺术品当中的人物，都在用自己近乎虚拟的动作 / 行为，拼尽全力去说明或图解革命话语的红火与革命力比多的旺盛。“由于一切艺术都是修辞性的，因此革命文化工作者面临三大基本任务：第一，投身到作品和事件的制作中去，这些作品和事件在改造过的文化媒介范围内大力虚构现实，以取得有益于社会主义获胜的种种效果；第二，作为批评

家，要提示那些非社会主义作品用来制造政治上不可取的效果的修辞结构，以作为抗击虚假意识的一种手段；第三，尽量独辟蹊径地阐释这些作品，以便从中攫取任何对社会主义有价值的东西……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的实践是投射式、争论式和攫取式的。”（伊格尔顿：《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郭国良、陆汉臻译，译林出版社，2005 年，第 149 页）这是那个病童在成长过程中亲身经历历史时亲身领教过的事情，哪怕当时他已经开始了偷偷摸摸的内在移民活动。当他回首来路，在形而下学的帮助下再次经历往事时，那些艺术品和艺术品中的人物全都黯然失色，投射、争论和攫取却更加打眼，阴暗则趁机成为它们的本质颜色——阴性转眼间就取代了火红，彻底取消了火红时代对意义的垄断。与此同时，作为一种补偿或者意外收获，意义授予权部分地落在了形而下学的肩头：反击的号角羞答答地响了起来。

回忆之书当中的阴暗大部分来源于形而下学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身体，来源于身体的不服从特性，来源于身体对硬性教义在事后的阳奉阴违。正是这一特质，刚好充任了回忆之书必然是失败之书的上好理由：第二次经历历史时的阴暗，意味着第一次经历历史的彻底失败，它火红而贫血，热闹而孤寂，谈不上充实和充足的奶水，说不上多么富有魅力，变态才是它的根本特性。在此，身体对硬性教义的不服从的一个上好形象是美人计：一个美人，委身于某个强权的代表，在床第之间娇喘莺鸣，但她即使在攀向顶峰时也未曾须臾忘记，正在和她交欢的人是她最大的仇家。她交出身体，是为了其后的反击；她以肉体付账，是为了赢得决战前必需的时间；她的身体的一半在服从，另一半正在暗中积蓄不服从的力量——我们不能把不服从仅仅理解为灵魂或意志的特异功能，实际

上，它仅仅是一种本能，是追忆的当下造型。但《反阅读》告知我们，只有在回忆之书中，这个不服从的身体才会凸现——不服从的身体来自形而下学的重新组建；服从的身体始终存在于回忆者亲身经历历史的整体过程之中。

通过对不服从的身体在追忆中的重新组建，我们这一代人中被挑选出来的回忆者成功地组建了一部个人的思想史。这部思想史和所有曾经存在的教科书都迥然有别：它呈阴性；它反对咋咋呼呼和急转弯；它不仅是反思的产物，更是在追忆中有身体参与的产物。它把不服从的身体放在了第一位，最大限度地抹去了那个服从的、沉重的肉身，最多只让那个服从的身体耐心地、虚心地倾听来自半个甲子之后的回声：

菜园中绿汪汪的油菜像一群莽撞的孩子
提前进入了一个疑虑重重的新时代：
一个时代结束的消息在菜园中
散播开来，像一场春雨淋湿园中
韭菜，那想象的花园中的诗行
充满了生长的巨大渴望

（西渡：《公共时代的菜园》）

这部回忆之书，这部个人思想史，通过对身体的重建和对历史的再次经历，有能力给出身体和历史之间存在着的广泛悖论：阳性的时代要想存在，必须依靠身体；阳性的时代要想存活，必须排斥身体。这个结论的得来基于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依靠追忆的本义，形而下学派遣了一具服从的身体潜入那个火红的时代，预先在一个阳性世界埋伏了一具将要伴随那个时代慢慢长大的身体，为的是对那个火红的时代实施事后

的反攻倒算，以重建不服从的身体为方式。是的，形而下学预先派出了一名特务；在所有计策中，美人计是这个特务唯一可以选择的计策，他必须预先交付自己的身体，让那个时代暂时托管；他必须将身体内部的力比多隐藏起来，故意不和革命的力比多相交、相切。但这只是回忆者事后才知道的事情；变态的平行四边形法则，那个被放大的切点，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我们的身体是行动的工具，并且仅仅是行动的工具。我们的身体不在任何程度上，不在任何意义上，不在任何方面服务于为一个表现（representation）作准备，更不用说服务于对一个表现作出解释了。”（亨利·柏格森：《材料与记忆》，肖聿译，华夏出版社，1999 年，第 204 页）只有不服从的身体存在，回忆者才能顺利地发现潜伏在火红年代之中的那个悖论。正是这个深刻而又简单之极的悖论，构成了这部个人思想史的核心部分；对这个悖论用众多的细节进行描画，像古波斯的细密派画家那样展开描画工作，则是这部个人思想史的真正的身体。仰仗着那位服从的特务用亲身经历换来的昂贵消息，不服从的身体开始在回忆之书中大规模地显现自身：是过去的身体和今天的身体跨越时空，结成联盟，才让那出美人计得以完美上演。美人计使个人思想史和它的核心部分化为了现实。我们的回忆者十分清楚，这必须要依靠反阅读（anti-reading）才能完成。

反阅读是美人计的另一个名号。那个特务在献出身体、以肉体付账的同时，也从火红的艺术品中最大限度地吸收了革命的力比多散发出的能量，尽管他也暗中发现了姐姐；当回忆者再次经历历史时，在让追忆得以成立的循环作用的帮助下，半个甲子之后成为回忆者的那

个人得以反窥红色艺术品对于个人成长史的意义，阴暗才能取代铺天盖地的红色，阴阳各归其位，回到正常的比例，中性人遭到拒斥。因此，反阅读是特务的阅读和回忆者的阅读共同造就的阅读：前者自愿从阅读中获取规训，尽管暗中的内在移民活动已经开始；后者则从获取的规训中反窥规训本身所拥有的荒谬。荒谬的本质内容就是那个无处不在的悖论。

重新使用身体，重新利用阅读，回忆者知道了自己的来历，但那个出发地，那个只能让特务存身的地方，是回忆者时间上的故乡吗？

5

让我们重新回到我们存身的这个黯淡的辰光，这个日见衰老的世界，这个千疮百孔的时代。1993年，我们的同龄人歌手张楚，以一曲《姐姐》走红大江南北：

> 这个冬天雪还不下／ 站在路上眼睛不眨／ 我的心跳还很温柔／ 你该表扬我说今天很听话／ 我的衣服有些大了／ 你说我看起来挺嘎／ 我知道我站在人群里／ 挺傻／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在死之前他不会再伤心不再动拳头／ 他坐在楼梯上也已经苍老／ 已不是对手／ 感到要被欺骗之前／ 自己总是做不伟大／ 听不到他们说什么／ 只是想忍要孤单容易尴尬／ 面对我前面的人群／ 我得穿过而且潇洒／ 我知道你在旁边看着／ 挺假／姐姐我看见你眼里的泪水／ 你想忘掉那侮辱你的男人到底是谁／ 他们告诉我女人很温柔很爱流泪／ 说这很美／ 噢姐姐／ 我想回家／ 牵着我的手／ 我有些困了／ 噢姐姐／ 带我回家／ 牵着我的手／ 你不要害怕

那个总在喝酒的混球，那个有些暴戾色彩的爹，我们的回忆者完全可以将他理解为那个火热的时代，或者那个火热的时代的肉身造型，尽管在形而下学的帮助下，在铭心刻骨的追忆中，“他坐在楼梯上也已经苍老 / 已不是对手”，但我们依然需要姐姐带我们回家，依然需要姐姐的滋养。可现在，时光不饶人啦。事实上，时光已经埋葬了太多的人。幸运的是，回忆者早已长大，他收获了失败之书，收获了昂贵的教训，收获了他的形而下学——不管形而下学是他的目的还是工具。当回忆者突然将眼光从第二次经历历史的过程中撤退回来，当那个特务从美人计中成功脱身并胜利凯旋，他会突然看见姐姐眼中的泪水，看见她经受过的各种屈辱，就像博尔赫斯突然间看见了那么多的国土、郊野和失败（博尔赫斯：《维拉·奥图萨尔的落日》）。直到这时，回忆者才会发现，和我们一样，姐姐也是不幸的，甚至更为不幸，虽然她滋养了我们的回忆者。是的，我们已经人到中年；是的，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开始谢顶；是的，我们的小腿不需要手术刀的额外奉献就已经开始酸痛，但毫无疑问，姐姐比我们更早老去。她的皱纹、依稀出现的白发、紊乱的生理节奏远在我们的视线之外，但又无时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

姐姐们都老了，包括《渔港新医》中那个因革命话语的浇灌而美丽无比的少女。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已经足够成熟，已经到了抛弃姐姐的时刻？

2007 年 3 月 20 日—27 日，北京魏公村

变态的上海及其他

1

“中国新感觉派小说是在日本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它的酝酿，应该从1928年9月刘呐鸥创办的《无轨列车》半月刊算起。”（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但这项编辑出版行动仅仅是新感觉派小说的前奏和引言，楔子和过门，像彗星划过夏日的夜空一样急速、短暂:在国民政府的报刊审查制度的亲切关怀下,《无轨列车》注定是一份短命的刊物——它仅仅存活了四个月即一命呜呼，魂归了我们今天已经无从寻觅的西天。但从只出版了八期的刊物上承载的诗歌和小说的样态来看,《无轨列车》“已初步显示了现代主义倾向”（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第4页），只因为它的创办人刘呐鸥是从扶桑归国的日本新感觉主义小说的信奉者，是川端康成的热情鼓吹者。为寻找新的舞台，1929年9月，刘呐鸥、施蛰存等人像是嘲笑无能的报刊审查制度一般，又另起炉灶，创办了《新文艺》月刊。他们在青春和执拗精神的鼓励下，暗中发愿，要将一种新型的小说艺术在中国推进到底，直到它寿终正寝的那一天。力量孱弱的《新文艺》一方面同情当时已经如火如荼的普罗文学运动，“但同时，创作上的新感觉主义倾向

也有了发展。刘呐鸥已写了八篇用感觉主义和意识流方法表现现代都市生活的小说，不久编集为《都市风景线》出版”（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第4页）。与此同时，施蛰存也开始“自觉地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来分析、表现人物的心理，这就有了《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等小说，开始显示出另一种特色”（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第5页）。1930年春，新感觉派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年仅十八岁的穆时英，受青春心理的公开教唆，开始在《新文艺》登台亮相：他抱来了一大堆针对上海的感觉碎片，像黑色的玻璃碴一样，横七竖八地镶嵌在《新文艺》的版面上。出于对报刊审查制度的正确呼应，和它的姐姐或兄长一样，《新文艺》未及周岁即中道崩殂，直到1932年施蛰存主持的《现代》杂志创刊，新感觉派小说才再一次找到了表演的舞台——对于快速流动、疾速行驶的中国新感觉派来说，这无疑是漫长的两年，是在别人的刊物上四处流浪的两年。

不知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刻意安排，和承载新感觉派小说的刊物的短命特性非常相似，中国的新感觉派小说也是一个寿命奇短的文学流派，或许那时候正在鼓动年轻学子专心阅读《庄子》的施蛰存，会拿“大年也，小年也”来自我解嘲。刘呐鸥的小说创作差不多结束于1930年，施蛰存结束于1936年，穆时英的小说寿命则终结于抗战爆发前夕。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结束小说创作时的年龄分别为三十岁、三十一岁、二十五岁，正处于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愤青”阶段，力比多还在激烈而广泛地涌动，就像上海滩傍晚时分的霓虹灯，左顾右盼而又旁若无人。的确，他们展开写作的年代是一个令人愤怒的年代，内忧外患、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是它的首要特征；他们展开写作的地点刚好是令人愤

怒的上海，一座“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之首句），一个“冒险家的乐园”。易于愤怒的年龄，异常火热的力比多，和必须以愤怒去面对的时空彼此勾搭，不偏不倚，正好结成了暗中的联盟；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发泄愤怒，为易于冲动的力比多找到一条恰切的途径，只差冥冥之中的机缘前来引诱和叩门了。

在力比多的公开煽动下，广泛的愤怒迫切需要一种表达愤怒的语言方式，正如汹涌的火山需要喷发的出口和通道——这是一种性状奇特的语言勒索，需要一种变态的、带毒的、急火攻心的、能够用“阳具将党捣得粉碎”（扎米亚京语）的那种奇异的力量。在中国，由于广泛的愤怒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早在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进行小说创作之前，表达愤怒的有效方式已经存在；至少，动不动就在字里行间高呼口号、动不动就在语言空间当中摆出横眉冷对之火爆造型的普罗文学，就提供了一条粗糙、暴烈、激进的道路；左联成立时，这条早有来历的、亢奋的、充血的激进之路已经被严格地模式化了：

> 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
>
> 艺术如果以人类之悲喜哀乐为内容，我们的艺术不能不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之“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
>
> 因此，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
> （《文艺界消息·左翼作家联盟底成立》，《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1930年4月）

1931年，年届五十的鲁迅早已到了老谋深算、目空一切的年龄，

面对脾气火爆、肝火旺盛的普罗文学，他不无悲哀地夸耀，这是中国目前唯一可行、唯一存在的发泄愤怒的模式，其他的一切方式要么微不足道，要么根本没有存在的理由和机会，要么就是毫无力道、意义些微：“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屠；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鲁迅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92 页）由于 20 世纪 20 年代、30 年代之交的“愤青”的力比多拥有异常奇特的力量，早在新感觉派草创之时，刘呐鸥等人对普罗文学就至少抱持着同情的态度：他们承认，无论如何，普罗文学都不失为一条发泄愤怒的有效途径。《新文艺》第 1 卷第 5 期《编辑的话》就毫不含糊地说过：“1930 年的文坛终于将让普罗文学抬头起来，同人等不愿自己和读者都萎靡着永远做一个苟安偷乐的读书人，所以对于本刊第二卷期的编辑方针也决定改换一种精神。”普罗文学的亢奋口号和肿胀着的标语，果然出现在翌年的《新文艺》月刊的版面上。但同情肯定不等于毫无保留地认同，同情或许恰好意味着：同情者需要寻找不同于普罗文学的其他模式。实际上，三个自视甚高的“愤青”一直在试图找到适合自己的泻火方式。这需要一个重要的机缘，这个机缘必须具备如下能力：激活那个暗中结成的联盟，那个易于愤怒的年龄和值得以愤怒去面对的时空结成的联盟。这个机缘早在刘呐鸥创办《无轨列车》的年代就已经出现。对此，半个世纪后的施蛰存有过较为清楚的回忆：

（在日本读书长大的）刘呐鸥带来了许多日本出版文艺新书，有当时日本文坛新倾向的作品，如横光利一、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的小说，文学史、文艺理论方面，则有关于未来派、表现派、超现实派，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文艺论著和报道。在日本文艺界，似乎这一切五光十色的文艺新流派，只要是反传统的，都是新兴文学。刘呐鸥极推崇弗里采的《艺术社会学》，但他最喜爱的却是描写大都会中色情生活的作品。在他，并不觉得这里有什么矛盾，因为，用日本文艺界的话说，都是"新兴"，都是"尖端"。共同的是创作方法或批评标准的推陈出新，个别的是思想倾向和社会意义的差异。刘呐鸥的这些观点，对我们也不无影响，使我们对文艺的认识，非常混杂。

（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将激发了暗中的联盟的那个机缘说得更清楚的，还是从日本辗转来到上海的刘呐鸥，《无轨列车》《新文艺》的主要创办者。1929年，一个距今异常遥远而又异常亲近的年份，刘呐鸥创办的水沫书店出版了由他本人担纲翻译的日本小说集《色情文化》，一部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家的作品集，一本"以表现主义为父，以达达主义为母"（川端康成语）的小说家们的小合集。在《译者题记》里，刘呐鸥十分明确地说："文艺是时代的反映，好的作品总要把时代的彩色和空气描写出来的。在这时期里能够把日本的时代色彩描给我们看的也只有新感觉派一派的作品……他们都是描写着现代日本资本主义社会腐烂期的不健全的生活，而在作品中表露着这些对于明日的社会、将来的新途径的暗示。"

在上海的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一切都准备好了：异常年轻的身体、对作为殖民地的上海的广泛愤怒、日本人经过杂交后生成的新感觉主义、充血的普罗文学对更年轻一代作家的挤压、渴望另辟蹊径扬名立万的青春心理，再加上已经开启脚步前来叩门的机缘，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着愤怒自然地穿过出口，连传说中必须具备的东风都是多余的——那个暗中的联盟就拥有这种难以被人体察的特性。

2

感受是一种来历久远的仅仅属人的能力；在促使既定感受得以改变的方法论到来之前，人们对一座城市，一个物件，一个人，一座山，一棵树，一次突如其来的爱情，一次猝不及防的幸福或一块石头的感受，总是倾向于大体一致，人们总是乐于遵循本地感受划定的感受范围和感受法律，除此之外，基本上不存在额外的租界，不存在法外的恩赐。感受的改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也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

上海自开埠以来一直昂然存在，外滩、霞飞路、十里洋场、外白渡桥一直存在，尽管它们都在快速地改变自身，以欲望为材料急速地加粗自己的腰身；刘呐鸥从日本带回的新感觉主义，则为年轻的中国作家提供了再一次感受上海的武器。本着先来后到的原则，这个促使既定感受得以改变的武器（或方法论）首先被刘呐鸥本人所挥舞、所借用。作为中国新感觉派小说最初的引航人，刘呐鸥就是“一位敏感的都市人，操着他的特殊的手腕，他把这飞机、电影、JAZZ、摩天楼、色情、长型汽车的高速度大量生产的现代生活，下着锐利的解剖刀”（《新文艺》第 2 卷第 1 期，广告栏）。这把解剖刀无疑来自日本的新感觉主义；在后

者不无殷勤的帮助下，本地感受逐步退场，新的感受悄然莅临，感觉的租界纷纷出笼，壁立于世。作为这把解剖刀的运作结果，在刘呐鸥的作品中，“我们显然地看出了这不健全的、糜烂的、罪恶的资产阶级的生活的剪影和那即刻要抬起头来的新的力量的暗示”（《新文艺》第2卷第1期，广告栏）。

“生活的剪影”是在碎片式的感觉描写中得以呈现的。碎片主义是新感觉派小说的首席美学特征。碎片主义的根本含义是碎片式的愤怒：碎片式的愤怒理所当然地构成了碎片主义美学的核心内容。这中间的转渡或桥梁十分简单：“愤青”急于发泄愤怒，所以放弃了从容的整体描写，或者由于他们的“愤青”身份，他们干脆就不具备从容的能力，不具备打量整体的本领——整体是一个黑洞，孱弱的视线一旦被它吸纳就会无路可逃，直至死无葬身之地；上海是一座大得看不见边际的城市，所以只有它的片断和局部才能被作为“愤青”的小说家们所感觉。与此同时，城市底部涌动的邪恶的力比多，与“愤青”们自身体内的力比多必然性地发生了冲撞。和前者相比，后者的渺小不证自明。后者想要在不对等的角逐中获取虚拟性的胜利，只有攻击前者的局部，攻击它的某一个片断；只有动用感觉，像那个阿Q一样，以便在感觉中获胜。感觉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一如伊格尔顿（T. Eagleton）说想象力是一种意识形态。刘呐鸥、穆时英（也许还应该包括部分的施蛰存）所动用的片断式小说结构，刚好跟感觉的本义相吻合，跟作为大都市的上海的本性相吻合。结构不仅具有美学意义，更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因为它首先是一种反抗的武器，是用于反抗的长矛。它的目的就是要表达碎片式的愤怒，一种零敲碎打的愤怒。这种愤怒是从整体的上海身上强行

扭下一小块肌肉，这一小块肌肉刚好能够被“愤青”们刚直、年轻的视线所逼视，新感觉派小说家基本上只具备逼视一小块肌肉的能力。

和炮制普罗文学的“愤青”们在字里行间挥枪弄炮地攻击现实迥然有别，碎片主义美学的把持者，那些被称作新感觉派小说家的“愤青”们，借用的武器只是较为可笑的感觉造反或感觉起义：借助外来的解剖刀，通过对敌手的全新感觉，通过对感觉的租界的精心营建，通过对法外的恩赐的广泛享用，反击丑陋的敌手，并在感觉中获得虚拟性的胜利快感——那个必须以愤怒去面对的时空果然在感觉造反、感觉起义中被弄得灰头土脸，里外不是人，但也没有让那个令人厌恶的时空痛苦得四处找牙、满地打滚，只因为感觉造反、感觉起义始终是碎片式的起义、碎片式的造反，它只能发泄碎片式的愤怒，也仅仅满足于这种鸡零狗碎、小肚鸡肠的愤怒。感觉造反、感觉起义在自我运作了一番之后，其成果大致如下：通常被认作激情洋溢的夜总会在刘呐鸥的感觉中，意味着狂乱、色情、颓废和堕落（参阅刘呐鸥：《游戏》），在更年轻的穆时英那里——因为力比多更为旺盛——则干脆指向死亡，那是毫无意义的死亡，是连一滴表达同情的眼泪都匹配不上的死亡（参阅穆时英：《夜总会的五个人》）；尽管上海并不是爱情的荒漠（那个时代众多惹人泪下的爱情电影可以为此作证），但在感觉起义的操持下，为繁衍后代做准备工作的爱情变作了陌生男女随意交配的借口（参阅刘呐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通过感觉造反，打扮世界，旨在让世界更加美丽的女人不过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肉体，仅仅是“1933 年新的性欲对象”（参阅穆时英：《白金的女体塑像》）；当然还有时间，但那是被切割、被胁持着向前快速流动的时间，迅疾得几乎没有给人留下任何喘息的机会，却

刚好被感觉起义候个正着，直接落入了感觉造反编织成的大手中：

> 忽一会，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出来的桃色的光线把场内的景色浮照出来了。左边的几个丽服的妇人急忙扭起有花纹的薄肩巾角来遮住了脸。人们好像走进了新婚的帐围里似的，桃色的感情一层层律动的起来。这样过了片刻，机械的声音一响，场内变成黑暗，对面的白幕上就有了银光的闪动。尖锐的视线一齐射上去。
>
> （刘呐鸥：《流》）

这是关于 20 世纪 20 年代、30 年代之交上海某家电影院的一个感觉中的小片断。如果不特别指出，恐怕很难准确地弄清楚这段描写指称的究竟是什么场景。很显然，在这个感觉中的小片断里，在大上海的这一小块肌肉里，连时间都遭到了劫持，连时间的本意也遭到了违背，连一向战无不胜的时间都无法按照自身的欲望自然流逝。在感觉起义的私下运作中，大上海被切割为片断；在感觉造反的引领下，城市的力比多遭到了“愤青”们的迎头痛击，一种仅仅存在于感觉之中的虚拟性胜利得以生成。这是小说艺术的胜利、片断式结构的胜利、感觉的胜利，是碎片主义美学和碎片式愤怒的凯旋还朝，但更是一种发霉的、自慰式的胜利。

毫无疑问，感觉造反、感觉起义是一种过于虚弱的反抗，哪怕它真的有一把来自扶桑的解剖刀，哪怕那把刀真如它号称的那样是锐利的。通过那个暗中的联盟的转渡作用，感觉起义宣布的结论仅仅是：这样的上海令人沮丧，这样的时空不值得居住，这样的世界足够让人绝望，顶多只是对“那即刻要抬起头来的新的力量的暗示”。但新的力量究竟在什么地方，却不是碎片主义美学能够给以明确说明的事情。它只负责暗示，仅仅提供暗示，也只满足于暗示。新的力量始终处于

黑暗之中，连萌芽所需要的那种轻微的声响都难以让人听见和把捉。很显然，左翼作家，那些炮制普罗文学，在字里行间造枪造炮的“愤青”们，有足够的理由谴责这种犬儒式的造反行径（参阅楼适夷：《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文艺新闻》第33号，1931年10月26日），只因为他们确实比新感觉派小说家要生猛得多。但他们的生猛显然无法复制，无法被刘呐鸥等人所借贷，因为炮制普罗文学的“愤青”们在和上海以及必须以愤怒去面对的一切时空作对时，不仅仅仰仗了他们自身的力比多，还借用了流淌在革命底部的、更为浑浊的力比多，甚至过度透支了革命的力比多的巨大力量。从纯粹力学的角度看，普罗“愤青”们在泻火时拥有了太多的幸运，以致他们在发泄愤怒时甚至把自己都给搭了进去，并由此增加了表达上的力量。

3

从另一个方面为新感觉派小说增加力道的，是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弗洛伊德通过施蛰存的写作实践进驻了中国新感觉派小说的大本营；在弗洛伊德与施蛰存之间起到桥梁作用的，则是奥地利小说家显尼志勒（Arthur Schnitzler），此公一贯喜欢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用小说的形式探讨诸如“爱与死”这类重大的人生主题，而显氏的作品的每一个英法译本，都曾得到过施蛰存的礼遇（参阅施蛰存：《显尼志勒〈自杀以前〉·题记》）。至此，新感觉派的两个力量来源已经昭然若揭：由刘呐鸥从日本带来的新感觉主义，由施蛰存从奥地利进口而来的心理主义。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是人类的“恶之花”，它出现在礼崩乐坏

的20世纪的西方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我们真不知道该以怎样的心情去面对这朵性状奇特的“恶之花”。更重要的是，心理分析理论是一把毋庸置疑的双面刃：它既是人类理智的胜利的象征，因为人类理智居然能够大张旗鼓地进驻无意识领域；又是人性脆弱和人性不可被信任的显明标志，因为在人类理智的凯歌高奏中，人性的脆弱和不可信任是如此的昭然若揭，人和动物之间的界限正在被逐步取消。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那座“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差不多就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肉体版本，是对心理分析理论的一种东方式解读，一个东方式的脚注。“愤青”施蛰存就生活在早已变态的上海；对弗洛伊德的接受和信任，让他感受到了双倍的变态。像刘呐鸥借助来自扶桑的新感觉主义去逼视上海的每一小块肌肉一样，施蛰存要借助弗洛伊德去描摹变态心理的动力学原理。

感谢心理主义的拔刀相助，施蛰存笔下的三个重要人物——鸠摩罗什（《鸠摩罗什》）、花惊定将军（《将军底头》）、石秀（《石秀》）——全都是不可思议的变态狂。作为一名来自西域的高僧，鸠摩罗什居然深陷情欲之海而无力自拔，他渴望得道，但又不愿意放弃令他格外销魂的性生活，他因此长期生活在不断自责而又不断自我宽慰的心境之中，最后连一枚舍利子都没能烧出来。花将军治军严谨，临战前一个士兵因调戏驻军地一位少女而被他斩杀，但与此同时，花惊定将军却绝望地爱上了那个少女，并为此在战场上莫名其妙地丢掉了性命。《水浒传》中的英雄，美色之前毫不心动的大丈夫石秀，面对结拜兄弟之妻的挑逗，时而冲动，时而自责，万般无奈之下，最后只好伙同义兄杀了义嫂，并在殷红的鲜血中，获得了类似于性高潮来临时的那种极大的快慰和战

栗……

行为举止正常，这只是表面现象，如同鸠摩罗什在他的大部分信徒眼中形象正常一样；但掩藏在表面现象之下的，则是狂乱的内心冲突，连动作也制服不了的内心冲突，相反，倒是内心冲突在与动作的角力中不时地占据了上风，迫使动作扭曲、变形。这就是施蛰存迫于变态的上海带来的压力，尽力描摹出的变态心理的动力学原理。经过施蛰存的写作实践，动力学原理构成了心理主义的核心，心理主义也颇识时务地容忍、退让，以致让动力学原理真的成为了自己的核心。仰仗着核心的公开支持，心理主义在施蛰存那里显示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就在两军对垒的生死攸关的紧张时刻，身为主帅的花惊定将军却出人意料地陷入了莫名其妙的沉思：

> 在步兵与骑兵混乱着的战争中，将军兴奋着。忽然，就在将军底身旁，一个武士倒下马来了。将军在匆忙之中，分一点闲暇去看了一眼，那个武士底前胸很深地被射中了一箭，所以倒下了马。而这个武士，当将军底眼睛转向着他底痛楚的脸的时候，将军不禁心中吃了一惊，也就是将军所恋着的少女底哥哥，那个镇上有名的英勇的武士。将军底马向斜里跑去了，那武士底重创了的身上，随即给别的马匹乱踏着了。
>
> 将军兜上了心事，不想恋战了，将军尽让他底骏马驮着他向山冈上奔去。将军想起了那个少女，现在哥哥死了，她不是孤独了吗？谁要来保护她呢？她不是除了哥哥以外，家中并没有别的人了吗？将军这样想着，便好像已经看见了这个孤苦无依的少女，在他底怀抱之中受着保护。将军心中倒对于这个武士底战死，引为幸运了。

这时的花惊定将军完全是自私的，他忘记了从前的武勇的名誉，忘记了自己底纪律，甚至忘记了现在是正在战争。

将军正在满心得意地想回转马头，归向村中去，但没有觉得背后有一个认得他的吐蕃将领正在追踪着他。将军底马刚才回头，将军底眼睛刚才一瞥地看见背后有人，而那凶恶的吐蕃将领底大刀已经从马上猛力地砍上了将军的项颈了。

……但，将军倒下马来没有呢？没有！将军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底头已经被敌人砍去了。一瞥眼看见了正在将利刀劈过来的吐蕃将领，将军顿时也动了杀机。将军也把大刀从马上擗过去，而吐蕃将领的头也落在地上了……将军底意志这样的坚强，将军正想回到村里去，何曾想到要被砍掉了头呢？所以将军杀掉了那个吐蕃将领之后，从地上摸着了胜利的首级，仍旧夹着他底神骏的大宛马，向镇上跑去。

动力学原理，尤其是它在叙事学上的功用，在此无疑得到了较为清晰的呈现：在最不该恍惚的时刻，一贯英勇善战、屡战屡胜的花将军却严重恍惚，其病根不早不迟，刚好来源于弗洛伊德心理主义的神奇力量；被吐蕃将领砍去头颅后，还能将蕃将的头颅砍去所需要的神奇力量，同样来自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在动力学原理更进一步的催促下，更有意思的还是花将军的爱情结局：

没有了头的花将军由着他底马背着他沿了溪岸走去，因为是在森密的树林间，踯躅着在溪的彼方的街上的边戍兵也没有看见他。将军觉得不知怎的忽然闷热起来，为什么眼前一点也看不出什么呢？从前也曾打过仗，却没有这样的经验呀。将军觉得满身都是血了，这样，怎么可以去见那个美丽而又温雅的少女呢？如此想着，

将军就以为有找一处浅岸去在溪水里洗濯一下的必要了。

将军在一个滩岸边下了马，走近到溪水边。将军奇怪着，水何以这样浑浊呢，一点也照不见自己底影子？而这时候，在对岸的水阶上洗涤着碗碟的却正是将军所系念着的少女。她偶然抬起头来，看见一个手里提着人头的没有头的武士直立在对岸，起先倒吓了一跳。但她依旧看着，没有停止洗涤。她看将军蹲下身来摸索着溪水，像要洗手的样子。她不觉失笑了：

“喂！打了败仗了吗？头也给人家砍掉了，还要洗什么呢？还不快快的死了，想干什么呢？无头鬼还想做人么？呸！”

将军底心，分明听得出这是谁的口音。一时间，将军想起了关于头的谶语，对照着她现在的这样漠然的调侃态度，将军突然感到一阵空虚了。将军底手向空间抓着，随即就倒了下去。

这时候，将军手里的吐蕃人底头露出了笑容。

同时，在远处，倒在地上的吐蕃人手里提着的将军底头，却流着眼泪了。

和感觉起义中上海滩没有爱情只有性交的情形相仿佛，为爱情丢掉脑袋的花惊定最多只换来了一行热泪：那是不需要人看见的热泪，也是没有人能够看见的热泪，但它刚好被心理主义当作了理所当然的俘虏。花将军头颅搞丢之后还能砍去对手的头颅所需要的那种力量，只是那行热泪成为俘虏的一个必经的步骤，一个必需的过门；因此，那行热泪无疑是对动力学原理的高度恭维，也是动力学原理理所当然的辉煌成果。

施蛰存是第一个运用心理分析理论改写历史故事的中国小说家。通过对变态心理的动力学原理的尽力描摹，施蛰存有能力绕过那些作为表

面现象的正常举止，直接进入到紊乱、冲突、活蹦乱跳的心理层面；经过动力学原理的转渡作用，曾经被大声颂扬的历史人物个个都显露出他们的变态狂特性，人人都获得了自虐分子的身份。动力学原理及其功能的被揭示，意味着历史理性的彻底破产，意味着历史底部山呼海啸的力比多绝不是人力能够控制和驯服的事物，哪怕那个试图驯服历史的人号称超人或者枭雄。但迫使施蛰存作出这种写作战略转向的力量，仍然是上海，变态的上海，那个冒险家的乐园，那座建立在地狱上的天堂。只因为能够激活那个暗中的联盟的，不仅仅只有感觉主义，不仅仅是感觉的租界；只因为那个暗中的联盟在呼唤新的催化剂，而弗洛伊德主义，刚好像个幽灵或半神一样来到了上海，附在了一个名叫施蛰存的“愤青”身上。

4

新感觉主义成功地铸造出了感觉起义这一犬儒式的反抗武器，它令刘呐鸥等人能够以变态的写作方式去感觉畸形的上海，并在碎片主义美学的帮助下，在变态感觉中成功地令上海彻底变态，由此为自己易于冲动和愤怒的力比多找到了恰切的途径；弗洛伊德的心理主义则让施蛰存成功地进入他笔下的人物的内心世界，窥探到了主人公的变态心理。前者以变态的感觉方式进行断片式写作，后者描摹变态的状况及其动力学原理；前者因自己的变态让必须以愤怒去面对的时空呈双倍变态之势，后者因描摹变态心理，得以从侧面、从后背攻击了值得愤怒的时空。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构成部分，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得以存在的结缔组织，弗洛伊德的心理主义为感觉造反、感觉起义加添了一条必不可少的

辅助线，进而完善了整个流派的武器库存；通过施蛰存写作上的战略转向，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从侧面和背部，声援了感觉起义、感觉造反，并为后者在对抗现实生活时的乏力与贫弱增加了超过半斤以上的力度——尽管普罗“愤青”们对此并不认同，还不无恶意地将之指斥为逆流、软弱和贫穷。

作为一个过于短命的文学流派，中国新感觉派小说早已成为过眼云烟；面对必须以愤怒去面对的时空，可能连新感觉派的小说家们都会觉得自己的泻火方式十分孱弱，无论是历史还是变态的上海，都没有因为感觉起义、变态心理的动力学原理的出现而有丝毫改变，三个自视甚高的“愤青”很快就停止了这种较为无用、无力的文字游戏，纷纷转向，试图在事功中寻找更为有力的反击方式。

抗战爆发后，东南沦陷。刘呐鸥重新回到上海，依附于汪伪政权，奉命筹办汪伪政府控制下的《文汇报》。报纸尚未出版，刘呐鸥就被人暗杀于 1939 年秋天的上海。关于他的死，版本较多（参阅施蛰存：《施蛰存谈〈现代〉杂志及其他》，《鲁迅研究资料》第 9 辑），但刘呐鸥在放弃了感觉起义和碎片主义美学后，对再一次得到更新和再一次加大变态力度的上海进一步失去了有力的感觉，却是不争的事实——他的死就是最好的证据。大半年后，更为激进的穆时英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暗杀于上海，时在 1940 年的春天。关于他的死，同样众说纷纭，有的说他是汉奸，依附于汪伪政权；有的则说，他是受命潜伏在汪伪政权之中的国民党特务，为国民党中央工作，他的死是一个双重的悲剧（参阅嵇康裔：《邻笛山阳——悼念一位 30 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香港《掌故》月刊 1973 年第 10 期）。和刘呐鸥一样，穆时英对上海的再一次感受并不成功；

在放弃了孱弱的感觉造反和对感觉的租界的经营之后，并没有找到更为有力的抗击方式。只有施蛰存以教书、翻译和编杂志为业，在孤岛上海度过了令人揪心的八年抗战，度过了令人更为痛心的国共战争并走进了新政权；此后，他获得了被长期埋没、被长期遗忘和被戏剧性地重新发现的奇特命运，历经磨难，终以百岁高龄病逝于他曾经从侧面和背部攻击过的上海。但和他不幸的同仁一样，施蛰存也没有找到比动力学原理更为有力的感觉上海的方式，尽管有一段时间，新生的上海比他曾经攻击过的上海还要变态，还要荒诞，还要可笑。

世事难料，一切都结束了，但一切又似乎才刚刚开始。

2007 年 4 月，北京魏公村

第三辑　一些疑问，一些随想

我有太多的疑问需要贡献出来，这就是我理解的“献疑”一词的语义学含义。因此，这一部分文字提供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我恳请列位牧师能够给我以教导——如果没有真牧师，伪牧师也行。反正我已经分不清真假了。

不断减少的文字，但越来越多的问号……

1

古典中国素无“世纪”一说。自从船坚炮利的欧洲人强行敲开中国的大门，追随着鸦片、洋泾浜英语和太阳旗，作为概念的“世纪”也明目张胆地来到了神州大地，并以加速度的方式，很快在咱们炎黄子孙心中安了家、落了户。那个被庄子点化为“心斋”的玄奥处所，自此融进了异质物品。有点无可奈何，有点悲哀，也有点喜剧色彩——如果考虑到“世纪”带来的广泛后果的话。我当然没有能力确切地指出，“世纪”概念究竟是在何年何月取得了华夏户籍，但有一点我倒是敢担保：在“世纪”和“甲子”的对垒中，甫一接火，就以前者的大获全胜、后者的一败涂地而告终。尽管在相术手册上，在拒不“进化”的某些老农民口中，“甲子”还像虱子藏在穷人内裤的某个夹缝中一样存活，但毕竟只能算是苟延残喘而已。

在中国，刚刚过去的一百年因此被指认为“20 世纪”。追随着“甲子”嬗变为“世纪”，古典中国的生活内容，也跃迁为专属于“20 世纪”中国人的历史与社会。在摩登学者口中，这满可以被称作特定的“历史境遇”、特殊的“历史语境”。确实，同样是战争，但不同于垓下之

战；同样是话语拼杀，但不同于陆九渊会朱熹于鹅湖；同样是谋杀，但不同于玄武湖之变；同样是水涝旱灾，但不同于乾隆年间的中原大旱、汉武帝或宋太祖年间的江南水患；同样是买卖，但不同于扬州八怪时期那些盐商们的行径、徽州商人故作姿态或潇洒自如的把酒临风；同样是向天空开炮，但不同于刘禹锡烟花爆竹迎新年；同样是痛苦，但不同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紧随着鸦片、洋泾浜英语和燃烧着的圆明园，拼命跟进的，是更加威力无比的“世界”。恕某不敏，没有能力指明那个叫“世界”的家伙究竟何年何月在中国人心中插队落户，但有一点我仍然敢担保：在“世界”和“天下”的肉搏中，刚一交手，我们念叨了数千年的“天下”，在我们祖先那里永远郁郁葱葱、永远水灵和沾满露水因而坚固无比的“天下”，顿时溃不成军、树倒猢狲散。尽管在我们的口头上，在我们的赌咒发誓中，还“天下、天下”叫个不休，但恐怕没有人不明白，那充其量不过是对古典中国的“天下”的拙劣模仿，不过是“世界”差强人意的同义词。何况所谓的“同义”也许并不成立。

追随着中国进入“20 世纪”，中国又如此这般地被置入了“世界”之中，从此与“天下”无涉。同样是出游，但那个头戴纶巾手持鹅毛扇的人却走向了“世界”；同样是长江，但越来越浑浊的江水却流向了“世界”范围内的太平洋，而不是笼罩在“天下”之中的东海；同样的剑门关，但到来的是汽车，而不是陆游的毛驴；同样的泰山、长城，却迎来了来自“世界各地”而不是“五湖四海”的宾客；同样是“理”，却不再是“道理”“性理”，而是“真理”“法理”和“定理”……

“甲子”意味着循环，意味着团圆和圆圈，与“天圆地方”的“天下”刚好暗合。数千年来，它始终自给自足、怡然自得并怀柔远人；“世纪”意味着直线，意味着冲刺。它拒绝循环，只愿意与“进步”神话媾和并狼狈为奸，勇往无前，直到传说中的“天尽头”。“甲子”是圆形或倒梨形的子宫，“世纪”则是硬得笔直的阳具；“天下”是封闭的盾牌，“世界”则是随时都在待机而动、在睡梦中都在挥舞着自己的那根长矛。

此时此刻，天高野阔，星汉垂地。玩味着刚刚过去的一百年，那个填充了“世纪”之肠胃并让“世纪”圆满的一百年，我丝毫没有动用比喻的心情，更没有玩弄语言花招的癖好。我衷心赞同“天下”人无数个“甲子”以来都遵循的“修辞立其诚”。那是个伟大而辉煌的格言。在这里，我不过是想说，崇尚“天下”和“甲子”的人民，那些视圆圈和循环为上天之厚德的老百姓，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成为信奉“世纪”与“世界”的强悍者，更不可能成为那些强悍者的对手。所以，鸦片、夕阳残照下的圆明园废墟、南京大屠杀、三年“自然灾害”中生产出的累累白骨、“文化大革命”里的冤屈无告者……都有理由抗议：我本来好好的，凭什么假借“世界”“世纪”，让我承担如此结局？让我担待这样的命运？我听见惨死在“世纪”和“世界”刀剑下的冤魂，排着长队，在我的窗外大声吼叫……

2004 年春节，我穷极无聊，躲在北京城南的一套陋室内，向臆想中的听众或读者，讲述了一个至今还没有推销出去的怪诞故事——那些专司出版的衙门告诉我，你的故事拙劣之极，根本就没有资格出版。就是在这个故事中，我杜撰了一个在全球地图上都查找不到的地方。它叫隆庆府，位于地球北部。按照我的虚构，隆庆府以盛产哲学家、酸菜、

醋坛子闻名全地球。在故事中，我说完了这些添油不加醋的开场白后，马上调笑式地说到了欧洲，那个位于我们西边、以“远东”来称呼我们的“西方”：

> 学通史时，基本上都以“米利都的泰勒斯”来开篇。这只能证明：那些皮肤苍白的西方人既无知，又妄自尊大。大脑袋哲学家牛勇增就曾严肃地考证过，泰勒斯根本就不配成为全地球第一个哲学家，即使是他的著名学说“世界是睾丸组成的”，也不是他的发明。牛勇增说得很明白，泰勒斯的学说完全偷自隆庆府。而且他偷窃的还不是隆庆府最早的哲学，更不是最好的哲学。他偷去的只是隆庆府视若敝帚的玩意。听牛哲学家论证说，那玩意有点类似于隆庆府人民吃鸡时扔掉的鸡屁股。牛先生还有一个重要推论，特别值得转述：泰勒斯既是西方最早的哲学家，又是一个哲学小偷，因此全部西方哲学就都是盗贼的产物，盗贼的产物当然只能催生出强盗哲学。牛先生甩开膀子，动用了最先进的考古手段和思想侦破仪器，如此这般地操作了一番，终于挖掘出了强盗哲学的精髓：强权有理，偷窃无罪。季明生对牛氏的推理持热烈欢迎的态度，并以一个小车司机特有的哲学语言，表达了对牛氏推理的高度首肯：“他（即牛勇增——引者注）把西方人挺着老二到处乱戳的秘密，全部暴露个球了。”
>
> （敬文东：《隆庆府当代哲学小史》）

我也许并没有开玩笑，何况在2004年春节的恶劣天气中，我连开玩笑的心情都没有。实际上，季明生先生所谓“挺着老二到处乱戳”，考诸历史，正是“世界”和“世纪”本来含义。从最为宽泛的语义学角度来说，“天下”意味着“至大无外”，“世界”则意味着“我”与“他”；

"无外"意味着所有人都可能是自己人，"我"与"他"则意味着我是我、他是他，一切都是那么汤清水白、利益清晰；"所有人都可能是自己人"意味着用怀柔的方式感化同类，"我"与"他"则意味着"我"对"他"必须进行武力征服、可以进行武力征服——反过来，"他"对"我"也一个熊样。为了和自己的时空主张获得一种类似于郎才女貌、门当户对的效果，"天下"为自己配备了"甲子"，"世界"则为自己发明了拥有"乱戳"能力的"世界"。

"世纪""世界"天然具有自产自销、强买强卖的禀性。它是强悍者，它是笔直者，它是"刺破青天锷未残"的长矛，它天然能找到买主，天然有能力把别人发展成为买主。谦卑的美洲、非洲、亚洲，还有我多灾多难的祖国，成了它最好的促销对象，成了铁蹄下的牺牲和祭品，并供奉在"世界"和"世纪"的神龛前。当然，它偶尔也打出广告，号召潜在的、正在被生产中的顾客，甚至以发展连锁店的方式，将这些顾客发展成自己的同类，让他们的心脏和"世界""世纪"在同一个振幅上跳跃。

我没有在"世纪""世界"修理中国人心性的进程中，看到过任何排异反应。或许它短暂地出现过，但在轰轰烈烈的"20世纪"，在"20世纪"的中国，大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一百多年来，无数唾弃"天下""甲子"的中国人果断地选择了"世界"和"世纪"。他们被公正地看作具有"世界眼光"的"龙的传人"。在更年轻的中国人那里，我指的是在那些吃麦当劳、肯德基、汉堡包，看美国大片、读《苏菲的世界》和"廊桥梦遗"长大的中国人那里，"天下"和"甲子"只不过是比喻和梦痕。那些刚刚尿完中国炕的人，都毫无转折期地成了"世界"

主义者、“世纪”的潜移默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本着“世界”和“世纪”的威风，想假借“世界”和“世纪”把中国拖进“世界民族之林”，却无意间和“世界”“世纪”上下其手、里通外合，继续摧残自己的同胞，而且手段花样翻新，比那些“乱戳”的家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中的另一部分人，则渴望着绿卡，梦想着大洋彼岸，希望有朝一日洗去“天下”“甲子”在自己基因中的残余。为此，他们都在不懈地努力。作为一个善解人意的犬儒主义者和怀疑主义者，我衷心祝愿他们能够成功；但作为另一类中国人中渺小的一分子，我也愿意向前者提出申请：求你们高抬贵手，咱们都是炎黄子孙，你们那样做又是何苦呢？也愿意向后者提出建议：既然是基因，恐怕就没那么容易被洗去。

2

“世纪”革新了中国人的时间意识，它不仅仅要求知古而鉴今，更要求面向未来、开创未来；“世界”则涂改了中国人的空间感觉，它不仅需要我们知道“至大无外”，还要我们明白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我们被称作“远东”，被指认为“东亚病夫”。我们的视野由此得到了全方位的更替。我们的鲜血、唾液，我们的肠胃、骨骼，我们的视线、灵魂，在“世界”和“世纪”的双重逼视下，得到了全面的更新。在整个“20世纪”，在中国，所谓时间，不过是一支向前飞驰的箭头，不过是一维的、线性的光阴；所谓空间，不过是分辨人我的度量衡，不过是标志异己的界碑。“天下”和“甲子”的时代，随着“世界”和“世纪”的广泛来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20世纪”的中国，飞驰的箭头既意味着现代化，又意味着在“甲

子”定义着和定义过的地基上，现代化具有何种程度的紧迫感和结巴感；分辨人我的度量衡既意味着革命，也意味着在“天下”笼罩着的土地上，革命具有何种程度的复杂性和暧昧性。总之，一切都变了，时间改变了方向，空间更换了气流和密度，男人改变了发型，女人则换了睡姿……

与此同时，和“天圆地方”暗中吻合的许多方块字，也被迫改变了自身的语义。在这些旧瓶装了新酒之后的方块字中，“革命”是异乎寻常的一个。考诸历史，古典中国的“革命”，莫不始终在“甲子”派定的框架内循环往复。从秦至清，每一个因“革命”而鼎立的朝代，看上去都像一个大家族中的不同成员：从眉眼、腰身、挺胸、俯首到安心受射，竟然是如此相似；它们虽然各有韵味，但我们一眼就能断定，那些自己把自己命名为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的，确实是一母所出的兄弟，符合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比喻。但在“世纪”“世界”暗中怂恿或公开教唆下，“20 世纪”的中国革命始终是现代化的严正要求。革命是现代化的助手或拐杖，现代化则是革命的终极目标。这当然是一种被迫的现代化、被迫的革命，它要求古典中国更换自己的血液，改变自己的骨髓，变更自己的灵魂。确实，这一切都来了，也都无一例外地被中国人做到了。

应和着一维的、线性的时间的旨意，应和着分辨人我的度量衡的严格规定，“20 世纪”的中国革命始终在两个向度上展开：顺着线性时间的手指给出的方向，奔赴现代化，为此，需要一场旨在走出“封建主义”和“中世纪”的时间革命；顺着分辨人我的度量衡的指引，去推翻一切异己的力量，为此，需要一场旨在保种求存，旨在维护本党、本阶级利益的空间革命。这两种革命都被恰如其分地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但

这些叫内涵的家伙，都来自“世纪”和“世界”或热得滚烫或冻得冰冷的枪管中喷射出的液体，也都更进一步地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的灵魂。

有鉴于“世纪”和“世界”的固有禀性，“20 世纪”中国的时间革命始终是一维的、线性的，始终是一根向前挺进的长矛，尽管它步伐凌乱不堪，在广袤的时间雪地上留下了许多螺旋式上升的轨迹。但它无疑把“世纪”的语义更加直白化也更加肉身化了。空间革命则始终在划分人我：要么是民族的仇敌，要么是同胞；要么是本党、本阶级的异己，要么是同志。它当然性地将“世界”给丰满、浑圆了，它也因此给了“世界”一个或丰腴或干瘦的面庞。

在中国，在“20 世纪”，时间革命意味着在“封建主义”的原始土地上，跑步完成赶英超美的任务；空间革命则意味着拼死抢夺对“赶英超美”的领导权。领导权的争夺，不仅在“中外”之间展开（比如中国和日本），也在中国内部各阶层之间推演（比如国民党和共产党）。无论是中外之争，还是兄弟阋于墙，都意味着残酷、血腥和水火不容。在这里，容不得一点点温情和柔软。那些拥有温情和柔软品性的，都被称作小资产阶级，都需要被无论哪种型号的革命所改造——虽然按照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说法，我们至今也没有搞清楚，这小资产阶级的“小”究竟“指的是卵子小，还是肾囊小”。

历史事实早已告诉我们，在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革命以空间革命优先；在 20 世纪后半叶，时间革命则被摆在了第一位。但无论是“优先”还是“第一位”，都不意味着吃独食或唯一性。实际上，所谓“优先”或“第一位”，仅仅是说，它不过是“革命”这个词给自己派生出的大老婆罢了。大老婆的存在，最多只能威慑如夫人，却不能消除小老婆存

在的合理性——记住这一点，在我看来至关重要。

我看见在空间革命中，无数人死于非命。本着邓汉仪“千古艰难唯一死”的正确看法，那些人都是冤死鬼，尽管他们一度被追认为烈士或无辜的难民。他们的鲜血浇注了革命，并最终让空间革命生动起来，让空间革命拥有了无数张变脸。我还看见在时间革命中，无数人殚精竭虑、夜不能寐。他们或咯血，或奋笔疾书，或道渴而死，或看见了一闪而逝的曙光，却只有少数几个幸运者，能够一抬头就望见了北斗星。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仁人志士，“难酬蹈海亦英雄”；他们都在前赴后继，“死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他们用精纯的智虑哺育了革命，并最终让时间革命满脸沧桑，却又分明有着一颗二十岁的棒小伙才配拥有的心脏。空间革命青春长存，时间革命则随时可以返老还童。这都是“世界”和“世纪”赋予它们的特异功能。丝毫没有必要在时间革命和空间革命之间，区分谁更温柔酷似林黛玉，谁更冷酷赛过阎王。不用去区分五十步和一百步了。事实上，无论是时间革命还是空间革命，从来都“不是请客吃饭”。记住这一点，同样对我们有好处、有帮助。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区别。

空间革命始终与枪炮联系在一起，与硝烟构成了孪生兄弟。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都无一例外地被空间革命征用为原料，所谓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毫无疑问，这中间最主要的原料当然是肉体，也是肉体定义过的一切：房屋、床、粮食、酒、茅草、土地、河流以及性。时间革命则与所谓的和平联系在一起。但时间革命许诺的和平差不多有二分之一是虚假的和平，它和看不见的战场、看不见的硝烟构成了双胞胎，所谓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像秋风对待落叶那样无情。在时间

革命的眼中，一切人或物，都有可能成为它利用的零部件、螺丝钉；一切人或物，从逻辑上讲，都可以成为它的牺牲和祭品。大至国家主席、元帅、土地、山河，小到下岗的工人、丧失了土地的农民、卑微的麻雀，都概莫能外。大的我不说了；我是一个小人物，只配说小的。一位我喜欢的诗人，就写到了在“除四害”运动中，作为“四害”之一的渺小麻雀如何以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对时间革命的崇拜：

战争在百万人的吼声中前进，
“麻雀过街，人人喊打。”
那声音如另一个声音响在人们的耳畔：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疯了的麻雀应声倒下（太疲倦了，
以至于干脆颓废而死）
另一些却为补充体力食毒米丧身。

（柏桦：《1958 年的小说》）

就这样，时间革命与空间革命不由分说地构成了“20 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奇怪的是，在那些死去的草木上，像涅槃的凤凰一样，许多新的人和事，居然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随着他（它）们破土而出、拔节长高，面色越来越红润，像发情的大猩猩。这是革命的奇迹，但不要追问究竟是时间革命还是空间革命制造出的奇迹。也没有必要指认这些猩猩中谁是领袖，谁是臣民，更没有必要搞清楚这些猩猩最终都产了什么卵，孵出来的究竟是龙种还是跳蚤。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一切都没有必要再问了。

但此处仍然有必要申说的是所谓的必然性，空间革命和时间革命腹腔中暗含的那种必然性。是“世界”和“世纪”给时间革命和空间革命配备了这种必然性。正是这个玩意儿，这个让舍斯托夫用“肉头”去碰撞的玩意儿，让时间革命和空间革命拥有了君临一切的巨大权威，让时间革命和空间革命具备了调动一切资源的能力。这种权威和能力是如此巨大，如此无微不至，以至于能把一切人或物在事前就定义为齑粉。除此之外，我还要说，在“世界”和“世纪”的严正逼视下，无论是空间革命中的“鲜血”，还是时间革命中的“智虑”——它们都是我们的无上宝物，最终都被迫改变了自身的含义。鲜血和智虑再也不是从前的鲜血和智虑了。它们不过是赫拉克利特所谓不能被两次踏进的那条“河流”。由于“甲子”和“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20 世纪”中国人流出的鲜血、付出的智虑，再也无法循环利用。那架数千年来颇为管用、颇有节约功能的机器，在“20 世纪”彻底报废了。那么多的“烈属”，那么多的“抗属”，那么多的孤儿寡母，那么多的断子绝孙者，莫不昭示着时间革命和空间革命的含义与属性，莫不表征着“世纪”“世界”打败了“天下”“甲子”后，给咱们炎黄子孙带来的痛苦、幻灭以及新生的豪情与决心。

3

无论是时间革命还是空间革命，都需要语言的帮衬。任何形式的革命都需要语言作为自己的装饰。实际上，语言才是一切型号的革命的最终出发地，最原始的革命胚芽，无一例外都包藏在语言当中。然而，革命一旦成形，一旦长大成人，就会反过来奴役语言。无论是在时间革命

那里，还是空间革命那里，语言的地位都仅仅等同于列兵。毫无疑问，每一种革命都豢养了自己的语言，都哺育了自己的语言。在革命和语言之间，一种互为母子的共生关系始终是它最为打眼的现象。这种性质和腔调的语言像守门的家犬一样，始终在兢兢业业地、忠实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也像母亲守护儿子一般，守护着自己生养出的革命。

语言不但各为其主，为自己的主人或儿子张目，也为了主人或儿子的利益，秉承着主人或儿子的旨意，主动打击一切异己的人或物。语言也像士兵一样在参与革命，在用实际行动帮助革命。

掌握了语言，尤其是掌握了书面语言的人，被称作知识分子。无论是时间革命还是空间革命，都秉承着“世纪”和“世界”的严正召唤，在拼命争夺对知识分子的所有权。知识分子是无论哪种型号的革命的宝贵财富，却并不仅仅是装饰品。一个有趣而辉煌的现象于此中闪亮登场了。知识分子和语言士兵一道，自觉地肩负起了革命赋予他们的使命：用在“世纪”和“世界”双重逼视下改变了语义的方块字，在半夜或黎明，在烈日下或大雪中，在稿纸上急行军，并在喘息着的行军途中，不失时机地射出由方块字组成的枪林弹雨。一时间，世界格局中的中国的天空——不是“天圆地方”的中国的天空，像黑压压的蝗虫一样，飞满了张牙舞爪的方块字。它们咬合在一起，撕扯在一起，每一个方块字都流出了黑色的血。那是战斗的血，是文字为革命付出的必需代价，实际上，那是方块字的一个个偏旁部首：

> 一片枪响之后，汉字变得简单。
> 掉下了一些胳膊，腿，眼睛，
> 但语言仍在行走，伸出，以及看见。

那样一种神秘养育了饥饿。

（欧阳江河：《汉英之间》）

这些在中国的天空中相互撕咬、撞击、决斗因而缺胳膊少腿的方块字，确实还在“行走”“伸出”和“看见”。因为在革命的洪流中，语言也是战士，它也得像战士一样奔赴自己的阵地，消灭自己的敌人，不战斗到最后一个笔画，决不放弃胜利的机会和对胜利的渴望。的确，这样一种神秘无比的现实养育了一种饥饿，但这无疑是对敌人的广泛饥饿。好在在“20 世纪”的中国，无论是在时间革命中还是在空间革命中，废除饥饿的食品从数量上几乎都是无限的，从质量上几乎都堪称优秀。饥饿有多大，作为食品的敌人组成的蛋糕就有多大；饥饿有多强烈，那些蛋糕的质量就有多优异，根本不存在任何恍惚与躲闪，更不存在解释学上的任何闪失。这真是一种提前到来的共产主义，一种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这是方块字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共产主义。

现在让我接着叙说知识分子。实事求是地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主动加入到时间革命或空间革命营造出的广泛氛围之中，都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他们对这两种性质的革命，或对这两种性质的革命中的任何一种，都抱有极大的期待和热忱，都真诚地相信，通过这两种性质不同、目的不一的革命，“20 世纪”的中国应该会有一个光明、美好的前途。他们中有不少人是饱学鸿儒，在塑造灵魂和修理我们的心性方面很有一套；他们中也有不少专司科学的大师，对如何改造山河，对玉米如何才能够亩产三十万公斤，颇有心得。但遗憾的是，这些勇敢、无畏而又真诚的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好报，并没有得到善终。与他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和人民一样，他们的历史也是一部心酸史、血泪史。

在“20 世纪”的中国，在中国的“20 世纪”，“知识分子”一词可以恰如其分、符合逻辑也符合需要地拆解为“知识”与“分子”。每一个“知识分子”几乎都拥有“知识”和“分子”这两重身份。作为“知识”，他们更多的是在为空间革命效劳，也被空间革命大肆利用。因为空间革命需要“知识”来为自己张目，需要“知识”来唤起民众。毕竟“知识”在刚刚过去的“天下”中国、“甲子”中国，在目不识丁的百姓那里，是一件神圣到了近乎迷信程度的事物。作为“分子”，他们更多的是在为时间革命效命，也全方位地被时间革命所挪用。时间革命倾向于否弃“知识”（“知识就是力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它更需要“分子”。在从“知识”到“分子”的角色转换中，“知识”被迫清除了自身中属于知识的那部分，不无痛苦但也不无欣慰地承认了“分子”的角色分配。这真是一大奇迹，尽管为着这奇迹的出现，时间革命花了整整三十年的漫长岁月。时间革命的耐心也由此可见。它确实比更为火爆、更为激烈的空间革命，拥有更多的耐心、更多的等待、更多的宽容？

无论是作为“知识”还是“分子”，这伙叫“知识分子”的特殊动物，都是玩弄语言的高手。语言在他们手中像蝙蝠一样四处纷飞。从“知识”到“分子”的角色转渡，把我们祖国的语言搞得更加离奇，更加古怪。正是这种语言和时间革命、空间革命结盟，生产出了被我们这些后人称作“20 世纪中国历史”一类的玩意儿。因为语言本身的古怪、离奇，所以“20 世纪中国历史”也显得古怪、可疑、暧昧和晦涩，令我等欲说还休、掸扯不清：

> 我不说一段历史，因为那段历史有错误
>
> 因为罗盘被冲上海滩的鲸鱼捎给了欧洲，供一个内陆国制造钟表

因为一头大鱼带头把它的鳃又赠给了路过的军舰

因为历史只是时间而已，政变和发财！

（李亚伟：《怀旧的红旗》第 1 首）

无论是时间革命还是空间革命，都需要语言的帮衬，都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尤其需要“知识”和“分子”的无私赞助。直到今天，这场伟大的演出还远没有到达谢幕那一刻。个把“黑马”思想家的出现丝毫不说明问题，尽管他们属于稀有物种。更何况这伙思想黑马中，本来就有不少人身在曹营，而心存汉阙。一百年来，时间革命和空间革命始终大门洞开，语言、“知识”和“分子”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地走了进去。这么多年过去了，大门还敞开着，几乎从未关闭过。有意思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么多人进去了，大门之内的空间始终不见拥挤，还有按照需要不断增长着的剩余空间以迎候新来者，以便继续创造历史。

我自始至终是这场伟大运动的旁观者，是这一历史过程的游历者、后来者，只能满怀酸楚地打量着“知识”和“分子”们的一举一动，却没有任何能力对他们援之以手……

4

许多小道消息纷至沓来，更多的谣言接踵而来：

我们被告知，我们正处在一个新“世纪”的端部，我们被委派为这个新“世纪”的受难者或受惠者；

我们还被告知，我们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当口，中国的事就是美国的事。

……

因为这些小道消息和谣言，我们的眼睛开始变得兴奋和忙乱起来，我们惊诧而惊恐地打量着眼前的一切。在一维而线性的时间观念的修理下，我们被逼迫着一切向前看。后视则被指称为老年的举动。而老年，恰恰是一维而线性的时间最不待见的人物。这是一个人人唯恐落伍的时代，一个快马加鞭的“世纪”，一个永远向前、永远面向不可预知的未来的“世界”。因此，健忘和故意遗忘，成了新的时尚。

我承认，“世界”和“世纪”已经植根于我们内心深处，现代化已经部分地成为强有力的事实，我们的记忆确实抵不过飞驰而来的各种变化、变迁和浑身肿胀的进步。因此，健忘和故意遗忘与其说是时尚，不如干脆爽快地承认：是“世界”和“世纪”的语义打败了我们的记忆。但另一方面，我们被敲打得支离破碎的记忆，却又被“世界”和“世纪”鼓掌欢迎，被“世界”和“世纪”认作一个“现代”人成功的标记。这个标记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现代”需要我们腾出足够的记忆空间以容纳眼前，还需要我们预备另外的记忆空间以接纳“世界”和“世纪”许诺的前景。“眼前”需要回忆，一百多年来，事实上“前景”更需要回忆。而我是不是可以把这种性质的回忆自相矛盾地称作回忆将来？

就在我们这样想、这样做的时候，另一条小道消息又不失时机地传递了过来：告别革命！很显然，这是一条加重了语气的消息，是一条急促的、喘着粗气的消息，通告了某种可称之为紧急的情况。我知道这条小道消息的意思，明白它要求我们告别的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可问题是，在“世界”和“世纪”依然存活的情况下，革命真的可以被“告”掉、被“别”掉吗？

在这个号称新“世纪”的时代，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新革命比

之于“老世纪”的老革命，的确少了一些表面上的血腥。但今天，鲜血却以另一种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种隐蔽的鲜血，但绝不是隐喻意义上的鲜血。我没有任何特异功能，但我的确看到了那么多隐蔽的鲜血涂抹在中国的天空……

新型革命以时间革命和空间革命相交织的神情出现在我们眼前，已很难分清谁主谁次。但既然是革命，就需要鲜血去浇灌，这的确没什么好说的。由于新型革命已被麦当劳、肯德基、伟哥、美元、人民币、博士学位、“时间就是金钱”“美好人生从现在开始”……极为有效地掩藏了起来，所以，新型革命所需要的血，也就符合逻辑地被名之为隐蔽的鲜血。

隐蔽的鲜血一方面意味着：虽然新型革命以给我们补血的方式推演着自身，但它必须要从我们的血管中抽成。我们的血管由此成了新型革命的生产车间。另一方面则意味着：虽然我们仍然在以鲜血浇灌革命的方式，被新型革命裹挟着前进，奔向乍看很近、细看却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未来，但于此之中，新型革命显然还是考虑到了革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就是说，所谓补血，不过是发放贷款；所谓抽成，不过是我们应该付出的利息。因此，这场轰轰烈烈却看不见硝烟的新型革命，被某些“妙人”认为是一场“双赢”的工程。但我搞不清楚，这“双赢”的“双”中，除了发动新型革命的“世界”和“世纪”，另一方究竟是谁？它是我们这些利息的提供者吗？是那些鼓吹新型革命的妙人吗？难道这些妙人居然不在其中？我们能够“赢”吗？我们从哪方面“赢”？究竟“赢”得了什么？是的，我们确实获得了贷款，可我们能买什么，又能卖什么呢？

“革命”，最古老的汉字之一。它现在越来越偏离“甲子”和“天

下”。我不知道它语义之旅的下一站会在哪里，因为我不知道在“世界”和“世纪”的胁迫下，更新型的革命将如何利用鲜血。它能称之为更隐蔽的鲜血吗？在这方面，我真诚地恳求大家最好放弃占卜打卦的癖好。“历史已经终结”的最新谣传，已经遭到了人们的唾弃，这无疑是占卜打卦者丢脸的最新版本。但看到汉字中的“革命”一词已经越来越偏离它的母体，我却无力说出追悼它的任何一句话。一切感伤的言辞，一切忧伤的语调，在此当口都是无用的、矫情的；一切装模作样的姿态，故意视而不见的清高，在“世界”和“世纪”面前，都是徒劳的、夸张的。

我只知道，在这样一场其贪欲犹如长颈鹿的脖子那样的革命的胸脯前，我再也无法成为旁观者；在革命语义之旅的这一站，我再也不敢说自己是游离者、后来者。我身处其中。我们都恭逢其盛。谁能够向我们援之以手？又有谁能够把我们摆渡出这万丈深渊？

2004 年 11 月 9 日—10 日，北京丰益桥

看得见的嘴巴

把嘴巴提升为军长

作为一个必须天天说话、每日三餐必须亲自上桌的正宗凡夫俗子，我从不敢小看嘴巴的本事，因为我在人世间充当的角色的平方甚或立方，都难以和它在人体上充任的角色比肩而立——尽管我们始终在遥相呼应、同气相求。作为一个渺小主义无可奈何的坚定崇奉者，我只能以感恩的语气说，嘴巴实在不平凡，但它能被我们无数次看见。

过往的先贤圣哲，当然也包括数量更多的时贤今哲，普遍有着崇尚器官等级制度的昂贵癖好。西方的柏拉图（他有坚定不移的《蒂迈欧篇》），我们的孔夫子（他有传说中由他写成的《易传》），都是器官等级制度坚定的拥护者和重要的创制者。多亏了他们积年的余威和神威，才让我们这些后起的渺小主义者看得至为清楚：在人体诸器官的座次表中，嘴巴仅仅处于县团级的肚脐位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上三路和下三路相交会的中心点，略高于乡镇级别的大肠和小肠，较高于纯然混迹于庶民阶层的肛门和脚趾，却距离稳坐司令部的大脑、心脏和眼睛至少有一万光年之遥。除了有一次鄙人喝醉了号召自己要向肛门致敬，没听说谁竟然胆敢赞美那个伸缩能力十分杰出的门洞，人们顶多只能看见肛肠

科大夫在极其职业化地维护肛门的正常运转；和那个杰出的门洞遭遇到的情形相去较近但性质迥然不同，歌颂嘴巴的人似乎也不多见。自古以来，嘴巴一直是个毁誉参半的主：有人居心叵测地把它吹上了天，更多的人将它贬得一败涂地——《神曲·地狱篇》在貌似的温柔中，对嘴巴的攻击就达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在器官等级制的严厉逼视下，区区一个县团级得到的赞美本来就应该十分有限，何况作为一个渺小的官员，它的缺点还是先天的——司令不可能有任何缺点；否则，就有篡党夺权的罪名向它黑袍加身。天生会吱吱呀呀的嘴巴竟然咬紧牙关，大口紧闭，一言不发地认可了这个事实，倒让我感到十分惊奇。我愿意善解人意地将嘴巴的做派看作韬光养晦。但它天生就具备这样的智慧吗？它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准备实施反击？这都是些无解的方程式。

我尊重身体上的每一个器官，包括尊重天天求着我必须把它消灭掉的胡子——它的渺小应当不证自明，但我更愿意将我有限的赞美库存中的大部分存货奉献给嘴巴，这个人体上最大、最深不可测的溶洞。我没有跟任何人唱反调的胆量，仅仅是想和过往的先贤圣哲、时贤今哲们打个商量：我看我们还是应该尊重一下嘴巴，还是有必要赞美一下嘴巴的超级重要性和它对我们作出的重大贡献。在任何时候，忘恩负义总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缺点。毕竟嘴巴才是能量进入身体的唯一通道；哺育我们的所有能量最终都来自太阳，因此，嘴巴又是太阳驻扎我们身体的第一个客栈。依靠这个溶洞的帮助，我们才有能力算计他人和算计生活。

作为一个整体，身体被神秘地构造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算计。我愿意相信，算计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总名称。不会有更好的词汇能像算计那样完美地总结我们的行为。活着就是算计，连被算计也只有当它作为算

计的对称形式时才有存活的权利。但算计首先是嘴巴的派生物。在埋没和压制了嘴巴若许年月后，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将它的地位提升一级？我建议，干脆破格给它个军长当当，它肯定能够胜任这一职位，也能更愉快、更卖力地为我们继续服务，毕竟押送太阳到肠胃中去进而支撑算计活动，唯一的胜任者就是嘴巴。借助太阳的权威，有太阳在天上助拳，我顿时觉得自己的建议并不是斗胆妄为——我为作建议前有意喝了二两羞愧难当。

醉眼蒙眬中，我看见许多人对我的提议举起了表示赞同的手臂。那是手臂组成的森林，让我振奋，让我震惊。一瞬间，我产生了一种不该有的幻觉：我好像不是一个渺小主义分子，而是一个振臂一呼听者不敢不应的枭雄。但我依然辨认得出，举手者中有胖子、饕餮之徒、贫血病人，也有痢疾患者、哑巴、穷人和暴发户。他们中的大多数不过是我的同类。但我悲哀地发现，能够高声赞美嘴巴的唯一角色只有嘴巴，因为只有它才能开口说话，但我没有听见任何一个嘴巴的有声响应。虽然肛门偶尔也能代替嘴巴嘟囔两句，但那显然不是赞美，何况它的唠叨根本就摆不上台面；它只需一句带有甲烷气味的言辞，就能坚定地否弃人世间的一切。和嘴巴不同，那个具有超级伸缩能力的门洞向来只负责否定。它是人体上的否定之神，比古今中外的社论和宪法更有威严。

雌雄同体，母子同体

我们总认为自己是单性动物，苏格拉底为此还专门制造过一个经典传说，声称这是神对我们的恩惠，既能让我们在无聊的算计中享受战栗带来的极乐，也能让我们在极乐中与神同在，趁机向永恒进军。但嘴巴

毫不犹豫、毫不留情地粉碎了这个流传久远的神话：人的雌雄同体性最为完好地体现在嘴巴的工作流程当中。这种说法很可能让明面上的君子们惊诧莫名，实际上平常得不值一提，就像人渴了要喝水一样简单、通俗。我要恳请大家从广泛的算计活动中暂时抽身出来，把对人生利润的追逐权且放在一边，花费一分钟的昂贵时间观察一下嘴巴的工作流程：当嘴巴押送太阳前往幽暗的肠胃时（它会不会照亮那个滑腻的时空呢），我们看见了嘴张嘴合，看见了舌头的搅拌和牙齿的切割；当嘴巴决定开口说话时，我们看见舌头在溶洞中像一条挺得笔直的蛇一样进进出出，牙齿侧身让道，旨在润滑口腔的黏液涂满了舌头的全身。终其一生都忙于算计的正宗凡夫俗子肯定会发现：无论是押送一次太阳还是开口吐出一句话，哪怕只是发出一个单音节的惊呼，嘴巴都毫无例外地完成了一次交合。最让人震惊的，恰恰是单音节的惊呼体现了舌头的高度亢奋，一个快速倒腾出来的长句反而只是舌头奔向亢奋顶端的引子或准备。

尽管拿性事作比喻是我们时代的老牌时髦，完全不足为训，但我无意把嘴巴的工作过程往性事身上扯。我说出的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任何一个有心人都能轻易发现这一规律：就在舌头（即阳）把口腔（即阴）“搅得周天寒彻”的一瞬间，嘴巴已经完成了它应该完成的工作。就像房中活动注定要生产出最初的哭泣，嘴巴既帮助我们的身体将能量切碎，也帮助我们生产话语。能量肯定不会被浪费，因为它总能得到肠胃的热烈拥抱，何况寄生在肠胃上的大肠杆菌早已摆好了夹道欢迎的姿势；可我们说出的话却极有可能是废话——那无疑是对嘴巴的工作的极度蔑视和浪费。我想恳请大家注意的是，在器官等级制度的法眼中，舌头的作用远远大于口腔的作用，只因为它碰巧占据着阳性的至高位置，

就像在等级社会中，男人总是被认为无限高于女人。是舌头在口腔中的进进出出为切割能量、生产话语提供了最大的助力。这应该不会有任何疑义了。没有必要为舌头的阳性地位再作任何辩护。

在押送太阳前往肠胃的幽暗旅途中，身体超越了自身的疆界，“它吞咽，大嚼，分割开这个世界，以世界为代价得到丰富并成长。人与世界的相遇，就发生在呼叫着、啮咬着、撕扯着、咀嚼着的嘴里，它是人类思想和意象最古老、最重要的对象之一。”巴赫金像一个意淫的老手，把吃饭时舌头与口腔阴阳交合割出昏晓的情形描述得惊心动魄，有几分淫色，也有几分暧昧，但对吃饭的赞扬我准备就此打住：我感兴趣的不是撕扯和吞咽，而是嘴巴的发声功能。

很显然，在上述前提下，所谓住口，就是逼迫舌头停摆；所谓闭嘴，就是强行将舌头囚禁在由三十多颗牙齿围成的白色栅栏之内。只有处于自觉住口和闭嘴的和睦状态，我们的舌头才能安静地平躺在口腔当中，像一个娇小孱弱的胎儿，径直将口腔当作了天然的子宫。这个子宫大小适中，光滑、湿润、幽静，适合胎儿的发育；安静是它最重大的主题。只有在这一刻，嘴巴才体现出它的母子同体特性。我们可以将雌雄同体和母子同体看作嘴巴拥有的双重特性，就像由嘴巴押送的太阳发出的光线既是波又是粒子——一个物理世界中极为罕见的现象。而当我们被命令住口和闭嘴时，尽管舌头也在口腔中侧身躺着，但它并没有忘记自己的阳性地位，始终蠢蠢欲动，在用舌尖暗中抚摸上颚、下颚和牙龈，类似于密室中偷偷摸摸的勾引者——神学家克尔凯郭尔十分熟悉这类活动，此处只好按下不表。总之，舌头的阳性品格最终决定了一个令人炫目的事实：看管舌头的口腔敌不过来自被看管者的轻柔挑逗，阴性却不

过来自阳性摄人心魄的妩媚勾引，舌头于是大功告成、如愿以偿——它又在口腔中进进出出，浑身上下披满了具有润滑功能的黏液。

致力于舌头管辖工作的大人物们异口同声地把这种境况称作“防民之口胜于防川”。他们对此痛心疾首。我理解大人物们的忧虑，我为他们的做派痛心和难过。在此，我愿意为他们免费贡献一个消解忧虑的方案：想尽千方百计开发嘴巴的母子同体性，从严打击嘴巴的雌雄同体，坚决禁止口腔乱伦。本着这个高尚的目的，最简单的方法不用我说大人物们也明白，因为他们的经验无疑比我丰富得多：随时怂恿牙齿和舌头打架，让舌头头破血流，根本打不起亢奋所需要的精神，更不会有试图亢奋的一丝雅兴。

我当然知道我的建议纯属多余，我推荐的方案数千年前就已经被广泛采用。

哑巴的妙用

作为嘴巴的极端形式，哑巴就是嘴巴有故障的人。哑巴破坏了嘴巴的一般形态。病理学能够告知我们，在所有哑巴中，因为舌头出了问题才成为哑巴的人为数众多。这大概又一次证明了舌头在嘴巴中的核心地位。作为雌雄同体和母子同体这个双重特性的认领者，嘴巴一直在坚持舌头的领导作用，它像后宫中的众多妃子维护皇帝的领导作用一样，在坚持不懈地维护舌头的阳性品格。很显然，哑巴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一种器质性的阳痿，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救它于水深火热之中。作为一种意外的补偿形式，哑语被发明出来了——这当然基于舌头发出的阳性吁请。所谓哑语，就是依靠手势的运作传达哑巴的心声。

手势：哑巴的舌头，它外在于口腔，就像我们身边那些无精打采的男人从成人保健用品商店扛回卧室的秘密器具。但它确实能起到隔靴搔痒的功效。

虽然哑巴看起来也能完成嘴巴的工作流程，但更主要体现在切割能量这一方面。哑巴说不出任何一个清晰完整的句子。哑巴除了器质性的阳痿外，一切正常；它在听从本能押送太阳时其嘴巴具有雌雄同体性，发声时则基本上处于母子同体状态。被逼而成的手势语只能从外围包抄臆想中的口腔，从象征主义的层面对口腔实施挑逗或勾引。尽管手上长满了骨头，看上去比真的舌头还要挺拔笔直，实际上仅仅比聊胜于无多了不多的一点点。因此，不能将哑巴试图说话时动荡不安的舌头理解为阳性物件，更不能将哑巴的舌头在口腔中的进进出出理解为乱伦。从最为善解人意的角度，我们顶多只能将哑巴说话时舌头的动荡视作后宫中的干夫妻行径——一种典型的菜户行为：有正常的冲动，却没有和正常的冲动相匹配的本领。所谓正常，就是至少需要裸体以上的能力；裸体是测定正常与否的唯一地平线。

哑巴通常被称作残疾人，这个称谓恰如其分，暗含着不多不少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丝毫没有歧视残疾人的任何歹念，我只是从物的水平上说事。在此，我要专门讲一讲哑巴的妙用。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无法说话的人听了高兴，我也免除了道德上的包袱。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圣君康熙大帝花费不菲，在自己的密宫中豢养过不少哑巴太监。许多顶级绝密的谈话，都当着他们的面在密宫中进行。很显然，哑巴是没有秘密的人，更没有泄密的能力。仁慈的康熙十分信任他们，赏赐他们的东西异常高贵——当然也没有高到给他们黄马褂的程度。对于他们，只需

要康熙爷笑两声就足够了，尽管他们听不见笑声。这里边显然牵涉到一种等价交换：皇帝的笑容在价值上等同于哑巴太监们在生理上的缺陷。

只有在哑巴身上，我们才能看到嘴巴的雌雄同体性和母子同体性被最大限度地割裂了。这是造物的神奇安排，也是造物主天生神力的意外证据，但谁又能肯定，这不是造物主的阴险和狡诈？康熙深谙此中要诀，否则，他不会在那么昂贵的地方，那么幽雅的屋宇，那个绝密的所在，豢养那些尤物。我们实在有必要记住一个秘传亘古的真理：所谓圣人，就是充分了解人性弱点的人；所谓圣君，就是充分利用我们生理缺陷的神。很显然，康熙比听从我的劝告仅仅怂恿牙齿和舌头打架的大人物们高明得多。

舌头决定论

长期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不懈地相信，咱们中国人的嘴巴与洋人的嘴巴区别巨大。按照童话的一贯语气，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这一直是我们能够得以自信的隐秘源泉。我们愿意相信，中国人的舌头在长势上，一直走的都是中庸主义的路子：既不红也不紫、既不长也不短、很好色却不淫，但又像弹簧一样伸缩自如——好在我们的弹簧和洋人的弹簧也不一样。正是这一点保证了我的描述的准确性。这种性质的舌头究竟起源于何时？现在已经万难稽考了。考察这个秘密需要我们发明一整套永远不会存在的考古学。但那个无法被再度发现的年代肯定称得上舌头的轴心时代。作为一个对所有隐秘之事充满好奇的人，我对塑造了我们舌头之长势的那个湮灭的年代十分怀念。想想看，那是一个何等魁梧的年代：一切都在暗中生长，一切都在无知中暗暗发愿，就像宫廷政变始终

处于密室或围绕在变了心的皇后的裙边，只在最后拿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新王朝，一份我们从未见过但异常熟悉的菜肴。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致力于刺探那个年代的消息，太多的时间被挥霍殆尽之后，除了赢得一个虚肿的中年，至今依然两手空空。

现在我只能说：经过长期的观察，我发现我们的舌头确实长势喜人，像雨后的春笋，遵循着种瓜得瓜种豆只能得豆的遗传学规则。舌头在长势上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人进食的方式与外国人大为不同——聪颖的罗兰·巴尔特对此就曾有过大失颜面的少见多怪；也决定了中国人说话和发声的方式与洋人迥然有别——我们是单音节的认领者，欧洲鬼子则是多音节的法定继承人。我愿意将上述情形称作舌头决定论——反正已经有那么多怪模怪样的决定论摆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我炮制一个摆在自家门口聊以自慰又有何妨？这也是我在有太阳助拳的情况下，胆敢建议将嘴巴破格擢升为军长的最大理由。

尽管嘴巴同时具有母子同体性和雌雄同体性的双重特征，但中国人的舌头的特殊长势，使雌雄同体性始终有向母子同体性缴械投诚的趋势。在我似是而非的记忆中，好像自古以来，自觉住口和闭嘴就是中国的舌头集团军追求的最高境界。很难弄清楚这个境界是何时来临的，唯一知道的是它带来的后果：舌头自动解除了它的阳性地位，只在切割光线时才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吃由此成了中国的舌头集团军最为重大的主题。酒肉的盛宴从哪个不知名的时代一直铺排到今天。我们为此发明了太多古怪的食谱，我们为食谱捕杀了太多古怪的动物。但这并不表明中国人从不发声、说话，不让舌头在口腔中进进出出。实际上，聒噪才是我们的重要禀性。瞧瞧“聒”“噪”的字形结构，就不难明白我们的舌头给

无辜的耳朵馈赠了多么严重的伤害：在舌头的驱动下，我们说了很多话，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说在这里直接等同于没说，等同于没有多少意义的噪音；表面上的雌雄同体带来的亢奋，只是母子同体的安静主题的另一种形式。舌头在自动解除言说过程中本该具有的阳性品格之后，它带来的快感只能是虚拟性的快感，它发出的声音转瞬即逝，它欲哭无泪却又有泪无哭——它既是太监，又是饶舌的哑巴。我们没有泄密的能力。

渺小主义的最早萌芽就怀揣在舌头决定论的上衣口袋中。除了少数人，我们在人世间的身份远远低于舌头在我们身体上的地位，何况它始终在领导我们、说出我们。在我肤浅的印象中，我们自古以来都非常满意自己的舌头，对它的发声方式更是信心爆棚。数千年来，连岩石也会在时光中擦伤皮肤，但我们总有能力一如既往地把一切非中国的发声方式一概贬做鸟语或夷语，将它等同于禽兽的胡言乱语，直到灾难降临的那一天。

是不是我们的发声方式最终导致了灾难的到来？反正鸟语或夷语很快就向我们证明了它的强大。中国的发声方式迅速衰落了。醒过来的饶舌的哑巴们痛定思痛，知道自己的舌头急需要滋阴壮阳。这个伟大的觉悟迫使中国的舌头放下架子集体投靠了鸟语或夷语。它被认作我们的舌头的春药。太多的事实证明，有了这包昂贵的药剂，我们的舌头并没有达到昂天直举的效果；在那包药剂的怂恿下，我们的舌头仍然很难发出正宗鸟语或夷语所认可的语调。洋泾浜是一个经典证据。但没有洋泾浜也有其他更为扎实的证据，只是我懒得罗列罢了。从发声方式衰落的那一天开始，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致力于矫正自己的舌头。在一个人造美

女大行其道的时代，用不着冒险我就敢肯定，用于修理舌头的外科手术正处于萌芽状态，说不定它早就从某个莫须有的子宫中走出来了，用它的满脸坏笑打量着我们中庸主义的舌头。

我对即将出现的舌头产业持热烈欢迎的态度。我愿意向寄生在我全身上下的所有细菌发布一号战备命令，让它们明天早上就手持鲜花，脚踩爆竹，夹道欢迎舌头产业的到来，因为迄今为止，我是唯一一个违背过往先贤大哲和时贤今哲的权威，妄图擢升嘴巴为军长的渺小主义者。

2006 年 10 月 4 日，北京魏公村

对快感的傲慢与偏见

自问生平，都无是处。忆少年豪迈不羁，谓悠悠斯世无一可与友者。骂坐之灌将军，放狂之祢处士，一言不合，不难挺刃而斗……意见偏颇，则性之所近而然也；议论悖戾，则心之所激而成也。其或情牵脂粉，语涉狭邪，犹是香奁本色。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自序》

1

钱锺书先生在一篇精短的随笔中曾经写道：“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论快乐》）我想，人类历史的进程往往会被（其实已经被）许多哲学家、历史学家或其他什么什么的家们，一厢情愿地拔高和美化，因为他们不能忍受历史的戏谑性和无意义；庄严在他们看来是必需的，哪怕是弄巧成拙的庄严或伪造的庄严也在所不惜。诗人西川在写到先知时用先知的口气说：“当我走进这灰瓦之城”，那些农民、商贾、妓女、工匠、僧侣、士兵、哲人和税吏居然——

尊我为“先知”，向我的驴子高声祝福

而我曾经是他们之中的一个

隐瞒起我的过去，向他们预言未来

他们毫不怀疑我，而我怀疑一切

（西川：《激情·伪先知或真理之歌》）

伟大的伏尔泰就说过，没有上帝，也得再造一个上帝。因为据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没有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比如性放荡。我们可以问，有了上帝，性放荡就是不可能的了吗？就这样，我们对历史的误解是普遍和深刻的。人类历史的进程其实更多俗不可耐的性质，也充斥着人为的伪造。说得直白些，引诱我们创造、向上、向前，最真实的东西其实就是快感。快感的邻居和亲戚总是和肉体有关。对快感的追求，坦率地说，最终引诱我们创造了一整部关于人的历史。快感是历史最大、最终的动力——不管是有关善的快感还是关于恶的快感。在这里，我宁愿用"快感"代替钱先生的"快乐"，因为快感较之于快乐很可能是一个更具包容性也更适合人的禀性的说法（快乐只是快感的一种）。而在获得快感的众多方式中，毋庸置疑，性快感差不多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江湖骗子、伟大的流氓、本世纪最深邃的思想家弗洛伊德，直言不讳地说，性快感促成了人类所有的创造性事业。换句话说，原子弹、氢弹只是性快感的轰然爆炸，飞机、宇宙飞船则是性快感的飞翔形式，贪污、腐败恰恰是性快感的丑陋表达，音乐、美术、诗歌仅仅是性快感的艺术载体罢了……而美国佬威廉·福克纳明显不同意弗洛伊德的见解。福克纳说，人不能一天八小时做爱，只能一天八小时地工作。这中间的原因被一个叫做米兰·昆德拉的捷克刁民揭示了出来。昆德拉在其长篇大著《不朽》中不无悲哀地说，把人一生的性快感全部加在一起，也顶多不过两小时左右。快感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是一个可以用时间来量度的概念。而用金钱来量度快感，作为快感的现代特征，我们稍后再说。它比钱锺书所说的"几分钟"要长，也比钱先生说的"几天"要短。在谈到快乐时，钱先生引用了法国作家维尼（Vigny）的说法。维尼说，

在法语里，“喜乐”（Bonheur）这个词由“好”和“钟点”拼成，可见好事多磨，只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而在汉语里，快乐一说也恰好标志出“乐”实在是消失得太“快”，在我们还没有过瘾的时候，它就迫不及待地逃逸了。“停一停吧，你真美丽！”浮士德的遗憾是整个人类的辛酸。想想看，如果人能一天八小时做爱，一天八小时享受性快感，快感恐怕也就没有多少乐趣可言了。

弗洛伊德的深刻在于：他给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以快感维度上的解释；也就是说，他把哲学家们的神圣观念给低俗地肉体化了。这当然会让道貌岸然的历史哲学和各种型号的乌托邦大感难堪，它们的破口大骂（当然，在它们眼里这叫做“批判”）是可以想见的。给弗氏戴上“江湖骗子”“流氓”等大帽子可谓明证。弗洛伊德的错误恰恰在于：他把性当作了唯一的快感，他把性快感的作用给无限地夸大了。就这一点而言，我赞同弗洛伊德合该挨骂。

没有必要在这里像学究一样去论证快感在指引人类前进这一真相。我只想说，如果阉割了所有的快感，人类是否还有历史，是值得怀疑的，或者至少不是今天已知的历史——那样的历史在我们的想象之外。道家堕落为仙道后，渴望长生和成仙，在许多人那里是一个辉煌的前景。其实，这也是许多看似不同的宗教的共同特征——从快感的维度观察就更其如此。佛教讲“极乐”，基督教讲“天堂之乐”，其实都是快感的意思。只不过在极乐和天堂之乐中，快感是随时的、随身的、每时每刻的。这就很可能意味着，追求每时每刻的快感（快乐）是人的最大欲求，也是所有乌托邦之所以有吸引力的根本之处。浮士德的辛苦、辛酸经历说明了这一点。《喻世明言》卷十三讲，张道陵为了试探赵昇求道求仙的决心，

派了一个美女去诱惑他，但被赵昇拒绝了。美女大惑不解，遂题壁留诗："美色人皆好，如君铁石心。少年不作乐，辜负好光阴。"赵昇看后大笑道："少年作乐，能有几时？"唐人施肩吾诗曰："夜静门深紫洞烟，孤行独坐忆神仙。三清宫里月如昼，十二宫楼何处眠？"（施肩吾：《清夜忆仙宫子》）也是从道家、道教，颇富想象力地一下子扯到了宿花眠柳。道家和宿花眠柳有关系吗？当然。赵昇大笑后的回答回答了这一问题。毫无疑问，这正是钱锺书所谓"希望它（快乐）留"，并且永远能"留"的真正含义。

2

追求快感是人的本能。性快感较之其他所有形式的快感是最强烈的，因而也就显得格外吸引人。《白雪遗音》记载着这样一首民歌：

> 情人爱我的脚儿瘦，
> 我爱情人典雅风流。
> 初相交就把奴家温存透
> ……
> 象牙床上，罗帏悬挂钩，
> 哎哟咱二人今晚早成就。
> 舌尖嘟（堵）着口，哎哟情人莫要丢，
> 浑身上酥麻，顾不的害羞，
> 哎哟是咱的不由人的身子往上凑。
> 凑上前！奴的身子够了心不够！

（《情人爱我》，《白雪遗音》卷二）

从不绝如缕的“哎哟哎哟”声中，我们可以知道，民歌中那位“奴家”很了解快感瞬时即逝的特性和快感的强度。但我们人类对性快感的误解，长期以来却是普遍的。虽然屠龙曾感叹过：“男女之欲去之为难者何？某曰：道家有言，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以此，则其根也。根故难去也。”（屠龙：《与李观察》，《白榆集》卷九）话虽如此，但中国人一向是排斥性的，尤其是到了理学大倡的时代。朱熹煞有介事地大声疾呼：“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所以要“革尽人欲，尽复天理”。（《朱子语类》卷十三）说得冠冕堂皇、痛心疾首和振振有辞。但我们的准圣人朱夫子做得又如何呢？据他的同僚叶绍翁揭发，老朱算得上人欲太强，不仅“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偕行”，并且“冢妇不夫而自孕”。三纲五常看来是管不住他的了。叶某人强烈要求皇帝治朱老夫子的罪（叶绍翁：《四朝见闻录》丁集，“庆元党”条）。朱熹对此供认不讳，向皇帝谢罪说：臣乃“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识明时之用”。（《朱文公文集》卷八五）不过，我倒觉得，与朱熹提倡理学比起来，他一生中最伟大、最闪光的行为，恰恰是他的淫秽举动：因为这意味着他归根到底还算一个活物。谢天谢地，他到底还没有成为圣人！

朱熹的例子更加证明了屠龙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前车之鉴并未成为后事之师。在漫长的历史上，我们曾搞出了多少关于性快感的清规戒律啊。一份叫做《十戒功过格》的文件恶狠狠地说：“遇美色流连顾盼：一过；无故作淫邪之想：一过；淫梦一次：一过；淫梦而不自刻责，反追忆摹拟：五过；有意与妇人接手，心里淫淫者：十过。”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圣经》上的同一腔调：“你们听见有话说，‘不许奸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女人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而在另一份相类似的文件中，则又号召人民，要“不久视美人”，并不惜记“五功”作为奖赏（《太微仙君功过格》）。仿佛崇祯皇帝对袁崇焕说，只要你堵住了胡人的进攻，朕不惜加官晋爵之赐。这就是说，人人都应该来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人人都该去做清心寡欲的柳下惠。这是不是就是儒家倡导的那个叫做“慎独”的玩意儿呢？当然，它肯定就是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City of God）里说过的话：“无论性欲在何处起作用，它本身就感到羞耻。不用说强奸时要寻找法外之网的黑暗角落，就连世俗社会中合法的卖淫也是如此。”“世间最无耻的人也知道这件事是羞耻的；他们无论多么喜欢此事带来的愉悦，也不愿将它公开。”

奥古斯丁有一点是对的。人追求快感的天性怎么着也禁绝不了：哪怕是在“法外之网的黑暗角落”，哪怕是以抛头颅洒热血为代价。想想“沉河”、挂破鞋游街的史不绝书就可以了。而让人倍感神奇的是：对快感偷偷摸摸的追求，无意中构成了人类历史进程的真正动力。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历史就是偷偷摸摸的产物呢？按照基督教的看法，圣母玛利亚是感上帝之灵而受孕的。假如我们以最无耻的方式去揣度，那上帝之灵，不就是上帝他老人家的神圣精液吗？据说，人类就这样诞生了，历史的车轮就这样成功点火了。这就意味着，历史在它的发端处是一场伟大的圣交。人作为上帝之子，圣交当然谈不上。因为圣交只是上帝的专有方式，人无法拥有这样的高度；而且，圣交只是一次性的，它不可能被重复，连上帝本人也不能例外。如果上帝在春情萌动时想来一次例外（以破坏他自己定下的世界法则为代价），那就意味着将有另一部关

于另一种人的历史，完全在我们的想象之外。上帝有没有这样的雅兴呢？恐怕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而我们这种俗人，没说的，就进行俗不可耐的男“欢”女“爱”吧。人的交配，可以看作是对上帝圣交的拙劣模仿。“欢”“爱”产生了无穷尽的、一代又一代的上帝的子孙：是他们使人类的历史不断续写下去。而快感在这里边起着支点、杠杆、润滑剂的作用——要是没有快感，人还会去做那无用而又费力的无聊交配吗？偷懒、省力也是我们人类的天性之一。快感是诱使人类不断书写自身历史的主要动因。一位叫康明斯（E. E. Cummings）的美国诗人对人类听从上帝旨意的男欢女爱，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的描摹：

May I feel said he

我可以抚摩你吗他说

（I'll squeal said she

我会叫的她说

Just once said he

就一次他说）

It's fun said she

那么好的她说

（May I touch said he

我可以抚摩你吗他说

How much said she

多少次呢她说

A lot said he

很多次他说）

Why not said she……

为什么不呢她说……

这就很有点像《白雪遗音》里那位“奴家”的味道了。中西合璧指的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很有趣，不是吗？

既然性交——不仅仅是作为生殖，即道学家所谓“为后也，非为色也”，而且是作为快感本身，对人类历史有如此大的作用，那我们就得承认袁枚的话是正确的。袁子才说：“惜玉怜香而心不动者，圣也；惜玉怜香而心动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兽也。”（袁枚：《子不语》卷一一）是人，而不是“圣也”和“禽兽”组成了人类史，这一点，怕不会有什么疑义了。时至今日，我们对此又弄懂了多少呢？

3

“我叫曼娜，现在我来为大家叙述一个我的亲身经历。忆起往事觉得非常有趣，我的经历大概和每个少女是一样的，希望各位读者能够从我的经历中得到乐趣……”这是一部曾经以手抄本为形式，流传在“文革”后期的声名赫赫的淫秽小说的那个著名开头。它在以快感（“乐趣”）招徕读者。这本名叫“少女之心”的小册子，其真实作者已经很难稽考了。我曾经看到过好几种不同的手抄本，其内容都有不同程度的变更。我想，不同的抄者恐怕都会依据自己对快感的需求，进行多多少少的添加和改动，因为对欲望和快感的需求，在不同的人那里，总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据诗人西川回忆说，那是一本“越抄越黄”的书。很显然，西川肯定看到过不止一个版本。在印刷业已经高度发达的时代，以手抄本为形式，

来传达人民欲求的民间创作，还真实地存在着，并且这一天还远没有过去。而在那个禁欲的年代，有多少人看过《少女之心》并为之激动不已呢？这恐怕永远都是一个谜了。

我最初看到它是在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在川北那间借住的小屋子里，我度过了一个狂躁、灼热、惊讶、恐惧和热血沸腾的夜晚。它勾起了我早已成熟但自己几乎毫无察觉的性意识。我是在《少女之心》的辅导下开始性启蒙的。我得承认，我既觉得金圣叹所谓雪夜读禁书的确十分有趣，堪称"不亦快哉"，又觉得恐怖和罪过。它为我打开了一个神秘的世界，有很长一段时间它让我想入非非，让我浑身充满了犯罪的快感。犯罪很可能是美好的，那是我当时的结论之一。这是因为犯罪带来了普遍的快感。

余生也晚，在我八岁时，"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华国锋充满复杂意味的腔调中宣布"胜利结束了"。但我仍然会很容易想象得到，在那个普遍禁欲的年代，在性快感被普遍剥夺的年头，《少女之心》带给人们的肯定是巨大的震动，当然，也是庞大的打击。我想，凡是在革命的间隙有幸看过那本书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肯定会被《少女之心》中那种种赤裸裸的性描写吓坏了。因为它带来的强烈的犯罪快感，和革命带来的神圣快感反差何其巨大。性快感是令人恐怖的，这是不是革命派生的定义之一？

"我叫曼娜，现在我来为大家叙述一个我的亲身经历……"《少女之心》在一开始就是犯忌的，因为革命不允许以第一人称单数的形式出现，只能是"我们"。和卡夫卡说魔鬼是一个复数一样，一切革命也是以复数为单位来现身的，至少在它的宣言里就这么讲。很久以来，我都

无法明白，革命为什么会厌恶性、排斥性呢？在八个样板戏中，男人都没有妻子，女人都没有丈夫，她 / 他不是死了，就是不准备恋爱、结婚，野合就更不用说了。在革命眼里，野合完全不可想象。而床作为道具，是绝对不允许出现在戏剧场合的，因为按照罗兰・巴尔特的理论，床的所指是男欢女爱，那让人惊心动魄的快感，与革命无关的另一种快感。但它注定会分散革命的注意力。可以设想，李铁梅要是活到今天，很可能还是单身女贵族；而李玉和会续弦吗？“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沙奶奶会按照人性的欲求，来一次美妙的黄昏恋吗？阿庆嫂的丈夫阿庆会回来吗？可即使续弦了、黄昏恋了、回来了，我们那场伟大戏剧的导演，会给他们在舞台上设置一张床吗？可以想见，这些都是革命的遗留问题……

革命对此却有另外的看法。它的看法最早体现在一本叫做“礼记”的书中：“故君子远色，以为民纪。故男女授受不亲。”“寡妇不夜哭。妇人疾，问之，不问其疾。以此坊（防）民，民犹淫佚而乱于族。”（《礼记・坊记》）即使拴一根细线在手腕上以听脉诊病，也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看来“刁民”是“防”不住的，因为性快感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革命记住了《礼记》的提醒；它因此产生了另一套理论：用革命带来的神圣快感去置换性带来的下流快感，如同革命能依靠它神圣、巨大的号召力，将乌合之众聚集起来并排队冲锋，把分散的、缺乏方向感的力集合到同一个方向。这就意味着，当普遍禁欲的年代来临时，人追求快感的本能依然在起作用，它的巨大能量能使革命稳步向前，并持续在一个又一个接踵而来的高潮中：革命的高潮代替了男欢女爱的高潮。当人们不能合法地追求性快感时，追求革命带来的神圣快感就不仅合法，而且也

就是最后的代用品了。神圣的革命快感，只是肉体的、下流的性快感的代用品，这可能就是革命的又一派生定义：弗洛伊德的理论在这里依然有效。红色代替了黄色。这不是开玩笑。乔治·奥威尔对此颇有体会，他在《一九八四》中说："党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防止男女之间结成可能是它无法控制的联盟关系。党的真正目的虽然未经宣布，实际上是要使性行为失去任何乐趣。无论是在婚姻关系以外还是婚姻关系以内，敌人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情欲。党员之间的婚姻都必须得到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委员会的批准，虽然从来没有说明过原则到底是什么，如果有关双方给人以他们在肉体上互相吸引的印象，申请总是遭到拒绝的。唯一得到承认的婚姻目的是，生儿育女，为党服务。"革命在引导我们走向胜利，在引导历史走向辉煌；可革命的最大助力恰恰是男欢女爱，而且是被它排斥、贬损的肉体之乐。革命最终是离不开肉体和快感的。革命排斥性、厌恶性又离不开性，较之于朱熹虚伪的理欲之辨，较之于《礼记》的迂腐提醒，的确要高明得多。

奥威尔说，他的女主人公裘利亚，是了解革命在性快感方面搞禁欲主义的内在原因的，这是因为"性本能创造了它自己的天地，非党所能控制，因此必须尽可能加以摧毁。尤其重要的是，性生活的剥夺能够造成歇斯底里，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可以把它转化为战争狂热和领袖崇拜"。裘利亚一语道破了天机，她说："你做爱的时候，你就用去了你的精力；事后你感到愉快，天塌下来也不顾。他们不能让你感到这样。他们要你永远充满精力。什么游行，欢呼，挥舞旗帜，都只不过是变了质、发了酸的性欲。要是你内心感到快活，那么你有什么必要为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等等他们这一套名堂感到兴奋？"我们得

说，裘利亚是一位伟大的智者，因为她洞悉了革命与性之间的一切秘密。革命排斥性，仅仅是因为性既让人浪费了革命精力，又让革命难以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样板戏里还可能有床吗？

伯特兰·罗素在《婚姻革命》里认为："在那些非常淫乱的社会里所以会产生禁欲主义"，正是性放纵导致了普遍的厌倦感。罗素显然不明白性欲与革命的内在联系。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反向切入罗素的命题呢？事实上，淫秽、肮脏、下流、煽情的《少女之心》，在"文革"后期广泛流传，仅仅是性快感被剥夺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人们的快感追求发出的一声反抗之音罢了。这也就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要表达的意思。他说，裘利亚和她情人的"拥抱是一场战斗，高潮就是一次胜利。这是对党的打击。这是一件政治行为"。据《南方周末》报道，《少女之心》的原始作者为这本被众多的人篡改过的小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位作者至今心有余悸，拒绝会见任何采访者。她想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她的反抗是一种政治行为。是的，至少革命就是这样看待她的，因为她削弱了革命的战斗力。

4

《少女之心》发出了一丝丝反抗之音，裘利亚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预言了它的出现。但《少女之心》的作者和裘利亚恐怕都忽略了一点：革命的确还有离不开性的一面。这里涉及一个性快感的重新分配问题。

上帝那次辉煌的圣交，可以被视为性快感的原始生产。这就是说，上帝是通过模范带头作用，把性快感的生产能力平等地赋予每一个人。经过漫长的群居、群交的性共产主义时代之后，性快感很快地走入了私

有制。宗教、理学、革命、各种清教禁欲学说，在除了裘利亚已经指出的那种原因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功能：为性快感的私有制辩护。性快感的私有制意味着：快感的总量是一定的，就如同《等待戈多》里那位波卓老爷说的，这个世界上的眼泪的总量是一个常数，有一个人哭，就一定有一个人不哭；正因为其总量的恒定性，所以有必要把性快感以制度化的形式集中起来使用，或者作第二次分配。生产和分配总是连在一块儿的。马克思要从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一看似俗不可耐的维度，去建立自己的伟大学说，的确是独具慧眼。宗教、理学、革命及各种清教禁欲学说，在这一点上，充当了准上帝。它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在认为必需的时刻将一定量的性快感发放给必需的人群。这一点实际上已经被裘利亚说出来了："生儿育女，为党服务。"而超过这一戒律范围的所有行径，都要遭到惩罚。惩罚就是对越轨的抚摩。《少女之心》只在民间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不过是这一惩罚较为斯文的形式而已。这当然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但它的确并不可笑。

性快感的第二次分配，注定会使关于性的话语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这一点可谓不言而喻。还是奥威尔说得最妙，他说，在"老大哥"的世界里，人们说话遵循着"新话的原则"。而新话的原则是，"除了肯定是异端的词要取缔以外，减少词汇数量也被认为是目的本身。凡是能省的词一概不许存在。新话的目的不是扩大而是缩小思想的范围，把用词的选择减少到最低限度间接帮助了这个目的。"性的丰富体验需要各种精微的词汇，这显然有违新话的原则，减省当在可以想见之列。比如说，你能在社论、政府文件、革命纲领、清洁的精神中，找到用于床头描写的那些丰富的词汇吗？即使有，也是千百次过滤后的产物。这就是说，

那些词汇是抽象的，是没有细节因而显得孤零零的，是带有总结意味的。而我要说，总结实在是太过残酷了一些。总结往往就是判断：一方面，它超越于细节，省略了过程，而只有过程和细节，才包纳了我们普通人的一切辛酸、屈辱及对快感的庞大体验；另一方面，它又要从它自身的需求出发，去“发现”可用于判断的细节，这种发现又往往具有双重性——首先是否定，毫无疑问，这当然残酷；紧接着的肯定也同样残酷，因为这种肯定同样意味着否定，因为在总结中，肯定只是陪衬。一大堆表彰的话语之后的一个“但”字说明了一切。否定是先在的。不能把肯定当成先在的，因为在总结门下，只有否定。总结自始至终都遵循新话原则。正是在这种近乎残忍的总结下，《少女之心》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现身。

米歇尔·福柯说过，性的放纵与上帝之死有极大的关系。他说：“正是‘放纵’发现了性与上帝之死系于同一体验。”考虑到福柯一向的精辟，他在此处的失言就是很令人失望的了。他显然忘记了，还有那么多的准上帝还活着哩。它们的寿命还长着哩，至少到目前还没有一丝衰败的迹象。而我们是需要上帝的，哪怕是伏尔泰所说的人造的上帝。所以，真正的放纵要么在民间是偷偷摸摸的——比如《少女之心》曾经激起的暗中的、广泛的震动；要么就在高层人士那里明火执仗地进行——性快感的第二次分配，不管是以革命的名义也好，还是以理学的名义也罢，都促成了性快感上的特权阶层。这一点容后再说。

有一种变了形的特殊的分配方式——我把它称为性快感的租借方式——尤其值得提一提。这就是被大智大慧的中国古人列入三十六计的美人计。美人计起源于何时，我正等着考古学家拿出明确的证据来。不过，我们可以预先在这里说，武王伐纣之所以能成功，妲己的功劳至少

在半数以上。关于这一点，连正统的司马迁也没有否认——去看看《史记》是怎么说的也许就明白了。这恐怕算得上历史上最有名的美人计了。西王母假充端庄，纣王不过是向她表达了一点想“入”非非的爱慕之情，就不惜以美人计来惩罚纣王。这一举动对纣王来说是美好的，可对人民来说就不那么美好了：纣王毕竟还暂时性地租借到了性快感，虽然他最后以江山付账；而死于妲己卖弄风情的比干，特别是那无数不知名的老百姓呢？我们都不记得了。总之，他们是君王胯下的牺牲品，他们是供奉君王性快感的牺牲。这一点想来不会有什么疑义了。周朝之所以能代商朝而起——据说那也是一次革命，革命的“革”被似是而非地当成周的先祖在局子里边搞出的一个卦象——的确得力于快感这块“方糖”的引领。至于越人用西施搞垮了吴国；王允用貂蝉弄死了董卓；王昭君听了汉家皇帝的话，睡了老单于又睡小单于；杨玉环不守妇道，跟了皇子又跟皇帝，并让大唐由盛而衰……则更给性快感的租借方式增添了光彩，加添了内涵——她们被一贯擅长意淫的文人们称为四大美人。凡此种种，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至少有一半是在床上进行的；革命本身在禁欲、贬欲的同时，早已天然地沾染了精液和白带。好笑的是，这也就是李敖满怀笑意提醒国民党高层人士时想说的话：你们大权在握，“牵一屌而动全身”，可要千万当心啊。宗教、理学、革命、各种禁欲学说，它们在推进历史按它们的旨意前进时，决不会吝啬快感。它们大方得很。它们有的是存货。

租借的内在含义是：那些东西我还要收回来。西施重归了范蠡，貂蝉回到了吕布怀抱，杨贵妃是被玄宗自己赐死马嵬坡的而不是别人，只有王昭君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实在让人有些遗憾。不过，租了人家

的房子誓死不还也是人的本性，有借有还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东西——你见过还荆州的刘玄德吗？这也是我们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内在原因，丝毫没有这大惊小怪的必要。

长期以来，《少女之心》被我们那些追求“清洁的精神”的人士们给普遍误解了。按照《太微仙君功过格》的看法，《少女之心》犯了“无量过”。其原因据《远色编》说就是：“夫淫为万恶首，今则不顾廉耻，乱用心思，撰此淫书，坏男女之人心，败天下之风俗，是自居首恶，并陷他人于首恶也。”《少女之心》，这个淫秽的文本，这个犯了“无量过”“陷他人于首恶”的文本，虽然一句也不曾提到革命，从头到尾只有赤裸裸的男欢女爱场面；但是，凡是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人其实都知道，它的背后恰恰是巨大的革命，只不过其尊容不让我们窥测罢了。革命有时候就拥有上帝的形象，它是无形的；就像上帝偶尔向摩西显露一下自己的真容——上帝说：“我是阿尔法，我是亚米加，我是初，我是终”——革命也会在我们怀疑它的存在时，给我们抖抖它的威风。革命的威风无处不在。《少女之心》的重大含义恰恰是：老百姓可以以偷窃的方式，去破坏性快感的分配原则——既然分配到的定量，远远达不到果腹的程度。这也许就是“无量过”的现代含义吧。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破坏了分配原则，也会引起另一场革命呢？《少女之心》在来不及谈到这一点时就结束了，另外一个人却谈到了。

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在写到“文革”中的造反派时，有一个会心的描写。说的是“偏向虎山行战斗队”本来好好的，副队长卫东、卫彪两人却为了一个叫路喜儿的土匪后代闹起了分裂，两人大打出手后，卫彪败下阵来。卫东一人包揽了喜儿柔软、乳峰高耸的身体。

卫彪一怒之下，转而成立了“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反团”，要和“偏向虎山行战斗队”对着干。性快感分配原则的破坏，引起了革命的质变，引起了对革命的重新思考，也引起了革命局势的大改变，这当然不是刘震云在开玩笑。想一想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而引清人入关就行了。战斗队队长，一个叫赖和尚的家伙（他自称是一位“老革命”）十分恼火，把副队长卫东骂了个狗血淋头：“都是因为你，为一个小 ×，逼走了卫彪，让村里多了一个造反团。你看咋办吧？！”很显然，赖和尚尽管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筐，却十分了解性快感的分配原则和革命形势的关系。一旦性快感的分配原则被打破，新的革命形势和方式就会出现，这的确是革命有意没收性、把性集中起来使用和再分配的最原始考虑。

5

性快感上的私有制注定会导致快感上的特权阶层。齐宣王坦率得很可爱，他对远道而来的孟子说：“寡人好色。”孟子为了说服齐宣王实施自己的王道主张，就因势利导：大王的这一爱好，与我们臣下是一样的啊。（《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想说而未说的话现在记在下面：拥有了各种特权的人，也就拥有了和老百姓不一样的性快感分配原则；你大王的好色，自然可以妻妾成群而不费吹灰之力，老百姓就只有“放死无匹”或来一道“怨女”“旷夫”的小菜了。

由孟德尔、摩尔根开创的现代遗传学派，从基因的微观角度证明了，男女出生的比数是一。这就从科学上验证了我已经说过的话：在这个世界上，性快感的总量是一定的。但是，对快感的追逐，却让我们始终具有尽可能多地占有快感的脾气，这就给快感特权阶层的生成准备了巨大

的、“合乎人性”的原因。需求总是产生理论的最大动力。在历史上，为快感特权阶层寻找他们可以成为特权阶层的理论何其多样。且听《盐铁论》的分解：“古者，夫妇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后，士一妾，大夫二，诸侯有侄娣九女而已。今诸侯百数，卿大夫十数，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桓宽：《盐铁论》卷六）《盐铁论》对此基本上持默认的态度，虽然它也承认，这可能会造成“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匹”。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说汉光武刘秀“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其潜台词不过是，在“寡人好色”的前提下，怨女旷夫的快感有否并不重要。在性快感的私有制里，特权阶层和普通百姓遵循着不同的分配原则——寡人先好色了之后，再分配给你们。所以才有“当今之君，其畜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墨子·辞过》），也才有襄公的“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千”（《管子·小匡》）……你说牛皮不牛皮？

考古学家早已告诉了我们，最迟从汉代出土的文物中，已经找到了男性的性器具。据考古学家估计，它很可能就是男性生殖器在无能时的代用品。我觉得这种推断合情合理，因为快感特权阶层的阳物，并不见得就比“放死无匹”的小老百姓的阳物有更大的能量。心有余而力不足之后，自然会在身体之外寻找延伸品——儒家的“反身而诚”在这里不管用；这就如同人因此而创造了上帝，革命在低潮时按斯大林的说法，可以暂时向强盗妥协。《金瓶梅》在极尽西门庆疯狂追逐快感之能事后，也写到了西门庆的阳物有魂归西天之时，可谓明证。第八十回中，水秀才做了一篇悼念西门庆的祭文，这篇祭文可以看作对西门庆那话儿（其实，他本人就是那话儿）的热烈颂扬和无尽悲哀：

> 维灵生前梗直，秉性坚刚，软的不怕，硬的不降。常济人以点水，恒助人以精光。囊箧颇厚，气概轩昂。逢乐而举，遇阴伏降。锦裆队中居住，齐腰库里收藏。有八角而不用挠掴，逢虱虮而瘙痒难当。受恩小子，常在胯下随帮。也曾在章台而宿柳，也曾在谢馆而猖狂。正宜撑头活脑，久战熬场，胡为罹一疾不起之殃？

西门庆当然是属于《盐铁论》所谓“富者盈室”的那一类特权阶层。我们说，西门庆是悲壮的，他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小车不倒只管推了。因为据《金瓶梅》揭发，他是死在潘金莲的秀腹上的。西门庆的悲壮在于，他几乎完全做到了《哈哈笑》里记载的那位叫“赛柳庄”的相士，在“相下部”时所说的话：“遇妻妾而无礼，因子孙之有功。一生耿直，两子送终。”这也难怪水秀才对他有如此高的评价了。

我们还没有理由去讽刺西门庆，因为他至少还物尽其用，享乐一生。最令人讨厌的是，性快感的私有制制造了一大批性快感的死物。想想《阿房宫》里那些终其一生也没有机会见到秦始皇，更没有机会和他上床的妃嫔们吧。她们就是死物。这也就是《后汉书》记载的，达官贵人们尽管“采女数千”，“且聚而不御，必生忧悲之感”（《后汉书·陈蕃传》）。这可以描述为：性快感不仅可以享用、占有，而且还可以储存。“储”而不“用”（御），恰恰是最大的残忍，因为它的剥夺是双重的：既让女人成为性死物，也给男人造成了普遍的饥馑。当然也有相反的事例。据记载，“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太子蒯聩献盂于齐，过宋野。野人歌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太子羞之。”（《左传·定公十四年》）（后两句今人译为：已经满足了你们的母猪，何不归还我们那漂亮的种猪？）山阴公主对她的皇帝兄长说：“妾与陛下虽男女有

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皇帝于是给妹妹弄了三十个面首以供享用。（《宋书·前废帝纪》）事例虽然相反，但造成的剥夺仍然是双重的，只不过这是一个相反的双重。

《少女之心》正是在这一点上起到了反抗的作用。它的诲淫诲盗，恰恰是想从不同的分配原则那里，求得相同分配的权利。而革命会造成荒淫吗？有关这一点，阿Q是最明白的！吴妈的脚太大、小尼姑过几年再说……这都是革命胜利的第二天该考虑的问题（丹尼尔·贝尔：问题总是出现在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在禁欲的年头，普遍的荒淫仍然存在着。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其肉麻、淫亵连林立果都听不下去。只有一个叶群、一个吴法宪、一个阿Q吗？我们有理由表示怀疑。《少女之心》在其后“越抄越黄”的过程中，更加强了这一反抗——方法就是“越抄越黄”。顺便提一下，令人遗憾的是，传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男性化的过程：虽然还是以女性第一人称的口气说话，整个描叙过程的腔调却是男人。也就是说，男人在以想象女人的无耻来叙说自己的欲望。这真是女人的悲哀。

6

绣像本《金瓶梅》中，有一张插图是这样的：在一扇纸做的屏风后，有一个木制的大浴盆，盆里是热气腾腾的洗澡水和赤身裸体的潘金莲与西门庆。两人相对而坐，潘金莲迷糊着双眼，脸上呈现出快乐的表情，两手轻靠在狭窄的浴盆边上；而此时西门庆那巨大的、明显带有画匠夸张色彩的男根正在猛烈撞向潘金莲的私部。如果《拉奥孔》的作者看了这幅画，会下结论说，这正是富有动作“包孕”的时刻；而如果他仔细

观察了这幅画，肯定还会加上一句：这个富有“包孕”的时刻是没有支点的。原因明显出在潘金莲那双有气无力的、撑在浴盆边的手上：一面要接受西门庆迎头而来的猛烈撞击，一面却又是狭窄、滑溜的盆边和孱弱的小手。散架是可以想见的结果。换句话说，这个富有“包孕”的时刻在生活中是不大可能的，或者是异常困难的。

我宁愿把这幅淫亵的春宫图看作一个隐喻：它象征着中国人的男欢女爱几乎从来都没有支点。在一个性快感被普遍占有、储藏和重新分配的国度（这并不是革命的后果），性行为要么被看作“为后也，非为色也”，要么就仅仅是把女人当成性快感的巨大库藏，可以开发，可以利用，自然也可以创收。《少女之心》也许最初的确是一位少女写成的，而在其后“越抄越黄”的过程中，明显就带有了男人的口气，其中的缘由不证自明：男人以想象女人的疯狂、无耻，来映射自己在快感方面的疯狂追猎。女人在性快感方面的求索中，明显处于受歧视的地位。佛说：“芙蓉白面，须知带血骷髅；美貌红装，不过蒙衣漏厕。”毫无疑问，这是对所有登徒子们的提醒，而不是针对女人——佛对女人很可能是不屑一顾的。《肉蒲团》第三回写到初婚的玉香时，有一个十分传神的描写：“却说玉香小姐姿容虽然无双，风情未免不足”，“只因平时父训既严，母仪又肃，耳不闻淫声，目不睹邪色，所读之书不是《烈女传》，就是《孝女经》”，所以，即使丈夫对她说些调情的话也会满面通红，到了“夜间干事，虽然承当”，“行房套数只好行些中庸之道，不肯标新立异。要做‘隔山取火’，就说是犯了背夫之嫌。要做‘倒浇蜡烛’，又说倒了夫纲之礼”。这里边不仅仅是个男权问题。更重要的是，从《肉蒲团》对玉香的白描式写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她那愚昧、不知快感为

何物的、振振有词的躲避动作，不正是潘金莲靠在狭窄的浴盆上那无力的双手吗？——玉香是没有支点的另一种版本。

邓之诚则从相反的角度记载了又一个没有支点的实例。他说的也是一幅春宫图："前世之图秘戏也，例写男女二人相偎倚作私亵之状止矣。然有不露阴道者。如景玄创立新图，以一男御一女，两小鬟扶持之；一侍姬当前，力抵御女之坐具；而又一侍姬尾其后，手推男背以就之。""手推男背以就之"就不用说了，它分明指的是，一方面，性快感的特权阶层在享用性快感时，连力气也是舍不得花费的；另一方面，这不也恰好能获得更多的性快感和成就感吗？那位"力抵御女之坐具"的侍姬，我们可不可以说，正是画匠（景玄）在意识到没有支点的危险境地时，临时加添上去的呢？我赞成说是。

正是这样，我们对女人的误解是深刻和普遍的，而美人作为从所有女人中被挑选出来的极少数，受到的误解尤其深刻。诗人臧棣有两句诗是这样的："对美貌必须实行高消费 / 这已经没有秘密可言：像今年的通胀指数。"（臧棣：《神话》）这两句诗恰好以反讽的口气，道出了男人和性快感私有制对美和美人的误解。在男人眼里，美人只是一个数学问题。这种误解的真正来源就是那个"支点"的缺乏问题。

最大的误解，那支点缺乏问题最极端的实例是为美而展开的战争。特洛伊之战就不用说了，这是两个伟大的古代欧洲国家，为了美丽绝伦的海伦展开的一场长达十年的血腥搏斗。这场战争促成了许许多多的英雄和可歌可泣的悲壮事件，但人们普遍地忘记了，真正促成这一切的是美和美人。美人的出现是上帝钟爱人类最大的慈悲证据。他派美人来到世间，是为了给世间增添光彩，给世间平添美的享受。美人意味着人间

还有珍贵的事物，人间还值得我们活下去。美人是公众参拜的圣物，不是床头的玩物。“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我们就这样误解了上帝的旨意。老不争气的人类对美的最大欲求就是据为私有。美人引起了拐骗、得到者的惊喜和失去者的愤怒，以及得到者和失去者之间的仇恨甚至战争。可是，这一切和美人又有什么关系呢？美人同意为她们而打的战争吗？这是男人们从来也不管的问题。

不要去嘲笑洋人了，因为我们自己更无耻，我们也有自己的更加好笑的特洛伊之战。春秋时代的夏姬堪称绝色美人，为了得到她，那些被称为君和称为臣的各国特权大人物们彼此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不惜子杀父、父杀子，不惜背叛、出卖、告密，不惜掀起一场国际战争……和通常一样，又有无数炮灰成了性快感和对美色疯狂追猎的牺牲品（参阅《左传》“宣公九年”“宣公十年”“成公二年”等篇）。这是历史有一部分就是胯下产物的又一例证。在由夏姬引起的这场持久的战争中，一些国家兴盛了，另一些国家衰落或更加衰落了。此情此景，让许多后起的历史学家和无聊文人们有机会总结出一条规律：女人是祸水。这是对美和美人最深刻的误解。而当我们回首那些令人叹息的历史往事时，我们不由得想起了潘金莲那双小巧、滑溜、放在浴盆边的手。我们真替她担忧，因为没有支点的快乐肯定是不可信的。她的毁灭早已注定。男人、快感特权阶层的无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潘金莲们的毁灭命运。她们只有靠淫荡来度日了。

台湾诗人、作家余光中在一首关于江南的小诗里，提到吴越春秋之战时，称它是一场“美丽的”小战争。余光中的意思显然是：因为这中间有了西施。余光中是正确的。老不争气的男人们为了占有美、拐骗美，

也为了自己的误解美，发动了各种型号的无耻、肮脏、残酷的战争，它既毁灭了美，又毁灭了自己。而最终为他们增添光彩甚至充当辩护角色的，恰恰是那些从不拥有“支点”的美人。西施不是第一个；出于同样的原因，她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没有支点的男欢女爱以及产生这种情况的最深原因，构成了整个人类的历史。我们什么时候对美有了正确的理解，我们什么时候才算有了支点，我们才不会给男欢女爱赋予那么多无聊的属性，我们也才不会产生那么多屡禁不绝的“黄书”——当然，这中间也包括《少女之心》。但这一天会来临吗？我们拭目以待。

7

人类要想进步，快感本身是无法根除的；只要快感还有一口气，就注定会有人想尽可能多地占有快感资源。没有支点的男欢女爱，在可以预计的将来仍将持续。特权阶层，也就是那些拥有权力的大人物们，尽可以以权力为筹码储藏性快感享用品，这自然叫做没有支点；那些大富人则完全可以凭借其财富疯狂地收购快感享用品，这是不是也叫做没有支点呢？随便你。

妓女和妓院，作为“人性”的产物，就这样产生了。连奥古斯丁都说，如果把娼妓从人类事物中排除出去，那么淫欲就会玷污所有事物；如果它们降临到诚实的主妇们头上，那么耻辱和卑鄙将会使所有事物失去光彩。据说，托马斯·阿奎那发展了奥古斯丁的这一看法。他说，卖淫相当于海中的污物和一座宫殿的下水道，如果没有下水道，那么污物将会堆满整个宫殿；要是把妓女从世界上消灭掉，那么兽奸将会充塞整

个世界。很显然，两位西方圣人的话都是针对男人的无耻性而说的。圣雄甘地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披露，在他的晚年，为了考验自己，他故意让一位妙龄少女和自己同床。他悲哀地发现，尽管自己早已白发苍苍，面对温婉、娇柔的身段，仍然还有性冲动——柏拉图所说的老人之所以受人尊敬是因为他们没有了性渴望，在这里是无效的。甘地为此感叹不已。上述三位高洁之士的行为和语言可以互相补充、发明。

妓女从一产生就和钱结下了不解之缘。齐桓公之所以在宫中广畜妓女（参阅《战国策·东周策》），按清人的说法，这是“征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李敖鼓掌同意这个看法，并挖苦道：“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经费来源，部分却是吃软饭吃来的，实在不怎么光彩。”雅典执政官梭伦（Solon）为筹军费，竟然设立国家妓院，营业处就在爱神庙中。难怪李敖有一本书的名字就调笑式地取为“且从青史看青楼”。在我看来，还不如干脆就叫“且从青楼看青史”，也许要更合事实。上述特权阶层非常了解性快感和金钱之间的密切关系。在马克思眼里，这种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该怎么计算，它将遵循什么样的价值规律，肯定是值得探讨一番的问题。可惜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倾听马克思的高见了。

凡此种种，竟惹得德斯蒙德·莫利斯（Desmond Morris）在其大著《裸猿》里感慨万端地作出了更加深入的说明：在一个性快感被广泛重新分配的人类社会里，有了那么多的怨女旷夫，有了那么多追求性快感的“人性”，合理的出路必然是“窥淫狂症”。莫利斯是在最广阔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词汇的。他说：“就其严格意义而言，窥淫狂症指的是从窥探他人的交媾中获得快感，但从逻辑上讲其词义可以扩大，从而包括对于一切性活动作壁上观的兴趣，几乎整个人类都乐此不疲。”“这

方面的需求是如此巨大，以致我们不得不发明出一些特殊替身－男女演员——让他们为我们表演性行为的全过程。”这当然是一种更没有支点的意淫。意淫没有贾宝玉认为的那么高贵。而中国素有窥淫狂症的传统。想想《金瓶梅》第八、第十三、第二十三等回中，那些用舌头舔破窗纸以窥淫色、以听淫声的场面吧。这种种问题其实都出在中国的建筑特点上。梁思成先生用土木结构和砖石结构来区分中西建筑之不同（参阅梁思成：《中国建筑史》）；而更重要的区别被梁先生忽略了，那就是西人有广场而中国没有。但中国有宫廷和后花园，伟大的天安门广场不过是宫廷和后花园的延伸。在西方的广场上，年年都要举行狂欢节，它是宗教的放假，肉欲的集体的、合法的放纵——在此，福柯无疑是对的，他说：“正是放纵发现了性与上帝之死系于同一体验。”在狂欢节里，上帝死去了。而天安门广场只是古时皇帝阅兵、庄严庆典的宏伟场所（难怪一位低智商的当代理论家要以“广场”来界定中国那些老不争气的、想往庙堂狂奔的知识分子）。后花园和宫廷只适合窥淫和乱交：皇帝和皇后在床上哇哇怪叫的时候，却忘了还有无数妃嫔在想象自己就是那皇后，在与皇帝的“玉茎”——借用中国房中术的术语说——交接，也没有注意到更多的太监和宫女在表演“干夫妻”的买卖。天安门把这一功能给神圣化和扩大化了。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把韦小宝放在妓院里成长和放在宫廷中成就其伟业——小流氓韦小宝就很是在天安门广场操过几回蛋，的确十分了解宫廷和妓院的同一性。

本雅明说，妓女就是融商品和售货员于一体的人物。她自己出售自己。妓女是自食其力者。她们一直在走钢丝，因为她们在干着没有支点的买卖。从通常的意义上看，她们是可怜人。在答杨笠湖的信里，袁枚

说过一句话："伪名儒，不如真名妓。"名妓就不可怜了吗？想想李师师和杜十娘就行了。而伪名儒倒是受人尊敬！她们都是男性这个巨大买方和收购者群体的牺牲品。如今的情况是，只要是个女人，只要你愿意，都可以重操先祖旧业；在卡拉OK厅，在洗脚房，在桑拿池，在下等旅社……随处可见这些从未进行职业培训的人。据那些快感收购者们说，真是人心不古，连婊子也不如从前那么有文化、有修养、有情义了。他们也不想想，正是他们这伙人使买方市场无比庞大，以致这些秉承祖业的人都只好在岗学习。至于"没情义"云云，不就是因为她们见过了太多的没心肝的男人吗？是买方促成和生产了卖方，马克思的话是肯定有道理的；而那么多熟知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人——比如时时被媒体曝光的那些要员们——在卡拉OK厅的包间里显然忘记了马克思的教诲。这真是该打。

希罗多德《历史》第一卷记载了巴比伦的圣娼，说的是巴比伦人有一个"最丑恶可耻的风俗"：每一位妇女都必须和一位陌生男子交媾。这位男子在抛钱给她的时候要说这样的话："我以米利塔女神（Mylitta）的名字来为你祝福。"钱币的大小多少并无关系。当完成交媾后，这个妇女就算完成了神的旨意，从此以后，任你出多少钱也休想得到她了。这是钱与性快感最神圣的结合。巴比伦人了解金钱的妙用和局限。我想，如今这铺天盖地的快感收购队和出售快感的人都普遍地误解了金钱。钱能买到一切，差不多是供销双方都认可的真理。金钱在受难。而我们什么时候对金钱有了正确的理解和同情，我们什么时候才不会仅仅凭着金钱去收购快感了。时下正在流行这样一首民谣：

结婚是失误

离婚是觉悟

再婚是执迷不悟

没有情人是废物

情人多了是动物

动物行为学认为，动物在交媾时并无什么快感产生。这是动物的大幸呢还是大不幸？不管怎样，不要再把用金钱收购快感的人比做动物了，因为这肯定会侮辱了动物。对不会说话的畜生们，我们就一定有权利把屎盆子往它们头上扣吗？

袁枚说“伪名儒，不如真名妓”有一个前提：“妓中有侠者，义者，能文者，工伎艺者，忠国家者，史册所传，不一而足。”这几乎就是柳如是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妇’有责”了。不过，我们对那些在岗学习的人儿们，不抱产生真名妓的任何奢望。当然，也恰恰是这些“小”妓，才真正配得上如今这伙快感收购队员们那没有支点的行径。柳如是今天的确没有了，可那是因为钱牧斋比柳如是绝迹得更早。未来呢？子曰：如之何，如之何；佛曰：不可说，不可说。钟鸣则提醒我们：“未来的岁月将会更加夸张。”

1998 年 12 月，上海

那些实在难缠的问题

现在我们还能不能谈论灵魂?

自然科学与技术的愈来愈嚣张、愈来愈霸道，充分证明今天是一个不需要灵魂的年代，至少是一个灵魂必须遭到放逐的年代。因为自然科学与技术不需要涉及灵魂，有了灵魂它反而不自在。在今天，整个世界差不多都是灵魂的西伯利亚：寒冷、凛冽而又含情脉脉。即使是商品生产者号称自己的产品如何如何人性化、如何如何朝着人性化的方向努力迈进，事实最终都会证明，那不过是商品生产者在处心积虑之中，终于为产品找到了能够且必须更新换代的合法性。在现时代，更新换代既构成了资本运作的超级润滑剂，又极大地怂恿了越来越没有灵魂的消费者主动向新产品投怀送抱。技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从而找到了自己的生长点，加固了自己对人性的统治。

科学或许表征着人类求知、求真的激情，技术则纯然表征着人的欲望。在现时代，从任何一个角度看，技术都绝佳地满足了人类好逸恶劳、好吃懒做和热爱堕落的天性。欲望成了人的唯一灵魂或灵魂的主要部件。在今天，我们能够谈论的灵魂就是欲望。这在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那里得到了公认。

鉴于科学主义的巨大成就导致的科学 / 技术上的威风，人文社会学科愈来愈愿意向科学主义靠拢，试图把自己也弄成科学。有那么一阵子，人文社会学科的从业人员普遍相信，只要他们努力，就能搜寻到关于人的心理、行为以及灵魂的普遍公式，并由此理解甚至预测人的灵魂。20世纪法国的结构主义者是这方面的显著例证。他们肯定知道，那几条干巴巴的公式一定是以消除人的复杂性、丰富性为代价，其中就包括了他们自己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但他们或许不愿意承认，就在他们试图把握人的灵魂的时候，灵魂（甚至欲望）已经从指缝间悄悄溜走了。理由很简单，人文学术研究在向科学或科学主义靠拢时，必须依靠一个显而易见的预设：人类以及人类生活仅仅是个物质世界；认识人类以及人类生活可以像认识物质世界那样，得到人文社会学科的认识。在此，灵魂显然是一件不存在的事物。

过于张狂的分类学

分类学是现代社会得以成立的基础，也是现代人文学术的地平线。从历史主义的角度观察，分类学当然有它较为漫长的行进步骤——反正涂尔干（Emile Durkheim）对此已经有过极好的说明，不需要额外申说。分类学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明确区分各门学科的势力范围；它倾向于毫无遗漏地将所有事物划归到各个不同的栅栏里，以供不同学科解剖，从而提供各种尸检报告。它像我们时代发放营业执照的管理部门那样，明确规定了各门学科之间的疆界、各门学科的营运范围；它颁布了产品的检测标准、学术规范的条例等等。分类学事实上充当的是警察甚至是秘密警察的角色：它维护学术秩序，严禁各门学科的从业人员互相串行。

如有此等事件发生，从业人员将在第一时间内被视为犯规、违法。

没有任何理由不承认，分类学才是人文社会学科的真正统治者和管理者。尽管看上去不像那么回事，但事实上所有的从业人员都得臣服于这位暴君。偶尔出现的几位破坏者或起义者很快就被就地正法了。在现代分类学的治理下，非鸟非兽的蝙蝠显然是难以为生的。迎合着人文社会学科对科学主义的过度仰慕，分类学明目张胆地构成了解除灵魂的最大、最隐蔽的能源。这就是说，管理现代人文社会学科的两大法人，从来就是科学主义冲动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现代分类学。很显然，在一个分类学过于嚣张的尘世，随意谈论灵魂即使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起码也是一桩奢侈的事情。任何一个人文社会学科的从业人员稍加反思就会承认，分类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愿意怂恿各门学科谈论欲望，并将欲望分割成零散的部件，装在不同学科围成的栅栏里，以供不同学科解剖。在现代学术体制的帮助下，分类学极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分类学反对整体，因为整体是分类学的天敌。但这里的难题恰恰是：灵魂从来都是一个整体，因为我们显然不能说，这世上存在着“三分之一的灵魂”或“半个灵魂”，也无法说出灵魂的肠胃、灵魂的眼睛在什么地方，哪怕仅仅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虽然灵魂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个比喻，但现代分类学却有足够的本事仅仅将灵魂看作比喻。在我们这个时代，分类学唯一的仁慈是：它愿意将灵魂实体化为零散的欲望。

政治行为

科学主义冲动在人文学术研究中已经成为潜意识；作为现代人文学术的基准线，分类学同样被潜意识化了。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说，前一种

潜意识从方法论上促成了人文学术对灵魂或欲望进行简化，后一种潜意识则从制度上支持了这种简化。现代人文学术的两位统治者就这样勾肩搭背，保证了人文学术的正常运行。很少有人会怀疑，在今天的学术格局中，上述情形被视为理所当然究竟有什么不对。我们都听得出来，这恰好是潜意识最通俗的口吻，也是潜意识最自得、最自信的语气。很显然，现代人文学术在科学主义冲动和分类学的帮助下将灵魂或欲望进行简化，恰恰是一种既隐蔽又明目张胆的政治行为。我理解的政治十分简单：遵照“仁”的“二人”为“仁”的原始语义，只要有两个人存在，权利就存在；只要权利存在，政治和政治行为就存在。政治的本义是管理，而最有效的管理从来都是格式化的。正是存在着这一隐蔽的规律，视灵魂为最高职事的基督教也需要一个机构，而那个被称之为教会的机构始终遵循着格式化的管理模式。没有这一机制，规模庞大、历时久远的十字军东征就是不可思议的。

颇具讽刺性的事实恰好是，在科学主义冲动与分类学的严密控制下，人文学术对灵魂的简化刚好投合了政治的要求。它为政治迅速找到有效的格式化模式提供了暗中的帮助。在此，没有必要专门申说政府拨巨款向人文学者订购有效的格式化管理模式，因为这是御用文人的专利；即使是那些看起来以反对一切强权为务的学术研究，其实在骨子里也难逃为政治服务的嫌疑。很显然，专项基金在这里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人文学术的堕落。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一尴尬局面的来由，仅仅归结为科学主义冲动和分类学在骨子里就是政治性的？对这个难缠的问题实在没有必要作过多的纠缠；我想表达的悲哀仅仅是：我们的人文学术不仅将灵魂降解为欲

望，不仅将欲望化整为零、批发零售，以至于成为灵魂上的游击主义者，更要命的是，它已经将如何有效管理各个欲望之部件的密码昭告天下。这究竟是在向谁讨好卖乖？人文社会学科的从业人员固然从中获得了成就感，他们也自以为把握住了灵魂。只有政治和权力在一旁偷偷冷笑：所谓把握住了灵魂，顶多只是把握住了关于灵魂的比喻。这是一个纯粹的修辞学事件。我们因此可以把对灵魂的解剖弄成一门特殊的修辞学。事实上，现代人文学术早已将灵魂修辞化了。

知识的单子化和人的单子化

迎合着科学主义颁布的方法论，人文社会学科对欲望的切割式研究与极度公式般的简化，导致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知识的单子化。我曾在别处说过，知识的单子化是对分类学绝对效忠的产物；知识的单子化如果不能说成是人的单子化的首倡者，起码也是加固者。这里边的部分原因是，尽管每一个人都拥有近乎相同的欲望（所谓“人同此心”），但不同的人心目中却有着关于欲望的不同的知识——当然都是些就地批发而来的零散的知识，没人有能力将它们聚成一个整体，只能任它们像砖石泥瓦一样四散飘零。尽管也有学者将这种情况美其名曰“知识网络”，但似乎从来都无济于事。

社会分层理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嚣张起来以至于渐成显学的。在我们时代，它被认为是一种十分管用的学问。但令我们的灵魂至为悲哀的是，这门学问首先建立在人的单子化早已是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却对解除人的单子化无能为力。我们注定了要在孤独中生活一世，根本无法指望人文社会学科能给我们指明任何有效的通途。这就是现代人文学

术的通病：在科学主义的感召下，迎合着分类学的强烈要求，各门学科都能十分精确地描述令我们备感神伤的现实，却无法从体制上和方法论上给出一套有效的解救之道。我们当然可以大而化之地将这种境况理解为人文学术的谦逊，但是很明显，这种谦逊要么是没用的，要么就是出于人文社会学科的自卑、无能因而是无可奈何的。可以设想，如果一位病人面对的那位医生只知把脉和报告病情，却谦虚地说我开不出处方，这位焦心的病人会有什么反应。或许正是在这一点上，人文社会学科又一次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科学主义冲动之潜意识的领导；它兴高采烈地认可了人的单子化与知识的单子化。一大帮书斋学者就这样操持着人文学术研究，换取了大量耀眼的头衔、金钱、奖杯、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无路可逃的想象力

实证是科学主义的法宝，归纳法则是实证的屠龙刀、太子剑。实证的本义是强调事实，要求将事实和价值绝对分开；归纳法的本义是对事实进行重新安排，同样要将价值驱逐出事实之外。因此，实证和归纳法一道，都是排斥想象力的；所谓科学中的直觉，不过是科学自我解嘲的比喻。无数的科学史家在提到牛顿和苹果的传奇关系时，炮制了太多的胡说八道，以致将某些意志不坚的科学主义崇奉者引上了邪路。现代人文学术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实证最内在的口吻是：永远不要想象事情应该怎样，而是必须承认它就是这样、只能这样。因此，实证更隐蔽的前提是：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在事实的层面上终归是合理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事实的非价值性描述。否则，实证根本不可能仰仗归纳法展开自己的工作。尽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强烈的“应是”冲动，但现代人

文学术出于对科学主义的效忠和投诚，从一开始就只承认“所是”的合法性。我们被告知，无论是归纳法还是实证，都没有能力从现实中找到任何关于“应是”能够存在的依据。站在我们这些早已单子化了的普通人的立场，我们尽可以抱怨：这种性质的人文学术顶多表征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一种黑色幽默过于浓烈的犬儒主义。

伊格尔顿说，想象力是一种意识形态，想象力显示了我们对当下生活的不满。我不知道伊格尔顿愿不愿意承认，作为一种无往而不胜的意识形态的实证，早已在人文社会学科各个可以想见的角落，彻底打败了作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想象力。现代人文学术倾向于相信，它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连一向瞧它们不起的各国政府也不得不对它们刮目相看，完全是因为它们逐渐学会了抛弃言不及义、花里胡哨、修辞成分过于浓厚的想象力。很显然，这种性质的人文学术研究始终在提倡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生活，反抗是从不存在的事情。这种悲观主义、犬儒主义的研究方式如今大行其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路凯歌高奏，最终汇聚到了浩若烟海的学术著作中，却刚好和迎面而来的“再生资源”回收车撞了个满怀。

奄奄一息的形而上学

与此同时，古老的形而上学也被人文学术全方位地排斥掉了。在实证和归纳法眼中，形而上学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言不及义的，被认为没有能力把握现实，并由此给了形而上学太多的嘲笑。在今天，即使是最具善意的学者也不大敢轻易同情形而上学。有意思的是，嘲笑形而上学的举证者经常拖出黑格尔当靶子。我同意将此人打入冷宫，因为他假借

形而上学之名做了太多无聊的事情。但我想或许在另一个角度上我们很可能真的错了：黑格尔确实想将形而上学发扬光大，却在急火攻心之间最终搞笑般地要了形而上学的老命。但是，事情的另一面很可能是：作为一种最古老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或许并不会因为黑格尔对它的胡乱运用而在后人的敌视中注定灭绝。

今天，在人文社会学科中取代形而上学的，是所谓的历史主义。今天，人人都能毫不犹豫地说出如下套话：必须将问题历史化或将历史问题化。我们被告知：只有将一切事实置放在历史之流中，才能看出问题的实质之所在，才能具体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处理问题。历史主义强调无物常驻，古希腊一句"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早已吓破了历史主义的小胆囊。近世以来，几乎所有的人文学术研究都暗中遵循这一规律，愿意将一切都置放在变动不居的历史链条上，却对可能存在着的某种不变的东西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人的灵魂、欲望也被认为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塑造出来的，因此只能历史地对待，却对我们的灵魂中是否存在不变的东西不屑一顾。由此，实证和历史主义一道，在骨子里都赞同"存在即合理"这一黑格尔式的信条；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人文学术秉承着科学主义冲动和分类学的命令，收获了那么多冷血的"科研成果"，产生了那么多只有人的排泄物却没有人本身的凛然呈价值中立状的"学术产品"。

形而上学确实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甚或奄奄一息了。但本着灵魂的整体性的要求，我们似乎有必要提倡这个世界确实存在着某种亘古不变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无法被实证和历史主义所消化、所克服；否则，历史主义必定会假他人之手搞出许多惨绝人寰的事情，诸如南京大屠杀、

人的单子化、耗费了过多民脂民膏而来的冷血的研究成果等等，就是至为合理的事情；尽管它们中的许多成员，确实是在历史主义原则指导下生产出的最耀眼的产品。

自恋的学术研究

尽管几乎所有的人文学者都不时哀叹，在科学与技术十分嚣张的日子里，越来越势利的有关部门越来越不重视人文学科了，但我们仍然能够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所有的人文学者和他们从现代分类学那里讨来的研究范围一道，始终在自哀、自怜和自恋。当集体的人被搞成绝对单个的人以后，人文学术研究据说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大任务：它是文人的生存方式。这当然是一个吓人的命题。不过，正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学术的自恋和自恋的学术。这一状况的根源仍然在于分类学，因为分类学不仅为学术划定了不能彼此穿帮串行的疆界，而且还将每一个领域的极端重要性赋予了一个个领域，致使彼此根本无法相互取代，致使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领域的领取者一道，都认为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在所有申请各级学术基金的报表上，除了看到该项目需要“××万元”外，还能看到所有的申报人都把自己和自己的领域吹得天花乱坠、口吐白沫，仿佛每一个学科眨眼之间都具有了拯救世界的能力，你除了把国库中的所有钱财散给他之外，别无他法。这搞得各国政府和各级政府都深感惭愧。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灵魂似乎又得到了有限度的承认：它存在、它需要帮助、它需要被认识，最后，它或许也是重要的。但在此我有一个疑问，很愿意就地免费贡献出来：不知道各级基金会是否清楚，它们投出的钱财除了满足自恋的学术的自恋癖好、满足分类学

与科学主义冲动的权威外，得到的回报是否是一些冷血的产品、没有人存在的产品，甚至干脆就是垃圾？它们是否和灵魂有一星半点的关系？即便如此，有一点还是很清楚的：各级基金会差不多都明白，它们投入的钱财，最起码收获了许多能够有效管理灵魂的格式化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恋的学术和自恋的基金会获得了它们念想中的双赢。

人文学术的目的

尽管科学主义是一切现代人文社会学科的领袖和效仿对象，但我还是愿意给自恋的学术兜头一瓢凉水，以便让它们清醒清醒：一切人文社会学科都不是科学，都不可能成为科学。其实，根本用不着我在这里多管闲事，因为多年前以赛亚·伯林就给那伙浑身滚烫的自恋分子淬过火了。伯林论证道，一切崇拜科学，试图以简化的方式对待灵魂、对待生活、对待欲望的行径都是徒劳的。人文社会学科的根本出发点应该是：人的灵魂、欲望从来都不是物理世界；事实上，它是物理世界之外的另一种世界。那些可以应用于物理世界的简化方式、科学主义方式、实证方式根本就不能见用和见容于生活世界；谁愿意将那些方式用于人的世界，谁就是知识学上的法西斯分子。干脆让我们说得更狠一点：谁愿意将它们用于生活世界，谁就是知识学上的超级受虐狂。

我们的基本常识是：自然科学面对物理世界，试图寻找物理世界的规律，每一个被找到的规律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物理世界的模式；人文学术面对生活世界，它的目的是探索人的灵魂，它要为我们认识灵魂提供出无数种而不是单独一种模式。整体的而不是三分之一的灵魂的状况、深度、疆域以及灵魂的全部可能性，才是人文学术的合法性的唯

一来源，至于使用何种有效的手段来完成认识灵魂的任务，可不可以借鉴被科学主义认可的方法，都是后置性的问题，都在可以谈判和商量之列。

有趣的是，以反形而上学自命的自然科学通过实证的方式，得出了掩盖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之下而又支配各种事物的永恒不变的规律，反对形而上学的历史主义则通过实证的方式妄图寻找到支配人的灵魂的公式。它们在骨子里其实都是形而上学的。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形而上学有什么不对或有多么伟大，而是说，作为一种最古老的认知方式，形而上学自有它无法被根除的惯性。这仅仅是因为形而上学离我们的灵魂最近。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术寻找到的不变的公式依然有着决然不同的性质：前者揭示自然的本质，后者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前者反映了人在万物面前的尊严，后者则旨在保护人的尊严。人文学术如果不能通过对灵魂持续不断的探索来保证人的尊严，来维护灵魂的整体性，只将自身降解为一种政治行为，这样的学术研究顶多是一种智力体操，一种向科学主义和分类学献媚取好的软体运动。但对这样的人文学术研究以及它们取得的伟大成果，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了。

伦理关切

和科学总是反对常识不同，人文社会学科在认知上的出发点始终是常识。常识先于一切逻辑框架和各种论证手段。但是，很遗憾，近世以来说到常识就没那么动听了，就连海德格尔、纳博科夫和波普尔那样的脑袋都认为，常识只是人们为思想懒惰寻找到的借口；理查德·罗蒂则认为，常识代表创新的反面。但太多的学术现实让我更愿意赞同 J. L. 奥

斯汀的暗示：常识是人类经验中最值得尊敬的经验类型，毕竟常识是经过生活世界反复检验过的经验，在对常识保持足够警惕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尊重常识给出的教诲。至少，常识可以保证我们多说人话，少说鬼话。更重要的是，合理的、有血有肉的、连通人性的人文学术所遵循的常识，始终和伦理冲动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说，常识是伦理冲动的产物，不是分类学冲动和科学主义冲动下的崽、产的卵。所谓人文学术的伦理冲动，指的是一切人文学术研究必须以伦理关切为基点，而伦理关切的内核就是对灵魂的热情探索，并且是充满善意的探索。它反对简化，它提倡整体。常识会告诉我们，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的灵魂在何种情况下需要何种安慰。这里边的唯一要点是：伦理冲动始终以对当下生活世界的绝对不满来达致自身。和一切号称科学的实证主义式的人文学术决然相反，伦理冲动始终在矢志不渝地关注生活世界的“应是”，始终在不遗余力地反对生活世界的“所是”。它坚信当下的生活世界就是不美好的世界。在此，伦理冲动看起来违背了常识，却又从最为深刻的角度符合了常识、符合了关于灵魂的常识。因此，一切歌功颂德，一切旨在为权力部门提供有效的格式化模式的行径，都要被伦理冲动彻底地清除出去。一切自尊自爱的人文学术都必须是在野的反对派，是任何权力的反抗者而不仅仅是哪一种权力的反抗者。除此之外，它还必须保持自己的贞洁而不致堕落为官方学说。它仅仅是要让民众明白它对灵魂的探索，以及这种探索道明的灵魂的真实需求，从而向强权部门施加压力，迫使权力部门对灵魂作出让步，以此达到灵魂与生活世界更进一步的契合。但所谓更进一步的契合并不表征美好世界的来临，恰恰相反，正是它的不美好构成了自尊自爱的人文学术研究新的出发点、新

的伦理关切的原点。这就是人文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伦理学。最后，人文学术研究首先不是提供知识，而是提供一种拒绝与任何权力合作的道德立场。

反对相对主义

相对主义是当今人文学术遵循的又一准则。但相对主义不能仅仅被视作价值多元的产物，也不能仅仅被看成是知识单子化、人的单子化的结果。无论它来自哪里，都意味着一场灾难。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们的人文学术研究不是缓解了这一境况，而是加固了这一境况。在相对主义的保护下，我们似乎真的拥有了花不完的自由，以至于有人胆敢宣称：相对主义从逻辑上是驳不倒的。这种急火攻心的言论实在是不值一提。无论从任何角度观察，相对主义都是一个拙劣的笑话。事实上，任何一个相信相对主义的人最终都选择了或愿意选择他最满意的生活方式，这暗示了一个逻辑前提：我选择的或我愿意选择的比其他所有选择都要好，因而在行动中最终放弃了相对主义；任何一个相对主义者肯定都不愿意承认，一个垃圾收捡者的价值会等同于圣雄甘地的价值，因而最终在价值评判上放弃了相对主义。这个简单的、来源于常识的事实，是否有能力驳倒相对主义？上述境况给人文社会学科奉献出的教益是：必须在价值失范的时代，首先批判和反对各种相对主义；必须在人文学术研究中摈除相对主义及其幽灵。除了相对主义本身的荒谬，除了相对主义“万物齐一”的内在口吻，合格的人文学术研究必须反对相对主义的最大理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意欲达到的和谐状态从来都不是相对的，相对主义却认为灵魂可以得到相对化的处理，而且每一个灵

魂与其他灵魂之间没有高下之分、贵贱之别。诚然，我们的灵魂和灵魂意欲达到的和谐状态在某些时候看起来确实是相对的，但那不能理解成相对主义的胜利，恰恰相反，必须要理解为相对主义的失败，因为那不过是生活世界本身的严酷迫使灵魂为保持自己的完整不得不作出必要的让步。很显然，让步肯定不是灵魂的本义，毋宁说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游击战术。在骨子里，灵魂不仅是整体的，而且还是绝对的。

明天的事情

在相对主义悄然现身的时代，现代人文学术研究还能满足灵魂的要求吗？我们还能在常识的意义上谈论我们的灵魂吗？我们还有机会相信我们的灵魂中存在着某种亘古不变的东西吗？而在现代人文学术研究的操持下，灵魂要么只是一个比喻，要么不存在，要么仅仅是一团和任何别的东西没什么区别的物质……因此，我们只好把合人性的人文学术研究、有人性的人文学术研究的到来，推迟到一个又一个的明天之后。我不是巫师，不是占卜者，如你所知，我只是一个现代人文学术研究的旁观者和冷嘲者。我愿意将合格的学术研究推向遥不可及的未来，不过是因为实在忍受不住地想代替洋洋得意的人文学术研究表达它们的希望、绝望甚至虚妄。

2005年7月31日，北京丰益桥

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

2005 年 7 月底，正是北京奇热难当的盛夏时分。我素来尊敬的前辈 A 女士居然纡尊降贵，驾车来到了我居住的南城，说是要和我一起喝茶聊天。南城历来是北京穷人的聚居地；A 女士一下车就委婉地表示过她对南城的不喜欢；我抱歉地对她说，我也有志成为一个富人，但努力了多年也没有成功，住在这里，确实是没法子的事情。在受宠若惊之余，也在较为漫长的交谈中，作为助兴的话题，学术界的不少明星都被我们提到了。其中有一位十几年来始终被我尊敬却又无缘谋面的前辈 B 也被我说了出来。A 女士很高兴，因为她和 B 先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让我有了找到组织的那种惊喜感觉。于是，很偶然但也很自然地，A 女士告诉我，B 先生有些不喜欢另一位我无缘拜见但也同样令我敬重的前辈 C。见我诧异，刚喝了一口清茶的 A 女士解释说，B 先生之所以对 C 先生稍存不屑，是因为 B 觉得 C 在深奥的专业研究之外对社会上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发言，不仅会影响学术上的精进、专业上的突破，还有哗众取宠之嫌；A 女士接着说，B 先生还有一个只能在朋友齐集的酒桌上才愿意掏出来的猜测：很可能是因为 C 对深奥的专业研究力不从心了，才转而对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指手画脚。

B、C 两位先生都是典型的学院派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否则，某虽不敏，还犯不上十几年如一日地尊敬他们，但面对社会上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所持的态度却迥然有别：B 认为自己的职业是学院知识分子，除了专业研究，大可以弃“杂七杂八的事情”于不顾，否则，就有不务正业之嫌；C 则认为，人文知识分子必须对生活世界上的“噬心主题”发表看法、表明立场。A 女士告诉我，B 只想做个专业知识分子；C 除此之外，还愿意充任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从 A 那里，我才知道时下流行的词语中有一个叫做公共知识分子，而我以前一直将这种人暗暗称作“打抱不平者”。见我有些走神，A 女士在喝茶的间隙，问我对此有何看法。当时是如何回答的，我已经忘记了；但我现在的看法是，鉴于今天早已是个专家的时代，我当然同意专业研究意义重大，何况专业研究还担负着生产知识的重任；但鉴于这个世界确实存在着太多让人不满意甚至愤怒的“杂七杂八的事情”，我不觉得公共知识分子（我不准备用那个江湖气太重的“打抱不平者”了）的所作所为没有意义，或者意义不重大。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今天，人文知识分子究竟有何用处？

作为维系当下生活世界的主角，社会分工早已是个不争的事实；长期以来，不独物质生产领域内分工越来越细致，知识生产领域里的分工同样愈来愈倾向于精密。被现代人文学术推举出来的主角即现代分类学在此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单就人文知识的生产来说，由于受制于分类学的权威，至少有两种知识生产的形式：专业领域内的知识生产，公共领域里的知识生产。个中人士无不明白，前者强调事实和价值的分离，否则，结论就有可能建立在意气用事的沙滩上，后者则拼死维护事实和价

值的和合，否则，那些冷血的知识根本就没有用处；前者强调知识本身的纯洁，后者则强调知识的有效与火热；前者是关于人类社会某一个特定部分的知识（比如关于语言和思维），后者则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整体的知识（比如关于幸福、公正和正义）。专业知识能让我们像使用显微镜那样放大人类社会的每一个细部，从而让我们更有效、更真切地认识我们自身，尽管这种知识有时候甚至在大多数时候确实具有冷血的特征；公共知识则能让我们随时随地明白幸福、公正、正义对于我们的重要性，让我们明白生活世界上有哪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始终在阻挠我们实现幸福、公正和正义，还能让我们知道，在面对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时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如果一定要说专业知识和公共知识之间的联系，我愿意在此冒险下一个结论，并希望 A、B、C 三位前辈能够原谅：公共知识是对各种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是在利用专业知识看清社会细部的基础上对“杂七杂八的事情”所作的评判。如果说专业知识是理论，公共知识无疑是对理论的应用。求诸于经验和我们千疮百孔的常识，与其说公共知识是关于幸福、公正、正义的知识，不如说是关于幸福、公正、正义何以被阻挠、何以不能实现的知识。归根到底，公共知识只能是关于缺失和缺陷的知识。这是公共知识的最终尊严之所在。

多年来，我们（包括我甚至也包括 A、B、C 三位前辈）被告知，我们是由人民养大成人的。联想到父母的艰辛和劳累，联想到自己那些吃不饱肚子的悲惨年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种说教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时间在翩翩流逝，愚钝如我者也渐渐明白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保证现代分类学及其功能得以成立的基础，始终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无论以何种方式、由何种权力来进行再分配。即使把一切可以忍受和不

可以忍受的东西一股脑儿全部计算在内，我等人文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安静地接受教育并最终成为人文知识分子，仅仅依靠父母的艰辛与劳作是不够的，还须仰仗他人的贡献——尽管有了他人的奉献并不能保证我们每天都能填饱肚子。而所谓他人，只要我们还心存感恩、知恩的念头和情怀，不过是长期以来惨遭妖魔化的人民。当然，除了少数有本事的人文知识分子，其他所有人都是人民的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被人民喂大，唯一的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听上去这是个十分庸俗和搞笑的说法，但我坚决不会用引号把这句话给包裹起来。像 B 先生那样生产专业知识当然是服务，当然值得尊敬，像 C 先生那样生产公共知识肯定也算服务，应该得到同等的尊敬。归根到底，知识生产不过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义务，就像公务员领取俸禄就必须完成分内的差使一样，哪怕有时候是以装孙子的方式完成差使。很显然，即使按照公务员松松垮垮的工作条令，如果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没有生产出知识或者生产出了有害的知识，无疑是知识上的渎职和犯罪。因此，相对于广大的人民，人文知识分子，无论是专业的还是公共的，根本不具有任何傲慢的资格和权利。

鉴于长期以来现代分类学的威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专业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坚硬的事实，几乎所有的人文知识分子都只记住了专业知识生产，却忘记了公共知识的生产；更有甚者，几乎所有的人文知识分子都以为知识生产只是个人的事情——“学术研究是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作为一个冠冕堂皇的托辞或一个煞有介事的毒誓，正好暴露了许多人文知识分子深埋内心的自私念头。从数量上说，和蛰居书斋的专业知识分子相比，对“杂七杂八的事情”公开发表看法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或许是在全世界）差不多已经成为恐龙了。在这样的情况下，C 先生冒着

遭受奚落的危险弃专业研究于不顾，实在是可贵之至。我隐隐约约地记得，在那个酷暑的下午，在北京南城的某间茶楼，我用这个小意思赞扬过 C 先生，而且得到了 A 女士的首肯。

在此有必要重申一个常识：诸如 C 先生一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在针对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发言时，必须要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现实生活。现实的不美好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预设。在这里，现实的不美好是绝对意义上的不美好。的确，正如某些不怀好意的人所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或许都不知道什么是绝对幸福、绝对公正和绝对正义，（他们因此会问：追求一件你根本就不知道的东西岂不荒唐？）但我们肯定明白什么是不幸福、不公正和不正义。幸福、公正、正义等概念，必须要从否定的意义上才能得到准确的定义。公共知识分子的义务，就是要不断生产关于幸福、公正、正义的内涵，并将它贡献给人民，并使用这样的内涵批判那些否定之物；尽管这种知识归根到底是些关于缺陷和缺失的知识，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值得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世世代代对它进行生产。也就是在这种性质的生产过程中，那个不美好的社会才有望得到一点一滴的进化；而这样的生产与进化是个永无休止的过程。

公共知识分子在进行知识生产时，必须站在人民这边。这是理所当然的。站在人民这边，就是站在我们自己这边。这是知识分子——无论是公共的还是专业的——的绝对立场。相对于各种超常的力量，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都是弱者，都是失败者。有意思的是，经过许多知识分子的顽强努力，千百年来，我们已经拥有了太多关于成功的哲学，但关于失败的哲学始终处于“尿道阻塞的丛林中”（沃尔科特语）；在成功哲学眼里，失败哲学不仅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是极端无聊的。成功哲学是

强人的哲学，它和幸福、公正、正义无关，甚至从骨子里就是对幸福、公正、正义的坚决否定。因此，公共知识分子的最大义务必须落实到对成功哲学的批判上。在今天，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许多惹人神伤、催人泪下、引人肝火燃烧的“杂七杂八的事情”，大大半来自于成功哲学的教唆。在成功哲学的圣殿上，不成功是不被允许的；在成功哲学眼中，信奉失败哲学的人本来就是应该被消灭、被淘汰的劣等人物；给这些人制造一些麻烦（这就是“杂七杂八的事情”的根本语义），也就是成功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批判这种哲学的精神内涵，满怀激情地扫荡这种哲学的原始功能以及它制造出来的惨烈现实，维护失败者可以失败的权利，正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义务——因为他是人民喂大的。

2005年12月18日，北京丰益桥

第四辑　虚构的和真实的

我知道这世上有真实的东西，比如空气，也有虚构的东西，比如谎言。两者我都喜欢。我愿意用虚构去看待真实，用真实去看待虚构。敬请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只是我的不良癖好。

本文纯属虚构

一、一本永远不会诞生的书的序言、正文与后记

A 序言

这篇序言和这篇序言的作者有一个小小的野心，就是想证明一本永远不会诞生的书确实存在过和存在着。作为我们时代的无业游民，我，王堪夜，也乐于干这类子虚乌有的事情。话虽如此，诸位看官却完全没有必要把这种性质的书和这种存在状态的书当作神秘之物，比如上帝啦、命运啦，或者其他无以名之的鬼东西。王堪夜不希望本序言最终要以“神秘”为武器、为噱头，而为这本书招揽读者。我不愿意这样做。

伟大的贝克莱，也就是那位在形而上学的天空凌空虚蹈，从而把世界给弄丢了的不幸哲学家，曾经说过：“某些真理对于心灵是如此接近与明显，以致一个人只需睁开眼睛看见它们。我将这一重要的真理作如是观：就是说，天上的所有合唱队，人间的所有物具，简而言之，即构成这个世界的强大骨架的所有形体，如果没有一个心灵就没有任何实质……或者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它只留存于某个永恒精神的心灵中。”

这本永远不会诞生的书，尽管在区区在下看来一点都不神秘，但也只对有心灵的人——即贝克莱意义上的有着搞笑性质的“唯心主义”者——开放。按照它的本愿，它也许将对所有型号的怀疑主义者、虚无主义者、物质至上主义者、物质决定论者、色情帮爱好者、机会主义者、素食主义者、机械唯物主义者以及乡愿紧闭大门。

就目前所能见到的令人生疑的只言片语看来，这本书可能是小说，是诗歌，是随笔甚至是戏剧，也可能是哲学、神学、历史学、语言学或者别的曾经存在于世上的任何一种可能的书写形式，当然也有可能是考证、证明、反诘、玩笑、痛斥、圣言、嬉皮笑脸……或者一个大写的零。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作为我们时代一个渺小得犹如打屁虫的无业游民，鄙人实际上也不大清楚。但就我目前所看到的内容来说（不怕你见笑，我能看到的内容相对于那本大书几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它归根结底只是一本莫名其妙的书，一本平凡的书，一本不那么纯粹和高尚的书；当然，在所有这一切之外，它也可能具有某种神奇的性质——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情况，接下来我马上就要说到。

已经有许多相当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表明，王堪夜并不是第一个看见那本书的人——尽管他凡事都渴望充当第一，但这个小小心愿自打盘古王开天辟地到而今，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现在他的最大理想就是凡事不当倒数第一。即便如此，他能有幸看见那本书，也确实称得上奇迹（他为此愿意感谢上苍）。像那个倒霉的但丁——而不是那个伟大的但丁——一样，“在人生的中途，他（也）迷失在黑暗的森林当中”；正当他像但丁等待维吉尔那样，等待他的拯救和拯救者时，突然眼前一黑，经过七拐八碰，像一个经过了多次偷鸡摸狗、转弯抹角而最后到来的观点一

样，居然掉进了一个山洞。就是在那个狭窄得像兔子的尿道一样的山洞里，王堪夜机缘巧合地看见了这本书。但那是一本不断飘忽、不断移动、不断拍击翅膀的书：它像可以挪动方位的人参，在这篇序言的作者面前不断地更改居所。王堪夜对此非常惊讶，完全不知道眼前这个哥们儿飞来飞去的究竟想干什么。就是在这种极度的无聊当中，王堪夜和那本书玩起了“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因为这样做，好歹能让他把洞外的“黑暗森林”暂时忘记，也能将他无望的茫茫前途（假如这玩意儿还真的存在）暂时扔在一边。让那个叫“前途”的狗东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当然，想把那本奇异的书籍据为己有以便从中猛捞一把，从而改变他王堪夜叮当作响的穷日子，也是“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能够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

但最后他并没能抓住那本书，他没有得手。他只是从那本书上撕下了一页——那一页肯定是对他参与游戏所给予的某种补偿，因为那本书也许真的是太寂寞了，也许那本书确实怀有悲天悯人之心。究竟怎样，我到今天也没有弄清楚。也许明天就能搞明白了——这是我们时代的失败者惯常的心理样态，一点都不新颖。但确切地说，本序言的作者只撕下了那本书的第一页的第一行。这一行并没有什么让人眼睛一亮的高论，所以，一贯擅长引用伎俩的序文作者决定在这里暂时就不引述了，并尽量争取将谜底拖延到最后时刻。

王堪夜看到山洞里有许多不同型号的脚印，便断定自己不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除非那本书在不同的时刻会生出不同型号的脚来。不过，这显然出乎他苍白的想象力之所料——在我们时代，和许多朋友一样，王堪夜也几乎完全没有想象力了。其后发生的许多事情证实了他的判断：他确实只是有幸来到山洞的少数人中的一个。王堪夜希望每一个碰巧到

过这个山洞的人，都能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引论、题赠或者其他形式的文字。

前不久，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确实看到了不少到过山洞的人写下的文章，它们大都刊载于我们时代的著名杂志上。那些碰巧去过山洞的人都说自己从那本书上撕下了一页，确切地说，都是“第一页的第一行”。但从他们的转述中，除了少数，每一个“第一行”都和其他的“第一行”很不相同，甚至面貌迥异，至少也是相互矛盾或者毫无关联。目前看来，除我之外，那些到过山洞的人基本上都是考古学家（鄙人只是一个初通文墨的自由职业者，或者更干脆地说，是一个无业游民），因为他们都想从撕下的那一行中，考证那本书的作者、成书的年代，以及思谋着如何从他们记忆中的版式上窥测出成书年代的物质水平，并最终给他们渴望中的理论体系作旁证。对考古学家来说，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对。毕竟在我们这个各种理论早已横行不法的时代里，想要构造出一种令人眼睛一亮的理论体系，已经十分艰难，没有超乎想象的证据和机缘几乎是痴人说梦。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这无疑是理论体系历史上的重要“转型期”，也就是说，机遇已经摆在我们眼前，就看谁狗运当头了。但无论是谁狗运当头，最终都是为我们的时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我们等待新理论体系的破土而出已经有一百年了。

遗憾的是，考古学家们的考证结果却千奇百怪，呈现出了“牛皮扯、扯牛皮”的严重局面：有的说这本书属于史前时期，有的说属于未来，有的说是外星人安放在地球上的密探，还有的竟然违背逻辑地说那本书根本就不存在——反正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习惯了危言耸听和自己扇自己的耳光。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遗憾是：所有宣称自己去过那个山洞的考古学家，都没能记住那本书的名字。这个不幸的事实给我正在做的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我只好给那本不断飘移的怪书取名为“一本永远不会诞生的书”。鉴于这个基本事实，各位看官应该相信我的诚实：王堪夜这样做，确实是出于无奈（而不是“无赖”），并没有一丁点玩噱头、玩神秘主义的意思。再说，他又不是法轮功分子，对各种型号的法轮功毫无好感。

考古学家的考证文章到目前为止，非但没有建立起新鲜的理论体系，却意外地引出了一个充满喜剧色彩的结果：无数为发财而面色红润的人，都扛着各种精密到了小数点后边第九位数的挖掘仪器，排着长队准备去那个山洞掘宝。有报道说：凡是有我们龙的子孙的地方，至少有一个代表加入了掘宝的行列。这毋宁是说，挖宝队伍来自我们时代的各个阴暗角落。可惜当我听说这个消息正准备加入进去，试图分一杯羹，却已经太晚太晚了。这再一次证明王堪夜没有充当第一的好运道。

听说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从五湖四海聚集在一起的掘宝大军，在经过了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一共四个八拍的残酷决斗，并付出了无数大腿、手臂、拇指和瞳仁后，终于痛定思痛、强作欢颜，最后居然和颜悦色地坐在了一起，进行更为残酷的点球决战。又经过较长时间的谈判，他们才为要不要掘宝和如何掘宝建立了统一联盟，确定了利益的分配方式。出乎他们所料，最后竟然还发明了一套精妙的、能够维持各方面平衡的袖珍“政体”，重新确立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把此道高手即考古学家惊得目瞪口呆。尽管在挖宝队伍内部，还存在着所谓“新……新自由主义”和“新……新左派”的严重派系斗争，

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不断的分分合合中还是作出了周密的分工。

据最近的消息称，分工的精确程度，已经达到了在什么情况下什么人分那本书的哪一行文字的境地。“挖宝章程”还明文规定，如果有功于掘宝的人太多，而文字的行数又不匹配，那就按照“章程”已述部分的规定精确到每一个字；如果连字数都不够分摊，就精确到偏旁部首或者字母——当然，这还要看那本书究竟是用什么文字写成的。总而言之一句话，在完成了这套复杂的程序后，掘宝大军确信：这一回一定能把那本传说中的书籍的每一根寒毛都夹带到我们的时代。他们一致认为，不管是采用顺手牵羊的方式还是贼喊捉贼的方式，也无论是使用开门揖盗的伎俩还是脱了裤子打虎的伎俩，只要能将那本书夹带出来就算成功。为此，他们又令人欣喜地把哲学上的历史目的论给演练了一通，也顺带重新论证了目的与手段之间各种可能的关系。在老理论发了新芽、老母猪变作了处女猪之后，他们又精确计算出了每一根寒毛的价格——在我们这个想象力已经极度苍白的时代，的确算得上了不起的奇迹。王堪夜没有理由不佩服他们。

顺便提一下：考古学家也在为此惭愧不已。舆论界已经普遍认为，与其把发明新理论体系的重任交给考古学家，还不如委托给掘宝大军中的优秀分子。公众也开始怀疑，我们时代花牛大的价钱养活那么多没用的考古学家，是不是有点太过分？

但是，很遗憾，那个山洞居然消失了；在那个传说中应该有山洞的地方，浩浩荡荡奔赴前来的战士们看到的只是一块平地，上面已经高楼林立，灯火通明，住满了各色人等。据后来的调查宣称，住在那里的人从小偷、狗贩子、人贩子、猪贩子、大学教授、乞丐到嫖客、政客、皮

条客和贪污犯，“都他妈一应俱全”（调查人员的原话——王堪夜注）。反正我们时代的人数确实比蝗虫和耗子的总和还要多，所以我比较相信这个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虽然我们时代的新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伪造的嫌疑，都有为新闻而新闻的癖好。为发财而面孔红润的人在绝望之前纷纷苍白着脸，咒骂那些考证文章的作者，并把他们当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无耻的骗子。这些偏激、夸张而又激愤的言论我是能够充分理解的。为什么不呢？因为我也是这个时代的一分子嘛，哪怕我只是一个无业游民。至少到目前为止，我王堪夜还没有接到高等法院开除我的“时代籍”的通知。老实说了吧，假如我遇到这样的情况，也会跳起脚来大靠考古学家的娘亲，还会顺带问候他们的祖先——尤其是他们的雌性祖先——隐秘的、带洞的部位；至于对带把的部位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既要通过进一步的观察，也要看本人是否有龙阳之好才能作出最后决定。

如今，我们时代的高等法院已经接到了许多自诉状，那些声称自己去过山洞的人（即考古学家）也接到了法院的传票。传票是以六百里加急的形式递送到众考古学家手中的。传票的主要意思大致是：考古学家要对掘宝大军的索赔负主要责任，并告知他们要勇敢地面对现实。索赔的内容，据我们时代发行量最大的《乌有日报》称，既包括掘宝者的精神损失费、精密仪器费、医疗费，也包括误工费——掘宝者当中确实有很多人是以辞职为代价来干这桩买卖的，不少人以前还有一个好薪水。现在他们不但财产尽失，有的人还付出了身体上的某一个零部件。据说索赔的额度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目前还在呈明显上升的趋势。据《乌有日报》的最新报道，之所以额度还在不断上升，是因为当初因各种各样的缘由没有加入掘宝大军的人，以为这一回是有利可图的难得机会，

于是就纷纷给自己派定了受害者的身份。该报的专栏分析家分析说，这就叫做“赶末班车”，也叫做“不能一错再错”，还可以叫做“痛打落水狗”（即考古学家——王堪夜注）。因为考古学家从前发明了那么多的理论体系，已经把五湖四海的人害惨了，这一回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岂可放过他们？所以，当初对那本书采取观望态度的人，如今加入索赔的队伍也不是瞎起哄。平心而论，人家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目的，有着更充足的理由。

到我撰写这篇序言的这几个字为止，已经有好几个接到传票的考古学家不堪压力，仓皇逃往了海外，寻求政治庇护；另有几个性急的已经悬梁自尽，还有一些在猛扇自己的耳光，后悔为了一点点考古学界的名声和自己的理论体系自找麻烦；当然，更不幸的一些好事者，则早已被那些面色苍白的人自发地监视起来了。寻死不成比起痛快地自杀，在我看来毕竟要难受和不幸得多，因为自杀肯定算得上很好地“表现”了“自我”（ego）。一般来说，自我了断确实算得上人类能动性的极端体现，所以神学教义才会把这种举动当作人类和上帝平起平坐的外在标志——因为即使是最正统的神学家，也会无可奈何地承认，上帝唯一比不上我们人类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能力自我了断、悬梁自尽，而不是他老人家不会撕开裤裆拉屎、撒尿。而被监视，在本序言的作者看来，其严重程度更甚于“自杀而不成”。道理显而易见：被监视在我们时代是一种遥遥无期的惩罚，其性质基本上相当于无期徒刑。诸位看官，不知你们对此有没有同感？

如今，山洞消失了，战士们只好把发财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些喜欢卖弄文字、渴望出大名的考古学家身上。那些被监视者在被监视的过程中，

情急之下，居然也冒出了好几个被迫的勇敢者——“置之死地而后生”嘛，我当然也能够理解。据报道称，逼急了的考古学家拿出了平时不敢拿出的刀子，并把刀子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对索债的人声称：“要钱没有，要命老子倒是有一条。”不过，和我们时代大多数阳痿早泄的情形相仿佛，少数几个被逼成为的勇敢者，最后还是成了懦夫，被群情激昂的、更沉得住气的索债的战士们彻底打回了原形。因为孤注一掷的监视者在这种关头比那些被监视者更明白，刀子云云不过是虚张声势的无赖之举和装饰品罢了。索债的勇士们，不管是“新……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还是“新……新左派”的门徒，内心里其实都相当清楚：古往今来，根本就没有几个无赖真的能把无赖行为进行到底；能进行到底的早就不叫无赖了——至于该叫什么，不是我这个无业游民所能知晓。但有一点还是很清楚，叫什么都可以，但叫考古学家或者无业游民肯定不可以。

《左传》里有一个名叫曹刿的家伙以绝对化的口吻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假如这个说法有道理，那么，刚开始还怒火万丈的考古学家在被彻底打回原形后，其沮丧心情各位看官朋友完全可以想见，不用在下多说。所以，把刀架在脖子上的考古学家最后也只好悻悻地丢下一句“听天由命”“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中外格言，然后把刀子收了起来，让刀子回到了它该去的地方。平心而论，刀枪一类玩意儿确实不是我们时代的考古学家就能玩得动的——这只要我们回想一下他们发明的理论体系是多么的柔软、油腻而又入口化渣，就没有什么不明白的了；出于同样的道理，“英雄”的名号也绝不是我们时代的考古学家能够担当得起的。不过，也就是在所谓“听天由命”、朗诵格言、收起刀子这一连串过程中，考古学家们倒

真的成了无赖，至少也算是理解了无赖之所以为无赖的理论精髓。我得赶紧申明：这个看法的发明者不是我，而是《乌有日报》第四版一位自称从不出门的名记。这个家伙叫季小贞。听名字像是个女人，但据我在《乌有日报》工作的情人的情报显示，该人是个隐藏在女人堆里的真男人。

我很庆幸没有按捺不住地将自己的洞中经历告诉世人。作为一个穷人，我从小就知道，秘密只有一个人在暗中欣赏时才最为有趣，也才不会被人偷走。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知识有限，也不那么服人管，早已被考古学家集体投票开除出了考古学家联盟，所以对创造理论体系也就没有什么热情，狗拿耗子的事情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当然，我现在也乐于站在一边看热闹。顺便说一下，按照我的本意，当初我的最大理想也是做一个考古学家。但人家一致认为鄙人没有资格加入到他们的理论分赃队伍之中，你说我又有什么办法？除此之外，我之所以能够如此幸运，既不必逃往海外，也用不着悬梁自尽以表现自我，还有一个更重大的原因：我也想将那本书据为己有，期望着从中猛捞一把。而说出那本书的具体所在，肯定就是走漏风声。《易》云：“臣不密则失其身，君不密则失其国。”我虽然智力有限，但还没有傻到那种程度。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觉得我的想法在我们时代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谢天谢地，仰仗着这点渺小的潜意识，总算让我避免了考古学家的聪明反被聪明误，也有幸避免了考古学家为了虚幻的名气自找苦吃。

再顺便在此“度”一下考古学家们的“君子之腹”：其实他们也想把那本书据为己有，因此同样也不想走漏风声。但考古学家建造理论体系的生理本能，却让他们必须要付出走漏风声的代价。在在下看来，考古学家的悲剧仅仅在于：他们未能在建立理论体系和发财之间找到微妙

的平衡。“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孔老三说得真是再好不过了。

现在，我只有对那些倒霉的朋友们——无论是被告还是原告，表示一点毫无意义的同情。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更想把诅咒奉送给那些考古学家，因为他们坏了我的好事，让一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丧失了一次绝佳的致富机遇，也破坏了让我一个人先富起来再回头观看我当年的穷哥们儿的把戏的好机会。这伙披着人皮的考古学家损坏了我的利益。我也想在适当的时候请求高等法院对他们提起公诉。

这篇序言除了宣布那本永远不会诞生的书确实存在之外，还有为众多被告声援的意思在内。尽管他们确实坏了我的好事，但他们也确实值得同情，因为我一向同意这样的看法：人性中的所有弱点不能得到过分的指责。——鄙人一贯擅长设身处地。当然，本序言还有一个目的：哀悼那些自杀的、逃往海外的、被监视的和扇自己耳光的我的同类们。——我虽然只是个无业游民，早已被考古学家联盟所开除，但我并不缺乏同情心。实际上，王堪夜已经穷得只剩下同情心了。现在，我将把考古学家已经公布的众多“第一行”收集起来，作为这本永远不会诞生的书的“正文”部分，并付梓出版。鉴于目前这件事情已经被众多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这本书——即那本“永远不会诞生的书”的摹本——肯定会有很大的印数。我期望着能够从中捞到一小把——这也许就叫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最后，让我们亮出底牌，坦诚相见，把心窝子也掏出来：“收之桑榆”才是我愿意为出版商充当枪手而编撰这本书的根本原因。

B 正文

1. 那些光，那些水，那些不存在的事物……

2. 前晚做了一个梦，我忘记了，但也记得一点点，现在……

3.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4.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人类历史的动力……

5. 来这里吧，朋友们，这里有甘泉、甜酒和美女……

6. 如果你不能起床，就在梦中开始你的经历……

7. 呼儿咳呀，中国出了个王老五……

8.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9. 人之初，性本善，越打老子越不念……

10. 何时东来雨？何时北来雨？……

11. 这座城市昨天才建成，现在我来说说它……

12. 请你将我的烦恼称一称，现今都比海沙更重……

13. 忘了吧，忘了我，何必希望又重逢……

14. 狗日的……

15. 这座城市前天刚被毁灭，我想说说原因……

16. 起初，神为男人创造了把柄，为女人创造了漏洞……

17. 有五种语言：天上的、地面的、海中的、鸟叫的和人说的，我都懂，我都忘了……

18. 我的故乡在远方……

19. 道生二，二生四，四生六……

20. 让我们荡起双桨……

21. 把一个处女发展成女人的秘诀如下……

22. 君子报仇三年不晚……

23. 我迟早要成为主席……

24. 做女人挺好，但做男人挺更好……

25. 从卧室到茅房的道路是黄金道路……

C 后记

这本永远不会诞生的书目前所能找到的只言片语全在这里了。它们都被称作“第一页的第一行”。我把这众多“第一行”的解释权拱手送给读者。正如本书正文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人类历史的动力……”本书中那些只言片语的意义的创造者，也只能是这本书的读者同志。因为我确实碰巧去过那座山洞，所以我担保有这本书（我确信我的经历并不是做梦，同时我也不想违背逻辑地说它不存在，因为我不是考古学家），但我不知道这众多的第一行是否真的就是“第一行”，毕竟我们时代的考古学家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修改考古证据已经不是第一回了。不过，考虑到那本书始终在不断移动和飘忽——在没有人陪伴时它是不是也这样呢——它们也许真的都是第一行。何况我也不愿意把考古学家都恶意地想象成骗子——在我们时代，诚实的学者虽然不多，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当然，我也没有把考古学家都想象成骗子的胆量，更怕别人挖苦说，看，那个被考古学家联盟开除出去的狗杂种对考古学家还怀恨在心哪。

（需要解释的问题有三个。一，收入本书“正文”部分的文字，除了我自己手中的那一份，都没有实物。那些实物都攥在考古学家手中。我只能把自己拥有的那一行文字的实物拍成照片，刊登在全书的扉页上，以示真诚之心。因此，二，我也愿意趁机在此做一个广告：如果有人意欲购买我手中这一行文字的实物，只要价钱合适，我会随时出手。我从

前也穷，但于斯为甚——反正我确实已经穷得准备去偷邻居家的狗来卖了。三，为了这本书的篇幅能达到出版的要求，我不得不收录散见在我们时代各种报章杂志上的相关讨论。这个建议是出版商作出的，更具体地说，是本书的责任编辑王向洪作出的。他们答应对此负责。因此，有关知识产权一事请直接找出版社，不要来麻烦王堪夜。）

在我看来，这本书仍然值得研究，仍然需要一些不要命的人去考证。我代表我自己鼓掌欢迎这号不怕再次吃螃蟹、愿意充当二茬英雄的梁山好汉。不过，话说回来，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上当受骗的发财者，估计将来的研究者至少不会再有接受法院传票的危险了。所以，有志于研究这本书的人，可以把心装到口袋里去。

感谢乌有出版社有出版这本书的勇气。

感谢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我的老哥们儿王向洪先生。

欢迎列位排队购买这本书。我已经准备好了足够大的钱袋。谢谢合作，谢谢捧场。

二、一次电话采访的记录

“您好，没见过面的朋友，我是《乌有日报》的记者。我奉我们老总子虚先生之命对您进行采访，希望能得到您的配合。”

“采访我？你搞错没有？我有什么好采访的？我是英雄，还是群众眼里那些坐在台子上的贪污犯？”

“你必须接受我的采访，因为我已经奉命了。再说，《乌有日报》

第四版正在等米下锅。到了这种‘严重的时刻’，也只好捡到篮子里的都算菜。开一句古典主义的玩笑，也只好就着红娘来解馋了。恭喜您有了一次上报纸的机会。”

“很有趣的理由。但我确实看不出有照顾这个理由的义务。再说，即使我是个英雄，我也讨厌自己的照片登在任何报纸上，哪怕它叫‘乌有日报’。实话说了吧，我长得很丑……”

“但您肯定很温柔。流行歌曲一百年前就这样唱过了。我个人认为唱的就是您。当然我这样说既没有讽刺您的意思，也没有恭维您的想法。所以您会接受我的采访，您也一定有点东西供我采访。说吧，倒出您的苦水吧，我会像解放全人类另外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那样解放你。就像谁说的，意义在阐释中生成，采访也在采访中诞生。您也许还不知道，现在我告诉你：我的工作就是要让采访排着长队等待诞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和上帝差球不多。我会把一堆垃圾中唯一一丝阳光样的金线给拣出来，并且登在报纸上。这就叫做美的发现。今天对您也一样……我确实不认识您，也不知道您是谁，您只是我随便瞎拨出的一个电话号码那边的人，但我确信我们能够很好地合作。我一贯都有这种信心。因为我相信缘分——为什么鬼使神差撩拨到的人刚好就是你呢，所以我确信能从您那里挖到有价值的东西。”

我只是随便一个电话号码那一头的人。这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像我“在人生的中途，迷失在黑暗的森林中”，从而发现了那本飘忽不定的书。这也是偶然性造成的。那本书难道真的在等待我，就像等待那些考古学家？我可没有《乌有日报》那位记者的自信。我想起了不久前写的那篇序言，那也是偶然的产物。更确切地说，是为了从偶然中找

到物质财富，再坦白点吧，也为了报复、袭击那伙考古学家，我才拼命抓住那个“偶然”誓死不放的。我要利用偶然，正如这个狗东西一贯都在利用我。而现在我能随便拨一个电话，就能让那本书听见我吗？要真是那样，面色红润的掘宝大军也就不会要求索赔了，他们也可以随便拨一个电话号码，只要他们和那本永远不会诞生的书确实有缘。应该说，假如有这样的好事，第一个想到的人肯定不是我。所以我才对电话那头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你真那么自信能在我这里捞到《乌有日报》需要的猛料？”

“猛料不猛料要看我怎样处理了。比如我能一夜之间，把一个不解风情的二八少女变作荡妇——可能你还不清楚，在今天，像我这样的名记这种机会实在太多了。这么说您该相信我的能力了吧？”

“我当然相信，这是你们名记的天下嘛。我又有什么不信的。”

“听您的口气，您好像是一个知识分子？难道也是个考古学家？——我很相信自己的直觉。现在，你也许正坐在书房里炮制一些没人要的‘精品’，一些自以为是的理论体系吧。你也不看看现在炮制理论体系的都是谁——反正已经不是你们考古学家了。”

“我没有炮制什么。我正在为无米下锅发愁。恭喜你的直觉。”

“哈哈，果然如此。果然！我劝您还是下楼来吧——您肯定住在某座高楼上的鸽子笼里，住在这种地方的考古学家我见得太多了。外面是五月，阳光很灿烂啊。连我都想抒情了。”

确实是五月的阳光，我正好坐在窗前，被我抬头看见了。作为我们时代的一个无业游民，我在文字中确实走过了太长的时间——虽然我最后还是没有机会混成一个人模狗样的考古学家，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须

臾离不开文字。正是这样，我才机缘巧合来到那座山洞看见了那本书吗？我长期以来确实忽略了阳光，但它现在被我抬头看见了。我原来想从那本永远不会诞生的书中找到阳光，确切地说，是找到钱，可以买来美女和大米的钱——我的情人们个个难看之极。现在看来完全是徒劳的，因为我迎面看到的阳光确实是更优秀的阳光。我也知道我的朋友们早在数年前，就已为我写了一首意在挖苦我的歌谣，非常有趣，全引如下："五月到了，小鸟恋爱了，蚂蚁同居了，苍蝇怀孕了，蚊子流产了，蝴蝶离婚了，毛毛虫改嫁了，青蛙也生孩子了，你还等什么？"我还等什么呢？等那本永远不会诞生的书的来临？扯淡吧。这样说我好像还是一个英雄。而我是否应该像《乌有日报》那位记者说的，放下电话走下楼去？我怕我习惯了纸上的阳光的眼睛，已经不习惯真实的阳光了。我已经快玩完了。但这确实是五月的阳光。它太真实了，反而让人感到它是虚构的。但电话那头的家伙是怎么知道的？

"朋友，我是《乌有日报》的记者季小贞。这个名字也许你听说过。别，别，你不要发愣，也不要挂电话。听我说，你肯定也是个寂寞的主——在这一点上我们本质上是一样的，我敢担保，你那间了无生气的书房需要我这样的包打听。我是说，我的确想从你那里发掘一点可以下锅的东西，但也同时能给你带来乐趣。俗话说，帮人就是帮己嘛。你要是不愿意说，那我就启发你。反正我的工作的主要技巧也正在这里。注意，现在我开始启发你了：最近离婚了吗？你对离婚有何高见？或者最近和老婆吵架了吗？你放心，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你塑造成名人。我就是生产名人的母机。好几个考古学家都是我塑造出来的。对这一点你可以放一万个心。"

“我没有离婚，我懒得离；我也没有吵架，我没有力气吵。这行了吧？”

“这是因为什么呢？你的情况不妙啊，朋友。这样说也不大合逻辑嘛。不合时代潮流嘛。怎么能不离婚呢？最起码也得吵架吧。连婚都懒得离，连架也没力气吵，是不是荷尔蒙分泌得越来越少了？现在的污染很严重，听说这让三分之一的男人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另外还有三分之一在作替补。对此问题你有何妙论？你是不是也丧失了这方面的本事？”

“我没有生育后代的义务。我不是种马。也许你是。当然，我也不反对你是。你放心，我的把柄至今健康茁壮。除此之外，我什么妙论也没有。你确实找错人了。”

“这又是为什么？是因为污染严重，还是因为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氛围让你感到别扭？”

实话说吧，我现在越来越讨厌胡乱动用因果关系，也讨厌胡乱拿因为和所以攀亲戚的人。我不相信这个世界真有纸面上出现的那么多因果关系。那不过是有人需要仰仗它壮阳补肾罢了。正如索赔的人需要索赔本身来壮胆。这些人仿佛没有了因为加所以就不会说话，或者说话就底气不足——我承认，我也曾经是这样的人。也许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的人。这是我们时代最隐秘的病灶，但也是众多考古学家们的理论体系的要害之所在。是的，我也是它的分有者，我仰仗这个病灶已经煮吃了太多的人造鸡肉。仰仗它，我颠三倒四地活到了今天。我倒反而佩服那些面色苍白的掘宝者：他们把自己的损失全部记在了考古学家的头上。这是完全彻底的无赖，是胡乱的因果关系哺育出来的最滑稽的标本。但那

也往往最有力量。当然，我也讨厌诸如“全球化”一类的词汇。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它已经被用滥了，像妓女的“漏洞”早已被众多的“把柄”倒腾得麻木了——请原谅我用了这么个粗鄙的比喻。我讨厌所有用滥了的词汇。它们给我带来了生理性的不适，甚至让我的把柄真的成了它们的把柄。但我有胆量讨厌阳光、空气、祖国、水、面条、母亲……这样的词汇吗？就像我的语言学家情人所说，它们不是更滥吗？或者说，像阳光、空气、祖国、水、面条、母亲……这样的词汇永远不会用滥？但我还是不喜欢“祖国啊我的母亲”这样的组合，我更愿意把它修改为“中国啊我的亲妈”。此时此刻，我不愿意和《乌有日报》的记者过多纠缠，只好对他说：“好了，朋友，你也不要再启发我了。我什么也不因为，也不为‘全球化’感到别扭，我只是不想离婚，也没有力气和老婆吵架，再说，我夫人很贤惠。”

“是吗？现在贤惠的女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帮个忙，朋友，你夫人是不是职业妇女？如果是职业妇女又很贤惠那就更有说服力了。也更能为我的第四版提供话题。能让我采访她吗？麻烦你帮我个忙，我们的报纸第四版正在等米下锅呢……”

“我觉得你极其无聊。”

“这是我的工作。听我说，哥们儿，像我这样坐在家里进行随机采访的记者今天已经不多了，就像你那个贤惠的夫人一样，都堪称尤物。所以你得满足我的要求。还是说回来吧，你夫人那么贤惠，她在本质上是不是个传统女人？听我说，这样的女人如今确实不多了。是不是正因为这样，你才不离婚，不和她吵架？要知道，现在离婚已经是很时髦的事情了，所谓中年男人的三大喜事——‘升官、发财、死老婆’嘛。为

什么不尝试一下？”

他说到了“哥们儿”，说到了“从本质上说”。我感到好笑。我真的笑了起来。实际上，我不是他的哥们儿，我也不是任何人的哥们儿。我夫人——如果我有一个夫人——也没有什么本质。她的本质就是我老婆，她让我下油锅我就下油锅，她让我上山我根本没有胆量下河——我确实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哥们儿”“从本质上说”也已经被用滥了，它们都不过是语言的装饰性在起作用罢了。装饰性让我们觉得祥和、温馨、安全，但我讨厌语言的任何装饰性，讨厌它的刻板和人尽可夫。比如说，这种装饰性让《乌有日报》的傻瓜记者说出来，我一点都不觉得温暖、祥和。但我现在突然愿意继续忍受下去，因为从中我能获得很多恶意的乐趣，为这个无聊的弱智者，我们时代的傻B记者。我逗他说：“哥们儿，从本质上说，你从我这里捞不到一丁点有用的东西，所以，你还是放下电话‘随’你的‘机’去采访别人吧，我担保有人会很高兴你的采访。”

“可我现在只对你有兴趣。能轻易到手的爱情又有什么意思嘛。说实话，哥们儿，你是我的受访者中最有趣的一位，我肯定能敲开你的嘴巴，就像我能敲开所有的‘漏洞’——对此我非常自信。这只是一个比喻，你别生气。千万别。虽然人人都说朋友妻不客气，但我还是恪守朋友妻不可欺的古训。闲话少说，咱们书归正传，就谈谈你今天干的事情吧，我来帮你分析一下那中间的含义，在这方面我可是个行家。”

“我刚起床，刚吃完饭，刚坐在桌前，然后你的电话就来了，我这会正在和你瞎扯。这就是他妈的今天。”

“……我承认我失败了，你真是个软硬不吃的主——甚至老婆的‘漏

洞’也可以出让。最后问你一个问题，请你能如实回答：乌有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号称‘永远不会诞生的书’，炒作得很厉害，卖得也很好。我们报纸也为此发表过社论和看法——不瞒你说，都出于我的手笔。在公众中反响不错。对此现象你有何高见？”

“我从不相信永远不会诞生的书会出版，只有你这样的弱智者，才相信这样的事情居然会发生。我讨厌这样的噱头。我讨厌你，讨厌所有的记者，尤其是你这种足不出户、随机拨号的狗屁记者。”

“不要这么说嘛，我没有骗你。我为什么要骗你呢，我们又没有仇。那本书确实出版了，出乎你的意料吧，书呆子？顺便说一句，谢谢你接受了我的采访。这是一次成功的采访，一次胜利的采访。我的第四版有米下锅了。”

“请代我向你母亲的‘漏洞’致敬。”

三、写在留言簿上的留言条

我知道你有故意不接电话的毛病，有唱空城计的本事，所以今天我耐着性子来过三次了。我把你的门都快敲烂了，没想到你真的不在。我还以为你躲着不愿意见我呢。不过，你可要听清楚了，我现在正式警告你，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我都能找到你，别以为你可以像对付别的女人那样对付我。弄了我十几次，我的新鲜劲头都还没有过去，你就胆敢擅自认为我破旧了。告诉你！我的肚子已经有两个月了。那是你下的种，你不要不承认，现在有的是先进仪器可以鉴定。你看着办吧。你也不打听

打听本姑娘究竟是干什么的。我现在给你指出两条路供你选择：要么拿十万块钱，要么重新与我和好，共度良宵。这个选择题你必须要尽快回答。我知道乌有出版社已经给你出了一本书，听说卖得很好，所以第一条路你完全可以走通。第二条路对你更是不费吹灰之力。我的大门始终向你敞开。究竟是什么大门，大门在我们两人的语境内象征什么，你他妈最好不要装蒜。这几天我暂时不找你，但你一定要想清楚，下回来的时候，如果你还不在，你的门估计就没有这回这么有福气了。你的脑袋也不会像上一回那么有福气了。我的铁掌功你又不是没有见识过。告诉你，我的铁掌功又上了一个台阶，这都是我们阴阳双修的结果！你是不是还想见识一次？站在你的角度上为你考虑，我认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但你要真的不思改悔，想以身试法，本姑娘也决不心慈手软！我不是观世音！

好哇，大骗子！原来你在外边的女人不止我一个！你居然还有脸口口声声说只爱我！你这个无耻之尤的骗子！骗子！天厌之，天厌之！昨天给你留言的那个女人究竟是谁？你们在一起究竟睡过多少回？十几次究竟是虚指还是实指？她凭什么敢向你要十万元？难道她比我还值钱？你一定要解释清楚！她的肚皮大了是不是真的跟你有关系？老实交代，还和谁睡过？我一个黄花闺女，就这样着了你一个无业游民的道，我想不通！一万个想不通！……我等了你两个小时。你的手机不开，你的传呼不开，你跑到哪个乌龟壳里去了？我现在警告你，如果你再敢骗我，我就要阉了你！晚上我还要来！等着我！如果你晚上还不在，我就要把你随意瞎吹自己去过那个狗屁山洞的事情揭发出去，让你的书一本也卖不出！让你和王向洪的发财阴谋得不了逞！让那个向你要十万元的娘们儿一个子也休想！我保证说到做到，不放空炮。别以为我软弱，难道语

言学家就一定软弱？你一定要记住：兔子逼急了也是要咬人的！

哥们儿，你也不能老躲着不见人呀。这也不是个办法。你知不知道，这本书出问题了。上面说我们出版社出的这本书完全是妖言惑众。出版社很可能要遭到我们时代的高等法院的解散。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我现在担负着乌有出版社生死存亡的巨大责任。上午我们开过会，商量过对策。大家一致同意应该牺牲你。毕竟你只是个自由职业者，又不是考古学家，所以大家选来选去，还只有你最合适。归根到底，的确是你的书在妖言惑众嘛，我们出版社顶多只是犯了见钱眼开的错误——见钱眼开其实根本就不算个错误。所以在这一点上你就不用反驳我了。做这本书的点子确实是我出的，但现在你已经没有证据了。我们咨询过律师，律师告诉我们，在我们时代，口说的证据不算。你必须要给我回一个电话，到底同不同意牺牲自己。——我预先给你通知一声，我觉得这一点你就不要有什么意见了。作为你多年的老朋友，为你打算，我觉得这是一桩空手套白狼的好买卖：牺牲了你，你在道德上就顿时生猛起来了，你在圈内也会拥有极高的名声。我们也会到处传诵你的美德。何况留得青山在，也不怕没柴烧，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只要有了好名声，金钱美女以后就是大大的。不捞白不捞呀，哥们儿，反正你到目前为止什么也没有。我知道你一直都是条好汉，小时候玩游戏，只有你愿意为我分忧，装扮座山雕，自愿等着杨子荣骑在你的脖子上拉屎拉尿，还顺带敲击你的脑袋。那也是免费的呀。我们都很感动。所以你一贯都是个把苦头留给自己吃的人。所以这一回也要全看你了。我代表乌有出版社全体同仁的饭碗和脑袋求你了。你就干脆再让我感动一次嘛。顺便说一句：你小子行呀，真没想到偷偷摸摸就弄了娘们儿，还玩起了二踢腿，

一炮双响。我原来还以为你没有开过斋，哪知你这么狡猾，把我都骗了，佩服。（这张条子看完后马上焚毁！切记！）

我就是你说的那些面色苍白的寻宝者中的一个！他娘的，我，我们，找了你很久，原来你躲在这个乌龟洞里！我原先是一个白领，也就是你屡次攻击过的矫情的小资产阶级，（我他妈就是矫情，又碍了你狗日的什么事情？）但现在我的所有财产都没有了，还受到了你的广泛奚落。真是笑里藏刀啊，你的语言比那些考古学家还要恶毒！你他妈到底还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在那篇狗屁序言里，你还说你的同情心多得用不完了。但它在哪里？我怎么就没有看见？我跟你说，我现在非收拾你不可，我的手心早就痒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你有什么资格讽刺我们这些寻宝者，你皮里阳秋地究竟想干什么？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我们脸色苍白的？难道你就没有苍白过？你把自己当成什么大人物了，以为有资格讽刺我们？其实，你算个什么东西呀，顶多是一个穷酸文人而已！我代表我的同伴们正式警告你：赶快通知乌有出版社，毁掉你的那本破书！否则，我们就要到出版社门前去游行。我们现在不准备到法庭告你了——法庭没有他妈的一点用处，我们现在只想要你的一条小腿下酒，以泄心头之恨。我们的口号是：舍得一身剐，敢把你拉下马！告诉你，反正我们已经是穷光蛋了，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是时间找你。我们是趁着索赔的官司的间歇来找你的。官司有多漫长，你的麻烦就有多漫长，你就时刻准备着上下而求索吧……

原来那些控告我们的人比我们还先找到你。告诉你，我们就是你讽刺过的考古学家，你在那篇狗屁序言里把我们讽刺得太厉害了。我们是来向你提出抗议的！我们有你说的那么愚蠢吗？我们有你说的那么无聊

吗？你败坏了我们的形象，你该当何罪？你这种无耻文人，除了嘲笑被炸断了腿的同类（即我等），究竟还有没有别的本事？比如说，你敢讽刺那些街头拉客的小女人吗？所以说你是我们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败类，幸好我们眼睛雪亮，早就开除了你。怀恨在心了吧？痛苦不堪了吧？乘机报复了吧？告诉你，败类！反正我们现在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我们中的一些朋友已经牺牲了，还有的已经流亡到海外去了，有家难回。我们考古学家联盟正在经受前所未遇的考验，这个考验就是你带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你，必须要把你拴到我们的裤腰带上，在必要的当口同归于尽，共赴黄泉盛宴。凭什么你那本破书能赚钱，而我们就得上法庭？你仔细想想，你那些钱难道不正是喝了我们的血吗？告诉你！天底下没有那样的好事，我们也不是好惹的。你躲得过十五，躲不过初一。我们还要来的！告诉你，你的住所现在已经被我们的人监视起来了，反正我们早就被监视了，你自己也知道，被监视在我们时代是个什么意思！

我是《乌有日报》的记者季小贞，我是通过上一回电话采访你时你留下的电话号码，才查到你住在这里的。这是我近年来第一次外出采访。你真牛 B 呀，哥们儿，竟然能劳动我亲自出马。我确实对你有很大的兴趣。我本想打你个措手不及，但很遗憾，你居然不在，居然从这么高的楼上下去了。不过，我的收获也不小。我看到了你的留言袋里的所有留言。你又给我带来了好运气，我要谢谢你，这回我真的又有猛料了。很猛很猛的料。你就等着看《乌有日报》明天第四版上的专文吧。从明天起，你就是一个名人了。提前一天恭喜你，做个好梦吧。顺便说一句，上一次你说你有一个贤惠的老婆，现在看来你在吹牛。根据我现在的判断，你连丈母娘还不知道在哪里。为了报答你给我提供的好运气，我给

你提个建议，给你免费指出一条光明大道：给你留言的那两个女人都不能要，她们都是母夜叉，她们会吸干你的骨髓的。哥们儿，根据我的经验，离这样的娘们儿越远越好，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她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吸血鬼……

你在哪里？我的心肝。我是做完今天的版面才赶来的。子虚先生又给了我新的任务，所以我时间有限，想先来速战速决然后立马回去应差。难道我来晚了吗？速速回来吧，亲爱的，我要你，我等着你——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恭候你。给你半个小时时间，要是不来，我们就彻底拜拜。

王老师，我叫李巫来，基本上算是你的崇拜者。你的书写得太好了。尤其是那篇序言，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啊。我对我的同学们说，好，狗日的确实是太好了——在我自己的语境中，那三个看起来是骂你的文字实际上是对你的无上表扬。长话短说，我是乌有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我想和你探讨你那本书中的“正文”部分。我带来了一篇有关“正文”部分的论文，是从神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文学、考古学、哲学、烹饪学、嫖学、人类学、裁缝学、形而上学等各个角度进行综合分析的。希望能得到你的指点。很遗憾你不在，我只好将文章放在你的留言袋里。你看了之后，请能给我回个话。十万火急！我的电话号码写在文章的最后一页上。十分盼望能得到你的指点。十分欢迎你灌水。最欢迎你的书在再版时能够把我的文章作为附录收进去。我的文章的风格和你那本书的风格很一致，不影响你的书的整体质量。求求你了，我马上要毕业，但我校规定在博士论文答辩前必须要发表两篇论文，到现在为止，我还一篇都没发表过。求求你了，看在这个狗日的人妖颠倒的时

代的份上，救我一把……

四、审讯笔录

姓名？

王堪夜。

年纪？

不知道，让我想想。

年纪？

三十有五。

职业？

无业游民。

职业！

自由职业者。

你为什么要妖言惑众？

我向毛主席保证我没有……

到这里来你向我们保证就是了，听清楚了没有？

听……听清楚了。

为什么要编造一本永远不会诞生的书？那是一本什么书？你狗日的居心何在？

我没有编造。我确实去过那个地方。我请求你能不能说话文明点……

什么叫文明我们肯定比你懂得多。我们认为这就是文明！少转移话

题。把你的狗眼睁大点！现在你看看这些照片，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山洞，上面早就住满了人。你所说的山洞在哪里？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

我？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确实去过那个地方。我向你保证。

还敢抵赖？告诉你，我们说没有那个地方就是没有那个地方，我希望你最好是放规矩点，要充分明白自己的身份。

我明白，我明白。我没有去过，我是在妖言惑众。

很正确。说说你的动机！

我想赚一笔钱，序言里边已经写清楚了。我一贯都很诚实，从不骗人，更不敢骗你。

从不骗人？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嘛。关于你是否骗了人，等会儿再和你理论。先说赚钱的事情。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犯法的？是作奸犯科？你给我们时代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带来了多大的麻烦，你给本法院带来了多少麻烦，你知不知道？难道你妖言惑众就不是骗人？

刚开始不知道，现在总算有点知道了。谢谢你的教育。但我犯了什么法？

还不老实！

可是首先说自己去过山洞的人是考古学家，他们的文章都比我早发表，我顶多只能算从犯。你们也不能专拿软柿子捏呀……

放屁！考古学家犯了罪我们照样要收拾！对我们来说，你们都是柿子。但人家是为着一个高尚的时代目的去那个地方的，是为了给我们时代作贡献！你算个什么东西，敢攀咬人家考古学家，难道人家和你一样……

那您的意思是指山洞又是存在的了？

大胆！我这样说过吗？这个问题是你能问的吗？你以为你在哪里？

我在局子里。法官大人，求你明察，我确实是被他妈的考古学家害了。

规矩点！你这是咎由自取！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考古学家怎么就害了你？为什么没有害到我头上？

你……你伟大嘛。

你敢讽刺我？

没，没。我是说，他们是拉我垫背的，我上他们的当了。连你也上他们的当了。他们都是戴眼镜的毒蛇！

你这是在影射我们弱智吗？

不敢！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他妈这是怎么说的？

谅你也不敢。先饶了你这一回。不过，我还是要提请书记员记下你侮辱本官的犯罪事实。我劝你不要管考古学家的事情，他们有别人收拾，还轮不到我们。你只说你的罪行！

我的罪行就是写了一本破书。我承认是见钱眼开，我确实穷得叮当响，我需要钱。难道见钱眼开最近成了罪行了？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法律嘛。

谁说见钱眼开成了罪行？这可是你说的。你的罪行不在见钱眼开上。——看你交代罪行态度不错，给你解释这么一句。但下不为例！继续交代！

其他就没什么了。

真的没有？

真的。

好，我给你看一件东西。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

留言条嘛。

谁的留言条？

我怎么知道。

你！掌嘴！

哎哟，我知道了，是我门上的。

承认了就好。具体内容我就不念了。你听好了，经我们初步查证，你犯有如下罪行：你至少和两个女人有染，还把其中一个的肚皮都搞大了，所以你犯了流氓罪和重婚罪；你根本没有去过那个山洞，所以你犯了妖言惑众罪；由于你的卑鄙行为，已经把一些喜欢猎奇的博士生拉下了水，所以你还犯有教唆罪。

我是在谈恋爱，我连婚都没结，怎么就犯了重婚罪？我爱她们……

哦？你说什么？

我还没结婚，我爱她们……

放屁，什么叫爱“她们”？你这种东西也好意思说爱？恋爱有你那么谈的吗？至于你是不是犯了重婚罪，我们会给你出示相关文件——现在又有新规定了。你认不认罪？

……

嗯？

求你救救我吧。救救我！我认罪伏法，我认罪。我现在交代是不是可以算自首？

法律是公正的，你说吧。

我和三个女人发生过关系，一个是语言学家，一个是武术家，还有

一个是《乌有日报》的记者。她们都长得丑陋不堪，送给你你也不要……

你狗日的可以啊，一个无业游民，怎么上手的？

我现在不大想得起来了。

那就掌嘴，给他清醒清醒！

别，别，我说，我说，我他妈全说。对语言学家我冒充诗人，对武术家我冒充考古学家——武术家没什么文化，很佩服有文化的人，对记者我冒充企业家……反正她们都没人要，所以即使她们后来明知我是假的，也要和我在一起，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纯粹是被逼无奈，上船容易下船难嘛。

你狗日的倒成了受害者。你是怎么装扮的，等会儿在号子里详细写出来——进了这道门，出去就没那么容易。现在继续交代你的其他罪行！

我没去过那个山洞。但我觉得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肯定有利可图，就写了一本书。没想到犯了罪——我已经交代了嘛。我法制观念淡薄，求你念在我初犯的份上饶了我。

这个我们可以考虑，但你也得给我们一点什么才行。

我想揭发一些人，你看可不可以？这可不可以算立功？

说！

这本书的最初创意者是乌有出版社的编辑王向洪，和我从小一块儿长大的。这个家伙不是个东西，从小就欺负我，他让我写这本书，我也不敢不写，他是他妈的黑社会。身上手枪都有三支。但他说他是看我太穷了，才给我出这个主意的。我瞎了眼，没有来得及防范这个白眼狼。并且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的语言学家情人也在旁边随声附和。她鼓励我写，说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事情。我现在估计她和王向洪有一腿，合

伙来修理我。对，肯定有一腿！我觉得他们也有罪！

我们会找他们的。好吧，今天就先审到这里。画押。画圆点！

能不能问一句：我会判几年？

这不是你现在能知道的。要看你的表现。你到牢里安心等待通知吧，也顺便把你如何勾引女人的经过写出来，我们要仔细甄别，也许可以给你减几天刑。

谢谢你，你是我的再生父母。

这是你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滚吧。

我可以走了？

滚吧！

五、《最高法院关于〈一本永远不会诞生的书〉的最后结论》（摘录）

……本时代最高法院经本时代授权，谨代表我们时代宣判一批犯罪分子。判决如下：

一、王犯堪夜，犯有流氓罪、妖言惑众罪、重婚罪、教唆罪和破坏安定团结罪以及间接杀人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

二、王犯向洪，犯有反时代煽动罪，判有期徒刑一百年；

三、李犯巫来，犯有反时代宣传罪，判有期徒刑五十年；

四、季犯小贞，犯有反时代宣传罪，但认罪伏法态度无比端正，主动投案自首，并当庭认主审法官为干爹，所以暂不追究刑事责任，留本时代查看，但《乌有日报》将对其永不续用；

五、考古学家联盟，犯有胡乱考证罪、妖言惑众罪和胡乱建设理论体系罪以及破坏他人财产罪，判处所有考古学家终身不许从事考古工作，本院另行培养新的考古学家，组建新的联盟；

六、解散乌有出版社，另行组建新的出版机构，直接归属本法院管辖；

七、给《乌有日报》记大过处分，停刊半年进行整顿，以观后效。

钦此！

2002 年 5 月 7 日，北京丰益桥初稿
2002 年 11 月 8 日—10 日，北京丰益桥二稿

隆庆府当代哲学小史

如此江山快人意，满船载酒下潼川。

——汪元量

楔子

这部哲学“小史”的本意，是想将隆庆府的当代哲学家一网打尽，将他们的思想尽收囊中。但鉴于隆庆府的哲学家已臻至多如牛毛的境地，这部小史的“宏愿”无论如何都难以实现。按照隆庆府政治哲学大师、隆庆大学伙食科王浴盆副科长的看法，隆庆府现在确实已经进入了思想多元的“全球化”时代。除了大家一致同意“所有人都喜欢干点床上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哲学学说，能得到哪怕两个哲学家的认同。因此，这部小史的区区“本意”要想实现，必须马上面对一个既简单又严峻的数学问题：隆庆府的男女老少、鳏寡孤独、良民歹徒、酒鬼疯子、妓女嫖客、流氓无赖……加起来有300万之众，即使每十人中才出一个哲学家，也至少有30万人。就算王浴盆的看法是真实的，也至少得有299999种哲学学说。要把这么多观点一网打尽，“小史”也就要进化为超级“巨史”了。

隆庆府每一位当代哲学家都不止拥有一种哲学观点。即使王浴盆所谓“所有人都喜欢干点床上的事情”，也不见得人人都赞同。著名哲学家，隆庆府人事局路一达局长的专职小车司机季明生，就持完全相反的看法。

季明生专门列举了几个熟人为例，借以讽刺和打击王浴盆的哲学肾脏："比如聂峰兵（男）、吕翠英（女）就不喜欢床上的事情。"他在一次哲学酒局上，曾嬉笑怒骂地发表过一通攻击王浴盆的言论："既然聂峰兵、吕翠英不喜欢床上的事情，王先生又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哲学屁眼呢？"

王浴盆的反驳以及季明生的反反驳，不适合在"楔子"里谈论。我想说的仅仅是，季司机确实道出了实情。凡是去过隆庆府的人，都会发现隆庆府的一大奇观：哲学市场。每逢 2、5、8（即每月的 2 号、5 号、8 号、12 号、15 号、18 号、22 号、25 号、28 号），在隆庆府每一个型号不同的城镇上，和猪市相邻的必定是哲市（即"哲学市场"）。伴随着猪市上的讨价还价声、猪叫声，哲市上也充满了讨价还价声、哲叫声（即"哲学家的叫声"）。和猪叫声一样，哲叫声中也包含了惨叫、快乐的叫，甚至不明不白、意味深长的叫。相邻的猪市一般情况下是用货币计算价格；与此大为不同，先前的哲市主要是以物易物，即用一种学说换取另一种学说。但同样要讲究个等价交换。和全球化相适应，隆庆府如今也进化到了市场经济的新时代，哲市自然也不能免俗。当代以来，隆庆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哲市。但为着"楔子"的通常目的，我要说的仅仅是：每逢 2、5、8 的哲学市场上，几乎齐集了隆庆府所有的哲学家。来哲市的人的主要目的，无非是提取自己最需要的东西：人缺少什么，当然就要购买什么。因为我们发明的哲学理念被认为总是不够用。哲市就这样应运而生。有上述铁板钉钉的事实撑腰，我们可以放胆下个结论：在隆庆府，确实如季明生所说，每一个哲学家都不止拥有一种学说。

这就给我这本小史的区区"本意"，增添了几乎无穷无尽的麻烦。在此，有必要遵照实用主义者赵小松先生的教诲：既然是写小史，就应该知趣

地把“小史”放在第一位。没有必要“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地梦想什么“巨史”。何况这部小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我的副教授职称能够早日搞定，大可不必面面俱到。在这种鸡狗不能同圈，王浴盆、季明生不能同床的情况下，放弃“一网打尽”的雄心，也就情有可原。好在“新可原主义”的创始人唐红女士，也从方法论的角度，给我提供了可以这样做的充分理由：在市场经济时代，什么都可以理解，他妈的阿Q动得，姑奶奶也动得！唐哲学家善解人意的理论，在这里满可以庸俗化地理解为：评职称需要专著，犹如老光棍急需泻火的靶子，容不得在三围、苗条或所谓的全面性上，搞什么穷讲究。所有副教授都是这么上去的，为什么我就不可以这么上去？因此，这本小史只能记录一些于我的职称评定有利的学说。否则，根本就不可能出版。三三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牛勇增先生说得好，不能出版，你小子的职称就一定要泡汤。更为严重的后果，来自于三三主义式的推理：在只有哲学造诣深厚才能吃香喝辣、大肠端部冒油的隆庆府，评不上副教授，就意味着找不到老婆；找不到老婆，那就只好天天去喝西北风了。

隆庆府的哲学遗产

隆庆府位于地球北部。在全球地图上，仅占有兔子的尿道那么狭窄的一块面积。但它名声极大，以盛产酸菜、醋坛子和哲学家闻名全球。按照《隆庆府通史》的记载，隆庆府从八万年前，就开始致力于哲学体系的构造。这就是说，后来被称作“哲学机器”的日耳曼人，还在忙于进化、还在为直立行走大伤脑筋的时候，隆庆府就有了哲学。它应该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哲学的发源地。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学通史时，基本上都以“米利都的泰勒斯”来开篇。这只能证明：那些皮肤苍白的西方人既无知，又妄自尊大。大脑袋哲学家牛勇增就曾严肃地考证过，泰勒斯根本就不配成为全地球第一个哲学家，即使是他的著名学说“世界是睾丸组成的”，也不是他的发明。牛勇增说得很明白，泰勒斯的学说完全偷自隆庆府。而且他偷窃的还不是隆庆府最早的哲学，更不是最好的哲学。他偷去的只是隆庆府视若敝帚的玩意儿。听牛哲学家论证说，那玩意儿有点类似于隆庆府人民吃鸡时扔掉的鸡屁股。牛先生还有一个重要推论，特别值得转述：泰勒斯既是西方最早的哲学家，又是一个哲学小偷，因此全部西方哲学就都是盗贼的产物，盗贼的产物当然只能催生出强盗哲学。牛先生甩开膀子，动用了最先进的考古手段和思想侦破仪器，如此这般地操作了一番，终于挖掘出了强盗哲学的精髓：强权有理，偷窃无罪。季明生对牛氏的推理持热烈欢迎的态度，并以一个小车司机特有的哲学语言，表达了对牛氏推理的高度首肯：“他（即牛勇增——引者注）把西方人挺着老二到处乱戳的秘密，全部暴露个球了。”

有着八万年辉煌历史的隆庆府，为当代哲学留下了许多遗产。限于篇幅和题旨，这里只讲至关重要的两件宝贝。第一是逻辑学。隆庆府古哲学的秘密，都蕴藏在它的逻辑学中。该逻辑学特别擅长在两件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间找到联系；在醉醺醺的巅峰状态，它还能将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完全等同起来，比如，眼睛就是肝脏，猪腰就是人腰，心灵位于胃部的幽门处。前猪市管理员、著名逻辑实证主义者严体勇，就曾经礼赞过逻辑学。为了卖弄学问和深刻度，此人还不无得意地指出：“说‘心灵位于幽门’，除了有些以偏概全之外，什么错误也没有。因为心灵就

是胃部。”该逻辑学还有一个特征，就是特别强调精确性。隆庆府逻辑学的集大成者，伟大的古代哲学家罗里老夫子就认为，逻辑学应该“精确得像鸟，而不是精确得像羽毛”。

第二大遗产是物质可灭理论。这个理论非常古老。据十卷本的《隆庆府古代哲学史》介绍，该理论成型于五万年前；成型之前，还有过一段漫长的准备期。虽然在历史上，物质可灭理论有很多修正主义观点，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基本要义仍然是：任何一种物质都有它的出生、成长、婚配、高潮、衰落和灭亡。这一理论初看起来至为简单，但对隆庆府关系重大，因为它教导所有的隆庆府人民，既然任何物质都不免于灭亡的命运，那任何物质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及时行乐就成为头等大事。这一点，既可以解释为什么隆庆府每一个村子都有夜总会，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哲市会那么兴盛。

这里有必要插入一段哲学逸事。《隆庆日报》记者、最近声誉渐隆的哲学新秀朱斗拱，有一次前往偏僻之极的庆祝村采访。多年来，这个村子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通知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安全基本靠狗，娱乐基本靠手。酒足饭饱之后，朱斗拱被安排到村子里的夜总会“娱乐”。和其他村子一样，这个只有三百人的小村子也有一家夜总会。夜总会的镇山之宝是七名“小姐”。她们都是村子里的大嫂：白天下地劳动，任劳任怨；晚上到夜总会上班，也非常敬业。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照她们的话说，她们这样做并不只是图钱，也有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的意思。朱斗拱刚坐在夜总会摇摇晃晃的破椅子上，一个快有四十岁的胖大嫂就笑眯眯地走了过来，问：“先生需不需要服务？”朱斗拱秉承物质可灭理论的基本精神，说：“当然需要。”“小姐”于是放开

缰绳，非常豪放地拉着朱记者的手说：“先生的皮肤真细呀，完全不像劳动人民的手。”接下来人人都可以想象的事情就不讲了。我只想指出一点：在那一夜之后，哲学又被提升了一个档次。因为皮肤细腻的朱斗拱在和那个皮肤粗糙的大嫂云雨之后，陡然悟出了一个真理，竟然把古老的物质可灭理论提到了一个新高度——究竟是什么样的高度，本书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详细道来。在此，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朱记者是秉承物质可灭理论的古老教诲，才去和比他大十几岁的大嫂云雨的，而云雨之后又让朱记者发展了物质可灭理论。这就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循环。实际上，隆庆府的诸多哲学体系，就是这样鬼使神差被发明出来的。

至于哲市的兴盛也可以从物质可灭理论那里得到解释，盖因为哲学也是物质，起码也是物质的特殊形式，所以也有灭亡的一天。因为哲学学说也在“可灭”之列，就应该不断创造新体系。哲市的兴盛，有一大半原因是：众哲学家生怕自己的理论来不及公之于众，就胎死腹中。这无疑暗示了：许多学说被创建出来，仅仅是为了证明物质可灭理论的伟大。哲市就是出于对灭亡的高度恐惧，才被迫采取的防卫措施。

它的确是一种正当防卫。

哲（学）市（场）

在“小史”的正文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隆庆府多年来长盛不衰的哲市。让我们先从哲市的“市场规则”谈起：

1.进入哲市的任何学说，必须经过质检部门的检查，不得私自将任何易燃、易爆和长有病毒的学说带入市场，违者将终生不得进入哲市。2.凡发现易燃、易爆品者，必须举报。但要注意保密，以免打草惊蛇。3.交

易力求公平、公正、公开，不得私下交易，不得缺斤短两。4.原则上只允许争论，不允许斗殴。但考虑到真理愈辩愈明的原则，在特殊情况下，允许部分人斗殴。但斗殴前须向市场管理部门申请。申请的内容包括：用什么器械斗殴，准备攻击对方什么部位，准备攻击到什么程度，准备攻击多长时间等。私下斗殴者除了要被赶出哲市外，双方全部学说将被没收，上缴府库。5.市场内严禁燃放烟花爆竹，即使卖了好价钱也不允许，以免引起其他学说持有者的不满，从而引发不稳定因素。6.坚决打击市场垄断，坚决打击欺行霸市，坚决打击哄抬物价。7.市场内严禁放屁，严禁大小便。哲学是神圣的，哲市是不容亵渎的。

上述规定是用五条大腿、十根胳膊、十四条肋骨、无数头发、二十只耳朵……换来的。据《当代隆庆府哲市小志》记载，以前的哲市可以随意出入，还缺乏严格的管理制度，以致无数有病毒的学说在哲市上大行其道，易燃、易爆品层出不穷。打架斗殴十分频繁。甚至一度出现了市场垄断，某几种学说竟然渐渐成为霸主，并随意哄抬物价。黑势力也曾十分猖獗。据不完全统计，最近十年来，在几任太守的亲自指挥下，乱棒打灭了上百个犯罪分子，捣毁了上百个造假窝点，取消了五种罪大恶极的哲学学说的垄断地位。在太守们的亲自过问下，才制定出严格的市场规则，也才算给了哲市一块太平天地。

与哲学在古代遇到的情形大为不同，当代隆庆府哲学已经进入到了市场经济的新阶段。哲学体系的创制也受到了市场规律的左右。各种体系相继登场，从前闻所未闻的哲学学说更是层出不穷。为了加强市场竞争力，许多哲学家使出了浑身解数，力求在新、奇、险、怪方面弄出新意。有些哲学家甚至利欲熏心，居然在体系的隐蔽部位故意夹带病毒。易燃、

易爆品大有抬头的迹象。本书只是一部哲学小史，没有必要叙述有关部门的相应措施。我只想提醒读者：一、有关部门从来都不是吃素的；二、本书在介绍当代隆庆府的主要哲学学说时，已经将市场经济的影响预先考虑进去了。

数十年来，市场管理部门每天都要登出销售排行榜。本书将要一一介绍的各种哲学学说，基本上来自于哲市的销售排行榜。具体做法是：首先找出最近五十年各哲市排行榜的前十名，本着第一名10分、第二名9分……第十名1分的计算方法，求出一个历年排行榜的得分表。五十年来排名前十八名的学说，将构成本书的正文部分。需要说明的是，排行榜的操作过程，始终处于太守们的直接领导之下，本书介绍的学说都是合法的，不会对大好局面造成任何不良影响。假如造成了不良影响，责任肯定不在我。如果考虑到市场规律对哲学体系的毒害作用，如果再考虑到质检部门的某些人和某些利欲熏心的哲学家沆瀣一气，故意让有毒的体系进入哲市，甚至心怀不轨地让易燃、易爆品进入“排行榜”，破坏大好局面的责任就更不在我了。

王浴盆的政治哲学

王浴盆今年五十八岁，在隆大伙食科副科长的位置上已经一坐三十余年，屁股上的死茧已经厚达五公分。但此人是一位天才的政治哲学家，到目前为止，其政治哲学已经造就了七位太守，同时也让其中的六位丢掉了宝座。按照规律，第七位丢掉宝座只是个时间问题，而第八位肯定正在自我酝酿、自我发酵之中。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每一个遵照王浴盆的政治哲学施政的副太守，都能迅速成为正太守。但作为一个政治哲

学家，王浴盆的创造力未免过于亢奋——他确实患有甲状腺肿大症，往往前一位太守才上去，他已经创造出了另一套政治哲学，而早已等候在旁的副太守便迫不及待地将之付诸实践。那个倒霉的正太守就这样当即人仰马翻了。现在，隆庆府流传着一句广为人知的谚语，和王浴盆及其政治哲学密切相关："成也王浴败也盆。"新近被发明出来的另一句谚语是："上帝不存在，但浴盆是魔鬼。"据说，这句在哲学界渐为人知的谚语，是一位刚被打翻在地口吐白沫的太守发出的呻吟。

由于王浴盆哲学功夫实在了得，而且杀伤力极大，所以，依照王氏政治哲学行事的任何一位太守，都对他又敬又恨又怕，故而他也就悲剧性地在副科长的位置上一坐三十余年。说起王浴盆的副科长职位，还得力于他的政治哲学造就的第一位太守。此人为了感谢王浴盆，力排众议，将后者从哲市的保洁员，直接提拔为隆大伙食科的副科长——一个肛门冒油的肥缺。扬眉吐气、走马上任的王浴盆年轻气盛，随着甲状腺的不断肿大，哲学兴趣也空前嚣张。不到一年，又创造出了一套新崭崭、水灵灵的政治哲学。也就是说，提拔王浴盆当副科长的太守，在太守的宝座上还没有赖到一年，就被副太守取代了。现在，王浴盆把肠子都悔青了：如果当年稍微扼制一下创造哲学体系的冲动和热情，让那位太守在宝座上多待几年，说不定他早就是处长了。因为新上任的太守虽然对他礼遇有加，甚至还给他颁发了"隆庆府超级哲精"的锦旗，但再也没有提拔他的任何兴趣。王浴盆明白了个中猫腻之后，大呼冤枉，也明显放慢了勃起的节奏。但无奈声名远扬，别说处长，恐怕正科长也不是这辈子的事情了。王浴盆虽然精通政治哲学，也力求按市场规律办事，但到底医不自治。这也算是害人终害己的一个实例吧。

在全地球上，最重要的哲学自始至终都是政治哲学。五万年前，罗里老夫子就教导我们：人是会笑的动物，但更是政治的动物。所谓政治，就是一个人倒台，另一个人上台；或者一群人倒血霉，另一群人吉星高照。快乐的总量是一个常数，但总有一些不自觉的人喜欢多吃多占。政治就是这种现象的直接表达。换句话说，所谓政治，无非是打倒和雄起的不断变奏。

无论政治哲学思想如何多元，修正主义方式如何繁多，归根到底只有两大类：正太守哲学和副太守哲学，也可以简称为正哲学和副哲学。正哲学的目的，无非是正太守在拼命维护自己的地位时，提供出正确的理论依据；副哲学的目的，则始终是让正太守尽快下台，副太守尽快顶上。一个高明的政治哲学家在创造体系时，必须要牢记两条准则：第一，创体系如烹小鲜；第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个优秀的政治哲学家要坚信：坐在太守位置上的那个家伙，一定不是太守的最佳人选。只有这样，才有更高的目标供有志于篡位者追求。政治哲学家的最初目的，就是要通过促成一个人上台、一个人倒台，来促成政治交响乐的完美实现。

任何一个想创造政治哲学体系的人，一定要作好下地狱的思想准备。出于对一个更高、更伟大的目标的呼应，任何一个想创造政治哲学体系的人，都必然遭人嫉恨，尤其是遭受正太守的嫉恨。但这恰好是我辈政治哲学家的天职。政治哲学是一门伟大的科学。站在政治哲学的入口处，也就相当于站在了地狱的幽门处。

蒲周哼的护阴理论

蒲周哼是隆庆府财政局司政科科长。作为一个哲学家，蒲周哼的成

就仅仅在于他被逼无奈才发明出来的护阴理论。说起来很有趣，蒲周哼的哲学思想几乎全部起源于他的老婆，隆庆府财政局伙食团的女厨娘。该女厨娘长相优异，乳房硕大，屁股优秀，总而言之算得上一个尤物。女厨娘的最大爱好，据说是一边做饭，一边和男厨师做爱。因此她做的每一个包子都充满了春天。依照哲学界的普遍传闻，到这部小史写到这里为止，她已经睡遍了伙食团所有的男厨师。现在已经开始睡第二轮。每发生一次野合事件，蒲周哼都要和男同案犯战斗一回。也许是拿人手短、吃人口软，所以战斗虽然激烈，但每一次都以蒲科长的胜利而告终。就是在永无休止的战斗中，蒲周哼完善和发展了他的哲学体系。按照目前的势头，蒲周哼的哲学体系有更进一步完善的可能。顺便说一句，护阴理论原名为“护 × 虫理论”。这个名字在哲学界流传久远。隆庆府每一个人都知道，“×”代表女人的“漏洞”；隆庆府的人民群众也都知道，“护 × 虫”的准确意思是：拼命维护女人“漏洞”的人。用“虫”指代“人”，是古隆庆府在语言学上的天才发明之一。本书将“护 × 虫理论”改为“护阴理论”，纯粹是出于清洁学术语言的需要。敬请蒲哲学家谅解区区在下的苦心。

丈夫天然应该成为老婆的“洞主”，老婆也必须永久性地出任丈夫的“棍主”。丈夫的肉体天然就是老婆的疆域；以波巴为代表的老婆的肉体，也必须成为丈夫的法定国土。从各种可能的意义上说，这都是一个绝对的主权问题。因此，任何人就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别人的领土，更不得随意干涉别人的内政。不要以为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就故意分不清国界、府界，就以为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在别人的领地上自由出没。凡是无视别人领土主权的人，凡是妄图分裂别人领土的人，凡是借难民

之名而行偷渡之实的人，一定会遭到正义的还击，一定会遭到双倍的报复。

毛菜的盗墓主义

毛菜是隆庆府著名的无业游民。无业游民而能被冠之以“著名”，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毛菜曾在哲市上亲口宣布过上帝已死；第二，毛菜不仅是盗墓主义的发明者，而且是该学说的忠实实践者。毛菜从小无父无母，全凭在哲市上帮人倒茶维持生计。众哲学家恐怕从来不曾想到，一个卑微的端茶送水者，日后居然会成为隆庆府哲学史上饱受争议的人物。也许在忙于生意时，众哲学家中不曾有任何人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毛菜在端茶送水时，总是尽量多地在哲学铺子里边拖延时间。目的是为了偷窃哲学技艺。当毛菜忍辱负重多年，终于觉得自己已经攒够了钱，也攒够了哲学技艺，可以自己摆摊设点时，如梦方醒的哲学家才大吃一惊。毛菜的铺子甫一开张，就敲锣打鼓。在鼓声余音绕梁之际，毛菜就大声宣布上帝死了。众哲学家对这个学说嗤之以鼻，因为上帝是死是活，跟隆庆府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想到墙内开花墙外香，上帝已死的小道消息，却在西方哲学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骄傲自大的西方哲学界第一次对隆庆府刮目相看，完全是因为毛菜。虽说毛菜为隆庆府争了光、露了鼻子，但众哲学家出于对同行相轻主义的绝对尊重，纷纷认为毛菜纯粹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完全不承认毛菜得自于西方的“荣誉哲学家”头衔。

毛菜的郁闷还不止于此。他的哲学铺子已经开张数月，几十年处心积虑积攒的小钱即将告罄，却仍然没有进项。看到别的铺子日进斗金，毛菜只好恶向胆边生，出人意料地发明了一种绝学：盗墓主义。隆庆府

人民素有祖宗崇拜的嗜好，毛菜这一招可谓阴险之至。他的哲学铺子因此一下子火爆起来，每天都有大把大把的进账。毛菜不仅成了哲市上的暴发户和声名远扬的黑马，也一举成为当代隆庆府哲学史上饱受争议的人物：有人将他奉为教主，更多的人则将他看作万恶之源，因为他的哲学让一部分人大发横财，却让另一部分人的祖坟再也无法冒出青烟。由于毛菜的异端邪说破坏力极大，太守不得不下令将其拘捕，最后迫于压力，只好将他处以极刑。毛菜就这样悲剧性地为真理献了身。噩耗传出，举世震惊。受惠于毛菜的西方哲学界向隆庆府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据说为了纪念毛菜，还专门成立了“毛菜研究会”。这就更让隆庆府哲学界觉得毛菜死有余辜。好在换了几任太守之后，现任太守十分英明，前不久专门颁旨为毛菜平反昭雪。本书也才敢斗胆介绍毛菜的哲学观点。

物质可灭理论早已教导我们，任何东西都有衰亡的一天。但数万年来，隆庆府人民完全没有弄明白物质可灭理论的精髓。祖坟就是对物质可灭理论的直接嘲笑：给一堆完全死亡、早已腐朽的肉体煞有介事地修建房屋，本身就是对物质可灭理论的坚决反动。数万年来，隆庆府哲学界总是这样自相矛盾：一方面坚信物质可灭理论，另一方面却在修建坟茔上热情澎湃，以为有了一个土堆，那堆烂肉就能得到永恒。

任何物质的灭亡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是完全丧失了呼吸和心跳的肉体要完全消亡，也会持续较长时间。这也许就是坟墓可以存在的唯一合理性。祖宗崇拜却因此彻底的错了：既然祖宗被认为总是在保佑我们，那就应该让他们在完全消亡之前，继续为我们服务。有必要把长眠在地下的祖先重新请出来，有必要让他们为后人继续发挥余热：他们的骨头中含有诸多化学元素，可以被提炼；他们尚未腐朽的肉体，可以

做成肉干；他们的后人给他们的陪葬，可以被我们继续使用。

隆庆府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八万年之久，隆庆府人民的繁殖能力几乎和昆虫的繁殖能力持平，所以长眠地下的祖宗人数众多。如果我们将他们一一请出，该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财富。隆庆府财政年年赤字。按照中和反应的基本原理，这笔巨大的财富一定能将赤字完全抵消，使其ph 值接近于中性。他们在地下已经躺够了，早就想重新出山了。他们的后人在他们的坟前叩拜了八万年，该轮到他们为后人重新出力了。

朱斗拱的新物质可灭理论

在本书第二节“隆庆府的哲学遗产”当中，我专门提到过朱斗拱在推进古老的物质可灭理论时，身体力行的英雄事迹。话说朱斗拱开动浑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在庆祝村夜总会那个胖大嫂身上辛勤劳作。他一边享受着正宗肉垫子带来的快乐，一边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发誓要把古老的物质可灭理论推进到底。他不能容忍物质可灭理论的名声败坏在自己手里。猛一个激灵之下，此人仿佛神助般顿有所悟。他顾不上身下人忘我的吹、拉、弹、唱，发狂般从那堆白肉中央挣脱出来，赤身裸体跑出夜总会，并大喊大叫：“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搞得夜总会另外几个没有生意可做的大嫂老脸失色。

朱斗拱翌日一回到报社，同事们就围了过来，纷纷问他究竟发了哪根神经，在庆祝村裤子都不穿，居然挂着空挡大喊大叫，把全体哥们儿的脸都丢尽了。朱斗拱此时仍然处于迷狂状态，不清楚他的同事们究竟在放什么响屁，嘴巴里长了何种型号的痔疮。他只一个劲儿地喃喃自语：“我明白了。我！我！我发了！”

清醒过来的朱斗拱马上辞去了报社的职务，把报社主编，著名的卸磨主义哲学家杨尽显惊得目瞪口呆。朱斗拱不管不顾，当天晚上就摸黑去哲市申请了一个摊位。从第二天一大早，《隆庆日报》前记者就正式开始了职业哲学家的生涯。由于他的学说来得极富传奇色彩，所以摊子边门庭若市。元宝纷纷滚进了腰包。随着朱哲学家的学说越传越远，庆祝村夜总会也声名大振，不少有志于成为哲学家的人纷纷去那里过夜，并点名要那位胖大嫂侍寝。这一天降馅饼的好事，直弄得胖大嫂眉开眼笑。此人的腰包也附带性地肿胀起来。但那家夜总会和那位胖大嫂的灵气，可能早已被朱记者一掠而空，所有前去采精的哲学家候选人竟然无一成功。胖大嫂一开始还感激朱斗拱让她生意兴隆，等她从哲学家候选人口中得知原委后，才如梦方醒。如梦方醒之后，胖大嫂竟然痛哭不已，大骂朱斗拱是个不要脸的小偷："狗日的偷了我的元宝！丧天良的偷了我的元宝！老娘一定要索赔！"

物质既可灭，又不可灭。就看你如何处理了。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掌握变废为宝的技巧。只要处理得当，明日黄花也可以蜕变为昨日黄花。实际上，在古老的物质可灭理论内部，就已经蕴含了这一辩证法。必须要学会废物利用，以便让各种可灭的物质循环起来、流动起来。流水肯定不腐，只要物质从容地循环，所有的物质都可以免于灭亡的悲惨命运。

该辩证法的全部秘诀，就在于对隆庆府祖传的力学理论的精妙运用。必须要从隆庆府祖传的力学理论那里，找到第一推动力；必须要让第一推动力像仙气一样，让看似可灭的物质得到推动，并永无休止地循环下去、流动下去。生命在于运动，物质的生命也在于运动。

物质的循环意味着快感的循环。考虑到物质在反复循环的过程中，

始终在不断磨损，第一推动力又不可轻易获得，因此，所有物质都会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损耗，快感也会逐渐变旧。但这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变旧过程，绝不会有彻底衰亡的那一天。正是古老的物质可灭理论中，蕴藏着的这条真理拯救了我们，拯救了隆庆府：虽说我们的快感在不断变旧，但我们仍然能在享受中一天天生活下去，把偷鸡摸狗和钩心斗角继续下去。当然，从性质上说，这也是日渐变旧的偷鸡摸狗和日渐劳损的钩心斗角。但它们又能在变旧和劳损之中常青常在，永不衰竭。

唐红女士的新可原主义

作为一个裁缝，唐红女士长期默默无闻；但作为一个哲学家，唐红女士却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哲市上，唐女士的哲学也占有不错的份额。应该承认，可原主义并不是唐红女士的独家专利。可原主义在隆庆府有着漫长的历史，唐红女士只不过将可原主义向前推进了一步，并比较适合全球化的需要而已。哲市上曾经出现过严重的市场垄断，古老的可原主义在当代哲学史上有一阵子几乎完全销声匿迹。唐女士因此特别感谢打击过市场垄断的前任太守。正是前任太守的英明果断，才使得默默无闻的唐女士声名大振，也才让头发苍白的可原主义重新受孕。遗憾的是，英明的太守很快就被他的副手取代。唐红女士为了表达对王浴盆的痛恨和对太守的同情，曾主动玉体横陈，让心绪不好的太守免费耕耘。这一举动让后者热泪盈眶，大叹“人心仍古”。唐红女士的丈夫也因此被迫成为护阴理论的初级信奉者。不过，太守虽然倒台，但积威尚存，唐女士的法定“洞主”还是不敢遵照蒲周哼的教导，对“借难民之名行偷渡之实”的前太守予以“双倍的报复”，只好天天

在家痛“扁”唐女士。“洞主”先生因此也就成为护阴理论不彻底的信奉者，遭到了隆庆府人民群众的广泛奚落。唐女士虽然发展了可原主义，但对她的丈夫一点作用也不起。甫一接火，新可原主义就无可置疑地败给了护阴理论。这显然是可原主义在其发展史上的奇耻大辱。因此在哲市上，当同行们不怀好意地问唐女士“您脸上为什么红肿”时，唐女士只好斩钉截铁地说：“他妈的蚊子叮的！”

这是个不能当真的世界，这是个没有真理只有道理的世界。因此，发生任何事情都可以得到理解，都可以得到原谅。只要我们相信人是有局限的动物，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犯错误自始至终是我们的天职。任何人犯任何错误，都可以得到谅解。犯错误的是人，原谅错误的只能是上天。

谁爱得最多，谁受伤害也就最多；谁爱得越深，谁受伤害也就越深。这就是这个世界的逻辑。只有犯错误才能让我们免受伤害。如果爱本身就是错误，那伤害就不是。

我们苟且偷生在这个虚幻的世界上。我们都不过是一具具可以移动的影子，没有实质，没有内容。我们犯下的错误，我们的所谓失误，也都是空洞的、虚幻的。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没有犯错误的能力。我们犯下的错误，也不叫错误，只不过我们的语言太无能了，只好给它们取了一个叫“错误”的名字而已。

严体勇的逻辑实证主义

严体勇曾经是猪市的一般管理人员，现在是隆庆府著名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严体勇从猪市管理员跃迁、裂变为哲学家，仰仗的是冥冥之中的某种神秘因素。二十年前的某一天，正是公猪思念母猪、母牛想念公牛的大好时节。

猪市中一头未阉的公猪看上了一头十分漂亮、也同样未阉的母猪。正当公猪准备有所表示，那头母猪已经成功转手，并随新主人向猪市门口走去。考虑到过了这村就没有那店，公猪情急之下挣脱主人的管辖，挺着笔直的标枪，箭一样直赴门口。一时间猪市大乱。研究哲学史的学者后来才发现，公猪偶然的失态，竟然引发了隆庆府哲学格局的重大变化。这当然是后话。现在还说猪市。作为管理人员，严体勇对公猪公然违背道德规则和市场规则的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提着既可以敲打猪卵又可以敲打人卵的警棍，怒不可遏地追了出去。对自己的力比多完全无能为力的那两头猪，丝毫没有顾忌严管理员的情绪，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调起情来。但见不要脸的公母二猪哼着急促的小调，穿过爱情的田野，一溜小跑，进了只有一墙之隔的哲市。众哲学家都在忙于讨价还价，忙于推销产品，猛一看见两头怪物，如同意外窥见了哲学体系中不怀好意的逻辑框架，居然都手脚无措。哲市因此大乱。公猪看到有这么多人在观看它的表演，一时兴起，掀翻了毛菜的铺子。母猪不甘落后，当即掀翻了季明生的铺子。然后它们对视一眼，分头行动，相继掀翻了聂峰兵的铺子、蒲周哼的铺子，接下来是牛勇增的铺子、王浴盆的铺子。到了唐红的铺子时，却不掀了。公猪直勾勾地盯着唐女士散发着新可原主义气味的肥硕屁股，浑身筛糠。母猪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它先掀翻唐女士的铺子，然后一下子拱翻了忘情的公猪，然后一路怪叫跑出了哲市。

作为对哲学药引子的描述，猪的传奇就介绍到这里。现在继续谈论哲学。由于公猪的偶然失态，严体勇得以见识众哲学家的做派。作为一个出卖体力和依靠纪律为生的人，严体勇一向瞧不起哲市中的各色人等。看到众哲学家一个个活得光滑、剔透、入口化渣又肥而不腻，严体勇曾经大惑不解：这些五谷不分、不事稼穑的家伙究竟是凭什么？由于公母两猪的引导，严体勇第

一次开了眼界：唐哲学家像包中药一样，随便用几张草纸捆住了几句活蹦乱跳的话，对着纸包念了几句咒语，那纸包就平静下来了。一千块钱也就这样到手了。严体勇仿佛被五雷轰顶，惊得目瞪口呆，浑身发抖，当即脱去制服，扔掉警棍，倒头拜向了唐女士。他希望后者能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秘诀传授给他，而他严体勇一定能够做到致富思源，坚决不会忘记挖井人。

逻辑实证主义是隆庆府逻辑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新逻辑学将从此开始。美好的哲学生活将从此开始。逻辑实证主义的精义，不是要证明两件互不搭界的事物从面貌到骨髓都一样，也不是要证明世界存在。恰恰相反，它要坚决证明世界不存在。复杂的逻辑形式、逻辑演算此处就不详谈了。逻辑实证主义要说的是：如果一次实证不足以证明世界不存在，那就继续实证下去，总有一天会证明出世界不存在。逻辑实证主义严格遵循数学上的微分原理，从最低的层次上说，也要遵循罗里老夫子发明出来的古来方法：一尺之棒，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当然，火候一到，它也就不得不竭了。这就是说，每实证一次，世界只剩下原先的一半。实证的次数达到一定数量，世界就完全消失了。当然消失了的，还有谣言、诽谤、猪市、哲市、太守和哲学本身；消失了的，还有我们的肉身、思想、力比多和欲望——这些万恶之源。

牛勇增的三三主义

牛勇增的脑袋占整个身体的三分之一，眼睛凸出，牙齿的性格外向、奔放，所以经常会让不少哲学家的胳膊、嘴唇以及大腿拐弯处挂彩。总之，牛先生属于异人异禀之列。他发明的三三主义确实称得上无中生有。也就是说，牛哲学家在没有任何先例、没有任何参照系的情况下，凭借

着硕大的脑袋，发明了一整套全新的哲学。可能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牛先生的学说在哲市上几乎无人问津。牛哲学家脑袋大，其哲学也因此显得迂阔、高远；牛勇增的牙齿外向、奔放，其哲学因此极具攻击力。这也就是牛勇增虽然名声显赫，却生意不好的内在原因。曲高和寡，在隆庆府八万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素来如此。即使伟大如罗子者，也要在他死去五百年后才被追认为大哲学家。牛勇增无奈之下，也只好以罗子为镜，如此这般地安慰自己。

应该说，牛哲学家的自我安慰不无道理。现在，牛哲学家已经从哲市撤退出来，隐居在芸芸众生之中。如果你在街边、小巷，有时甚至是在田间、地头，看见一个人拖着一颗巨大的脑袋，时而念念有词，时而口吐白沫，就一定要脱帽致敬。因为他就是隆庆府当代哲学史上最怀才不遇的巨人，天才的哲学家牛勇增。

三三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三个三的意思。

第一个三是三进取：向天空进取、向地心进取、向肛门进取。向天空进取是为了获得空气和永生；向地心进取是为了获得煤炭和地狱；向肛门进取是为了理解世界的黑暗，从而把灯点到充满臭味的肛门里头。

第二个三是三撤退：从马背上撤退、从人群中撤退、从钱眼中撤退。从马背上撤退意味着放弃战争、立地成佛；从人群中撤退意味着孤军作战，还人生以孤独的本来面目；从钱眼中撤退意味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或有时候就是请客吃饭。

第三个三是三突出：突出阳具、突出隆庆府、突出脑袋。

因此，三三主义准确的名称应该是：“三个进取、三个撤退和三个突出主义”。在三三主义内部，三个进取、三个撤退和三个突出既相互对应，

也可以相互组合。在后一种情况下，三三主义最终将演化为二十七种主义。这二十七种主义代表着光明世界的二十七种方式。只要进入到二十七种光明世界中的任何一种中去，我们就是真正幸福的人了。在这个世界里，除了三三主义，其他所有哲学学说都可以休矣。

季明生的姓名发生论

小车司机季明生是个私生子。季明生的母亲还是个丫头片子的时候，伴随着一阵闪电和数声怪叫，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了一股精液，不到五个时辰，就产下了一个婴儿。季明生的传奇故事还没有到此结束。据说，他生下来时，两手握拳，始终不愿松开。他母亲不顾咕咕外冒的鲜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的两个粉拳打开。小家伙一手捏着一颗淡蓝色的药丸。季明生的小母亲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只好请教季明生的外婆。外婆正在化妆，准备赶赴村里的夜总会。凭着一个老革命的火眼金睛，外婆一眼就认出淡蓝色的药丸竟然是避孕药。小季明生闻言大喝一声："想搞死我，没门！"

季明生因此也属于异人异禀者之列。他冥思苦想了很多年，始终搞不明白：自己的母亲都说不清那股精液来自何处，难道自己是上帝的私生子不成？自己出世时手握药丸，是不是和那个贾宝玉有异曲同工的嫌疑？季明生于是对自己充满了期待。但随后的人生轨迹却让他大失所望：虽说他成了哲学家，可以吃香喝辣，但正式职业依然是一个小车司机，到目前为止，丝毫没有被太守提拔的迹象。

季明生原名叫季朝阳。成为哲学家后，他模仿曹雪芹的做派，给自己取名为季药丸。叫了一段时间后，仍不见好运临头。他一边开动小车，

一边开动哲学家的小脑筋，终于横下一条心认定：他之所以这样背运，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来路不明。于是更名为季明生。为的是冲一冲晦气。这当然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就在给自己重新取名的当口，季明生无意中发明了一套哲学体系，名曰“姓名发生论”。和牛勇增凌空高蹈发明出的三三主义一样，姓名发生论也属于前无古人的哲学学说。

一个好名字预示着一个好的人生运程。名字取得不明不白，意味着身世不明不白。人的一生发源于姓名。只有光明正大的姓名，才能表示一个人光明正大的来历。那些名字黑暗的家伙，创造出的哲学体系也是黑暗的。毛菜是一个显例。蒲周哼又是一个显例：他整天哼哼个啥？

有些人看起来来路不正。但只要考虑到有些人未曾被药丸剿杀，因此从本质上说，这些人，只有这些人才是来历最明的人。这在历史上也有先例：生于马槽中的耶稣，就起源于上帝的神圣精液。隆庆府人民不相信上帝，但假如没有上帝，这些人又来自何方？

宋速滑女士的新悲惨女权主义

几乎所有上过小学的人都知道，在隆庆府八万余年的历史上，有过一段漫长的女权主义时期。西方观察家把这一男人的地狱称作“母系氏族时代”。有点文不对题，也有点真实。据研究显示，母系氏族时代土崩瓦解的原因，是男人们的下三路咬紧牙关、忍住饥渴，集体绝食长达十年之久。古老的女权主义者被逼无奈，只好忍痛退位让权，以求消灭延续了多日的饥荒。这一退一让，居然让男人们嚣张了数万年。女人从此成为弱势群体，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男人掌握了历史所有权后，竟敢颠倒黑白，编造了新的人类起源理论，成功地将女人在创世史上的作用消灭得干干净净。当

代哲学家宋速滑女士才用复杂的口吻说："罗子是男人的领袖，他发明的哲学是男人的哲学，是男人压迫女人的政治纲领。"

当代女权主义理论五花八门，但没有一家是成功的。当代女权主义者虽然人数众多，但互不服气，因此不可能结成联盟，因此其下三路不可能集体绝食，因此她们迄今为止仍然处于水深火热的中世纪。本书不打算详细介绍女权主义的诸多门派，只愿意介绍宋速滑女士的新悲惨女权主义。虽然这一学说并不能代表女权主义的各家各派，甚至不能算女权主义的正宗和主流，但它无疑代表了当代各种版本的女权主义的终极走向。

我们的祖先太软弱了，看到男人们集体绝食，人丁不旺，种族大有灭绝的危险，就可悲地妥协了。作为她们的子孙，我们努力了数万年，仍然不能还清那笔来自妥协的债务。女人不但有伟大的子宫，更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抱，所以上天才给了我们高耸的胸膛。但高耸的胸膛正是妥协之源。它太柔软，无法真正坚强起来。一被抚摸，就软成了一摊清水。这是上天成心要成全男人的霸权：它给了男人柔软的标枪，可是一经抚摸，马上还原为标枪的本来面目。

起点决定了命运。虽然我们在历史上也风光过若干年，但到底架不住上天的旨意。可叹我们的先辈们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到现在还万里长征没有迈出第一步。因此，与其本末倒置地揭露男人的可耻，不如脱了裤子集体骂天。

女权主义从此可以永远停歇了，因为所有的女权主义理论都没有看清上天的阴险。各家各派的女权主义理论，都建立在假想的公正、假想的平等之上。我们曾经掌权的祖先们已经用尽了我们仅存的光荣。她们用尽了光荣，光荣也用尽了她们。到头来只给我们留下了用之不尽、取

之不竭的悲惨。

在每一个床头，在每一个可以受辱的田间、山冈、林下，在每一个可以让我们软成一摊清水的地方，都应该刻下这样的铭文：男人们，为了听从上天的吩咐，我们平躺在这里。

乔治俊的油瓶主义

乔治俊恐怕是隆庆府历史上最长寿的哲学家。此人早已闯过百岁大关，至今仍然健步如飞，双目炯炯。由于他严格按照油瓶主义行事，估计再活一百岁也不成问题。作为隆庆府最长寿的哲学家，乔治俊被太守视为隆庆府形势一片大好的象征。乔治俊的房间里就挂着前任太守的亲笔御批："好老贼。"

油瓶主义是专门负责阐发长寿之道的哲学学说。由于人人都怕进入坟墓——尤其是在盗墓主义又开始抬头的市场经济时代，所以乔治俊的生意好到了火爆腰花的程度。由太守亲自批准，乔治俊在隆庆府几乎每一个哲市上都开有铺面。到本书走笔至此为止，全隆庆府开哲学连锁店的只有乔治俊一家。

由于乔治俊数十年来生意极其火爆，隆庆府的老态龙钟者也日益增多。仰仗着乔治俊的哲学单方，隆庆府现在也进入到老龄社会的新阶段。这导致了一个严重问题：隆庆府年年财政赤字，完全没有能力支付越来越多的老贼所需要的最低生活保障费。由于形势紧迫，隆庆府好几任太守都患上了"屁眼发紧症"。为了让太守的屁眼松弛，隆庆府近年来开始逐步提高哲市的税收额度。众哲学家对此痛心疾首，齐声痛骂乔治俊。无奈乔老是油瓶主义的坚决崇奉者，众哲学家的骂声在他看来，不过是

讨人嫌的蛛网，被他从耳边轻轻地抹去了。

油瓶倒了也不能扶。这句话有两层重要含义。第一，除了床上需要亲自动手，也应该开动机器紧密配合外，家中大小事体都属于女人的管辖范围，不用瞎操心。第二，府里的任何事情都与你无关。天下兴亡，匹夫无责。第一层含义可以让人宁静致远，第二层含义可以保你一世平安。

油瓶倒了也不能扶。你将会有更多的时间用于长寿，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准备长寿。一定要腾出时间，每天捏卵蛋五千次，以求还精于脑，打通“大头”和“二头”之间的咽喉暗道。让脑髓和精液混合起来，并像血液那样循环。因为脑髓是灰色的，而精液之树常青，所以必须要让脑髓植根于精液的无底深渊之中，以精养脑，保证脑髓的活力。

经过如此这般的艰辛努力，你能让脑髓和精液形成一种亲密无间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简称为“精髓辩证法”。精髓辩证法是上天意志的直观显现，是上天最大的秘密。这个秘密专属于男人。女人知道了也没用。

上天是最高的法官，只有长寿才是天道，才能让上天满意。本着这一基本原则，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都大可以忽略不计。

酒疯子的占卜哲学

在隆庆府当代哲学史上，有一位没有留下名号的哲学家。也许此人曾经拥有过姓氏字号，但因为长年累月深陷于杯中乾坤，大家都喊他酒疯子，真实姓名反而被人忘记了。按照姓名发生论的严正教义，酒疯子此后会有什么人生际遇，似乎不难预测。按说此人整日里疯疯癫癫，他的话不可能被人当真。可事情怪就怪在这里。酒疯子虽然疯癫，但从不

唠叨。在少有的清醒时刻，他的嘴巴会像抽水马桶一样滔滔不绝；处于迷醉状态时，他反倒惜字如金，神态严肃，极少开口。这就是说，隆庆府的“酒哲”先生掌握了一套新的时间原则：迷醉的时刻正是清醒的时刻，清醒的时刻正是迷醉的时刻。关键要看你从哪个角度进行观察。仰仗着这一手，他的哲学铺子从开张以来，生意一直不错，甚至还吸引了一大批和哲学毫无瓜葛的善男信女。酒哲的生意之所以极好，事后总结起来，不外乎如下原因：第一，他自称处于迷醉状态时能够通神，能预言各种事情。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所有的预言中，最具有轰动效应的是他预言了毛菜的自我爆炸，尽管他作预言的时候，毛菜的名声正如日中天。但在毛菜被处以极刑后，酒疯子又说：不出十年，毛菜的学说一定会重新勃起如铁。这一预言又很快化为了现实。第二，他每天只接待三个买主，赚够了酒钱就收摊回家。第三，当他清醒时，完全忘记了自己在迷醉时所作的所有预言，因此他被认为是守口如瓶的人，故而所有的善男信女都相信他不会将秘密泄露出去。

酒哲的上述做派却引起了其他哲学家的广泛嫉恨。众哲学家的意思是：酒疯子从事的根本不是哲学工作，也不是学术工作，而是算命卜卦的勾当。哲市的管理部门为了破除封建迷信，终于将酒哲扫地出门。酒疯子只好在哲市和猪市之间的墙角处摆摊设点，从而一举成为隆庆府当代哲学史上唯一一个街头哲学家。

酒疯子最后一个预言是自己的死。当然，他准确预见到了死亡的具体时间，因而提前半小时躺在床上，满含笑意地静候死神爷爷大驾光临。

任何事情都有起因，都有其必然归宿。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我是被神偶然选中的人。神在众人之中挑中了我，是想让我把他的心思有限度

地暴露给世人，以便起到拯救世人或警告世人的作用。我不敢保证神的目的是不是一定能够达到。但神让我做这件事情有一个条件：天天醉酒，并在迷狂状态下打量神的旨意、接近神的旨意、通晓神的古怪心思。神就这样始终让我处于分裂状态，让我在清醒和迷醉之间反复穿梭。由于神的有意安排，清醒和迷醉始终是互为忘川的关系。因此，有两个我，但他们彼此隔河而望，互不相识。他们中的一个是另一个的绝对陌生者。

我讨厌酒，我讨厌迷醉，我一点也不想当哲学家。按照我的本意，我只想当一个猪贩子。事实上，我曾经就是一个优秀的猪贩子。几十年来，我为我的工作受够了鸟气。我真想日神的妈。

我能报告所有人的运程，我熟悉每一个人的命运的链条，我知道这些链条的每一个工作着的齿轮的所有秘密。只要我愿意，我能将它们一一道出。但我对此已经越来越没有兴趣。我每天只接待三个买主，不是要故意为占卜哲学制造神秘气息，仅仅是为了消极怠工。神已经警告我很多回了。但我决定不予理睬。我丝毫不怕他一怒之下改变我的命运链条，提前让我死于非命。恰恰相反，我就是要激怒他，让他早日将我收走。

我看出神的怒火了。几十年来，我像燧人氏一样，艰难地制造出了这些愤怒的火星，现在它就要燃烧了。我的厄运就要结束了。我要彻底收摊了。

王问海的教育哲学

王浴盆的上级、隆大伙食科科长王问海，靠给太守提供了解决“屁眼发紧症”的单方，一屁股坐到了校长的位置上。这个单方极其简单：王问海首先建议太守冒隆庆府之大不韪，敢做敢当地提高哲市和猪市的

税收额度。当然，这只是明修栈道，目的是为了干扰自称掌握了舆论制空权的哲学家们的视线。因为王问海的真正目的，是接下来的暗度陈仓：组织敢死队，赶快将长眠地下的祖先请出来，拿他们的骨头熬油。这样做，既繁荣了工业，又解决了日渐严重的失业问题，还能为隆庆府的财政收入提供保证。除此之外，王问海还专门压低声音，向太守建议：有必要撤销乔治俊的哲学连锁店，因为乔治俊才是太守龙体欠安的直接缘由。王问海建议，在必要的当口，甚至可以考虑让乔治俊死于车祸，从而从源头上杜绝老龄化时代的无限蔓延。太守闻言大喜，当即力排众议，将王问海一绳子提到了隆大的校长宝座上。顺便介绍一下，王问海一步登天后，太守并没有把科长的宝座赠给王浴盆，只让后者以副科长的名义主持全校的伙食大业。这一结局，把隆庆府的政治哲学大师气得当场吐血，恨不得马上制造一种新的哲学体系，将忘恩负义的太守全部放翻在地。只可惜他现在已经力不从心，因为他的甲状腺早已消肿。

王问海校长肩负着一项重大使命：火速为隆庆府培养一批品学兼优的敢死队队员。本着这一目的，王问海上任伊始，就全面革新了隆大各系科的主要课程。一切都要为培养敢死队队员侧身让道。比较著名的课程有：胆量学、破除迷信学、忠诚学、夜间眼睛明亮学等等。这些专门学问，都经过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专门浸泡。联想到太守日渐发紧得快要完全封闭起来的屁眼，王问海顶住来自左、中、右三个方向的压力，加快了培养敢死队队员的步伐。

教育必须要为隆庆府的繁荣昌盛服务，必须要为隆庆府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由于老龄化时代的阴险来临，隆庆府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致使几任太守刚一上任，身体就出了毛病。因为

太守的健康关系到隆庆府的繁荣昌盛，关系到隆庆府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准能否提高，所以，教育必须为太守的身体服务。

考虑到隆庆府自然资源十分匮乏，老人又在不断增多，因此，有必要重新利用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教育首先要锻炼学生的胆量，让他们在面对白森森的骨殖时，不能有任何恐惧心理。经过学习，要让每一个学生都必须将坟墓里的东西直接看作元宝。其次是要破除迷信。破除迷信学首先要教导学生：必须从自己的祖坟挖起，然后才能正人正己地挖别人的祖坟。但最重要的始终是要学会忠诚。每一个学生都是吃隆庆府的奶水长大的，每一个学生都要责无旁贷地忠于隆庆府的全体人民，忠于隆庆府太守。因此，我们的口号就必然是也只能是：教育兴府，教育救府。

郑元的诗歌哲学

隆庆府历史上向来缺乏诗人。比罗里稍晚一些年头出生的另一个哲学大师苏四，曾经建立了一套影响极大的“大同学”。“大同学”中有极小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专拿诗人开涮。苏子的意思很明确：诗人不仅是可耻的说谎者，而且还都是些神经不健全的人，势必会在“大同世界”中为非作歹、妖言惑众，因此有必要将他们赶出“大同世界”。在苏子的建议下，几万年来，历朝历代的太守都将诗人列为违禁品。在隆庆府，有很长一段时间，要是谁被称作诗人，无疑就是对谁的极大侮辱。随着时间的渐渐流逝，尤其是到了市场经济的新阶段，受市场规律的教唆，许多易燃易爆品公然冒头，诗人也趁机开始小批量出现。建立了诗歌哲学的郑元，就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一位。

郑元是隆大哲学系的小助教，我的同事。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算我的

哥们儿。王问海担任隆大校长后，虽然让隆庆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好转，但由于革新了隆大的所有课程，跟不上革命形势的郑元和我，已基本上处于无课可上的危险境地。郑元曾经放下架子，拼命巴结过前伙食科科长，但王问海对从前经常在一起发酒疯的老哥们儿坚决不予理睬。垂头丧气、毫无艺术细胞的郑元于是开始写诗，擅自发明了一套诗歌哲学不算，还公然以诗人自居。一时间成为隆大的新闻人物。按这小子的话说，他这样做，就是要给“那个人一阔脸就变”的“可耻家伙”“找点难堪”。因为手下人公然违背太守禁令，作为法人代表，王问海肯定要受到太守的挤兑。说不定还要被打回原形，重新去做他的伙食科科长，与王浴盆为伍。由此也可见郑元的阴险。

倒退五十年，像郑元这样的痞子肯定是要进大牢的。而现在人心不古，此人非但没有罹祸，反而跑到哲市人模狗样地摆起了摊子。郑元知道我无课可上，又没本事成为哲学家，只好在家里炮制哲学小史，就放下生意，专门跑来请我喝酒。在酒过三巡、互称哥们儿之际，这个阴险狡诈的家伙才亮出了匕首：他要我看在哥们儿和马屎的份儿上，把他也写进去。并对我晓以利害：“你把违禁品写进去，你的书也就成了违禁品，你也就算蹚了一趟雷区。你的书保证畅销。到时候，元宝就是大大的。”他又敬了我一杯糖衣炮弹，接着说：“你把我写进去，好处就大了。而我呢，不过是借机巩固一点名声而已。老实说，我现在的名头已经够响亮的了。归根到底还不是为你好?”我耳朵软，也想尽快结束这本小史的写作，再说他都已经公开摆摊设点了，也没见出现什么问题，于是心一横，趁着酒兴把他夹带进了哲学小史。

水是用来消灭口渴的，火是用来解决寒冷的。但这都不是诗歌。所谓诗歌，就是要揭示出水自身的饥渴，火自身的寒冷。一切反过来的，才可

能是诗歌。反反反，诗歌就是一连串的反，全部的反。正如一把手枪，既可以拆成手，又可以拆成枪。不断拆下去，世界就将在相反相成的向度中自动呈现。世界最后将由相反相成的微粒组成。逻辑实证主义要证明世界不存在，而诗歌遵从的哲学，则自始至终都是互相反对的世界主体论。

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太简单了。现存的诸多哲学体系都对世界作了简单化的处理。究其原因，就是没有看出世界中隐藏着大量自我反对的因素，也没有发明一套测量自我反对因素的仪器。这一严重的失察，导致了诸多学说的内分泌失调，构成了诸多哲学体系的肾功能衰竭。但诗歌哲学有望克服这一困难，因为诗歌就是一连串的反，就是全部的反。

诗歌就是放在世界胸膛上的一把手枪。但这不是一般的手枪，而是可以让人生还的手枪。只有诗歌才能给予我们这样的视角。同样的道理，诗歌也可以是放在世界右腹腔中的一根香蕉。当然，这也不是一般的香蕉，而是能够让人上吐下泻的香蕉，反香蕉。

戚世三的性快感本体论

戚世三，隆庆府当代哲学史上最不幸的人物，直到今天还被一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视为“流氓哲学家”。此人由于其异端邪说，早在二十年前就被正法。正法的地点就在他的哲学摊位旁边，目的是杀鸡给猴看，或杀猴给鸡看。究竟给谁看，那就看你自认为是猴还是鸡了。说起来戚世三确实有点不幸。就在他被正法的第二年，市场经济就敲锣打鼓、一路疯跑着来到了隆庆府。他的性快感本体论又开始广为流行。作为这方面的辉煌物证，隆庆府大大小小的夜总会，都在为戚世三的不幸命运暗自垂泪。但掌握了这一学说，并将这一学说化为现实的诸多人等都吃水

忘了挖井人，依然将他看作流氓。如今他的坟墓已被敢死队队员撬开。他的骨头已经被冶炼、熬油。他因此变作了如下物品：一根铁钉，一根锌棒，铝合窗上的一小块，五百克掺有土灰的磷肥，药店里的一小瓶钙片……也就是说，戚世三至今还在为使用上述物品的人的快感提供服务：让他们强筋健骨、滋阴壮阳，为他们的快乐提供通风的门窗……好样的，戚世三。你在彻底灭亡之后，仍然没有忘记证明自己的理论的正确性。

快感是世界之源。没有快感，就没有人类，当然也不可能有隆庆府。快感的司令始终是性快感，因为性快感派生出了其他诸种形式的次等快感。性快感是其他诸种快感的亲娘。

性快感的语言就是精液和卵细胞。精、卵两种细胞还有自身的语言。我们至今仍然无法确切地知道，它们在让我们饱餐了快感之后，在相互拥抱时都说了哪些缠绵悱恻的话。实际上，在性快感本体论看来，它们说的就是上帝的语言，因为上帝是用语言创造出了世界。因此，敬重精液和卵子，就是敬重上帝。善待精液和卵子，就是善待上帝的道。

我们在性快感的指引下才创造了历史。全部隆庆府的人类史都是精液和卵细胞的产物，但归根结底，隆庆府有史以来的人类史，都是精、卵两种细胞的语言的产物。隆庆话就是对这种语言的拙劣模仿。隆庆话不过是上帝的方言。性快感就是历史的亲娘，是历史的发动机和打火机。

崔建平的酒后哲学

崔建平先生现为隆庆大学哲学系教授，本人的导师，隆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席。崔建平教授的哲学名叫酒后哲学。这种哲学的基本要义，就是专门和西方的基督教唱反调，以便扬我府威。崔先生博通古今、学

贯中西。酒后哲学就起源于三百年前一位名叫利马斗的意大利人的所作所为。据崔先生的独家新闻披露，利马斗在翻译隆庆府哲学家罗里的著作时，取名为“罗子的伦理：一个在我们基督徒的主和救星耶稣降生五万年前就已达到思想巅峰的隆庆府哲学家，其教导至今仍为隆庆府人民奉为最佳人生指南”。按说这是件对隆庆府大为有利的事情。不料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恰恰证明，利马斗的工作，给了西方人对隆庆府进行“妖魔化”的直接由头。《罗子的伦理》刚一出版，就引起了意大利基督徒的极度愤怒：基督降生五万年前，隆庆府居然就有了成熟的哲学，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众基督徒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利马斗点了天灯；第二件事，就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证明了罗里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第三件事就更容易了：隆庆府是传说中的地方，可能曾经存在于火星，但肯定不在地球上——反正欧洲人的阴险，已经到了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程度。崔教授认为，有必要从纯哲学的角度，教育教育那些妄自尊大的西方人。于是有了酒后哲学的闪亮登场。但保守、迂腐的崔建平教授是从形而上学开始立论的，这就让他的哲学有着浓厚的西化色彩。由于形而上学（它在哲市上价位最低）和西化色彩（这有崇洋媚外之嫌），崔教授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始终也不能成为当代第一流的哲学家。他为此爱上了酒精，整天日爹骂娘，什么事情都看不顺眼。如今他已经成了半个酒鬼，这就更给酒后哲学增添了光彩。作为他的学生，我曾经含蓄地提醒过他这中间的症结所在，却遭到了他的大声呵斥。这也算一个哲学逸事吧。

形而上学的诸多概念在表达世界方面，永远都只是一种近似值。形而上学的诸概念流传了数千年，可见人类要么是痛恨精确性，要么是在

等待精确性的出现方面没有耐心。我承认，这有点类似于一个名叫卡车的德语小说家所说的：我们之所以丧失天堂的烤鸭，完全是因为耐心不足。但另一个更根本的理由也许才是最重要的：从来就没有精确的人生，只有近似的人生。

西方大哲K.牛德先生说得好，正因为人始终具有"应是"的渴望，所以始终是其"所是"的我们，才有了不灭的超越冲动。另一个西方大哲M.古德格尔则声称可能性高于现实性，虽然老古一直宣称自己在致力于拒斥形而上学。但这怪不得人家古德格尔，老古也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不得不犯如此低级的错误。这有点类似于我们隆庆府足球队在比赛中，老是故意把点球送给对方。

将形而上学逐出哲学王国，在逻辑技术上是可能的，比如使出了吃奶力气的逻辑实证主义。但每一个掌握了该项技术的哲学家，在拒斥了形而上学后，那个叫形而上学的家伙多半会在半夜找上门去。于是我们听见了哲学家的惨叫声和告饶声。不过，黎明来临，当哲学家一如既往地摊开自己的思想时，完全将昨晚发生的事情忘记了。这不能不让人相信：这个哲学家确实患有受虐症。

但完全没有必要从心理学和病理学的角度，去寻找受虐症的原始诱因。受虐症实际上来源于形而上学的顽皮。必须要坚信受虐症有着坚硬的神学来源：它是上帝在制造我们时，注入我们体内的隐蔽机制。有了它，我们就得不到真正的幸福。那些坚信形而上学可以被清除出哲学王国的哲学家，在这一点上低估了上帝的智慧。上帝决不会像我们中的某些人那样，愚蠢地砸了自己的饭碗。著名的狂人哲学家，也就是那个叫毛菜的家伙，居然宣布上帝死了。但其后的事实证明，死了的始终是那个叫

毛菜的隆庆府哲学家，而不是毛菜宣布的那个人。

我们现在当然不再相信上帝的存在了。这个老不死的也许真的死掉了。不过上帝为了证明人的弱智，还是派他的第二个儿子来到了人间。只不过这个儿子不是玛利亚生的，也不是生在马槽里。他也不叫耶稣。耶稣是上帝的长子。实际上，他就叫形而上学，他就生于我们的脑海之中。

圣母玛利亚死去后，我们天天都在和上帝交配，以便生出上帝众多的第二子。我们是上帝造就的，上帝有权利使用我们。无论我们是男是女，上帝总可以找到进入我们或让我们进入的通道。我们既是玛利亚又是受造物，而且还是上帝的第二子，因为形而上学始终跑不出我们的脑海。我们，也只有我们隆庆府的全体人民，才是真正的三位一体。

聂峰兵的梦中哲学

季明生在嘲讽王浴盆副科长的哲学观点时，专门提到过聂峰兵“不喜欢床上的事情”。种种迹象表明，季司机的看法是正确的。聂峰兵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创立梦中哲学时说过的话，也可以为季司机的观点作证：“我只喜欢床上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做梦。我只愿意在梦中会见唯一一个女人。”聂峰兵的如许行为带来了三个相关的后果。第一，他一举成为当代隆庆府的圣人，深受现任太守的器重，目前官运亨通。第二，他的学说为崔建平的酒后哲学声张了正义，并将酒后哲学推进了一大步。崔教授还在大谈上帝、三位一体，聂先生却率先宣布：他在梦中见到的人不是上帝，甚至不是天使。第三，聂峰兵的学说明显违背了物质可灭理论，悲剧性地放弃了及时行乐，遭到了众哲学家的批判。

令人费解的是，聂峰兵面对来自左、中、右三个方面的夹击，居然

我自岿然不动。这一令人惊诧的举动，让所有批判过聂峰兵的哲学家陷入了高度恐慌之中。他们不知道哲学界又将有什么大的风波，这场风波会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意。不过，在本书看来，聂先生的学说不过有些意淫，既谈不上引起哲学风波，从而让哲市崩盘，更不至于令人恐慌。聂先生不过是充分利用了古隆庆府精妙无比的逻辑学，把诸多完全不相关的东西搞到了一起，并给它们赋予了超级同一性。我本来想将梦中哲学更名为意淫主义，无奈聂先生坚决不同意。

我又一次梦见了她。虽然我看见的只是她的侧面，但我能肯定那一定是她。只可能是她。虽然我梦见她的次数并不多，然而多年来，我已经熟悉了她的面容、她的腰肢、她的三围、她的……眼神和皱纹。我甚至清楚地知道她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在我梦中。她的到来总和我的饥饿有关。每一次她都给我带来了渴望中的食物：面条、馒头或者可以佐酒的花生米。但数量总是有限。昨天晚上她给我带来的就是方便面。她坐在野外一张破石桌上，神情从容、姿势优雅地给我泡了一碗。而在我来不及下咽第一口的时候，她就消失了。我现在唯一感到有意思的是，那是我迄今为止第一次梦见方便面，纯粹的工业制品。

我至今还记得她第一次来到我梦中的情形。那时我正遇见一只从未遇见过的老虎。后者穷凶极恶，显然已经把我当作了盘中餐、碗中肉。在慌乱中，我竟然没有想到逃跑和反抗。这和我清醒时的行为刚好相反。正当我准备等死的时候，她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老虎的倏然消失。我现在已经搞不清楚，究竟是老虎看见她而逃跑掉了，还是她就是那只老虎幻化成的“白虎星”。我记得我好像问过她，但她只微笑，不说话。而有那么一刹那，我似乎从她身上闻到了一丝老虎的腥味。

我从未见过她的裸体。我希望见到她的裸体。我想总有一天会看到她的裸体。我猜那可能是最匀称、最光滑的裸体。但我在偶然间还是透过层层包裹的衣服看见了她的骨头，看见了她的骨头的众多转弯处。那么多的骨头团结在一起，团结在以她为核心的周围，并最终组成了她。我甚至听见了骨头的拔节声：清脆、微弱，但悦耳，像撞在我眼帘上的一丝阳光，随即敲响了我日渐沧桑的眼角膜。

从前梦见她时，她总是显得很轻灵，似乎是飞行在离地五公分的天上。而现在，随着变老变胖，她来到了地面，还给我端来了面条、水和我喜欢的菠菜，甚至还有一小片珍贵的牛肉，像我相濡以沫多年的妻子。是不是即便在梦中，由于我们逐渐熟悉，她的天使身份也会被消除？当然，我一开始就知道：她从来就不是天使。我也没有听她说过自己是天使或者曾经是天使。

我不配梦见天使。作为一个讨生活的人，我多次提醒自己不配梦见天使。我梦见的都是次一等的事物、更次一等的事物、再次一等的事物：灾难、从未谋面的狼、极度挥霍繁殖力的鱼、荷花、两分钱、永远不愿它到来的醒来、让人恐怖的蛇，当然更多的是人，那些无聊的人。偶尔也会梦见天空的一角，像从某张风景照片上随便撕下的一小块。我从未梦见广袤的天空、整体的天空。即使梦见天空的一角，也从来没有作为点缀的星辰，那些珠光宝气的星辰。奇怪的是，总有些来历不明的光亮唆使我看见她的面容、她的腰肢、她的三围、她的……眼神和亲密团结在眼神四周的皱纹。

我逐渐变旧的梦的大门始终向你打开。随着梦的年龄的渐次增长、变老，梦的大门的孔穴也在大门的不断磨损中逐渐变大，就像通过过五

条生命的伟大的阴道。所以它刚好能够以相同的增长速度，适应你逐渐臃肿起来的身躯，为你多肉的骨架提供了进出的方便。

路一达的统一理论

路一达是当代隆庆府历史上典型的颓废主义者。此人成为颓废主义者实在有些匪夷所思：他相貌英俊，堪称隆庆府哲学史上数一数二的美男子；他聪明绝顶，十六岁就成为隆大哲学系的研究生，不到十年，就成为隆庆府当代哲学史上重要哲学理论的创始人；除此之外，他还是几任太守的私人秘书，后来又一屁股坐在了隆庆府人事局局长的宝座上，成了著名哲学家、小车司机季明生鞍前马后的服务对象。小车司机的服务要是不那么周到，路局长还可以随便踢他的屁股。按说，这等人物是绝对不应该颓废的。但人家就是出你意料地颓废了，你又有什么办法。

路一达发明的哲学叫做统一理论，旨在总结当代隆庆府的诸多哲学体系。因此，统一理论又称万教归一理论。路一达有的是钱，从来不去哲市，也不大看得起去哲市的人。他的哲学发表园地主要是酒桌。因为他位高权重，人们也乐于为他发布哲学消息。好在路一达是免费销售自己的学说，甚至还要倒贴酒钱，众哲学家也就原谅了他试图总结所有哲学体系的狂妄。

路一达后来自杀了。他从阳台上奋力一跃，就让自己九九归一了。哲学界为此十分震惊，纷纷将他看作隆庆府历史上唯一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哲学界为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太守还亲自下令：不许骚扰路一达先生的坟墓。

人太多了，地球太沉重了。我感觉到它已经大汗淋漓，已经有些转不动了。多少个失眠的晚上，我听见了地球气喘吁吁的呼吸，像拉着破

车的老牛。

地球深感沉重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人多，而在于人的欲望太盛。欲望并不是没有重量的。早晚会有一种仪器被发明出来，用于称量和检测人的欲望。不仅活人有欲望，死去的人也有。古往今来，这么多的人和这么多的欲望不断加诸同一个地球，地球要是不老迈，要是不累得两眼昏花，是不可思议的。

拯救地球的唯一方法，就是根除人的欲望；根除人的欲望的唯一方法，就是让人类绝种，从而让地球休息、养精蓄锐。反正猴子、猩猩还大量存在，它们迟早会进化为人。等它们辛辛苦苦变作有欲望有重量的人之后，地球就又有足够的能力运转他们了。

后记

本书篇幅仅仅二十余万字，却断断续续写了五年。为什么会是断断续续的五年，原因太多，此处就不讲了。现在，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十五年间，按照各种学说的教唆，照例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不少还和本书有关。此处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第一，王问海下台了。换了太守，王问海自然应该下台，这是古今通例，没什么稀罕。王浴盆的政治哲学早已道出了个中猫腻。但民间传言说，王问海培训的敢死队队员，基本上已经挖完了隆庆府积攒了八万余年的坟墓；资源已经耗尽，他当然也就失去了用场，下台更是免不了的事情。我在本书中早已写出、后来又删去的“卸磨主义”，也讲清楚了个中猫腻。民间传言还说，他王问海天良丧尽，历经五任太守还我自岿然不动，脑袋居然好端端地长在裤裆上，已经算是便宜他了。王问海下台后，隆

大各系科的课程，又复辟到了前王问海时代的模样。我又开始有课要上。因为现任太守要肃清王问海的流毒，哲学系的课程便显得特别繁重，这部小史的最后定稿也因此被落了下来。隆庆府靠哲学起家，当然也要靠哲学肃清流毒，这更没有什么价钱好讲。

第二，由于换了太守，毛菜的盗墓主义、郑元的诗歌哲学，甚至严体勇的逻辑实证主义、戚世三的性快感本体论、路一达的万教归一理论，又成了违禁品。我闻听之下，冷汗直冒，觉得自己的著作毛病太多，即使从原来的二十万字，一删再削到如今三万字左右的篇幅，在发表方面恐怕还是凶多吉少。于是心灰意冷，懒得在这上面再花工夫。我从此开始像我的导师崔建平教授一样，也爱上了酒精，整天日爹骂娘，将已经删削好的书稿束之高阁，一任它遵循物质可灭理论的基本要义，慢慢腐烂。

第三，几年前，我娶了一房老婆。尽管她的长相赛过猪八戒的干妈，腰身直追老黄忠的胯部，年龄仅仅小我妈十岁，但到底还是老婆。不管怎么说，我没有去喝西北风，已经算捡了大便宜。当年癞蛤蟆想吃天鹅屁地想当副教授，不就是为了讨一房福晋吗？既然有了老婆，写书和出版书的激情也就当场虚脱。

第四，经过好几年的不懈努力，我终于给自己续上了香火。感谢现任太守，将毛菜的异端邪说列为违禁品，我儿子日后不会为找不到祖坟号啕大哭。我现在凡事都得为香火考虑。于是一边感谢太守，一边拿出尘封多日的书稿。只是几年前痴心妄想为了出版该书而删去的十几万字，再也不可能复原了。

重新拿出这部手稿的目的很简单：我要把这本名为“小史”实为断章残简的“小书”，留给我儿子。我想让他知道，他爹为了吃香喝辣，

为了一房漂亮老婆，秉承着市场经济的原理，当年上穷碧落下黄泉，确实努力过。只不过时运不济，只给他讨了一房丑陋的妈咪，以致严重影响了他五官的健康和大腿的修长。我还想让他知道，当年的隆庆府确实如我所述，出现过许多旋起旋落、方生方死的哲学体系。它们大都能卖上好价钱。我更想让他知道，正因为出现了太多的哲学，隆庆府的人民群众才狡猾之至、诡诈之极。这本手稿，就算我给他留下的人生宝典。他长大成人后是否会上当受骗，全要看他如何揣摩他爹留下的墨宝了。

如果他日后注定要上当受骗，我愿意提出最后的建议：到猪市找口饭吃吧。猪市的臭气，只是人间的臭气；哲市的香味，永远都是天堂的骚味。

2004 年 1 月 7 日—25 日，北京丰益桥

色块的长征

初试身手

1934 年夏天的某一个星期日，当北平《世界日报》的兼职广告设计师、北平美专国画系的学生张仃被国民党宪兵队抓捕归案时，他年仅区区十八岁。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在“罪犯”的年龄和“罪犯”的犯罪事实之间，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反讽关系，显透出一种强烈的喜剧效应——十八岁的幼小“罪犯”，实在不大可能“犯”那种性质严重的“罪”。不过，从当时严酷的历史语境的角度看，张仃被抓捕的原因其实又相当简单，考虑到国民党自 1911 年“双十节”就开始的惯常性的神经衰弱，也确实相当有道理。

这位来自东北的小个子、北平美专国画系半工半读的学生，十分不满意当时美专的艺术教育。在小个子张仃看来，在一个国破山河在、日本人已经侵占了东三省——那是张仃的家乡——的危急年头，再像美专教导的那样画那种言不及义、远离国计民生而又毫无力道的高冠贵胄和病态仕女，实属彻头彻尾的堕落。因为这种饱具士大夫腐朽性质的画风和惨烈的社会现实之间，构不成丝毫有效的摩擦力，除了纯粹技巧上的意淫和心理上的意淫式满足外，几乎毫无用处。而相对于当时亡国灭种

的严峻形势，这种意淫式画风确实含有浓厚的不道德成分。当张仃质朴的心灵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质后，于是自作主张，几乎是在无师自通的状态下，画出了一组多达三十余幅讽刺时弊、时政的漫画。这些作品和张仃在美专受到的艺术教育，几乎谈不上任何干系。

当这些漫画在北平某中学的一间教室里展出后，既在社会上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因为当时颇有影响的《京报》“副刊”对此专门作了报道，还选登了张仃饱具讽刺意味的作品《有吏夜捉人》），也引起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对于张仃的兴趣——当时的地下党组织对反政府、反主流意识形态的人士向来嗅觉敏锐。于是它们很热情也很自然地邀请张仃为共产党的地下刊物《潮水》搞编排设计。《潮水》是左翼刊物，有趣的是，内忧外困的国民党当时正患有极为严重的“恐左症”，生怕在一不留神之间，某一根善于惹是生非、不安分守己的稻草会打翻自己的千秋伟业。因此，宪兵队抓捕和共产党地下组织有所接触的张仃，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鲁迅曾经非常幽默地说起过张仃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的荒唐事：“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而已集·小杂感》）在另一篇文章中，鲁迅还用讽刺的口吻——其讽刺的口吻和张仃的漫画的讽刺口吻大异其趣而又异曲同工——说到过另一种“怪事”：“有公民某乙上书，请将共产主义者之产业作为公产，女眷作为公妻，以惩一儆百。”（《而已集·拟预言》）在这种充满高度赤色恐慌的大背景下，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和共产党“有

染”的张仃要是不被国民党抓捕，倒反而有些说不过去了。不过，和鲁迅所说的“有在朝者数人下野；有在野者多人下坑”的严峻事态相比，张仃仅仅是被抓（这件事本身就具有某种喜剧色彩），既不存在“下野”之虞，也无缘享受“下坑”之待遇，可谓“幸运”极了。

就在画出那组多达三十余幅的漫画作品之前，对国民党面对东三省的沦陷采取不抵抗政策、转而一心一意收拾共产党的行径心怀不满的张仃，早已和另外两个美专同学一道走出了校门，从北京奔赴山海关东北军的前线驻地，凭着一腔怒气和热血，又是演讲又是画宣传画，试图鼓舞士兵们收拾旧山河的斗志。由于张仃和他的两个同学的姓氏按照国际音标,其发音的头一个字母都是“C”,于是他们就称自己小小的组织为“三C 战地宣传队”。这几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哪里知道，他们为自己充满正义和良心的行动小组的命名，刚好犯了大忌：“三 C”是苏维埃共产党（CCCP）的拼音缩写！当他们知道这个名号和自己的身家性命有着严重的利害关系时，吓得直吐舌头，连称自己命大。不过，现在看起来，这个巧合也许是无意的，但它却为张仃其后的人生运程预先定下了基调：在激动、激愤、焦虑和冲动中，向往国家的富强，并以画笔做武器，为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摇旗呐喊。这个巧合性质的事件，也为张仃的画笔为革命所借重和利用，预备了人生逻辑上的胚胎。从张仃一生的所作所为来观察，这个胚胎的发育从其开端处就堪称正常、准确和正确。

但在 1934 年夏天遭逮捕的张仃，并不是共产党（张仃加入共产党尚在许多年以后）。他对共产党也所知不多，甚至连共产党的德国老祖宗马克思的大名都似乎没有听说过。张仃那时的主要心思确实集中在学习美术上。考虑到他还是一个未成年人，这的确没什么好说的。这也有

旁证。据说，北平美专有一位从法国回来的教授，当他偶然之中看到张仃充满赤色风味的漫画时问过张仃：“你是马克思的信徒吧？”张仃觉得很诧异，但还是满不在乎地说：“什么马克思，马蒂斯吧？”的确，前“三C战地宣传队”小战士张仃画漫画讽刺时政、时弊，仅仅出自一个有良心、有血性的中国人，在危急关头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质朴感情，并无党派政治的背景。只不过张仃的质朴感情，与共产党的宗旨有些不谋而合罢了。虽然国民党抓捕张仃显得有些勉强和僵硬，但确实符合神经衰弱的国民党的一贯作风，也符合神经衰弱者的内在心理逻辑。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从来如此。

平心而论，在所有形式的美术品类中，漫画差不多是对时政、时弊与国事民瘼进行发言的最直接的方式。漫画的如许性质，与张仃的质朴情感倒也很自然地有了交叉点和契合点。这也是不谋而合的事实。有些巧合的是，张仃从小就酷爱卡通画。这一爱好也许为张仃的牢狱之灾，正好预先准备了理由。据张仃的传记作家王鲁湘先生记载，张仃从小就对东北故乡用于超度亡灵、画有十八层地狱和十殿阎罗的水陆画着迷——实际上，张仃的许多漫画在技法上就受到过水陆画较为严重的影响。王先生记载过童年张仃的一件趣事，这里不妨提一提。据说，张仃有一个舅舅，是算命先生。此人为了招揽顾客，也为了打败同行中的竞争者，别出心裁地喂了一只鸟，专门给前来算命之人叼签。除此花招之外，他还想给自己的摊位弄点醒目的设计，以便更彻底地打垮那些较为有力的竞争者，从而垄断别人的命运消息。此人于是找到了张仃。张仃虽小，画画在镇上已颇有名气。于是张仃参照大人从城里带回的包点心的旧画报纸上的卡通漫画，设计了十二生肖，全用拟人法，兽头人身。

“比如子鼠，就画了一个打洋伞穿裙子的鼠小姐。十二生肖图往舅舅的算命摊儿上一挂，果然轰动，生意于是看好。”（王鲁湘：《大山之子——画家张仃》，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 页）有着这种童年记忆的北平美专国画系的学生张仃，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选择“艺术为人生”的理念，抛弃言不及义的意淫画风从而选择漫画，既为时代留下了不失夸张和真实的见证，又为同时代的同胞提供了夸张的、醒目的现实，提醒他们在国破山河在的紧要关头，不要忘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应该说是相当自然的事情，并不需要党派政治背景作为支撑。而说到底，漫画的功能之一就在于：它能够把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部分给抽取出来，通过漫画特有的夸张技法，让被抽取出来的部分更显眼、更能刺激人的心灵，从而让现实在对现实已经麻木的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漫画即提醒，漫画即抗议，漫画即强调，这无疑是热血沸腾的小张仃在创作漫画时所遵循的总纲。但这也无疑触动了神经脆弱的国民党当局和它的执法机器——宪兵队。

张仃当时最崇拜的人物是鲁迅。后者对漫画有过相当精辟的陈述：“漫画的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要确切的显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态，也就是精神。”漫画在除了夸张之外，还必须真实，鲁迅接着说，正“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且介亭杂文二集·漫谈“漫画”》）鲁迅所理解到的漫画的精髓，在小张仃那组用于参展的三十余幅漫画中，其实都具备。早在被捕入狱之前，张仃就画了一幅具有高度夸张色彩又不失真实的漫画——《焚书坑儒》。张仃画这幅画的背景是国民党执政府在上海龙华枪杀了柔石等“左联”五君子，以及丁玲的遭逮捕、鲁迅的遭通缉。据王鲁湘先生介绍，《焚书坑儒》的处理方式很有创意：张仃采用

了中国传统的水陆画形式，在填得很满的画面中，把蒋介石画成阎王，并且高高在上，此人座下的几个小鬼，却被张仃处理成拿着牌子追赶鲁迅的丑类，而丁玲则被关在近旁的一个笼子里，望着外边的自由空气和鬼类世界愁肠百结。这幅漫画在张仃的创作谱系中不能说有多么重要，但它却很好地表征和暗示了张仃其后漫画的几乎所有特色：凝重、真实、锋芒毕露、画面填得很满而又略显古拙；当然，一般漫画画面中应该包含的幽默感，却是没有或很少有的。

张仃被捕后被判刑三年有半。因为不满十八岁，有关方面“念其幼小无知”，也因为各类监狱早已人满为患，实在没有张仃的位置，只好将张仃送往苏州的“反省院”了事。张仃调皮、聪明、个子又小，再加上他年龄尚幼，正处在发育中，怎么看都是个孩子，让任何人都难以将他和坏人或者“赤色分子”挂上钩。因为在上世纪 30 年代国统区的许多人眼里，赤色分子就是坏人，最不济也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幽灵”——即一般中国人心目中的鬼类或神秘之物。对 30 年代国统区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赤色分子是传说，是谣言，人们仅仅是在风闻中听说过它。而传说中的幽灵，无一例外总是张牙舞爪、青面獠牙和凶神恶煞的形象。但苏州反省院中的张仃，却是一个瘦小、白净、满脸稚气的孩子。张仃的如许形象，很快就使看守们放弃了应该具有的警惕，更有甚者，张仃还很快和反省院的看守结成了要好的“哥们儿”关系——这差不多算得上一个“剿匪”不成反被匪“剿”的小小的、成功的战例。这一有趣的成功战例，使张仃即使在反省院也未曾放下过画笔。当 1935 年他被保释出反省院时，居然大摇大摆、堂而皇之地带出了创作于监狱的三四十幅漫画作品。

事情说起来还真是有趣。就是在苏州的反省院里，张仃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了上海著名漫画家张光宇、鲁少飞主办的漫画杂志，尤其对杂志中张光宇的漫画作品印象深刻。张光宇的漫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张仃后来尖刻、犀利的画风。这恐怕更是“剿匪”者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们将张仃误做赤色分子、革命志士抓进了监狱，却没有想到后者径直把监狱处理成了自己的大学，而且还有人管吃管住，站岗放哨，享受的竟然是高等学生的待遇。这是一件非常具有幽默性质的事情。我们甚至可以夸张地说，张仃的漫画虽然毫无幽默感，或者很少具有幽默感，但他的漫画经历、人生经历，却从来都不缺少幽默感。苏州反省院中发生的事情仅仅是一个开端罢了。

张仃带着他的漫画从他的“大学”毕业出来了。但此时此刻漫步在街头的张仃，除了那几十幅漫画，早已身无分文。生计问题又一次被摆在眼前，成了必须要妥善解决的头等大事。联想到自己是左派，自己也是以左派的名义被误关进局子里去的，张仃于是就将一幅以水灾为主题，一幅以罢工为主题的漫画，寄给了当时相当有名的左翼刊物——黄士英主编的《漫画生活》。一方面是想找“同志”（假如同志真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为了糊口。没想到最后左翼拒绝了左翼，看来国共两党在左翼的标准问题上，和在其他事物的标准问题上一样，还相当的不一致，还须长久地切磋、商榷和谈判。

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特别难以理解。当时的共产党正处于地下状态，蒋介石正在拼着吃奶的力气围剿共产党的“苏区”。而在国统区内，共产主义分子被统称为“赤色”人士。在国民党的宣传中，这伙人实行的是“共产共妻”的政策。相较于正常的人性，相较于国统区内绝大多数

正常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这确实有些骇人听闻，也确实有些大逆不道。因此在国统区内，许多人闻赤色变。而“赤色”人士这个“雅号”的得来，排除其他所有可能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党旗是红色的。一件事物的外表的颜色总是最打眼、最直观的，哪怕它仅仅是一个象征物的颜色。确实，共产党的党旗和国民党颇具中国特色的青天白日旗在颜色上恰成比照。虽然张仃漫画画的是水灾和罢工（这是地下共产党最喜欢的题材），但张仃擅长的黑白色块，却使他的漫画太具有悲怆的气质，和红色所显透出的邀请语气、煽动性质和蓬勃激情大相径庭，也和纯正的红色所要求的战斗精神大相背离。张仃被革命的、火红的《漫画生活》拒绝，似乎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张仃的漫画的主色调不符合革命或者革命语义的要求。它们确实太灰暗了，尽管它们确实太真实了。鲁迅精辟地说过，真实是漫画的命脉，正如毛主席在几十年后正确地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一样。鲁迅还说，正是因为真实，所以漫画才有力量。但力量作为一种观念产物（而不是自然物），在不同的人那里从来都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含义；力量希图达到的目标，在不同的人那里，也从来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想利用它改朝换代，有的人想借助它攻克碉堡，有的人不过是想仰仗它混一碗好饭，甚至是讨一房福晋。而革命的宗旨和远大理想首要的、初步的目标就是改朝换代。既然如此，革命从来就不需要悲观和悲怆。悲怆的力量不是革命的力量，甚至不是革命所需要、所特别倚重的力量。悲怆的力量只是革命的力量的“偏师”和补充。它的性质与革命的力量的性质，如果不是背道而驰的，起码也是有较大距离的。因此，《漫画生活》代表革命语义拒绝张仃的漫画，也就是相当有道理的了。

迫于严重的生计问题，在万般无奈之下，张仃只好将这些画投向了“资产阶级”的“右翼刊物”——著名漫画家张光宇先生主持的《上海漫画》。没想到很快就被重点采用了，而且两幅画都被制成彩色珂罗版。这件事情让张仃觉得太有幽默感了。直到几十年后接受笔者的采访时，已经年逾八旬的张仃还对此念念不忘，也禁不住轻微地摇头。他感到了不可思议。但他是否也感到了这件事对他的人生运程具有的某种提示？在采访中，我们没有问过他。

但这件事对于张仃却是一个重大的转机。正是著名漫画家张光宇和他主编的《上海漫画》，适时地接纳了和推出了一个新人，也是张光宇和《上海漫画》将小小年纪的张仃，推到了漫画家的位置上。这不仅一举解决了张仃的生计问题，还使张仃借助这个转机，把自己逐渐修炼成中国漫画史上——又岂止是漫画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一个重要的人物。

职业漫画家

张仃在1936年颇富戏剧性地一夜成名后，在漫画界一些前辈画家——比如张光宇等人——的帮助下，开始成为职业漫画家。他马不停蹄地为《扶轮日报》和《中国日报》画时事漫画，一方面发泄了心中的愤懑，另一方面，也为糊口找到了一条符合自己爱好的渠道。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重要收获，就是认识了后来的张夫人陈布文小姐。但张仃的职业漫画家生涯只持续了短短两年时间。迫使张仃中断职业漫画家生涯的原因是日本人的大举入侵，以及日本军队对南京（那是《扶轮日报》和《中国日报》的所在地）、上海（那是漫画家和漫画杂志最集中的地方）

的占领。但就是在这短短的两年内，不足二十岁的张仃以凝重的笔触，画出了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漫画。《春劫》（1936 年）、《玩偶大观》（1936 年）、《看你横行到几时》（1936 年）、《同志》（1937 年）、《乞食》（1937 年）、《休息》（1937 年）、《野有饿殍》（1937 年）、《日寇空袭平民区》（1937 年）、《蹂躏得体无完肤》（1937 年）、《战争病患者的末日》（1937 年）、《兽行》（1937 年）……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在这些漫画中，“现实主义精神，单纯的写实加上强烈的夸张变形，黑白色块的对比浓重，冲击力极强。”（王鲁湘：《大山之子——画家张仃》，第 22 页）这些漫画构思巧妙，形象独特、打眼，画面非常拥挤，颇有民间水陆画的风采，几乎没有多少剩余的空间，毫不犹豫地给人一种极其强烈的视觉效应。但绝无丝毫快乐的成分，就更不用说有闲阶级愿意欣赏到的狂欢和具有搞笑性质的幽默感了。

黑白色块是世间最常见的颜色（假如白色能够被称为颜色），但也是互相“敌对”的颜色。它们都是颜色中的极端分子。将它们放在一块儿，对比也就分外强烈。张仃用这两种颜色作漫画，虽说是受了墨西哥画家维拉和珂弗罗皮斯的影响，也部分地接受了德国画家乔治·格罗斯和美国画家威廉·格罗拜的启示，但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恰好在于：身处一个国破山河在的惨烈年代中的画家，尤其是一个有正义感、有血性的忧心如焚的画家，似乎不大可能动用更鲜艳的色彩来描写现实，因为现实首先就是昏暗的、悲惨的、暗无天日的。虽然太阳每天都照常升起，但那是正在变黑、变暗、走向衰亡的太阳；虽然月亮每逢十五就圆，星星仍然在天际摆出一副天女散花的架势，但那是惨淡的、打上了悲惨时代中人浓墨心理底色的月亮和星光。它们在心理效应上几乎就等同于鬼

火。因此，在张仃那里，颜色不仅具有视觉心理学上的意义，更具有视觉伦理学上的意义：该种伦理学要求一个真正的、诚实的、愿意凭着人性的基本要义介入现实的画家，真实地描写现实。这种描写容不得一丁点粉饰。相对于惨烈的现实，五彩缤纷确实是不道德的。

张仃的漫画的这一特质，几十年后在他夫人陈布文先生的笔下，得到了真实的、质朴的描述："一般说来，观画应是一种欣赏，常能使人在精神上得到休息与享受。但是，看张仃漫画，却令人一下子回到黑暗时期的旧中国，感到异常的沉重与窒息。"这就是真实裹挟而来的力量，它能让人越过时间的长河，仍然感受到当时的暗无天日和惨淡无光。

虽然现实生活内容进入艺术的文本空间——哪怕它叫漫画，从来都有着多种渠道，但画家最终选择哪种具体渠道，则和画家本人的天性、禀赋和气质关系重大；虽然现实生活场景进入艺术空间需要多重转换，但怎样转换、按照何种方式转换，却需要画家的心灵进行过滤。也就是说，需要一种特殊的、精致的、对艺术有效的心理机制。那时张仃年轻、冲动、偏执、易怒，像几乎所有的同龄人一样（他还不足二十岁）。所以张仃在职业漫画家阶段所画的漫画，几乎每一幅画中的人物、场景、车轮、手势、步伐、面容、服饰、某些可诅咒的人士的獠牙甚至空气、阳光（假如它存在）、街道、土地……都充满了胀鼓鼓的力量，似乎要冲破画面直立行走。它们都是饱满、充沛、充盈的形象。在这些画面中，无论是被画家痛斥的对象（比如《看你横行到几时》中的日寇），还是被同情的对象（比如《野有饿殍》中饥饿的城市贫民、《休息》中在路边沉睡的黄包车车夫等），都是黑色的，都充满了胀鼓鼓的仇恨。甚至连懒洋洋的沉睡者（比如《休息》中的黄包车车夫）也肌肉僵硬，随时

准备冲起来为生计赶路。但这首先是年轻气盛、精力充沛、情感亢奋的画家内心的仇恨：是画家面对现实所产生的巨大内心张力，使画面中的各色人等、各色场景、各式道路和各种线条都充满了力量。这不是一般的力量，而是愤怒的力量，悲怆的力量，同情的力量，痛苦的力量，仇恨的力量，但同时也是关于愤怒的力量，关于悲怆的力量，关于同情的力量，关于痛苦的力量，更是关于仇恨的力量，它是张仃向这个非人的、地狱般的世界投出的黑白交加的诅咒。这是真实的诅咒，但首先是因为现实比现实应该得到的诅咒更真实。正是因为真实，所以才拥有了穿透纸背的力道。

但这种力量在红色的、具有爆发力和冲击力的革命的力量眼中，也许只能算是革命的前奏力量，革命的准备力量。它是革命力量的萌芽。在这一点上，拒绝过张仃的左翼杂志《漫画生活》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愤怒的力量、悲怆的力量、同情的力量、痛苦的力量、仇恨的力量在其来源上，还只不过是对悲惨现实的真实观察和描摹，而反抗这种现实、改造这种现实的力量，还处在密谋状态、萌芽状态。它只是革命力量的胚胎。但并不是说这种胚胎状态所具有的力量就是无力的力量，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另一种力量而已。

张仃在漫画中大量使用黑色是正确的，也是相当准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黑色是最悲哀的颜色，几乎没有人在葬礼上穿大红大紫而要穿黑色的服饰，也许就不失为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对视觉的心理效应进行过哲学论证的休谟和贝克莱，深知这中间的猫腻，我们在有空闲的时候也不妨向他们咨询。而张仃的上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恰好是悲哀的中国。至少张仃在苏州反省院的狱友艾青，就是这样来描写他们的中国

的。只不过艾青使用的是分行文字。但那仍然是黑色的分行文字——艾青在他的诗歌中就多次用“黑色”来指称中国和中国的土地、人民、山川、树木、独轮车甚至太阳。在艾青的诗中，这些事物一忽儿被冠以“黑色”的名号，一忽儿又被授之以“悲哀”的徽章。在这个重要的参照系下，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张仃使用黑色描述他眼中的中国、他的中国，确实是准确地对应了现实生活的悲惨境遇。

而黑色同时又是最痛苦的颜色，是最丰腴的颜色。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在色彩的大家族中，或许只有黑色才能准确描写中国人最丰富的痛苦。这种痛苦的丰富性，按照古波斯诗人的话说就是：“论灾难，我们自有取之不尽的源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表达反抗现实的力量的密谋状态的黑色，完全对应了张仃作为艺术家的诚实、正义和良心。他对得起他赋予色彩的伦理学基因，因为他的漫画从骨头到面孔都是真实的。

在《漫谈“漫画”》一文中，鲁迅就曾经说过，这一类的漫画在中国一向就很难生存，因为早就有一些上等人和正人君子说过，他们最讨厌人使用显微镜。因为显微镜能照出现实的“只手”上隐藏的、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张仃的漫画是显微镜吗？但张仃的漫画不是显微镜吗？

在《漫谈“漫画”》一文中，鲁迅还说过，欧洲先前在讨厌显微镜方面也并不两样。“漫画虽然是暴露，讥刺，甚而至于是攻击的，但因为读者多是上等的雅人，所以漫画家的笔锋所向，往往只在那些无拳无勇的无告者，用他们的可笑，衬出雅人们的完全和高尚来，以分得一枝雪茄的生意。”在短暂的职业漫画家阶段，张仃笔下的人物可以大而化之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拳”有“勇”的“有告”者，比如《兽行》中穷凶极恶的日本人、《玩偶大观》中中国的官方上层人士以及国际上

的法西斯主义者；一类是无拳无勇的无告者，比如《乞食》中那个饥饿状态下的贫民、《休息》中那个疲惫之极的三轮车夫、《日寇空袭平民区》中那个丧妻丧子的欲哭无泪者。在黑白两种颜色的笼罩下，这些人物连同他们身处的场景，虽然只存在于各自的画幅之内，但如果将这些漫画完全置于张仃整一的作品谱系当中，无疑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有拳有勇有告者的存在，恰恰是无拳无勇无告者的存在理由和根本依据。

作于 1936 年的漫画名作《玩偶大观》，代替张仃很好地表达了这个意思。《玩偶大观》在张仃职业漫画家阶段的诸多作品中，之所以格外打眼，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白描”性质。《玩偶大观》不像张仃的其他作品那样浓墨（但不重彩），而是纯粹用黑色线条勾勒了许多玩偶式的人物，主要角色有：玩弄伪满洲国傀儡的日寇，玩弄女人的腐朽的中国官僚阶级，玩弄法西斯的国际凶神恶煞们……正是这些线条式的玩偶之人，造成了《乞丐》中匍匐乞讨、濒于死亡边缘的孤苦无告者，《野有饿殍》中的白骨和白骨旁边正要变作白骨的骷髅之人，《休息》中依在摇摇欲倾的墙壁睡觉的另一个贫穷的骷髅之人……总而言之一句话，正是那些玩偶之人，以自己的生存促成了这些悲惨人民的悲惨的黑色现实。真实的、“白描”的、准确的《玩偶大观》，不仅为那些无拳无勇无告者找到了他们的身份在现实中的来源，也使张仃在职业漫画家阶段的所有作品，有了整一的逻辑递进关系。假如我们说，张仃的黑色色块所显透的力量，仅仅是革命的前奏力量，但反过来，这种前奏性的力量，不也预示了革命力量的到来几乎是顺理成章的吗？

黑白色块——主要是黑色色块——的过多加入，使张仃在职业漫画家阶段的作品几乎没有任何幽默感。或许是因为年轻、易怒、好冲动，

因而在面对这等人间惨境时有着过多的怒不可遏，才使得幽默感在张仃的漫画中毫无藏身之地。而有关张仃的好冲动，这里可以举两个小例子。王鲁湘先生在张仃的传记中讲到过两个故事，其中之一是“脑袋事件”。说的是在东三省沦入敌手，而政府又采取不抵抗的政策时，北平美专国画系学生张仃因此苦闷之极，后来连行动都变得有些反常，看上去颇有些疯疯癫癫的意味。这倒与他悲愤、感情充沛的作品有共同的一面，但也与他冷静、清醒和客观的作品有恰成比照的一面。而美专不少同学不理解张仃的怪模怪样，还拿这个逗他开心。“北平的冬天很冷，到处有积雪，同学们常在宿舍的屋檐下晒太阳、聊天。有一次一个同学故意激张仃，指着院子阴面一人高的雪堆，问他敢不敢扎进去。张仃二话没说，一头扎了进去，趴在里边死活不肯出来。后有好心的同学死拉硬拽才把他弄了出来。”（王鲁湘：《大山之子——画家张仃》，第 14 页）第二个是“红墨水事件”。这说的是已经成为职业漫画家的张仃因为画漫画赚了几个钱，给自己买了一件白色麻纱西服。有一次，他穿着这件衣服去大量采用过他作品的中国日报社。有人故意逗他：“张仃你怎么也抖起来了？”张仃一句话没说，抓起桌子上的一瓶红墨水——这是他的漫画中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用到过的颜色，顺着衣领就倒，白西服即刻就成了花西服。诸如此类的事情，使张仃获得了“神经病委员会委员长”的称号（参阅王鲁湘：《大山之子——画家张仃》，第 20 页）。这两个故事在旁观者看来，很可能饱具幽默感，而故事的主角一定不会承认这是幽默。对于这样一个极其容易冲动的人，在面对他天天存身其中的惨烈的生活内容时，幽默感的退场，应该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愤怒几乎是不能用幽默的方式来传达的。

有趣的是，就在张仃成为职业漫画家之前，著名作家林语堂曾大力提倡过幽默文学，不仅如此，林语堂还煞费苦心地创办过《宇宙风》《人间世》等杂志来承载他的倡导。林先生的意思是中国人一贯缺乏幽默感，所以也就失去了做人的大半乐趣，因此有必要由他来倡导倡导幽默，以改善中国人的人生状况。林先生对幽默的大力倡导引起了一些人的呼应，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批判。批判者持论的依据是：这不是一个幽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幽默是一种奢侈品。在采访中，我们没有问张仃是不是也这么看待林先生倡导的幽默文学。不是我们忘记了问，而是没有必要问。

因此，职业漫画家阶段的张仃的作品，就合乎逻辑地具有了一个极为鲜明的特色：讽刺与幽默之间关系的严重失衡。作为张仃漫画的见证者，张夫人陈布文先生生前在替张仃整理漫画稿时，意味深长地写过一段话："（张仃）刚开始创作漫画的时候，就带有极其痛苦与沉重的心情——这使他的画，也太沉重，太严肃，甚至是太严厉了。""有人批评说，张仃漫画，没有幽默只有讽刺。"陈先生深有感慨地说："说实话，把张仃的漫画翻阅到这儿，真愿意能有几幅富于幽默感、十分有趣的小玩意儿插进来，可以使观众长吁一口气，轻松一下。"根据现存的张仃的漫画来看，陈先生的评述堪称准确。但讽刺与幽默之间的严重失衡，却从另一个方面得到了补救，这就是过多的仇恨和过多的同情因素的加入。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总有着正确的情感，有着对人性正确的理解。张仃也是这样。千万不要以为张仃只有愤怒和仇恨。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据说自从当上了职业漫画家，张仃也开始有几个钱了。有一次得了十五块大洋的稿费后，他买了一件黑呢子大衣。就在穿上大衣的那天，

在回家的路上，张仃碰到一个老乞丐，冻得瑟瑟发抖，他心中一动，就想脱下大衣披在老乞丐身上。后一转念，没有脱大衣，掏出剩下的十块大洋塞进乞丐的手里，头也不回地走了（参阅王鲁湘：《大山之子——画家张仃》，第 22 页）。张仃把生活中这种真实的举动，援引到了他的漫画创作中。无论是对日本人的仇恨，还是对普通民众的同情，都在他充满强烈对比的黑白色块的笼罩下达到了极致。

而漫画，从人性的本义上说——倒未必是从漫画的本义上说，总是无权者对有权者的抗议，弱势者对强势者的愤懑，也是对平等、友好和温暖的呼吁和呐喊。对于抗议和愤懑，讽刺是最好的方式；对于呼吁和呐喊，真实的、用心的、寄予同情的描述，就是最佳手段。而讽刺和描述不一定非得和幽默有染，在最基本的层次上，只需要有力就行了。在张仃的时代，幽默确实是一件昂贵的奢侈品。而张仃的“太沉重，太严肃，甚至是太严厉”，其实正好正确地体现了漫画的这一“本义”，也是对于时代堪称最正确的回答。

抗战漫画

短暂的、充满激情和焦虑的职业漫画家生涯结束后，从 1938 年开始，年仅二十岁的漫画家张仃，以漫画为武器、为工具，走向了抗日的第一线。张仃和叶浅予、张光宇等师友们一道，组织过旨在抗日救亡的“漫画宣传队”，举办过“抗日漫画展览会”，出版过《抗战漫画》杂志，筹建过抗日漫画培训班，搞过抗日漫画巡回展……二十挂零的张仃是这些活动的主角之一和重要组织者之一。正是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张仃的脚步迈过了铁蹄下的中国的许多山山水水，而满目疮痍的现实，更给张

仃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也给张仃的心情打上了厚重的底色：他更加坚定了对黑白色块的使用。

上述系列漫画活动，都是以抗战为主题展开的人生叙事。如果说，在职业漫画家阶段，张仃主要是在为谋生而画漫画，是自发地表达了正确的情感（比如同情、仇恨、悲哀和忧郁），他的漫画创作基本上属于个人行为，那么，在这一阶段，张仃已经把漫画强化为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是自觉的行为，也是集体的行为。

随着日本人先后攻克上海和南京（这两个地方都是职业漫画家阶段的张仃的临时驻足地），对于自由主义思想浓烈的漫画家们来说，集体生活开始成为一种必须。这首先是因为战争改变了漫画和漫画家的角色先前所拥有的美学含义和伦理学含义。现实生活不仅始终是艺术的直接来源，也充当着艺术家的教师爷角色。艺术归根到底是个人的行为，这当然不错，但在某种惨淡、严峻的关头，现实生活却会在具有共同志趣和共同血性的艺术家之间充当纽带，把这些分散的艺术家们连为一体，迫使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要按照时代和现实的需求，贡献出自己的才华，贡献出才华中所蕴藏的正确力量，从而成为一个集体，一个具有更大力量的集体。在这个集体中，漫画家们所充当的美学角色也得到了改变：不仅要描述现实，不仅要夸张、凸显现实中的“噬心主题”，不仅要讽刺、陈述现实中的黑暗部分，更要反抗现实，替现实呐喊。

尽管张仃仍然一如既往地在漫画中使用他钟爱的黑白色块，但他适应着新的形势和新的心理需要，又给他所钟爱的黑色赋予了更加积极的含义，这就是反抗。但这归根结底是惨烈的现实，通过漫画家的感知教育了色彩，修改了色彩的美学含义和伦理学含义。而反抗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则分明带有了浓厚的悲壮色彩。因此，如果说张仃在职业漫画家阶段的作品有着浓郁的悲剧色彩、悲哀特质，有着浓厚的仇恨心理，“抗战漫画”阶段的作品，则有着浓厚的悲壮色彩，也有着挥之不去的乐观神色。这相当完好地体现在张仃的代表作《收复失地》当中。

这幅尺寸较大的作品在“抗敌漫画展览会”上展出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画面仍然由黑白色块组成。在画面中，占主体地位的是一位一手执长枪、一手执大刀的中国军人，军人的脚下是长城，身后是黑色的土地和田野，高高举起的大刀则与苍穹连为一体。圆张的嘴唇表明了画中军人的怒吼与呐喊。这是一幅感人至深的战地宣传画，一洗漫画家张仃在职业漫画家阶段的悲哀和忧郁。《收复失地》也在一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适时地表达了一种黑色的希望，与田野一样颜色的希望。

黑色在这幅画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画中黑色军人的呐喊，因为黑色而有了音色上震撼人心的厚度，因为田野而有了情感上和心理上的坚强支撑，因为长城而有了战斗和战斗意欲达到的目标。尽管在画面中，黑色仍然是悲哀的底色，但悲哀在此时却给了呐喊以足够的支撑：正因为悲哀，所以才起而作出有希望的反抗。这是符合心理逻辑的画面。诚如鲁迅所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一定会在沉默中完蛋。黑色在这里充当的就是一种爆发的色泽，行动的色泽。二十岁的矮个子画家张仃听从现实境遇的旨意，修改了黑色的含义，也给黑色灌注了一种反抗的力道。

黑色在这里还表征着希望。黑色也被强行修改为有关希望的颜色，它和爆发的色泽、行动的色泽，有着惊人的内在一致性。因为黑色是凝重、厚实的颜色，所以希望也是凝重、厚实的希望；因为黑色是悲哀的颜色，所以希望也是凝重、厚实、悲哀的希望；因为黑色是痛苦的颜色，

所以这里的希望也必将是过多的痛苦之后经过呐喊和战斗换回的一点点狂欢的希望。正如多年后张仃的同辈人、诗人公刘面对开国大典时所写的那样："为了这一天，我们奋斗了一生！"而所有这一切，都通过画面中的军人圆张的、夸张的大口给表达出来了。

但"抗战漫画"阶段的张仃并没有一味沉浸在虚幻的希望之中。希望也许有，但还需要时间、战斗、流血和反抗。因此，张仃一如既往地揭露了日本人的兽行，以及日本人兽行之下悲惨的中国人与中国人的悲惨生活。1938 年元旦，武汉出版的《抗战漫画》第一期上，《兽行》就登在杂志的封面。这意味着，在漫画家张仃眼中，在当下中国，希望是与日本人的兽行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那个危难的时代，所谓希望，就是打败日本人，争取到民族的解放；所谓兽行，不过是激发中国人希望的诱饵而已。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希望，也是一种极端的、需要用绝望来做底色的希望。遇到这种悖论性惨境的人，确实需要比活在其他境况中的人更多一些的力量、忍耐、意志、严肃和沉重。几十年后，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些漫画，我们能够看出：张仃没有愧对他的时代，他做出了一个中国人在那个年代应该做出的事情。

基于这样的境况，黑色在这里被更加复杂化了：它不仅承载了性质惨重的希望，而且还是希望的底色，是需要再生和破茧而出的底色。这种底色正在呼唤另一种颜色和另一种颜色的帮助。如果我们把《蹂躏得体无完肤》《兽行》和《收复失地》联系起来观察，这种底色的严重性就昭然若揭了。《蹂躏得体无完肤》说的是日本人在如何践踏旨在限制日本人为非作歹的"九国公约"，在如何肆无忌惮地行凶作恶；《兽行》说的则是画面上口中衔刀子、双手系皮带（那是因为刚刚发泄完兽欲）

的日本人在如何奸淫杀掠。《兽行》的内容算得上是对《蹂躏得体无完肤》所表达的主题的具体化。但《收复失地》正是对这两者的抗议。有意思的是，《收复失地》作于 1938 年，前两幅漫画则作于 1937 年。这个时间序列，也许正好反映了张仃从职业漫画家阶段走向“抗战漫画家”阶段的心路历程。也就是说，希望是残酷现实生产出的宝贵“遗产”，不管这个希望在眼下是如何的渺茫和虚幻，但它作为中国人的昂贵食物，须臾不可缺少。这同时也表明了，从前悲哀与愤怒的职业漫画家，现在已经成了一位战斗着的漫画家。

如果说，职业漫画家阶段的黑色在漫画家张仃手中的“美学效应”更多在于真实，在于真实地描述和传达那个年代中中国人民悲哀、悲惨的生活，在抗战漫画阶段，黑色则成了具有悲壮色彩的希望，它的目的在于反抗，而且以其色彩上的黑，指明了这个希望的悲壮气质。这全部的意思不过是：抗战漫画的黑色，继承了职业漫画家阶段的黑色的全部语义学遗产，但又将前者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使得张仃这两个阶段的作品之间也具有了逻辑上严谨的承传关系。

任何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其艺术都有自身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自然而然地到来的，是水到渠成的，容不得一丁点“强扭”的成分。时代和漫画家集体的火热生活教育了漫画家，也教育了漫画家心目中的黑色，更教育了漫画家心中的黑色所具有的伦理学内涵，使从前悲怆、忧郁的伦理学，一跃而为充满希望的伦理学。这或许就是“自然而然”和“水到渠成”的真实意思。

张仃的漫画有一个值得特别一说的特性，那就是画面始终填得很满。这似乎有些违背向来强调“含蓄”的东方美学精神，也似乎是在和向来

追求“神似”而不是“形似”的文人画唱对台戏。无论是职业漫画家阶段的绝大多数作品，还是抗战漫画阶段的几乎所有主要作品，基本上都无一例外。这使张仃的漫画给人一种强烈的、不由分说的视觉效应。画面填得很满，排除张仃在漫画艺术上的风格追求不论，仅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恐怕正是因为他有太多的话要说、太多的情感需要宣泄所致。这也不难理解。因为那毕竟是一个发生了太多“事故”、产生过太多悲惨“故事”的年月。这些“事故”和“故事”，需要一些有良知和正义感的艺术家对它们作出解释、评注、判断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看，张仃几乎毫无剩余空间的漫画画幅，确实满足了众多“事故”和“故事”的吁请。罗兰·巴尔特认为，艺术风格是一种心境蜕变的结果。假如巴尔特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也不妨匆匆下结论说，张仃将时代“事故”和“故事”的吁请，转换为一种美学风格，也是“心境蜕变的结果”。在他的艺术心理和时代内容之间，确实达到了一种精确的共振，也确实有着惊人的同一性。

在这段时间里，作为武器的漫画，在张仃那里也得到了空前的利用。无论是抗敌漫画巡回展，还是筹建漫画速成班，其目的并不在漫画本身，而是要尽力将漫画置换为唤起民众的工具。没有必要讳言，作为漫画家的张仃，也许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画家。这不仅仅是因为时代反对纯粹的艺术和艺术的纯粹，也不仅仅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一切艺术形式都有着工具论的传统，更是基于艺术家的良心本身。在水深火热中求生存的人，是不在乎求生存的方式是否优美的，他们更看重这种方式的有效性。这种方式也必须要与时代有及物的上下文关系，必须要努力和自己的时代之间产生足够大的摩擦力，从而让自己变得更加有力、有效、

有用和有意义。与张仃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艺术家一样，张仃为艺术赋予了过多的工具意义。艺术被理解为一个非纯正的空间。但这归根结底是时代强行赋予艺术的责任和良知。

漫画作为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秉承其传统，也一向被认为是各种美术形式中，最能面对现实直接发言的形式。在时代内容与漫画的根本内涵之间，确实有一拍即合的地方。张仃在这一方面是幸运的：通过他的艺术天分，他照顾到了漫画本身的特性，赋予了漫画相当高的艺术性；通过他的血性和良知，也让漫画适时地、恰当地承载了时代内容，以及时代所需要的心理指标。也就是说，在民族革命与漫画创作之间，从自发到自觉的转换过程中，张仃很快就找到了契合点。而通过的方式，就是让色彩改变含义——无论是美学上的含义，还是伦理学上的含义，让色彩说出它在一个严峻的时代应该说出的话。民族革命的严正要求，也因此在黑色中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这是张仃的幸运，也是他所钟爱的黑色的幸运。

包装革命生活

职业画家的短暂生涯消失后不久，在 1938 年，张仃作出了一个对他的一生有着决定意义的选择：像许多同时代的热血青年一样，他投奔了火热的革命圣地延安。那确实是一个火热的、在视觉上充满了红色的地方，是共产党的党旗遍地飘扬的处所。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延安被描述为一个盛行“红色机器舞”的地方。人们扭着秧歌，挥舞着长矛，而长矛上总不忘系上红巾。后者象征着革命火红、热情、喧嚣和声势浩大的庄严气氛。而在那片贫瘠、广袤、堪称荒凉的黄土地

上，红色无疑是最有视觉冲击力、最能激发人们战斗欲望的颜色。一个在国统区内用黑白色块进行漫画书写的愤怒的漫画家，能适应这种具有巨大冲击力的颜色吗？事实上，虽然初到延安，并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做教师的张仃过得并不太愉快，但他还是选择了长久地留在这里。他给了自己另一个任务：尽可能适应这种颜色，因为这种颜色确实比他所钟情的黑色更表征着希望，更有热情，也更为乐观。他年轻的灵魂也需要这种颜色的荡涤。

但投奔延安，至少给画家张仃带来了两个问题，却又不可不提：作为一个有着浓厚自由主义倾向的、有着烈火一般热情的年轻人张仃，几乎很难适应延安高度政治化、纪律化、军事化的氛围；而作为一个在文艺政策上强调歌颂而较为反对暴露的地方，延安熄灭了漫画家张仃继续“漫画”的热情。

因为不管怎么说，也无论漫画怎么变，讽刺和夸张总是漫画最重要的特性，漫画也总要针对主流社会造成的后遗症发言。从根本上说，漫画是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人们之所以在众多的美术品类之外，还要发明一种叫做漫画的东西，其实正着眼于漫画的自由主义特征。这是美术自身的幽默：当其他的美术品类被主流意识形态一一招安和收编时，美术还可以仰仗漫画的自由主义精神，保持自身的尊严。从某种意义上说，漫画就是美术的预见性和幽默感的直接产物。而现实的情况是：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有人存在，就肯定有主流社会和主流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延安，漫画如果不被红色同化，就一定会和红色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强烈，并不比它在别的地方产生的冲突力道更小。有意思的是，早在张仃去延安之前的 1937 年 9 月，毛

泽东就已经在全党范围内作了《反对自由主义》的报告：

> 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
>
> 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
> ……
>
>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

这绝不能仅仅理解为巧合。而更有意思的是，张仃对自己身上的自由主义倾向也有着很深的认识。张仃这样描述过自己："延安七年，我一直未入党，心里一直很矛盾。我虽然信仰共产党，但觉得自己是个散漫的艺术家，不够格，入了怕给党添麻烦，自己也受束缚。"（王鲁湘：《大山之子——画家张仃》，第46页）在这种情况下，有着浓厚自由主义素质，已经习惯了黑色以及黑白色块混用的张仃，放弃自由主义成色浓厚的漫画创作，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了。这似乎也有旁证。

1942年2月15日至17日，延安美协在延安军人俱乐部举办了一个"讽刺画展"。当时的《解放日报》对此作了较为谨慎的，但十分合乎漫画根本品质的报道："作品共七十余幅，内容为对延安新社会中所残存的某些弱点，作严正之指出。"有些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讽刺画中，没有一幅出自短短几年前还是漫画界风云人物的张仃之手，它们的作者

是华君武、张谔、蔡若虹三人。据说毛泽东在看了这个画展后，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

也许是因为土法上马的漫画的作用太小，造成的冲击力不大，也可能是延安对线条式的东西没有对文字性的东西那么看重，总之，这些有"严正之指出"意味的作品，没有像文字性的《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那样遭到猛烈批判，仅仅是受到了毛泽东轻描淡写的批评，它们的作者也没有王实味那样的悲惨命运，应该说是相当幸运的。张仃没有蹚那趟浑水。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工作性质等），也许是他深刻地认识到了，他惯用的黑色与圣地延安之间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冲突，从而使他免去了可能因漫画带来的个人厄运。

事实上，除了刚到延安为一些友人——比如艾青、萧军、丁玲——画过肖像漫画，并被有些人斥之为有意"丑化革命作家"外，张仃再也没有画过漫画。因为漫画的讽刺特性、自由主义行为，和革命以及革命的赤色逻辑产生了广泛的冲突。革命甚至不需要个人之间偶尔流露出的友善式幽默感。红彤彤的延安和张仃擅长的黑白色块在颜色上也产生了对立。这对视色彩为生命的画家来说，确实是致命的。张仃很识相地收起了画笔，将自由主义藏在了心中。应该说，在延安，张仃很快就有效地克服了对于黑色的热情。他降伏了黑色对他产生的心理冲击力。实际上，呼应着抗战漫画阶段的黑色的内在要求，张仃正在努力寻找一种新的替代色，准备为圣地延安更好地服务。

但年轻、热情并被红色所强烈感召的张仃，并没有因此完全放弃创作。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工艺美术上。正是工艺美术，使张仃在艺术与革命之间找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既宣泄了他创作的冲动，又让这

种冲动尽可能地满足了革命的要求。漫画的自由主义之火熄灭了，因为它对革命有害；代之而起的则是对延安、对革命有利、有用的其他方式，是从单纯的笔墨纸张、色彩线条和黑白色块，走向了纯粹的实物形式：木头、椅子、土陶、毡子、麻绳、壁灯、屏风、匾额、南瓜、冬瓜、劳动模范等等，这就是工艺美术和设计以及布置劳动成果展览。工艺美术和劳动成果展，既向延安展现了火热的革命色彩和这种色彩带来的辉煌成果，也向外界展示了革命的要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革命战无不胜的纪律性。

在延安，张仃主持设计了很多“工艺品”。其中有几件特别值得一说。首先是装饰“作家俱乐部”。按照王鲁湘《大山之子——画家张仃》的记载，情况是这样的：“装饰作家俱乐部时，张仃就地取材，利用本地的木材、土陶、土毡，把它弄得尽量古朴高雅。座椅全设计成折叠式的，里面绷上麻绳，外面蒙上灰毛毡，再用土蓝布扎上两道蓝边，烫上作家俱乐部的徽记。壁灯是倒扣的娟制蓖罗，样式很别致。本色木条做成长方格子的屏风，糊上土纸，往墙角一放，显得很洋气。张仃还在进口处设计了一个酒吧，萧军的爱人王德芬就在酒吧后面卖酒，也就是本地的土白干……张仃还给作家俱乐部设计了会徽——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中的一把金钥匙，还配上了一条标语：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让张仃感到意外的是，这个创意又引起了一些非议，有人责问张仃：究竟党是盗火者，还是作家是盗火者？究竟谁有资格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党还是作家？（参见王鲁湘：《大山之子——画家张仃》，第 42 页）

这个反问确实非常有趣，也相当符合革命语义的内在音色。它说明，尽管张仃完全放弃了漫画，并尽量在工艺美术设计中，剔除漫画所具有

的任何自由主义因子，但并不能完全让革命或者某些具有吹毛求疵癖好的革命者满意。不过，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革命和某些革命者错了，而是意味着：在艺术家的自由灵魂和革命的红色教义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偏差。它们之间要想达到完全的平衡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张仃的努力却是有意义的：他在用自己的“手艺”为革命服务，实际上也就间接地打击了、痛斥了他在职业漫画家阶段的漫画中所表现出的地狱般的人间生活，也把抗战漫画阶段用黑色透露出的厚重的希望，给进一步地升华了。

这差不多是在说，张仃给了这种希望一件红色的外衣。这种希望洗去了黑色所沾染的任何悲哀、悲怆的成分。“作家俱乐部”会徽上熊熊燃烧的烈火，就是这件外衣的形象。这束火苗基本上烧毁了张仃职业漫画家阶段的所有悲怆、忧郁和悲哀，也彻底照亮了抗战漫画阶段有着浓厚悲哀底色的希望。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束火苗还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消除了张仃对黑色的兴趣。他所钟爱的黑色将会遭到压抑，直到晚年才有机会再一次勃发。

到延安后不久，几经周折，张仃到了“联政”宣传部做美术组长，负责军队成果展览设计。张仃后来对此有过相当愉快的回忆：

>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十分艰苦。在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了很大扩充发展。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封锁，边区自然条件贫乏，军民非常困难，我们便遵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军民展开了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畜牧纺织。部队的生产程度惊人，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就是这时进行的。收获过后，每到冬季便搞一次生产成果展示会。组织上连续几年派我负责这个展示会总体设计。

> 第一次，在延安南门外举行，规模很大。为防日寇飞机轰炸，我利用靠山而挖的数十个窑洞，在洞外搭建长长一路席棚，棚外张贴大幅标语，标语内容为：兵强马壮，准备反攻，抗战到底，争取胜利。还为革命领袖、英雄模范画了一系列巨幅画像悬挂在会场。我按照政治部的展示提纲做出总体设计方案……展品全是部队生产、部队送来的。有特大的南瓜、土豆、玉米、大白菜、圆白菜、萝卜、黄瓜、粗布、粗毛呢……等等。要知道，在黄土高原那样贫瘠的山地，种出了那样大的蔬菜，土法手工织出布和毛呢，实在是奇迹，大家十分振奋。在席棚和窑洞里用粗糙的木板搭展台，展台上摆放展品。展台后面墙上挂有图表和英雄事迹的连环画。图表由我绘制，我和临时调来的美术干部一起下连队，采访那些英模，把他们的事迹编成故事，编成连环画展示……

假如说张仃在装饰“作家俱乐部”时还受到了某些人的质疑，到了设计成果展览会时恐怕就有些大获全胜的意思了。这表明，一个讽刺性的漫画家在火热的革命生活中得到了改造，其讽刺的天性为革命的“歌颂主义”所取代，其自由主义因子为高度的革命纪律性所置换，但同时也表明了：艺术在革命的年代只有为革命服务、于革命有利，才会得到展示，才具有合法的身份，艺术家也才可能找到自己的努力方向。正是在延安，张仃才由一个讽刺人间地狱的漫画家，成了一个包装延安进而包装火热的革命新生活的高手。延安改造了张仃，教育了张仃早已习惯了的色块，也修改了张仃对于希望的定义：战斗意味着一切。

随着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也随着革命语义的不断丰富，张仃的被改造进程仍然处于持续之中。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以革命巨人的身份，

向全体革命艺术家发出了“向工农兵学习”的号召。其大致意思是：艺术家必须要通过工农兵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既要向工农兵普及艺术，也要向工农兵普及红色的革命思想，甚至红色本身。而所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当时的语境中，就是民族形式。毛泽东在一系列鸿篇巨制中充分地、彻底地表达了这个理念。而这一主张也得到了张仃的认同。因为早在幼年时期，张仃就特别喜欢具有高度民族特色的民间水陆画、年画，还临摹过这方面的画谱。张仃一直对他童年时期在民间艺术中看到的猴子形象念念不忘，就是明证。那些从《名人谱》上描下来的猴子，母亲剪纸的猴子，药店门口石墩上蹲着吃桃子的猴子，还有许多江湖画家笔下的猴子……这些民间艺术中质朴、生动的猴子形象，一直在张仃的脑海中闪现。因此，张仃认为民间艺术形式自有其活泼和充满生命力的一面，就是太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而对它们进行改造和利用，可以更好地为革命服务，也能更好地表达革命语义所要求表达的东西，也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他认同毛泽东的号召，自然就更在情理之中。

从 1942 年起，张仃把主要精力从工艺美术上撤退下来，径直投入到了对陕北三边剪纸的搜集整理上，并自制了许多年画。张仃的这一红色美术行动，既满足了革命语义的严正要求，也满足了张仃个人内心的需要。这是革命语义和个人语义完美结合的一个例证。抗战胜利后，张仃到东北担任东北画报社总编辑。利用职务之便，他大力提倡新年画运动。就在这一时期，张仃创作了不少新年画，《人民翻身立家立业》（1947 年）、《保卫果实，学习文化》（1947 年）、《喜气临门》（1947 年）等作品，就是其中的佳作。

“新年画”在张仃手中，也和当年的漫画一样，走的是直接介入现

实的路子。当然，除了在这一点上有相似性外，新年画与漫画之间也就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了，反而有着天壤之别。和早期悲观、忧郁、愤怒和呐喊的漫画相比，新年画则充满了乐观、积极、喜悦的情绪，十分符合革命的胃口，也十分符合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尤其重要的是，漫画中的黑白色块的对立，也完全被新年画中色彩缤纷的色块所取代。而在新年画中，红色作为主色，红色作为色块中的总司令，却是显而易见的。

红色被许多人理解为生命的颜色，尤其是被理解为生命处于上升期的颜色。它和血液是同一种颜色。革命语义选中红色来标志、象征和指称自己的身份，确实非常有道理，因为红色很好地对应了革命阶级努力的方向和战斗的热情，也很好地对应了一个处于上升期的革命阶级的心理和情绪。同时，红色也把革命的力比多给色彩化了。力比多是狂欢的、充满生机的。红色正是在这一点上，很好地显透了、表达了革命的力比多那狂欢，那热情，那乐观，那始终充满希望的力量。

因此，张仃用红色全面取代黑色，应该不难理解。而且火热的革命生活始终在呼唤新的色彩，新的情绪。但它首先是修改了曾经的漫画家张仃本人对色彩的认识，重新分配了张仃对色块和内心情绪的意识，也使张仃找到了正确的艺术方式、色彩句法、艺术语言，从而继续包装和渲染新质的革命生活。早年在漫画中展示的悲惨现实，随着红色的大面积降临，似乎早已被重新照亮；早年漫画中所揭示出的病态生活，随着革命语义的照耀，随着新年画中乐观、健康、朝气勃勃的新生活的到来，似乎也有望被全面根除。而这首先是革命的胜利，也是革命语义修改了一位艺术家的灵魂、思想、手艺和眼光之后的产物。至少对于张仃，漫画的时代似乎真的结束了。

包装新中国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从火红的延安走过来的张仃又承担了包装新中国的任务。按张仃后来不无戏谑的话说，就是为国家办“红白喜事”。（参阅王鲁湘：《大山之子——画家张仃》，第57页）在建国初期，昔日激愤、悲观和忧郁的漫画家，也沉浸在革命成功的大喜悦中。他看到了山河一片大红的祖国，也看到了欣欣向荣的希望。也就是说，张仃早在抗战漫画阶段所表达过的沉甸甸的希望，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张仃于是在兴奋中，愉快地承担了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政协会徽的重任。政协会徽是张仃主持设计的，这从来都没有疑义；有意思的是，国徽的设计却颇多争议。实际上，从现在能见到的材料看，国徽的设计过程充满了戏剧色彩——它是争论、修改、协商和争取之后的产物，是不折不扣的集体智慧的结晶。现在当然早已尘埃落定。我们可以说，参与国徽设计的人很多，但主要人物应该是梁思成、张仃和高庄。至少现存于中央档案馆和全国政协档案处有关国徽设计的第二份说明书，就是张仃所为。现将相关内容摘抄如下：

国徽应征图案设计含义

一、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红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

三、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国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

现在看起来，张仃当初的构想大多数都体现在沿用至今的国徽上。

此处没有必要去讨论谁是国徽的设计者，或谁是主要设计者。这里想说的仅仅是，张仃从一个讽刺性的漫画家，慢慢成为一个包装新现实、包装新中国的装饰设计师，其实有着非常深刻的原因。这个原因是：当年讽刺性的漫画所追求的理想现实，正是今天的现实；当初通过黑白色块表达的希望，已经成为今天红彤彤的现实。对一个有正义感、热爱和平与自己的祖国的画家来说，这种转变并不难理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徽设计中用到的主色调之一还是红色。这一方面说明红色在漫长的战斗之后，终于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合乎革命逻辑地成了色彩中的总司令，革命的力比多也全部、彻底地达到了它的目标；另一方面也说明，张仃这位使用黑白色块的昔日高手和老手，对红色的理解，较之延安时期也加强了许多。他从更高的层次上，终于理解了红色之于中国、红色之于中国革命的巨大意义——无论是象征的、隐喻的，还是现实的。如果说，他早年赋予黑色以视觉伦理学上的意义，主要在于真实地描写苦难中的中国人、中国人的生活以及中国人的心境，主要是为了表达一种厚重的希望、有巨大仇恨心理支撑的希望，现在，他所使用的红色的视觉伦理学的意义、政治学的意义却是革命赋予的。张仃只不过是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认同了这些意义而已。

秉承对红色的理解，秉承对红色的政治学意义和伦理学意义的认同，在设计完国徽和政协会徽以后，张仃在其后的日子里，又马不停蹄地主持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系列邮票（1959 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系列邮票（1957 年），主持了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1952 年），主持了巴黎国际艺术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1956 年）。在这种鞍马劳顿、旅次频催之中，

张仃也把自己整个儿地融进了红色。他成了红色的一部分，他是构成红色大海洋的一部分。他成了一粒欢腾的、兴奋的红血球。

肩负着这种经过长期修炼和实践才得来的色彩身份，在巴黎艺术博览会上，为了展示中国古老的文化，也为了向世界展示一个古色古香的古国是怎样慢慢变成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张仃于是把中国馆搞得像一座中国园林，一座庄严的宫殿："花坛、假山、溪流，古代建筑展厅前两旁铜狮对峙，既威严，又大方……在丝绸展厅，张仃把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放大，又在黑色人造大理石上刻上金线，作为丝绸厅的背景，效果非常好，也吸引人。中国馆鲜明的中国民族风格吸引了巴黎市民，开馆那天，观众如潮，旁边的美国馆倒显得很冷落。闭幕后，还有人想看，有个巴黎花店的老板还想把这个序幕厅的中国花园全部买下来，以供巴黎人长久观赏。"这是张仃的艺术的成功，但归根到底是红色的成功，是红色假借张仃之手，才让张仃获得了成功。

而在莱比锡博览会上，张仃意在展示红色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农业与工业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意在直接展示新中国燎人眼目的红色本身。于是他把展台设计成中国园林中的长廊形式，从而体现了新与旧的统一，古老文化与新生事业的统一。而在此设计理念中，张仃也就把红色之得来的原因与红色之运动的结果，一并给摆了出来。

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张仃除了将少量时间用在了国画创作外，将大量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包装新中国上。他包装新中国的方式不仅仅体现在设计国徽、政协会徽、邮票和布展上，也体现在被时人称之为"毕加索加城隍庙"风格的装饰画上。而所谓"毕加索加城隍庙"，就是将毕加索画风中的有益成分和中国民族画风中的有益成分结

合起来，亦中亦西，亦古亦今。顺便说一句，早在延安时期，张仃就对毕加索充满了钦佩；建国后，他和毕加索还有一面之缘，甚至提出过授予毕加索荣誉中国公民的动议。而“城隍庙”所代表的民族风格，更是张仃自幼年以来的钟爱之物。不过，这一大批令人耳目一新、具有开风气之先性质的“装饰画”，其目的却一如既往地是要尽力展现新中国积极、乐观、健康、清新和奋发向上的新生气质。

这是一种以红色为底色的火热气质，尽管红色在此时已经被较好地掩饰起来了，但它作为新气质的支撑，却又无处不在。画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猎手》《苍山牧歌》《哈尼族女民兵》《夏日——北京门洞》《谛听》《洱海渔家》等作品中，无论画面中的“主人公”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小孩还是大人，是静物还是“动”物，都无一例外地体现出乐观、积极与奋发向上的调子。这是充满喜色和乐观的画面。在这些作品中，色块既不是职业漫画家阶段的黑与白，也不是火热的、充满革命特色的延安时期的那种红色。主色调已经一跃而为黄色和橙色。色块的变化，充分表达了时代的变迁和艺术家心境的变迁。如果说职业漫画家时期的黑白色块象征了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象征了画家悲观、失望的忧郁内心，如果说延安时期和新年画时期的红色象征了革命语义的颜色，象征了革命汪洋恣肆的力比多，象征了画家内心沸腾的鲜血，那么，金黄色、橙色或金黄色与橙色有比例的杂融，则无疑象征了革命语义在取得胜利后，为画家允诺的累累果实的全面来临。

这是真正的快乐，因此黑色无处藏身；这是大面积的快乐，因此即使有黑色线条和色块的出现，也不过是出于艺术技巧的考虑，当然也被天然地打上了喜悦的气质。这非常符合情理。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

面对丰收的人，会大面积地使用黑色色块；也很难想象，在面对丰收时，有人会不把黑色也处理成丰收——当然，这是更丰腴、更厚实、更厚重的丰收。黑色在这里只是，也只能是希望的翻番。

这一时期的张仃是幸运的，他已经心悦诚服地为新中国开足了马力，用画笔、色块、线条，为革命语义取得巨大胜利的产物——新中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从“文革”的九死一生中幸运复出后，张仃又用自己的热情包装重新获得新生的中国。只是这一次包装的方式不再是设计邮票、国徽、展台，而是壁画：为获得新生的中国增加新的色彩。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包装主要是精神上的，或弘扬精神的（比如设计国徽、邮票），那么壁画则是物质上的，或直接针对物质的。

从“文革”复出后，张仃主持过首都机场的壁画制作、长城饭店的壁画制作……也许是重新获得了解放的原因吧，张仃在首都机场那幅气势宏伟、酣畅淋漓、汪洋恣肆的《哪吒闹海》（1979 年）的长卷中，使用的主色调就是红色；而在为长城饭店设计的壁画《长城万里图》（1983 年）中，金色是景色眉宇间的主要气质。色块的鲜艳、打眼，体现的正是一个被解放者的好心情。

《哪吒闹海》完全可以看作红色的海洋，红色的大狂欢。画面中的海水是红的，闹海的哪吒是红的，哪吒手中的兵器是红的，哪吒的衣服是红的，甚至连空气都是红的。红色翻腾、喧嚣，表征着热闹、新生、速度和热情。张仃这一次所使用的红色，已经和表征革命力比多的红色大为不同，这是对一个九死一生的新生国家的祝愿，是对再生的新中国重新拥有腾飞的速度的渴望，也是对凤凰一样在烈火中再生的中国的热

情欢呼、讴歌。总之，这个时期的红色表征的是新的希望，新的理想，或者新的革命。不用说，在这里，黑色照样是没有多少存身之地的。

壁画是物质性的。墙壁坚硬、冰冷而又热情的质地，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张仃在此之前对新中国的包装具有浓厚的精神色彩，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点，这一阶段的包装则是物质性的。它表征着一个正准备腾飞的再生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仃才会说："当你面对一堵墙时，你一定要把它看作一块纪念碑。"这是为了让物质性的墙壁寄托更深厚、更坚实的希望——比黑色所承载的希望更厚实的希望，是为了让物质性的墙壁，而不是让纯粹"精神性原子弹"，来作为我们的生活背景。

黑色的回归

革命者被人革命，是古今中外常有的事情（比如丹东，李岩）——这绝不仅仅是个狡兔死、走狗烹的问题，更是对革命的不同理解的问题；革命艺术家（无论他以前是什么性质和身份的艺术家）在革命语义的感召下，重新选择自己的色彩、语调、姿势、线条、句法、神色，也是古今中外常有的事情（比如张仃）——但绝不仅仅是个随大流的问题，同样是对革命的不同理解的问题。上述事实虽然常见，但也并非不令人叹息，因为它造成了许多真实的人间悲剧。虽然每一个艺术家，随着时间的流逝都会改变自己的艺术风格，但在革命语义的教育下变更风格，和在时间的严正要求下变更风格，或多或少还是有些区别。

张仃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这不仅仅是说他失去了自由，遭到了人身侮辱，尤其不能忍受的是一些无知的"革命者"从他的绘画作品

中找到了所谓的反革命的“证据”。这中间还不乏对他有所了解的人。据说，“文革”中，张仃所供职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把张仃那批“毕加索加城隍庙”风格的装饰画集中在一起，开了一个“黑画展”。“《苍山牧歌》人体变形比较厉害，就有人责问：‘为什么把傣族姑娘的脚画得那么胖——不，是水肿，这不是影射少数民族生活艰难吗？’院里有位老干部，也算是鲁艺美术系出来的，数十年与张仃共事，他用心更不一般，居然发现了《油灯》里没有油：‘油灯里没有油，这不是攻击社会主义穷吗？’对《大公鸡》，他的解释是：‘公鸡看上去那么好斗，赫鲁晓夫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他是好斗的公鸡，这不是呼应赫鲁晓夫吗？’他对静物画《向日葵》的解释，最为阴险歹毒。向日葵明明是插在一个彩陶罐里，他硬说成是骨灰罐。那么，骨灰罐里插向日葵，又有什么比这更大逆不道的呢？”（王鲁湘：《大山之子——画家张仃》，第132页）而在绘画作品中寻找反党、反革命证据的过程中，自然也伴随着人格、人身的侮辱。

上述种种，使得张仃对他从延安时期就开始钟爱的红色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反感。张仃的传记作家王鲁湘先生这样写道：

> 张仃无法理解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也无法判断所发生的一切。他只感到深深的厌倦，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厌倦。他开始厌恶颜色，特别是红颜色，一想起喧嚣翻滚的“红海洋”，他简直就想呕吐。到后来，他连被子和床单上的颜色都不能忍受，干脆将它们全翻过来，眼不见为净。
>
> （《大山之子——画家张仃》，第136页）

有趣的是，在张仃漫画生涯的“回光返照”时期——即四人帮倒台、

“文革”结束那段时间，在他画出的讽刺性漫画中，也隐隐用到了红色。在画于 1976 年的《女皇梦》《女巫的赌博》《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金猴》《净土变》中，我们都能看到红色的萌动，红色的胎记。橙色和金黄色的交叉使用，则又对红色构成了反讽。这个时期的红色与新年画运动中的红色也构成了反讽。因为这些漫画中的红色再也不是革命的颜色，而是某些人的野心的颜色：野心（假如它还是“心”，当然它也确实是“心”）在跳动过程中，输出的血在颜色上和我们正常人的血非常相似，并没有多少视觉上的差别。张仃故意用一种色彩上混淆视听的方法，也确实包含着一种幽默。这是他的漫画中不多见的幽默。

张仃在停止漫画的几十年后，又重新拾起画笔，实在有些意味深长。这说明，即使像张仃这样一个由革命语义哺育大的人（张仃初到延安时仅仅二十挂零），在革命开始不可遏止地走向它的反面时，仍然会捡起自由主义性质的漫画，捡起漫画上寄居的讽刺和夸张，以表达一个无拳无勇无告者的愤怒。而关于张仃这段时间的漫画的上述特征，以及这种特征的由来，王鲁湘先生有着生动的描绘，转抄如下：

> 1976 年 10 月，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倒台，在中国人民庆祝“解放”的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中，还戴着“黑帮”帽子、没有被“解放”的张仃异常兴奋与激动。一天，他忽然说：“我要画漫画了。‘四人帮’是绝好的漫画题材。”《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他的第一张批判“四人帮”的漫画就令人拍案叫绝！但是他的漫画还不能发表，他还没有资格参加揭批“四人帮”的任何活动，他还是个“黑人”。1976 年 10 月 6 日，“四人帮”被捕的前夜，他还被拉去批斗。所以，他画“四人帮”的漫画，都是在晚上，独

处斗室之中，自己画，自己和家人以及少数挚友看，完全是一种地下活动。他的老朋友、作家郁风回忆说："当他第一次拿到我们家的时候，画页一打开，我们就惊服了。不仅由于它的高水平，不仅由于漫画技巧和形式的完全创新，最主要是他的构思、设计，广泛采取各个时代各种艺术特征，深刻揭示四个丑类的野心和残暴，使我们大大的解恨！他说他就是为了解恨才画了这套画，自己题了'立此存照'四个字是仿鲁迅之意，为了留给孩子们看和保存，永远记住历史上有这么一桩大蠢事大恨事！"这组《立此存照》的漫画，成为张仃漫画的收山之作。

（王鲁湘：《大山之子——画家张仃》，第 28 页）

也就是说，人类在各种美术品类之外，再发明一种旨在反抗和吁请的漫画，不但在紧要关头维护了美术的尊严，也能让一个（或一群）孤苦无告的人获得做人的尊严，哪怕这种尊严仅仅处于密谋状态、在野状态和地下状态。漫画之中隐藏的如许特质，给一个向往自由与美好生活的人，提供了必要的屏障，无论是心理的还是现实的。在这种严峻的时刻，对于弱势者来说，漫画不仅仅是武器，同时也可能是——宗教。

张仃的创作生涯极其漫长，也极其多变，更尝试过多种类型的创作：漫画、工艺品、装饰画、新年画、新国画以及焦墨画等等。现在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张仃在各种类型与各种形式的美术创作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但他一生的最高成就，以我辈之愚见，却应该是他晚年所钟情的焦墨画。这是张仃艺术生命的大喷发，也是他所钟爱的黑色自身的大喷发。

所谓焦墨画，就是纯用玄色的焦墨作画，而不掺杂或很少掺杂其他

颜色。它是纯粹的黑，是彻底的黑。依王鲁湘先生的介绍，张仃对焦墨的发现，是经过了漫长的人生痛苦，并以之为代价换来的补偿品。王先生说，张仃在“文革”后期艰难的日子里，“发现了焦墨，发掘了焦墨，表现了焦墨。这一年他五十七岁，他的焦墨生涯自此开始。以后，他将与焦墨结下后半世的情缘，他将通过焦墨更深刻地发现自我，通过焦墨更深刻地发掘自我，通过焦墨更深刻地表现自我。张仃和焦墨将互相成就，融为一体，共同书写中国山水画新的篇章……用焦墨这种最冷峻、最朴素的语言来抒发张仃此时的胸臆，再恰当不过了。回过头来看，张仃雄强朴实的人格，同焦墨原本就有一种微妙的契合。正如他后来说的那样：焦墨好比音调中的黄钟大吕，乐器中的钢琴，音乐形式中的管弦乐和打击乐，极宜表达艺术的阳刚之气和雄性之美。残酷的人生打击，竟成了艺术发现的契机。这种艺术上的辩证法，真是意味深长。”（王鲁湘：《大山之子——画家张仃》，第 155 页）

这是张仃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张仃一生的经历对张仃的提示。详细解读和评价张仃的焦墨画，不是本文的任务，何况笔者根本不具备这种功力——无论是人生的功力还是艺术的功力。这里想说的仅仅是：在张仃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从他钟爱的黑色开始，中经对黑色的克服并替代性地忘我于红色之中，然后再厌倦红色，最后再一次发现了黑色的伟大功用，确实是大有深意，也令人感叹。张仃在色彩的变迁之中，也仿佛走了一个大圆圈。但这不是一般的圆圈，而是一个巨大而漫长的圆圈，充满追求的圆圈，也是一个痛苦的圆圈。这个圆圈在纯粹的艺术追求之外，表征了张仃那一代艺术家（又岂止是艺术家！）的心路历程：痛苦、尴尬、追求、奋斗、失望、希望、觉悟、惊醒……这种种因素始

终紧紧扭结在一起，构成了他们多姿多彩又让人唏嘘不已的人生。但幸运的是，张仃最后在这个由各种色彩所包围的圆圈的终端，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本色”。张仃创作了大量杰出的焦墨作品。它们是张仃贡献给自己祖国的艺术珍宝。

众多的焦墨作品——它们往往也是气势宏大的作品，表明了颜色的长征最后究竟昭示了什么含义。焦墨画是一个提示，它们冷到极致的色泽，符合我们对古老中国在色泽上的认同。中国是黑色的，丰腴，痛苦，而又始终不失希望——张仃晚年的大量作品，通过它们自身的气势和语调，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

2003年4月7日—11日，北京丰益桥

台湾秀威版后记

这些乱七八糟，时而朝别人吐舌头、时而向自己脸上吐口水的文字，即将和台湾读书人碰面。对我来说，这是一件毫无信心的事情，尽管我确实期待这次碰面。因为我深知，自己的文字很不优秀，尤其是这些文字诉说的很多事情仅仅关乎我自己、关乎我的大陆同胞。一个中国大陆的小知识分子，斗胆把这些不成器的文字输送到已经和大陆有较大文化差异的台湾，肯定很难得到认同。但我还是愿意厚着脸，期待大陆对岸的“一小撮人”（这是中国大陆政治术语体系中的贬义词，意指一小部分自绝于人民的坏人），能够对它感兴趣——当然，连这也很可能只是我的奢望。

我阅读过很多台湾学人的文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很多。这里出于个人兴趣，单提张大春先生的名字，别的名字等以后有机会一一道来，比如钱穆、李济、台静农甚至李敖，但绝不包括余光中。张先生的《小说稗类》真让我眼界大开并拍案叫绝。在我眼中，这是一部世界水平的关于小说的巨著。我阅读这部书不下十次。依我看，张先生的这部大著既可以当学术著作读，也可以当随笔读。无论当作学术还是随笔，它都是极品——我不愿意瞎贬人，但也不愿意乱捧人，何况我同张先生素不

相识（我至今不认识任何一位台湾作家），他的小说更是一部也未读过。之所以提到他和《小说稗类》，仅仅是想说：我对这本书在“一小撮”台湾读书人那里怀有的“奢望”，归根到底很可能只是痴心妄想。

本书虽然杂乱无章，但也有大概的中心：快感和欲望一直是我业余关心的问题。我要补充的是，无论古今还是中外（更不用说一衣带水的台湾同胞了），人都差不多：有同样的欲求，有大致相同的心思。所谓差异，仅仅是同中之“异”或求大同存小异的那个“异”，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如若不信，尽可以去咨询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这个角度看，这本粗陋的随笔，也许可以得到海峡对岸的读者的理解。

感谢尊敬的蔡登山先生和本书的责任编辑蓝志成先生，正是他们对本书先于台湾读者的理解，才导致了本书在台湾的出版，才让我对“奢望”不至于完全滑向“痴心妄想”心存一点点“希望”。

2009年2月22日，北京魏公村

北岳版后记

收录在这本小书中的文字，是我最近八九年来在读书、教学和所谓的学术研究之余抽空写出来的。它们中的大多数是我主动写的，但也有不少是应朋友之约随手涂鸦而成的。尽管如此，没有任何理由把这些文章在质量上的惨不忍睹归罪于约稿，归诸我的朋友们。我觉得与其为寻找托词煞费苦心，不如干脆爽快地承认自己能力有限。

在整理这本小书的过程中，我又将这些文章仔细读了一遍。我得坦率地说，这的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为自己的鲁莽、大胆过头、放肆、轻率和胡言乱语感到了有限的惭愧。虽然将这些历时八九年的文字放在同一个平台上，也让我从中看到了某些令我欣慰的变化，但它们在总体上的糟糕确实让我沮丧。不过，这种糟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却对我十分有用和有效。至少在我炮制这些文章的时候情形就是这样：这些文字基本上可以算作我在琐碎、无聊的生活当中的一次次喘气，在艰辛而又徒劳无功的劳动间歇内的一次次休息，或者干脆说，一个个懒腰、一个个哈欠。我一向把随笔性质的文字只看作“正事之余”（请严肃的随笔作家原谅）。之所以要这样说，仅仅是因为随笔允许我放肆、张狂和不负责任。或者说，我认为随笔有义务让我放肆、张狂和不负责

任。对于一个喜欢胡说八道、善于胡说八道而又没有足够的能力为自己的胡说八道负责的人，随笔的这一特性真是可爱极了。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允许我说出在其他场合不便说出和不敢说出的话。我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快乐。在这个意义上，随笔就是仅仅属于我个人的“宗教的放假”。而我一贯喜欢文本领域内的天下大乱，一贯钟情于文本领域内的春秋战国，因为这给了我这样一个在现实中一无是处的人以浑水摸鱼甚至打家劫舍的机会。所以，不幸见到这本书的读者，最好不要用任何型号的审美标准去待见它。美学不适合我的文字。或者说，我有自己的美学，但它太渺小、太无聊、太低级趣味，不符合通行的美学交通规则，因而完全不足为外人道。

装在这本小书中的文字，基本上都在松松垮垮地谈论欲望和快感。明眼的读者能够一眼看出，在这些文章中，有的是正面在谈论欲望与快感，有的采取了迂回包抄的方式，还有的则使用了离题万里的放风筝的方式。“正面的”可以被称作攻坚战，“迂回包抄的”可以大而化之地叫做游击战，“离题万里的”则可以叫做空袭或者偷袭。就我的本性来说，我比较喜欢游击战，但尤其喜欢偷袭。因为在我看来——也仅仅是在我看来，这两种战术都不是为了侵占别国的领土，也不是为了消灭别国的有生力量，而仅仅是为了向邻国示示威、开开玩笑，顺便为自己找点乐子。我承认，我就是这样看待历史上众多类似行为的。攻坚战的目的基本上完全与此相反。一般来说，我几乎从来没有侵占别人的领土的大志，也没有这样的癖好。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这个能力。不过话说回来，有一般就有例外，如果自觉实力超群，核武器库存又足够充足，再加上某些具有极大杀伤力的生化武器的帮衬，就是侵占了别国的领土，

也没什么要不得的。恕我大胆，这也是我偶尔采用攻坚战术的原因。毕竟占领了别人的家园更是实力的体现，当然也就更有成就感。我对此实在是仰慕已久，因而在没有实力、没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情况下，有时也禁不住不自量力地手心发痒。这里先给那些胆豪气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我这样做并不是要抢他们的地盘，仅仅是出于对他们的仰慕。

在我看来，欲望、快感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就是一片巨大的国土。虽说它一直就在我们身上，但往往只在我们身边，甚至有时候离我们还挺远。自从造化把猴子弄成没毛的人以来，不管我们同不同意，我们对这片国土始终知之甚少。我们对它的“了解”，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反复证明为莫大的“误解”。欲望和快感的如许特质带来了与本书的文字相关的两个后果，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提一提。一，它可以让我面对这片神秘的疆域胡说八道、信口开河而又不承担责任。二，我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采取空袭和游击战的方式面对这片疆土，在乱放了一阵机关枪和乱投了一阵“爱国者”导弹后，自以为还打中了几个目标，从而能够洋洋得意地上床睡觉，做自己的春秋大梦去。

若许年来，我们都生活在欲望以及和欲望有天然连带关系的快感组成的天罗地网之中，但因为五花八门的心理作用和各种怪模怪样的立场的广泛干扰，我们往往看轻了这个“天罗地网”的用途和意义。我们对欲望和快感的误解，最终导致了我们的若干失误。我承认，欲望和快感确实是难以准确了解和精确分说的；同时我也相信，正因为这样，我们对它的误解也就有了深刻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理由。这一点当然也给我带来了好处：它使本书中的胡说八道、大放厥词和胆大妄为有了较为坚实的理由——既然允许别人去误解欲望和快感，那也得允许

区区在下去犯错误。我赞同阿 Q 同志的主张：和尚动得，老子也动得。谁也不比谁更有权力。

欲望和快感是我的随笔写作——假如我的写作被允许称为随笔写作——的重要话题。这个话题是如此巨大，以致我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敢采用攻坚战的方式。不过，无论是采用哪种战术，我的目的还是想将快感和欲望拉向人本身，想趁机把它瞧个仔细，搞清它的线条、命脉、胎记、五官、肠胃甚至充满激情的三角区。如果能在此过程之中给我的目光增加一点犀利度，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和更加准确地看待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生活，那简直就是额外的收获了。当然，这只是我的奢望。

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奢望恰好是欲望的一部分，同样能给人带来快感。这也是我敢如此奢望的重要原因。只不过我的斗胆，又给不幸见到这本书的读者平添了若干口实，当然，也不幸正中了欲望和快感的下怀。我承认，我这是明知故犯。但处在今天这个几乎没有标准的世界上，即使是明知故犯，归根到底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这些文章发表于如下报刊：《读书》《莽原》《天涯》《十月》《青年文学》《粤海风》《黄河》《中华文学选刊》《布老虎散文》《文学界》以及《长沙晚报》；它们的发表和如下人士有关：叶彤、李洱、李静宜、李少君、周晓枫、邱华栋、祝勇、徐南铁、谢泳、奉荣梅、王干、远人、宁肯、雪媛、颜炼军。愿女士们、先生们接受我微薄的谢意。

2007 年 5 月 1 日，北京魏公村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颓废主义者的春天
作者=敬文东著
页数=338
SS号=13452453
DX号=
出版日期=2013.10
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